中國文學批評史

罗根泽 著

三







中國文學批評史

三

罗根澤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序

"不禁感慨系之"，眞想不到由我来序罗雨亭(根泽)同志的遗著。雨亭年龄比我小，精力比我强，只由于疾病缠身，竟使他余业未就，賫志以歿，所以写此序时，百感交集，眞不免墨瀋泪痕，一齐涌上了笔端。当我在无锡疗养的时候，得雨亭信，已说肝病很重，语气间颇有伤感情绪，我除复信慰问外，再带一些勉励意思，要求我们两人都能把病养好，重做工作。但是，到现在，雨亭竟斗不过病魔而逝世了，而由我来序他的遗著了，序他仅仅部分完成还没有全部完成的遗著了。既为私谊慟，更觉得这是学术上的损失。

雨亭少年好学，除入清华国学研究所外，再入燕京的国学研究所。当时他治诸子之学，已有所成就。不久我因事不能再兼清华的文学批评史课，就邀他接我的课。雨亭当时有难色，谦让不肯去。我说治一门学问有成就的，治别一门也决无问题。这话固然说得偏一些，但对雨亭来讲，而且指这两门学问讲，我想还是很合适的。于是，雨亭开始教文学批评史的课。果然，雨亭不但能胜任，而且比了他的诸子之学有更大的成就。

雨亭之书，以材料丰富著称。他不是先有了公式然后去搜集材料的，他更不是摭拾一些人人习知的材料，稍加组织就算成书的。他必须先掌握了全部材料，然后加以整理分析，所以他的结论也是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的。他搜罗材料之勤，眞是出人

意外，诗词中的片言只语，笔记中的零楮碎札，无不仔细搜罗，甚至佛道二氏之书也加浏览，即如本书中采及智圆的文论，就是我所沒有注意到的。当文学批评史这门学问正在草创的时候，这部分工作是万万不可少的。而雨亭用力能这样勤，在荜路蓝缕之中，作披沙拣金之举，这功绩是不能抹煞的。至于观点方法，如果说还有值得商榷之处，则是旧知识分子一般的局限，我们不必在这方面加以苛求。而且，以我所知，他在这本书中，也确是想尽力做到减少错误或沒有错误的。

遗著，他的文学批评史的遗著，只能到这一时期为止，不能再看到他搜集的明清部分的材料了，更不能再看到他对明清部分材料的意见了。看到琴尚且想到抚琴的人，何况是序他的遗著呢？何况是序他沒有全部完成的遗著呢？何况是序我认为畏友的遗著呢！

眞不禁感慨系之！

郭绍虞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一日

目　录

第六篇　两宋文学批評史

第六篇

兩宋文学批評史

第一章　宋初的詩文复古革新論

一　唐宋两代文学复古的異同

唐宋两代都进行了文学复古运动，但唐代的复古止限于文，宋代的复古兼及于诗；唐代的复古是复三代两汉之古，宋代的复古是复唐代之古。无论唐代的复三代两汉之古或宋代的复唐代之古，在当时都是一面伟大的旗帜。在这伟大的旗帜下进行的，不止是复古运动，更重要的还有革新运动：唐代的革新运动是在针对着魏晉以迄唐代的骈文，宋代的革新斗爭是在针对着晚唐以迄宋初的时文。他们一面复古，一面革新，再加上时代不同，表现的对象不同，所以结果是唐代的文章并不全同于三代两汉而完成了唐代独特的风格，宋代的诗文也不全同于唐代而完成了宋代独特的风格。

唐代的复古运动成于韩愈，韩愈说“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详四篇七章三节）则所复之古当然是三代两汉。他反对骈文，倡作古文是人所共知的，但找不到反对律诗的言论；所作虽以“古诗”为多，但“律诗”也有八十首。（昌黎集卷十）他推崇李杜，李主张复古，（详四篇三章二节）杜兼取古律。（同上三节）和韩愈同时的元稹指出杜诗的特长是：“铺陈终始，排比声韻，大或千言，少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详四篇四章一节）正是就律诗而言。韩愈的复古源于独孤及，

独孤及对于诗却称道沈佺期宋之问的:“裁成六律,彰施五色,使言之而中伦,歌之而成声。”说是:“缘情绮靡之功,至是乃备。”(详一篇一章八节)这实质就是赞扬沈宋的完成律诗。可见唐代的复古止是文的以古代骈,诗则并不一定以古代律,相反的还提倡律诗。

宋代的复古运动始于柳开,中间经过王禹偁诸人的努力,到欧阳修总集大成。柳开初名肩愈,字绍先,意思是肩韩愈,绍柳宗元。(详二章五节)王禹偁赠朱严云:“谁怜所好还同我,韩柳文章李杜诗。”(小畜集卷十)欧阳修记旧本韩文后云:“学者当至是而止尔。”(详三章一节)可见他们都是在复韩、柳、李、杜之古,也就是在复唐代之古。自然他们也进而复三代两汉之古,如柳肩愈的更名开,字孟涂,据他自己说,就是因为“既肩既绍”之文,又“大探六经之旨,已而有包括杨孟之心”,“意谓将开古圣贤之道于时”,“为必开之为其涂矣”。(答梁拾遗改名书,河东集五)但复三代两汉之古既是在“既肩既绍”之后,知也是由唐代引导。

韩柳之古是文,李杜之古是诗。欧阳修作苏氏文集序云:“子美(舜钦)之齿少于予,而予学古文反在其后。天圣之间,予举进士于有司,见时学者务以言语声偶擿裂,号为时文,以相夸尚。而子美独与其兄才翁及穆参军伯长,作为古歌诗杂文。”(详三章二节)可见他们的复古不止在“古文”,还在“古歌诗”。欧阳修统名苏穆所作为“古歌诗”,检苏学士(舜钦)文集,则标为“古诗”者九十六首,标为“律诗”者一百一十六首,这就是因为对古体而言,后者为“律诗”,对“时文”而言,则后者也是“古歌诗”。

南宋刘克庄竹溪诗集序云:“本朝三百年间,虽人各有集,集各有诗,诗各有体,或尚理致,或负材力,或逞辨博,少者千篇,多

至万首，要皆经义策论之有韵者尔，非诗也。”（后村大全集九四）后人论诗者也都指出“唐人以诗为诗，主性情；宋人以文为诗，主议论”，尽管清人叶燮曾在原诗卷四有反驳。这一则是由于诗的本身有了转变，二则也由于另外又有了主性情的新文体，就是词。元人刘祁在归潜志就说过了：“唐以前诗在诗，至宋则在长短句，今之诗则俗间俚曲也。”既然唐以前的诗在诗，主性情，所以就与文章分道扬镳；既然宋代的诗在词，诗本身转于主议论，所以就与文章合流发展。

二 宋初的文体——时文

唐代的复古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次复古，宋代是第二次，论理第二次应较第一次容易，但是不然。唐以前为南北朝，南朝盛行今文（就是骈文），北朝却大半是古文，所以唐代的复古，不过是以北朝的文学代替南朝的文学，（详四篇六章一节）比较不甚困难。宋以前为晚唐五代，晚唐五代的文学纯是“今体”，就是后来所谓“时文”。宋太祖建隆元年（九六〇）称帝，这种时文仍执文坛牛耳，一直到将近百年的仁宗嘉祐二年（一〇五七），欧阳修知贡举，黜“太学体”，（详后三章二节）才逐渐的銷声匿迹，从文坛败退。那么复古革新，当然更不容易。

“今体”的名称见李商隐樊南甲集自序，（详五篇一章二节）“时文”的名称见田况儒林公议（详下节）及欧阳修与荆南乐秀才书、苏氏文集序，（详前节及三章二节）意义没有多大差别，所以宋初的时文大都效法李商隐的今体。不过如详细分析，则百年间的时文，前期是沿袭五代余绪，可以称为“五代体”，后期是模仿温（庭筠）李诗文，可以称为“晚唐体”。

宋史文苑传序云：

国初楊亿刘筠，犹襲唐人声律之体，柳开穆修志欲变古而力弗逮，廬陵欧阳修出，以古文倡，临川王安石、眉山苏軾、南丰曾巩，起而和之，宋文日趋于古矣。

好象柳开穆修的变古是对杨刘而发，其实大谬，杨亿生于宋太祖开宝七年（九七四），柳开生于晉出帝开运末年（约为九四七，据张景所作行状），杨亿后柳开约二十年，知柳开的革新变古不是针对杨刘，而是针对杨刘以前的与古相反的文体，就是"五代体"。

这种五代体的作家，靠着传统余绪，稳据当时文坛，不须别创新的风格，也不须别创新的理论。作品，在当时自然不少，但因为止是沈溺在旧的窠臼，到现在几乎全被淘汰。理论方法方面，止有詩格、文格和詩句图，（详五篇二、三、四各章）也纯是五代旧说的因袭与扩展。

古文家骂时文丽靡薄弱，（详下节）究竟怎样的丽靡薄弱，我们止能取证史书。宋史文苑传的第一卷（宋史四三九），列叙了十几位文人，言及文章的，止有郭昱"好为古文"，其余都是沿袭五代的声偶丽靡。如宋白"学问宏博，属文敏贍，然辞意放蕩，少法度"。"尝类故事千余门，号建章集"。朱昂"读陶潛閒情赋而慕之，因广其辞"。赵邻几"少好学，能属文，尝作禹别九洲赋，凡万余言，人多传诵"。"为文浩博，慕徐、庾及王、杨、卢、骆之体。每构思，必斂衽危坐，成千余言始下笔，属对精切，致意縝密，时輩咸推服之。及掌诰命，颇繁富冗长，不达体要，无称职之誉"。何承裕"有清才，好为歌詩"。郑起"时举子多尚詩赋，惟起有文七轴，歌詩尤清丽"。和𡼖"献所著文赋五十轴"，又"献观灯赋"。"虽幼能属文，殊少警策。每草制必精思讨索而后成，拘于引类偶对，颇失典诰之体"。此外还有梁周翰，传云："五代以来，文体

卑弱，周翰与高锡、柳开、范杲，习尚淳古，齐名友善，当时有高、梁、柳、范之称。”但就其“上五凤楼赋，人多传诵之”，“以辞学为流辈所许”而言，知仍然偏近五代体，和柳开的“变古”不同，据柳开答梁拾遗改名书，周翰“指摘韩氏（愈）之疵”，“以韩氏未足为可贤”。（河东集五）和柳开的学韩愈古文，也显然异趣。

范仲淹的尹师鲁河南集序云：

> 唐正元元和之间，韩退之主盟于文而古道最盛。僖懿以降，寖（原误作寝）及五代，其体薄弱。皇朝柳仲涂（开）起而麾之，髦俊率从焉，仲涂门人能师经探道有文于天下者多矣。洎杨大年（亿）以应用之才，独步当世，学者刻辞镂意，有希髣髴，未暇及古也。其间甚者专事藻饰，破碎大雅，反谓古道不适于用，废而弗学者久之。洛阳尹师鲁，少有高识，不逐时辈，从穆伯长（修）游，力为古文。……欧阳修从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变。（范文正公集，四部丛刊本卷六）

是的，柳开所领导的革新变古的未能成功，原因甚多，而杨亿的“以应用之才，独步当世”，吸引“学者刻辞镂意，有希髣髴”，确是重要关键。神宗旧史欧阳修本传云：

> 国朝接唐五代末流，文章专以声病对偶为工，剽剥故事，雕刻破碎，甚者若俳优之辞。如杨亿刘筠辈，其学博矣，然其文亦不能自拔于流俗，反吹波助澜，助其气势，一时慕效，谓其文为昆体。（欧集附录四）

田况儒林公议云：

> 杨亿在两禁变文章之体，刘筠钱惟演辈皆从而敩之，时号杨刘。二公以新诗更相属和，极一时之丽，亿复编叙之，题曰西昆酬唱集，当时佻薄者谓之西昆体。其他赋颂章奏虽颇伤于雕摘，然五代以来芜鄙之气，由兹尽矣。（稗海本卷上）

前者谓杨刘“不能自拔于流俗”，后者谓杨刘已变五代芜鄙之气，两说相反，但都能说中一面。自同点看来，晚唐五代的文体本来

相近，模仿晚唐的杨刘自然是未能自拔“五代末流”，自异点看来，五代矜重“声病对偶”，晚唐矜重“剽剝故事”，模仿晚唐的杨刘自然是已革五代蕪鄙之气。杨亿西昆酬唱集序云：

> 余景德中，忝佐修书之任，得接群公之游。时今紫微錢君希圣（惟演），秘閣刘君子仪（筠），并負懿文，尤精雅道，雕章丽句，膾炙人口。

可见他们所矜重的是“雕章丽句”，所以也常以“雕章丽句”赞人，如杨亿作杨徽之行状云：“凡游赏宴集，良辰美景，为有雕章丽句，传诵人口。”（武夷新集，文津四库本十一）“雕章丽句”就是“剽剝故事”。严羽沧浪诗话，王士祯居易录，冯武西昆酬倡集序都说西昆体起于李商隐以至溫庭筠和段成式。这种错误，清四库提要已有辯证，但杨刘的取法溫李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所以就历史言是“晚唐体”。

刘攽中山诗话载：“天僖中，杨大年、錢文僖（惟演）、晏元献（殊）、刘子仪（筠）以文章立朝，为诗皆宗李义山，后进多窃义山语句。尝內宴，优人有为义山者，衣服败裂，告人曰：吾为诸馆职撏撦至此！”是模仿义山诗文已成一时文风，欧阳修所黜的“太学体”，疑也是模仿义山不成的末流之弊。欧阳修的儿子欧阳发所记事迹云：

> 嘉祐二年，先公知貢举。时学者为文以新奇相尙，文体大坏。公深革其弊，一时以怪僻知名在高等者，黜落几尽。二苏出于西川，人无知者，一旦拔在高等。牓出，士人紛然惊怒怨謗。其后稍稍信服，而五六年間，文格遂变而复古，公之力也。

“文体大坏”下原注云：

> 僻澀如“狼子豹孙，林林逐逐”之語，怪誕如“周公伻图，禹操畚鍤，傅說負版，来筑太平之基”之說。（欧集附录五）

这确是"刻辞镂意，有希髣髴"而不成，据知"太学体"也就是"晚唐体"。

三　古文家对时文的攻击

时文猖獗的一方面固然是阻碍了复古革新，但另一方面也更激起了复古革新。首先倡导古文的是柳开，在上王学士第三书攻击时文云：

> 代言文章者，华而不实，取其刻削为工，声律为能。刻削伤于朴，声律薄于德，无朴与德，于仁义礼知信也何？其故在于幼之学焉，无其天之性也，自不足于道也。以用而补之，苟悦其耳目之翫，君子不由矣。（河东集，四部叢刊本卷五）

柳开所攻击的今文就是时文，从历史上的体裁说，可以名为"五代体"，指出为五代体而施以攻击的要推王禹偁和范仲淹。王禹偁的东观集序云：

> 天未厌德，付于有唐。然而三百年間，圣賢相会，事业之大者貞观开元，文章之盛者正元長庆而巳；咸通以下，不足征也。（小畜集，四部叢刊本卷十九）

又在送孙何序云：

> 咸通以来，斯文不竞，革弊复古，宜其有聞。国家乘五代之末，接千岁之統，創业守文，垂三十載，圣人之化成矣，君子之儒兴矣，然而服勤古道，鑽仰經旨，造次顚沛，不違仁义，拳拳然以立言为己任，盖亦鮮矣。（集十九）

此外，五哀诗中的高锡一首亦云："文自咸通后，流散不复雅，因仍历五代，秉笔多艳冶。"（集四）咸通是唐懿宗的年号，历僖昭二宗就是五代。送孙何序说国家乘五代之末，作文章的很少"拳拳然以立言为己任"。五哀诗更明说"因仍历五代，秉笔多艳冶"。

显然是攻击当时诗文的仍然陷溺在"五代体"的艳冶流散。

范仲淹的尹师鲁河南集序就说:"懿僖以降,寖及五代,其体薄弱。"(详前节)在唐异诗序又云:

五代以还,斯文大剝,悲哀为主,风流不归。皇朝龙兴,頌声来复,大雅君子,当抗心于三代。然九州之广,庠序未振,四始之奥,講議蓋寡。其或不知而作,影响前輩,因人之尙,忘己之实,吟詠性情而不顧其分,风雅比兴而不覌其时;故有非穷途而悲,非乱世而怨,华車有寒苦之述,白社为驕奢之語,学步不至,效颦则多;以至靡靡增华,愔愔相濫,仰不主乎規諫,俯不主乎劝誡,抱郑卫之奏,責夔曠之賞,游西北之流,望江海之宗者有矣。(范文正公集,四部叢刊本卷六)

这不止是攻击五代文体的悲哀风流,而更是攻击宋初模仿五代文的一则学步效颦,忘己之实,二则变本加厉,增华相滥。大体说来,柳开在着重的揭发华侈伤德,范仲淹在着重的揭发模拟失真。

首先攻击西昆体——即晚唐体的是陈从易,稍后最激烈的是石介。田况儒林公议云:

陈从易頗好古,深擯(楊)亿之文章,亿亦陋之。天僖中,从易試別头进策問时文之弊曰:"或下里如会粹,或叢脞如急就。"亿党見者深嫉之。近山东石介嘗作怪說以詆亿,其說尤甚于从易。(稗海本卷上)

石介(一〇〇五——一〇四五)的怪说分上中下三篇,中篇云:

昔楊翰林(亿)欲以文章为宗于天下,忧天下未尽信己之道,于是盲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見有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使天下人耳聾不聞有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俟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之道灭,乃发其盲,开其聾,使天下人惟見己之道,惟聞己之道,莫知其他。今天下有楊亿之道四十年矣,今人欲反盲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見有楊亿之道,使天下人耳聾不聞有楊亿之道,俟楊亿道灭,乃发其盲,开其聾,使目惟見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

之道，耳惟闻周公、孔子、孟轲、杨雄、文中子、吏部之道。（石徂徕集，康熙刻本卷五）

这真是对西昆体的毫不躲闪的攻击，当时颇有人替他担扰。据怪说下，或有人忠告他说："子之怪说，上篇言佛老，下篇言杨亿（今为中篇），信怪矣。然今举中国而从佛老，举天下而学杨亿之徒，亦云众矣，虽子之说长，又岂能果胜乎？子不惟不能胜夫万亿千人之众，以万亿千人之众反攻子，予且恐子不得自脱，将走于蛮荒险僻深山中，而不知避也！子亦诚自取祸矣！"石介听了，不惟不惧而知避，反跃身数尺，瞑目作色云：

吾学圣人之道，有攻我圣人之道者，吾不可不反攻彼也。盗入主人家，奴尚为主人拔戈持矛以逐盗，反为盗所击而至于死且不避，其人诚非有利主人也，盖事主之道不得不尔也，亦云忠于主而已矣，不知其他也。吾亦有死而已，虽万亿人之众，又安能惧我也！（集五）

有人对他这种态度担忧，也有人对他这种态度怀疑，欧阳修就觉得有点"特异于人以取高"，他作答欧阳永叔书云：

今天下为佛老，其徒嚣嚣乎声，附合响应，仆独挺然自持吾圣人之道；今天下为杨亿，其众哓哓乎口，一唱百和，仆独确然自守吾圣人之经。凡世之佛老杨亿云者，仆不惟不为，且尝力摈之，天下为而独不为，天下不为而独为，兹是仆有异乎众者。然亦非特为取高于人，道适当然也。（集十五）

旁人的担忧与怀疑，都改变不了他的攻击佛老杨亿，这是因为自他看来，佛老坏乱圣人之道，杨亿破碎圣人之道，学圣人之道的人，自然应当不避艰险讥讪的施行攻击。何以说佛老坏乱圣人之道，兹可从略；何以说杨亿破碎圣人之道，怪说中云：

今杨亿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刻镂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使天下不为书之典谟、禹贡、洪范，诗之雅颂，春秋之经，易之繇、爻、十翼，而为杨亿

之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其为怪大矣。（集五）

这种诋毁确是不免太过，可是西昆体的末流之弊，也确是割裂补衲，当时的优人就讥诮他们挦撦义山，（详前节）稍后的欧阳修诗话也说时人的效法西昆体，致使"先生老辈，患其多用故事，至于语僻难晓"。反映到自命学圣人之经的石介，当然要抉本塞源，使天下人目盲不见杨亿之道，耳聋不闻杨亿之道了。

不过石介的使天下人不闻见杨亿之道，是针对西昆体的末流之弊，不是针对杨亿本人，所以怪说下云：

吾以攻乎坏乱破碎我圣人之道者，吾非攻佛老与杨亿也。

攻击的目标既不在杨亿本人，而在西昆体的末流之弊，则集中的没有提到杨亿西昆而止是攻击侈丽文学的言论，事实也都是对末流的西昆体而发。如上赵先生书云：

今之为文，其主者不过句读妍巧，对偶的当而已；极美者不过事实繁多，声律调谐而已。雕锼篆刻伤其本，浮华缘饰丧其真，于教化仁义礼乐刑政，则缺然无仿佛者。

又云：

今……独斯文邈乎不可视于唐。居上者点化语言，组织章句。如彼画工，不知绘事后素以为质，但夸其藻火之明，丹漆之多。如彼追（锤）师，不知良玉不琢以为美，但夸其雕刻之工，文理之缛。载毫荦笔，穷山刊木，模刻其文字，布于天下以为后进式。（集十二）

此外，上蔡副枢书、与裴员外书、上范中丞书，也都有类此的言论，这可见石介对末流的西昆体的深恶痛绝。欧阳修怀疑他的态度，可是欧阳修的能以古文革替今文，石介的这种冲锋陷阵，实在不无先驱之功。

四 柳开的古文定义

攻击时文是破坏敌人。止破坏敌人是不够的，还要建设自己。建设自己除了创作以外，就是阐发理论与寻求路线；寻求路线俟下章叙次，兹止述阐发理论。就阐发理论说，首当大书特书的是柳开（生晉开运末）的古文定义，他在应责一文云：

> 子之言，何謂为古文？古文者，非在辞澀言苦，使人难誦讀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長，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謂古文也。子不能味吾书，取吾意，今而观之，今而视之，不以古道观吾心，不以古道观吾意，吾文无过矣。吾若从世之文也，安可垂教于民哉，亦自愧于心矣。欲行古人之道，反类今之文，譬乎游于海者，乘之以驥，可乎哉？（河东集，四部叢刊本卷一）

“古其理，高其意”，是古文的內容；“随言短长，应变作制”，是古文的形式；“垂教于民”，是古文的目的；定义明确，目的也显豁，对推行古文，无疑的发生很大作用。

古文是对今文而言，和今文的差别，柳开在答臧丙第二书云：

> 文取于古，則实而有华；文取于今，則华而无实。实有其华，則曰經緯之文也，政在其中矣；华无其实，則非經緯之文也，政亡其中矣。（集六）

又在上王学士第四书云：

> 始于心而为若（原作君，疑誤）虛，終于文而成乃实，习乎古者也；始于心而为若实，終于文而成乃虛，习乎今者也。习古所以行今，求虛所以用实，能者知之矣，不能者反是。（集五）

这自然不免偏袒古文，但大体不很错误。首先倡导今体——就是今文——的是李商隐自序樊南甲集说：“有請为文，或时得好对切事，声势景物，哀上浮壮，能感动人。”（详五篇一章二节）柳

开力主恢复古文，答臧丙第三书说:“我本非以文矜伐于今之人也，将以文矜伐于古之道也；矜伐于古之道也，则务将教化于民。……若以文矜伐于今之人也，则不在于古之文也，在于今之所尚者之文也，轻浮侈靡，张皇虚诈，苟从时欲，求顺己利。”（集六）合而比观，益可以知古文的目的在教人，而今文的目的则在动人。教人要“古其理，高其意”；动人则要“好对切事，声势景物，哀上浮壮”。自今文家看来，“好对切事，声势景物，哀上浮壮”，这是文，同时也就是实；自古文家看来，这是辞华，不是实，实是可用以教人的“古其理，高其意”。因此柳开说古文“实有其华”，“则曰经纬之文也，政在其中矣”；今文“华无其实”，“非经纬之文也，政亡其中矣。”古文所阐论的是实，这实泰半是因依古人；今文所描绘的是虚，这虚却泰半是自己创造。因此柳开又说:“始于心而为若虚，终于文而成乃实，习乎古者也；始于心而为若实，终于文而成乃虚，习乎今者也。”“古其理，高其意”的目的在教当世之人，因此又说:“习古所以行今，求虚所以用实。”

基于晚唐五代的历史流风余俗，重辞华的风气，在宋初还占绝对优势；基于宋初社会政治的需求，以古道教民的意识，已急剧发达，由是就有人主张以偶语述古道。如张詠（九四六——一〇一五）答友生问文书云:

> 視文之臧否，見德之高下，若以偶語之作，参古正之辞，辞得异而道不可异也，故謂好古以戾、非文也，好今以荡、非文也。（乖崖集，續古逸叢书本卷七）

虽没有彰明较著的驳斥柳开，但总是在攻击古文家的反对今文，独倡古文。在张詠看来，今文也可以述古道，在柳开看来，则绝对不可能，述古道非古文莫办。为什么呢？因为古文“随言短长，应变作制”，能委曲纤悉的载述阐论；今文“华而不实，取其刻削

为工，声律为能；刻削伤于朴，声律伤于德”。（详前节）当然不适于论述古道啦。

五　王禹偁的易道易晓说

张咏的反对标榜古文，并未能阻止古文运动，相反的倒促成古文的改善。的确，古文的毛病是最容易流于“好古以戾”，韩愈以后的唐代古文家的斤斤于提倡怪奇，（详四篇七章）便是绝好的例证，也是绝好的鉴戒。因此到了宋代，不惟反对标榜古文的张咏，指出“好古以戾”的非文章正轨，倡导古文的人也知预防艰深；柳开已经说古文不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诵读之”，稍后的王禹偁（九五四——一〇〇一）更剀切详明的提倡易道易晓。答张扶书云：

> 夫文传道而明心也，古圣人不得已而为之也。……既不得已而为之，又欲乎句之难道邪？又欲乎义之难晓邪？

由是首引六经为例云：

> 请以六经明之。诗三百篇皆俪其句，谐其音，可以播管弦，荐宗庙，子之所熟也。书者、上古之书，二帝三王之世之文也，言古文者无出于此，则曰：“惠迪吉，从逆凶。”又曰：“德日新，万邦惟怀；志自满，九族乃离。”在礼儒行者，夫子之文也，则曰：“衣冠中，动作慎，大让如慢，小让如伪”云云者。在乐则曰：“鼓无当于五声，五声不得不和；水无当于五色，五色不得不彰。”在春秋则全以属辞比事为教，不可备引焉。在易则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日月运行，一寒一暑。”夫岂句之难道邪？夫岂义之难晓邪？今为文而舍六经，又何法焉？若第取其书之所谓“吊由灵”，易之所谓“朋合簪”者，模其语而谓之古，亦文之弊也。

又引韩愈的文章为例云：

> 近世为古文之主者，韩吏部而已。吾观吏部之文，未始句之难道

也，未始义之难晓也。其间称樊宗师之文，必出于己，不蹈袭前人一言一句，又称薛逢为文，以不同俗为主。然樊薛之文不行于世，吏部之文与六籍共尽。此盖吏部诲人不倦，进二子以劝学者。故吏部曰："吾不师今，不师古，不师难，不师易，不师多，不师少，惟师是尔。"（小畜集，四部丛刊本卷十八）

由是劝张扶"远师六经，近师吏部，使句之易道，义之易晓。"张扶答书，也引六经和韩文为证，却说文章不一定易道易晓。又引杨雄说文比天地，不当使易度易测。王禹偁于再答中，逐条驳正。驳所引杨雄语云：

子之所谓杨雄以文比天地，不当使人而易度易测者，仆以为雄自大之辞也，而非格言也，不可取而为法也。夫天地易简者也，测天者知刚健不息而行四时，测地者知含弘光大而生万物，天地毕矣，何难测度哉？若较其寻尺广袤而后谓之尽，则天地一器也，安得言其广大乎？且雄之太玄准易也，易之道圣人演之，贤人注之，列于六经，悬为学科，其义甚明而可晓也。雄之太玄既不用于当时，又不行于后代，谓雄死已来世无文王、周、孔，则信然矣；谓雄之文过于伏羲，吾不信也。仆谓雄之太玄，乃空文尔。（集十八）

驳谓六经韩文不易道易晓云：

子又谓六经之文，语艰而义奥者十二三，易道而易晓者十七八。其艰奥者，非故为之，语当然矣。今子之文则不然，凡三十篇，语皆迂而艰也，义皆昧而奥也，岂子之文过于六籍邪？若犹未焉，子其择也。子谓韩吏部曰："仆之为文，意中以为好者，人必以为恶焉，或时应事作俗下文字（此三字原缺，据韩文补），下笔令人惭，及示人，人即以为好者；"此盖唐初之文有六朝淫风，有四子艳格，至贞元元和间，吏部首倡古道，人未之从，故吏部自是而人能是之者百不一二，下笔自惭而人是之者十有八九，故吏部有是叹也。今吏部自是者著之于集矣，自惭者弃之无遗矣。（同前）

实则六经在著作时代虽易道易晓，但传至后代，则以语文变迁，确是逐渐的形成语艰义奥。在汉代，杨雄的法言问神篇已经说："虞夏之书浑浑尔，商书灏灏尔，周书噩噩尔。"到唐代，韩愈在进学解更说："周诰殷盘，佶屈聱牙。"王张的时代距韩愈又后二百年，语文又有变迁，自当时的语文看六经，无疑的更语艰义奥。假使眞是效法六经，恐怕也必然象张扶说的语艰义奥，不会象王禹偁说的易道易晓。王禹偁说韩愈的文章易道易晓，韩愈自己却说怪怪奇奇。这可以证明易道易晓是宋初的古文新义；也可以证明宋初的古文运动，表面上是复古，实质却也在革新。

王禹偁所举的易道易晓的例子是：诗三百篇的"俪其句，谐其音"，春秋的属辞比事，以及其他各经的俪句，由此知他们虽反对当时的四六文，却不反对俪句。俪句是构成四六文的基础，却不即是四六文；四六文必需全篇四六对偶，俪句则不妨前后都是散文。在他们看来，执执的四六对偶，不易"传道明心"，所以必需改革；执执的决不对偶，也不易"传道明心"，所以也不应提倡。他们所主张的古文，是"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可长可短，也可散可骈。这样才能委曲详悉的"传道明心"，这样才是易道易晓的"实有其华"。他们宗经学韩，却不效法经文韩文的艰奥怪奇；他们反对晚唐五代的四六文，却采取构成四六文的俪句，这是他们的新贡献，也是宋代古文的特点。

六　赵湘尹洙的文心説

易道易晓是为的"传道明心"，道和心是文章的内容。柳开上王学士第四书云：

> 文不可遽为也，由乎心智而出于口。君子之言也度，小人之言也覝。号令于民者，其文矣哉，心正则正矣，心乱则乱矣。发于内而主

于外，其心之谓也；形于外而体于内，其文之谓也；心与文一者也。君子用己心以通彼心，合则附之，离则诱之，咸然使至于善矣。故六经之用于时若是也。（集五））

他只提出心，没有提出道，但“君子之言也度”，也就是基于君子的心合于道。柳开以后的赵湘（九九三年进士）作本文，就很明显的说文源道心：

灵乎物者文也，固乎文者本也，本在道而通乎神明，随发以变，万物之情尽矣。……若伏羲之卦，尧舜之典，大禹之谟，汤之誓命，文武之诰，公旦公奭之诗，孔子之礼乐，丘明之褒贬，垂烛万祀，赫莫能灭，非固其本，则湮乎一息焉。一息之湮，本且摇矣，而况枝叶能为后世之荫乎？而况能尽万物之情乎？……或曰：古之文章所以固本者，皆圣与贤，今非圣贤，若之何能之？对曰：圣与贤不必在古而在今也。彼之状亦人尔，其圣贤者心也；其心仁焉、礼焉、智焉、信焉、孝悌焉，则圣贤矣；以其心之道发为文章，教人于万世，万世不泯，则固本也。今学古之文章，而不求古之仁义之道，反自谓非圣贤不能为之，是果中道而废者，果贼于儒术者，为蠹教之物者。（南阳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卷六）

尹洙（一〇〇一——一〇四七）的志古堂记也说：

夫古人行事之著者，今而称之曰功名；古人立言之著者，今而称之曰文章。盖其用也，行事泽当时以利后世，世传焉从而为功名。其处也，立言矫当时以法后世，世传焉从而为文章。行事立言不与功名文章期，而卒与俱焉。后之人欲功名之著，忘其所以为功名，欲文章之传，忘其所以为文章，故虽得其欲而戾于道者有焉。如有志于古，当置所谓文章功名，务求古之道可也。古之道奚远哉，得诸心而已。心无苟焉，可以制事；心无弊焉，可以立言。惟无苟，然后能外成败而自信其守也；惟无弊，然后能穷见至隐而极乎理也。信其守者本乎纯，极于理者发乎明，纯与明是乃志古人之所志也。志乎志，文章功名从焉而不有之也。（河南先生集，四部丛刊本卷四）

柳开说文“由乎心智而出乎口”，赵湘说“以其心之道发为文章”，尹洙说“欲文章之传”，当“求古之道”，“古之道”，“得诸心而已”。是他三人都认为文章的基本源泉是心。柳开上王学士第四书载有人问：“今之文咸异于子之言，统其事而无不干者，亦何经哉？”柳开说：“几于苟矣。于身适其取捨之便，于物略其缓急之宜，非制乎久者也。”问者又说：“亦自于心矣，恶不可久乎？”柳开说：“裁度以用之，构累以成之，役其心求于外，非由于心以出于内也。”（集五）这就是说他们所谓心，指由衷的良心而言。由衷的良心只有是非观念，沒有利害观念。“于身适其取捨之便，于物略其缓急之宜”，“裁度以用之，构累以成之”，是“役其心于外”的利害计较，不是“由于心以出”的是非判断。换言之，是假心，不是良心。古人的文章源于良心，今人的文章源于假心。良心是正的，心正则文正，所以“君子之言也度”；假心是邪的，心邪则文邪，所以“小人之言也甋”。

柳开所说的心，指是非观念的良心，赵湘尹洙所说的心，也指是非观念的良心。良心所蕴藏表现的就是道，所以不惟赵湘说“以其心之道发为文章”，尹洙说“古之道奚远哉，得诸心而已”，柳开在上王学士第三书也说，“运之于心而符于道”。（集五）所以他们都主张“文由心出”，同时也都主张“文为道筌”。最显明的，如柳开在上王学士第三书说：“文章为道之筌也，筌可妄作乎？筌之不良，获斯失矣。女恶容之厚于德，不恶德之厚于容也；文恶辞之华于理，不恶理之华于辞也。”（集五）王禹偁说：“文、传道而明心也。”也于明心之外，益以传道。不过他们既认为心发为道，道得于心，则心是源泉，道是表现。唐代的古文家只提出传道，他们于传道之外益以明心，而且把心视为道的源泉，当然也就是文的源泉。所以他们虽出于唐代古文家，却也进于唐代古文

家。

"易道易晓"是他们的形式革新，"传道明心"是他们的内容发展。这种革新和发展，都隐藏在复古学唐——或者说是宗经学韩——的旗帜之下，容易被人忽略，我们必须分别指出。这是第一点。其次，形式革新的要求在不避"俪句"，内容发展的要求在由"道"至"心"，这结果必然使二者逐渐矛盾，造成文学与道学的分立。唐代的韩愈是文学家，同时也是道学家。宋初的这一群古文运动者，也都有浓厚的道学色彩；但后来却逐渐的分道扬镳，互相诋諆。这自然主要的由于社会基础所决定，但形式的"易道易晓"的实质既是骈散兼收，认为这样才是"实有其华"，自然就正面影响了后来古文家的重文轻道，究心辞章；反面促使重道轻文的人不得不别立门户。内容的"传道"之外，还要益以"明心"，而且认为心是道的源泉，则心重于道，所以直接造成了后来道学家的究极心性，而不重视心情的文学家遂由"传道"转于"述志"，唐代的古文家主张简易载道，到末流就激起了骈俪缘情的今文；宋代的古文家惩于前车之戒，自始就不忽略辞华，可是很快的就引起文学与道学的分家。这种历史事实，我们应当特别指出；这种经验教训，我们应当特别珍视。

七　石介的宗經新說

柳开赵湘和尹洙都说"文由心出"，石介则说"文由识生"。当时有龚鼎臣者"学为古文，问文之旨"，石介在送龚鼎臣序答云：

> 夫与天地生者性也，与性生者誠也，与誠生者識也；性厚則誠明矣，誠明則識粹矣，識粹則文典以正矣；然則文本諸識矣。圣人不思而得，識之至也；賢人思之而至，識之淺也。詩、易、书、礼、春秋言而为中，动而为法，不思而得也；孟、荀、楊、文中子、吏部勉而为中，制而

为法，思之而至也。至者，至于中也，至于法也；至于中，至于法，则至于孔子也；至于孔子而为极矣。（石徂徕集，康熙刻本卷十八）

识和心，在本质上沒有多大差别，所不同者，心当然指主观的良心，识不免杂有客观的认识。但石介说识源于诚，诚源于性，则他所謂识指主观的意识。意识的来源，石介说間接出于性，柳开赵湘都沒有說过，自他们的观点而言，大概直接源于心，心性本不相远。

石介说"文由识生"，所举的例证是六经，柳开等说"文由心出"，所举的例证也是六经，所以他们都主张宗经为文。宗经为文是唐人的旧说，但他们却别有新论，柳开上王学士第三书云：

观乎天，文章可見也；观乎圣人，文章可見也。天之文章有其神，非則变，是則昬；圣人之文章有其神，从則兴，异則亡。天之文章，日、月、星、辰也；圣人之文章，詩、书、礼、乐也。（集五）

王禹偁送孙何序云：

天之文日月五星，地之文百谷草木，人之文六籍五常。舍是而称文者，吾未知其可也。（集十九）

石介上蔡枢副书云：

夫有天地故有文。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貴賤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見矣；文之所由生也。天垂象見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則之：文之所由見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所由用也。三皇之书，言大道也，謂之三坟；五帝之书，言常道也，謂之五典：文之所由迹也。四始六义存乎詩，典謨誥誓存乎书，安上治民存乎礼，移风易俗存乎乐，穷理尽性存乎易，懲惡劝善存乎春秋：文之所由著也。（集十三）

柳开王禹偁的说法好象止是推六经以参天地，石介的说法则显然是一种文源说。这种文源说归结于六经是"文之所由著也"，

那么学文的人当然要宗依六经。明白了石介的说法，回头再看柳开王禹偁的说法，也含有学文当宗依六经的意味。

为什么宗依六经，他们提出一种新论证，特别是石介尤为明显。他们的新论证，植基于天人合一。照他们的观点看来，天地有一种自然法则，不止是天地规律，也是人生规律。这种法则在天地表现为天文地文，我们现在名之曰"自然之文"，是"文之所由生也"。由生而见，由见而用于人生，我们现在名之曰"人文之文"，是"文之所由迹也"。就"自然之文"和"人文之文"，写为"文章文学之文"，是"文之所由著也"。著之最原始而又最典型的是六经，那么六经当然是文学源泉，学文的人当然要宗依六经了。

这种说法的来源当然托始易经易传，所以他们引用的话大都见于易传。唐代的历史家和古文家也曾据以建立一种天文说和人文说，但柳、王、石介又和他们不同。唐代历史家的目的，在据以建立文学的折中主义及政治工具说（详四篇五章二至四节），唐代古文家在据以建立简易载道的文论（详四篇六章十节），柳、王、石介的目的则在据以建立宗经为文的新论证。唐人也提倡宗经为文，论证止是说六经为圣人传道的典籍，宋人更为这传道典籍找出自然根据。

以经为文章本源，和以心以道为文章本源，并不冲突：道是心的表现，经是"传道明心"的典籍，所以心是文章本源，则道与经也便是文章本源。自然详细分析，心为主观挈矩，道为客观准绳，经为典型文章；而从大体言之，心与道与经，正是三位一体。

八 孙复的文教方案

在第三节，我们已经指出柳开的古文定义，除了內容形式，

还说到古文的目的是“垂教于民”。其实不止柳开，宋初的古文运动者都抱有这种见解，也都为这种见解努力。王禹偁送谭尧叟序云：

古君子之为学也，不在乎禄位，而在乎道义而已，用之则从政而惠(原作害，疑誤)民，舍之则修身而垂教，死而后已，弗知其他。科试以来，此道甚替，先文学而后政事故也。然而文学本乎六經者，其为政也必仁且义，議理之有体也；文学杂乎百氏者，其为政也非貪則察，涉道之未深也。(集十九)

穆修(九七九——一〇三二)答乔适书，首先慨叹“有志于古文”者甚少，然后说：

夫学乎古者所以为道，学乎今者所以为名。道者仁义之謂也，名者爵祿之謂也。然則行道者有以兼乎名，守(原作中，依孙敏修校改)名者无以兼乎道。何者？行夫道者虽固有穷达云耳，然而达于上也則为賢公卿，穷于下也則为令君子；其在上，則礼成乎君而治加于人；其在下，則順悅乎亲而勤修乎身；穷也，达也，皆本于善称焉。守夫名者亦固有穷达云耳，而皆反于是也：达于上也，何賢公卿乎？穷于下也，何令君子乎？其在上，則无所成乎君而加乎人；其在下，則无以悅乎亲而修乎身；穷也，达也，皆离于善称焉。(河南穆公集，四部叢刊本卷二)

王禹偁慨叹科举以来的先文学而后政事，但又说“文学本乎六经者，其为政也必仁且义”。在送丁谓序也说：当时举进士者，以文相售，岁不下数百人，可惜很少“宗经树教著书立说之士”。(集十九)那么，他当然主张文学要“宗经树教著书立说”了。穆修沒有说出“政教”二字，但学古行道者既穷达皆贤，在上成礼，在下修身，也正是政教。

王穆以外，如石介，对政教的鼓吹尤力，集中的上赵先生书、上蔡副枢书、上范思远书、与士建中秀才书、上孔徐州书、上孙少

傅书，答欧阳永叔书、与君贶学士书、与张秀才书等篇都有这类言论。我们姑止迻录上赵先生书中的一段：

介近得姚铉唐文粹及昌黎集，观其述作有三代制度，两汉遗风，殊不类今之文。曰诗赋者，曰碑颂者，曰铭赞者，或序记，或书箴，必本于教化仁义，根于礼乐刑政而后为之辞：大者驱引帝皇王之道，施于国家，教于人民，以佐神灵，以浸虫鱼；次者正百度，叙百官，和阴阳，平四时，以舒畅元化，缉安四方。（集十二）

随后就叹惜当时为文者，"求教化仁义礼乐刑政，则缺然无所髣髴"。上蔡副枢书也指摘当时的文章，是"遗两仪三纲五常九畴而为之也，弃礼乐孝悌功业教化刑政号令而为之也"。可以说是大声疾呼的鼓吹为文者应当以政教为主。

不过柳开虽说古文的目的是"垂教于民"，王禹偁虽说为文者应当"宗经树教著书立说"，穆修虽也从政教立论，石介虽也更热烈鼓吹，但都没有拟出具体的方案。到生在石介之前，死在石介之后的孙复（九九二——一〇五七），才于答张洞书，首先确定文章的宗旨云：

文者道之生也，道者教之本也。

然后依据这个宗旨，拟一具体的方案云：

诗书礼乐大易春秋皆文也，总而谓之经者也，以其修于孔子之手，尊而异之尔，斯圣人之文也。后人力薄不克以嗣，但当左右名教，夹辅圣人而已。或则发列圣之微旨，或则鸣诸子之异端，或则发千古之未寤，或则正一时之所失，或则陈仁义之大经，或则斥功利之末术，或则扬贤人之声烈，或则写下民之愤叹，或则陈天人之去就，或则述国家之安危；必皆临事摭实，有感而作，为论为议，为书疏歌诗赞颂箴铭解说之类；虽其道甚多，同归于道，皆谓之文也。（孙明复小集，文津四库本卷二）

方案详明，推动自然得力，虽然他并没有异于柳王以来的新理

论。

九　智圆的仁义五常古文説和善善恶恶古詩説

宋代古文运动的幅度，较唐代广阔的多得多，竟扩展到了佛教徒。大中祥符九年(一〇一六)，錢塘沙门智圆自序闲居编云："于讲佛教外，好读周、孔、杨、孟书，往往学为古文以宗其道，又爱吟五七言诗以乐其性。"(闲居编卷首，续藏经二编六套一册)在广皮日休法言后序，他言及近世柳仲涂；(编十二)在读中说，他言知道王通系得力于孙汉公的"辨文中子"，(编二十六)柳仲涂就是柳开，孙汉公名何，是王禹偁的得意弟子，据知他读过柳、王、孙、何的文章，受了柳、王、孙、何的影响。

柳开说古文在古理高意，王禹偁说在传道明心，智圆评錢塘郡碑文也说："夫文者明道之具，救时而作也。"(编二十五)不过柳、王沒有具体的说出道理是什么，智圆具体的说是仁义五常。答李秀才书云：

> 夫論文者多矣，而皆欲其妖蠱，尚其純粹，俾根柢仁义，指归道德；不尔而但在文之辞，似未尽文之道也。愚尝謂文之道者三，太上言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德、文之本也，功、文之用也，言、文之辞也。德者何，所以畜仁而守义，敦礼而播乐，使物化之也。功者何，仁义礼乐之有失，則假威刑以防之，所以除其害而捍其患也。言者何，述其三者以訓世，使履其言，則德与功其可知矣。然則本以正守，用以权成，辞而辟之，皆文也。故曰：仲尼祖述堯舜，宪章文武焉。堯舜非德邪，文武非功邪，故愚尝以仁义之謂文，故能兼于三也，以三者岂越仁义哉？(編二十四)

律师庶几欲从受古圣人之书，学古圣人之为文，智圆作送庶几序

告云:

夫所謂古文者，宗古道而立言，言必明乎古道者也。古道者何，圣师仲尼所行之道也。昔仲尼祖述堯舜，宪章文武，六經大备，要其所归，无越仁义五常也。仁义五常謂之古道也。若將有志于斯文也，必也研几乎五常之道，不失于中而达于变，变則通，通則久，久則合道。既得之于心矣，然后吐之为文章，敷之为教化，俾为君者如勛华，为臣者如元愷，天下之民如堯舜之民，救时之弊，明政之失，不順非，不多爱，苟与世齟齬，言不見用，亦冀垂空文于百世之下，闡明四代之訓，覽之者有以知帝王之道可貴，霸战之道可賤，仁义敦，礼乐作，俾淳风之不墜而名揚于青史，盖为文之志也。古文之作，誠尽乎此矣。（編二十九）

他的意思很明显，他认为古文的意义是遵古道立言，古道是孔子传下来的仁义五常，所以有志古文，必研究仁义五常之道。反之如不研究仁义五常之道，即使古其辞，也不能算做古文。送庶几序接云:

非止澀其文字，难其句讀，然后为古文也。果以澀其文辞，难其句讀，然后为古文者，則老、庄、楊、墨异端之书，亦何尝声律偶对邪？以楊、墨、老、庄之书为古文，可乎，不可也。老、庄、楊、墨弃仁义，廢礼乐，非吾仲尼祖述堯舜宪章文武之道也。故为文入于老庄者謂之杂，宗于周孔者謂之純。馬迁班固之书，先黃老，后六經，抑忠臣，飾主闕，先儒文之杂也；孟軻楊雄之书，排楊墨，罪霸战，黜浮伪，尚仁义，先儒文之純也。吾尝試論之，以其古其辞而倍于儒，岂若今其辞而宗于儒也。今其辞而宗于儒，謂之古文可也；古其辞而倍（背）于儒，謂之古文不可也。虽然，辞意俱古，吾有取焉尔。且代人所为声偶之文，未見有根仁柢义模賢范圣之作者，連篇累牘，不出月露风云之狀，諂时附势之談，适足以伤败风俗，何益于教化哉？（編二十九）

反对澀辞难句同于王禹偁的"易道易晓"，归于教化同于柳开的

政教说。惟柳、王虽趋向儒家，但没有象智圆样的说“古其辞而倍于儒”，不能算做古文，古文必须根柢儒家的仁义五常。这是很值得注意的，智圆是佛家，却较不是佛家的、更偏向儒家。稍后的佛家契嵩也论古文，也说古文应当根柢仁义五常，但他所谓仁义五常是佛家的五善十戒。（详四章一节）智圆不然，他“于讲佛教外，好读周、孔、杨、孟书，往往学为古文以宗其道”。不止在自序这样的分别交代，在病夫传也说：“行五常，正三纲，得人伦之大体，儒有焉；绝圣弃知，守雌保弱，道有焉；自因克果，反妄归真，俾千变万态复乎心性，释有焉。吾心其病乎，三教其药乎。”（编卅四）又如中庸子传、（编十九）谢吴寺丞撰闲居编序书，（编二十二）也有类似的言论，知他不同其他佛家的糅合儒、道、佛，而是分析儒、道、佛；古文必需根柢儒家的仁义五常，老、庄、杨、墨的废仁义弃礼乐不是古文，佛家的复乎心性也不是古文。

柳开致力古文，作诗很少；王禹偁诗文俱工，而且提出了“韩柳文章李杜诗”的口号，可是论文略诗，仅有的如诏臣僚和御制赏花诗序，孟水部诗集序，（集二十）都缺少新的见解。智圆则不惟有宗孔子的仁义五常的古文说，还有宗孔子的善善恶恶的古诗说。錢唐闻聪师诗集序云：

> 或問詩之道，曰：善善惡惡。請益，曰：善善頌焉，惡惡刺焉。如斯而已乎？曰：刺焉俾远、頌焉俾迁，乐仁而怵义，黜回而崇見，則王道可复矣。故厚人倫，移风俗者，莫大于詩歌与！於乎，风雅道息，雕篆叢起，变其声，耦其字，逮于今已极矣，而皆写山容水态，述游仙洞房，寖以成风，竞相夸饰。及夫一言涉于教化，一句落于諷諫，則偉呼族噪，攘臂眦睚，且曰：“此詬病之辞矣，譏我矣，詈我矣，非詩之謂矣。”及問詩之道，則昂其头，翕其目，瞑然而对人曰：“人亦有言，可以意冥，难以言狀，吾何言哉？”吁！可怪也！

叉云：

> 詩之道出于何邪？出于浮图邪？伯阳邪？仲尼邪？果出于仲尼之道也。吾見仲尼之道也，吾見仲尼之删者，悉善善惡惡頌焉刺焉之辞耳，岂如今之人謂之詩者，盈簡累牘，皆华而无根，不可以訓者乎？（編廿九）

前节指出诗的使命是善善恶恶，后节指出诗的渊源出于孔子，孔子的删诗以善善恶恶为标准，所以后人的作诗也应以善善恶恶为依归。达上人湖居诗集序（编卅三）也有类此论调，从省不赘。

源出孔子的善善恶恶的诗，智圆统称为“古之诗”，联句照湖诗序云：

> 古之为詩，辞句无所羈束，意既尽矣，辞亦終焉，故无邪之理明，丽則之文著。洎齐梁而下，限以偶对声律，逮于李唐，拘忌弥甚，故有辞有余而理不足观，理可观而辞无取，兼美之难，不其然乎？有以見古之詩也易，今之詩也难。（編廿九）

“古文”是对“今文”而言，“古之诗”自也是对“今之诗”而言。但一般人很容易误以为“古之诗”专指不拘平仄的散体诗，“今之诗”专指拘限平仄的律体诗。是的，智圆明明白白在指责齐、梁、李唐的“偶对声律”。但他那时的“今之诗”，“雕篆丛起”，变其声，耦其字”，“而皆写山容水态，述游仙洞房”，事实上是沿袭着晚唐五代的纤艳格律，止以沒有新的名字，所以仍称“律诗”，仍以“偶对声律”括示体貌。王禹偁智圆以至苏舜钦、梅尧臣、欧阳修都不满意这种诗，所以都鼓吹复古。不过他们所恢复的“古之诗”，不止是周汉的“古体诗”，也包括唐代的“古体诗”和“律体诗”。王禹偁的诗分古调诗，古诗，律诗，歌行四类，智圆的诗也有古有律。智圆读乐天集云：

李杜之为詩，句亦模山水；錢郎之为詩，旨类图神鬼；諷刺义不明，风雅犹不委。於鑠白乐天，崛起冠唐賢，下視十九章，上躡三百篇。（編四八）

松江重祐和李白姑熟十咏诗序云：

夫詩之道本于三百篇者也，所以正君臣父子，辨得喪，示邪正而已。洎乎王者之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后春秋作。后世屈、宋、李、苏、建安諸子、南朝群公，降及李唐，作者不一，而辞彩屡变，騁殊軌轍，得之者虽变其辞而且无背于三百篇之道也，失之者但务嘲詠风月，写狀山水，拘忌声律，綺靡字句，于三百篇之道，无乃荡尽哉！故李百藥論詩而文中子不答。唐初李謫仙得之者也，其为詩气高而語淡，志苦而情远，其辞与古弥异，其道与古弥同。（編卅二）

是对李白白居易显然不卑视，反之还推崇邁依。王禹偁在赠朱严云："韩柳文章李杜诗"，在自贺诗云："敢与乐天为后进，岂期子美是前身"，（小畜集九）对杜甫的观点与智圆不同，对李白白居易的观点与智圆相近，益知复唐是复古的路线，虽然智圆比较的重周轻唐。

十　苏舜欽梅尧臣的詩教說及古淡說

智圆是沙门，和士大夫的交往不多，他的言论足以表现复古的时代意识，但对复古的推动恐怕没有发生多大效力，对复古诗的推动发生伟大效力的，欧阳以前，要算苏舜钦（一〇〇八——一〇四八）和梅尧臣（一〇〇二——一〇六〇）。苏舜钦石曼卿诗集序㊀云：

詩之作与人生偕者也。人函愉乐悲郁之气，必舒于言，能者財之傳于律，故其流行无穷，可以播而交鬼神也。古之有天下者，欲知风

㊀ 此序又見石介徂徠集卷十八，疑誤。

教之感，气俗之变，乃設官采掇而监听之，由是弛張其务以足其所思，故能長久，長久弊乱无由而生。厥后官廢詩不傳，在上者不复知民志之所向，故政化煩悖，治道亡矣。……国家祥符中（一〇〇八——一〇一七），民风豫而泰，操筆之士，率以藻丽为胜。惟秘閣石曼卿与穆參軍伯長自任以古道，作之文，必經实不放于世，而曼卿之詩，又时震奇发秀，盖取古之所未至，托諷物象之表，警时鼓众，未尝徒役。（苏学士文集，四部叢刊本卷十三）

梅尧臣还吳长文舍人诗卷云：

詩教始二南，皆著圣賢迹；后世竟翦裁，破碎隨刀尺。我輩强追仿，画龙成蜥蜴。有唐文最盛，韓伏甫与白；甫白无不包，甄陶咸所索。（宛陵集，四部叢刊本卷五一）

答韓三子华韓五持国韓六玉汝见赠述诗云：

圣人于詩言，曾不專其中，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自下而磨上，是之謂国风，雅章及頌篇，刺美亦道同，不独識草木，而为文字工。屈原作离騷，自哀其志穷，憤世嫉邪意，寄在草木虫。邇来道頗喪，有作皆言空：烟云写形象，葩卉詠青紅；人事极諛諂，引古称辯雄；經营惟切偶，榮利因被蒙；遂使世上人，只曰一艺充，以巧比戏弈，以声喻鳴桐。嗟嗟一何陋，甘用无言終。（集廿七）

苏从政治一方面言，谓当政者应采诗观风，弛张其务，梅从诗一方面言，谓作诗者应因事因物，刺美见志；殊途同归，都是要诗擔负政教的使命，不作艺术的装饰。因此，苏攻击当时诗人的“以藻丽为胜”，梅慨叹当时诗作的沦于“一艺”。

这种言论由苏梅说出，这种意念却是复古者所共有，智圆的善善恶恶，无疑的也是基于这种意念。他如张咏许昌集序说诗的体性功能在：“疏通物理，宣导下情，直而婉，微而显，一联一句，感悟人心，使仁者劝，而不仁者惧，彰是救过，抑又何多，可谓擅造化之心目，发典籍之英华者也。”又讥贬：“洎诗人失正，采

詩官废，淫词嫚唱，半成谑谈，后世作者虽欲立言存教，直以亚废无用。”由是也慨叹“正始之音，翻为处士之一艺”。（乖崖集八）更与苏梅如出一轍。

采诗观风是很古的制度，后来特别提倡的是白居易，（详四篇四章二节）白居易的重视讽谕是受杜甫影响。（同上一节）王禹偁智圆都推崇白居易，王禹偁又推崇杜甫，苏与梅也都推崇杜甫，苏与张的言论又都近似白居易，那么他们的复古的取道唐代，沒有什么可以怀疑的了！

梅以全副的精神用在诗，苏则诗外还要从事于文，上孙冲諫议书云：

> 某尝謂世之急者教也，教之久則困弊而不流，柄天下者必相宜以救之；救失其宜則衰削潰敗而莫得收。昔者道之消，德生焉；德之薄，文生焉；文之弊，詞生焉；詞之削，詭辯生焉。辯之生也害詞，詞之生也害文，文之生也害道德。夫道也者性也，三皇之治也；德也者复性者也，二帝之迹也；文者表而已矣，三代之采物也；辞者所以熏后，秦汉之訓詔也；辯者华言丽口，賊蠹正眞，而眩人視听，若卫之音，魯之縞，所謂晉唐俗儒之賦頌也。……上世非无文詞，道德胜而后振故也；后代非无道德，詭辯放淫而复塞之也；故使龐杂不純，而流风易遁，誠可叹息。夫文与詞失之久矣，烏可議于近世邪？况敢言道德者乎！（苏集九）

可见苏舜钦也要文擔负政教使命，足证对诗文的意念相同。同时如柳开论文略诗，梅尧臣论诗略文，但都置重政教，也容易理解了。

擔负政教使命的诗不需要“藻丽”，需要“古淡”。苏舜钦贈释秘演云：

> 作詩千篇頗振絕，放意吐出吁可惊，不肯低心事鐫凿，再欲淡泊趋杳冥。（苏集二）

詩僧則暉求詩云:

会將趋古淡,先可去浮嚣。(苏集八)

梅尧臣读邵不疑詩卷云:

作詩无古今,唯造平淡难。(梅集四六)

又于林和靖先生詩集序云:

詩則平淡邃远,讀之令人忘百事也。(梅集六十)

"古淡"是韩愈曾经提倡的,如醉赠张秘书云:"张籍学古淡,轩鹤避鸡群。"(昌黎集二)然则苏梅又大都受韩愈影响。总之是以唐人为复古南针。不过,以唐人为复古南针,并不就是完全的恢复唐代风格。例如韩愈,还有怪奇一面,宋人就不学习鼓吹。所以如第一节所指出,他们在复古运动的旗帜下完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詩文。

第二章　宋初对李杜韩柳集的甄理与鼓吹

一　五代前后的沈埋

如前一章所叙述，宋人复古是走的唐人路线，特别是“韩柳文章李杜诗”。现在看来，“韩柳文章李杜诗”，真如日中天，有目共睹。但这有目共睹的地位，虽基于韩、柳、李、杜的诗文造诣，可也不能埋没宋初人的甄理与鼓吹。宋人姚宽西溪丛话卷上云：

> 殷璠为河岳英灵集不载杜甫诗，高仲武为中兴间气集不取李白诗，顾陶为唐诗类选，如元、白、刘、柳、杜牧、李贺、张祐、赵嘏皆不收，姚合极元集亦不收杜甫李白，彼必各有意也。

日人山田钝文笔眼心抄序云：

> 大师（遍照金刚）入唐也，在贞元元和之际，而此编所论，专为四六骈俪，其言不及杜少陵韩昌黎何也？盖少陵变诗格，昌黎唱古文，久而后行，当时言之者少，故殷璠编河岳英灵集，选有唐名家诗，而不收少陵；韦縠著才调集，自存阅李杜集，而不录杜诗，时好之所存，亦可知焉。大师入唐，气运未开，故其言不及杜韩耳。（范文澜先生藏传抄本）

可见唐人对于李、杜、韩、柳并不象后人的尊崇。韩愈是尊崇李杜的，据洪迈容斋四笔的统计，韩诗六称李杜（卷三“韩公称李

杜”条），尊崇最高的如调张籍云：“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但是，一则下文接云：“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知谤伤者大有人在。魏道辅说：“公作此诗为元稹而发，盖元稹作李杜优劣论，先杜后李故耳。”（引见朱文公校昌黎集卷六）实则元稹不过先杜后李，勉强可以说谤李，绝不能说谤杜。由唐人选诗不录李杜看来，知谤伤唾弃者很多，不过彼辈身名俱灭，无从考知罢了。二则韩的地位既没有后人想象之尊，到五代又同样走着厄运，因此他的推崇并未发生多大作用。旧唐书李杜传不引韩愈推崇，新唐书杜甫传则引云：“昌黎韩愈于文章重许可，至歌诗独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诚可信云。”知就是因为五代不尊重杜韩，自然不引韩崇杜，宋初尊重杜韩，韩崇杜的言论才值得借重。

旧唐书韩柳传各云有集四十卷，文苑传言李集二十卷，杜集六十卷，可是经籍志都不载。这是最当注意的，经籍志就书著录，不载就是没有书；最低刘昫博考中秘及私家弆藏未见四家集子，即有似亦很少流传。樊晃杜工部小集序云：

> 文集六十卷，行于江汉之南。……属时方用武，斯文将坠，故不为东人之所知；江左词人所传诵者，皆公之戏题剧论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当今一人而已。今采其遗文，凡二百九十篇，各以事类，分为六卷，且行于江左。君有子宗文宗武，近知所在，漂寓江陵，冀求其正集，续当论次云。

樊晃不知何人，就其知宗文宗武所在，当后杜甫不久，文集六十卷便已无法寻求。仇兆鳌跋云：“樊氏初求遗稿，仅得二百九十篇，经宋人搜辑，渐次集为完编，诸家采录之功，诚不可没也。”（杜少陵集详注，附录）

真的，杜集的渐次集录是宋人之功，但元稹说：“得杜诗数百

首”，白居易说杜诗“可传者千余篇”，（详四篇四章一节）都多于樊本，可见唐人也曾集录；出何人不可知，说不定元白本人。元白都推崇杜诗，元稹特着一“得”字，似不是寻常的取阅，而是求索的获得。可惜到五代又复散落，以致刘昫编经籍志无从著录，张为作诗人主客图也未图及，王叡以迄保暹的大批的诗格也很少征引。（参五篇二、三两章）蔡宽夫诗话云：

> 唐末五代，俗流以诗自名者，…… 大抵皆宗贾岛辈，谓之“贾岛格”。而于李杜特不少假借，李白“女娲弄黄土，抟作愚下人，散在六合间，濛濛若埃尘”，目曰调笑格，以为谈笑之资。杜子美“冉冉谷中寺’娟娟林外峰，栏干更上处，结缔坐来重”，目为病格，以为言语突兀，声势蹇涩。（引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五十五）

可见五代人对于李杜，不是唾弃，便是嘲笑。唾弃嘲笑的程度大概杜甚于李，所以李集还能躲在一个角落里偷存，杜集则飘落云烟，再不能恢复旧观了！

旧唐书经籍志没有著录韩柳集，列传却有韩柳传。韩愈传云：

> 常以为自魏晋以还，为文者多拘偶对，而经诰之指归，迁雄之气格，不复振起矣。故愈所为文，务反近体，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后学之士，取为师法。当时作者甚众，无以过之，故世称韩文焉。然时有恃才肆意，亦有盩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为罗池神，而愈撰碑以实之；李贺父名晋，不应进士，而愈为贺作讳辨，令举进士。又为毛颖传，讥戏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纰谬者。时谓愈有史笔，及撰顺宗实录，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颇为当代所非。穆宗文宗尝诏史臣添改，时愈婿李汉蒋系在显位，诸公难之。而韦处厚竟别撰顺宗实录三卷。（旧唐书一六〇卷）

柳宗元传云：

> 江岭间为进士者，不远数千里，皆随宗元师法，凡经其门，必为名

士。著述之盛，名动于时。时号柳州云。（旧唐书一六〇卷）

是对柳文还相当敬重，对韩文则率多讥贬，卷末标史臣曰："贞元大和之间以文学聳动搢绅之伍者，宗元禹锡而已；其巧丽渊博属辞比事，诚一代之宏才。"对韩愈和他的弟子李翺止说是："于陵迟之末，遑遑仁义，有志于持世范欲，以人文化成，而道未果也。至若抑杨墨，排释老，虽于道未弘，亦端士之用心也。"并沒有称誉他的文章，反之在赞里讥贬云：

愈翺揮翰，語切典坟，犧鷄断尾，害馬敗群。僻涂自噬，刘柳諸君。

这样的肆意诋毁，尤其斥韩愈为"牺鸡断尾，害马败群"，历史上的其他时期，我们是寻找不到的。

在前边我们说刘昫沒有见过韩柳集，现在韩愈传说到罗池庙碑讳辨和毛颖传，此外还引到进学解和论佛骨表。柳宗元传的评语也好象取之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这不是刘昫已见韩集的证据吗？我想不是的。刘昫若见到韩集，经籍志不能不著录。讳辨和论佛骨表都在政治上惹起了风波，毛颖传也招致了裴度的非毁，进学解作于在京师为国子博士时期，比较为人注意。罗池庙碑和柳子厚墓志铭的碑主是柳宗元，可以相依共存。因此这些文章都附事附人而显，刘昫知道这些文章，不足以证明他见过韩集，也不足证明韩集在五代风行。

二　乐史宋敏求等的补綴李集

李集躲在一个角落里渡过了五代的厄运，到宋初便有乐史宋敏求等的珍爱补缀。乐史李翰林别集序云：

李翰林歌詩，李阳冰纂为草堂集十卷，史又别收歌詩十卷，与草堂集互有得失，因校勘排为二十卷，号曰李翰林集。今于三館中得李

白賦序表贊书頌等，亦排为十卷，号曰李翰林别集。(分类补注李太白詩，四部叢刊本卷首)

乐史增辑李翰林集的年代不可考，增编别集的年代，据序文在宋真宗咸平元年（九九八)。乐史后有宋敏求者(一〇一九——一〇七九)，又继续增辑，所作李太白文集后序云：

唐李阳冰序李白草堂集十卷，云"当时著述，十喪其九"。咸平中，乐史别得白歌詩十卷，合为李翰林集二十卷，凡七百七十六篇。史又纂杂著为别集十卷。治平元年（一〇六四)，得王文献公溥家藏白詩集上中二帙，凡广一百四篇，惜遺其下帙。熙宁元年(一〇六八)，得唐魏万所纂詩集二卷，凡广四十四篇。因裒唐类詩諸編，泊刻石所傳，别集所載者，又得七十七篇，无虑千篇，沿旧目而厘正其汇次，使各相从，以别集附于后，凡賦、表、书、序、碑、頌、記、銘、贊、文六十五篇，合为三十卷。(分类补注李太白詩卷首)

最后题"夏五月晦"，可惜不知是何年五月。后来曾巩又"考其先后而次第之"，就成功流传至今的李太白集。采葉求添，自然不免有误收他人詩歌。苏轼的东坡志林就说："曾子固编李太白集后，谓颇获遗亡，而有赠怀素草书歌，并笑矣乎数首，皆贯休齐己辞格。"(稗海本卷一)可是总可以知道，不仅李阳冰编的李集没有被五代的洪流冲散，而且还留有别本可资增辑，较杜集幸运多了。但增辑的是宋人，不是五代人，知五代人不重视李，重视李的是宋人。

三　刘敞王禹偁等的搜輯杜詩

五代的洪流沒有冲散李集，却冲散了杜集；六十卷的杜集在唐代已经汩沒，千余篇以上的杜诗又在这时漂零。欧阳修詩話云：

陈舍人(从易)当时文方盛之际，独以醇儒古学見称，其詩多类白乐天。盖自楊刘唱和，西昆集行，后进学者爭效之，风雅一变，謂之昆体，繇是唐賢諸詩集，几廢而不行。陈公时偶得杜集旧本，文多脫誤。(欧阳文忠公全集卷一二八)

实则唐贤诸诗集的几废不行，不始于昆体盛兴，旧唐书经籍志的别集类，不仅沒有李、杜、韩、柳集，也沒有刘禹锡，李翱、张籍、孟郊以及元白诸人集。但搜辑校录，确是起始昆体漸衰。古今诗话云："杨大年不喜杜子美诗，谓之村夫子。"(引见诗话总龟前集卷五，又见中山诗话）村夫子的诗当然不必辑录。后来的辑录，正是在威胁西昆，改变诗体。

陈从易偶得的杜集旧本卷数不知，卷数可知的辑杜者，莫早于咸平二年(九九九)进士孙仅（九六九——一〇一七）所辑一卷。辑录的年代与乐史的辑李相先后，知是同一潮流，同一观念下的工作。孙仅有读杜工部诗集序，今载蔡夢弼草堂诗箋，对杜甫推崇备至，可是并未言及卷数。所以知止一卷者，王洙的杜工部诗集序云："蒐辑中外书九十九卷"，蔡夢弼注有孙仅一卷。

蔡夢弼注王序九十九卷，除孙仅一卷外，为：古本二十卷，蜀本二十卷，集略十五卷，樊晃序小集六卷，孙光宪序二十卷，郑文宝序少陵集二十卷，别题小集二卷，杂编三卷。古本，蜀本，集略，别题小集和杂编，不知出于何人，恐不在孙仅以前。郑文宝和欧阳修同时，欧阳修诗话载有与共宴张齐贤家警句，后孙仅约四五十年。惟孙光宪系五代时人，知五代时也还有人编校，但由孙仅的止能辑得一卷，知虽有若无，不为一般人传诵。

孙仅以后的从事搜辑者很多。王琪杜工部集后记云："近世学者，爭言杜诗……人人购其亡逸，多或百篇，少数十篇，藏弆矜大。"(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附录)不过其人不可考。可考者，刘

敞(一〇一九——一〇六八)辑外集五卷,所作寄王二十云:

昔借君家杜甫集,无端卧病不曾編。近从霅上吳員外,复得遺文四百篇。夫子删詩吾岂敢,古人同病意相憐。新书不知傳將去,悵望秦城北斗边。

前有序云:

先借王杜甫外集,会瘧未及录。近从吳生借本,增多王所收,因悉抄写,分为五卷,不为作序,故报之。(公是集,乾隆刻三刘文集本卷一)

另有一诗,题名"编杜子美外集"(集一),知他向王家借来的名杜甫外集,他增编后仍名外集。王家的外集不知多少篇,他据以增多的共四百篇。外集当是对本集得名,可惜刘敞所见的杜甫本集今不知多少卷。

和刘敞时代相先后的苏舜钦也陆续辑有老杜别集一册,所作题杜子美别集记云:

杜甫本傳云有集六十卷,今所存者才二十卷,又未經学者編輯,古律錯乱,前后不倫;盖不为近世所尙,墜逸过半,吁可痛閔也。天圣(一〇二三——一〇三一)末,昌黎韓綜官华下,于民間傳得号杜工部別集者凡五百篇,予参以旧集,削其同者,余三百篇。景祐(一〇三四——一〇三七)初,侨居長安,于王偉主簿处又获一集,三本相从,复擇得八十余首,皆豪迈哀頓,非昔之攻詩者所能依倚,以知亦出于斯人之胸中。念其亡去尚多,意必皆在人間,但不落好事家,未布耳。今以所得,杂录成一冊,题曰老杜别集,俟寻购仅足,当与旧本重編次之。(苏集十三)

末题景祐三年(一〇三六)十二月五日,去孙仅已三四十年。在这三四十年中,一方面发现了二十卷本,不知是否即蜀本或孙光先本?一方面刘敞苏舜钦都有所辑获,说不定別人也有所辑获,可见已成为文学界注意的课题。但由苏舜钦增编外集的能多出

三四百篇，可见原来本集的贫乏；如即是二十卷本，那么虽名为二十卷，而实质也很有限了。

刘敞没有说出他所见的杜甫本集，苏舜欽止说存集二十卷，究竟多少篇，无从探悉。在苏舜欽增辑后三年，就是宝元二年（一〇三九），王洙据中外书九十九卷，编为二十卷，据序，凡古诗三百九十，近体千有六，赋笔杂著二十九篇。又过了二十一年，就是嘉祐四年（一〇六〇），王淇刻于苏州。蔡夢弼注未言及苏舜欽本，也未言及刘敞本，恐都未收录。还有王安石在王洙编校以后十三年，王淇校刻以前八年，就是皇祐壬辰年（一〇五三），又得到三百篇，王淇本大概也未收入。王安石老杜诗后集序云：

> 予考古之詩尤愛杜甫氏作者。…世所傳已多，計尙有遺落，思得其完而观之。…予之令鄞，客有授予古之詩世所不傳者二百余篇，观之，予知非人之所能为，而为之实甫者，其文与意之著也。然甫之詩，其完見于今者，自予得之。（临川文集，四部叢刊本卷八四）

后来蔡夢弼将杜诗编为草堂集，作草堂诗笺，在序中言及王介甫本，知便已收入，但刘敞苏舜欽两本的收入与否则不可知。蔡序还言及欧阳修、宋子京、苏子瞻、陈无己、黄鲁直、张原叔、张文潛、蔡君模、晁以道诸本，不知止是文字有异同，还是篇章也有出入。

王安石自以为从他辑录以后，甫诗完全见于今。但李刚在绍兴六年（一一三六）作校定杜工部集序，说黄长睿"又得逸诗数十篇"。（杜少陵集详注，附录）绍兴中登第的周紫芝竹坡诗话云："近世士大夫家所藏杜少陵逸诗，本多不同。余所传古律二十八首，其间一首，陈叔易记云，得于管城人家册子葉中；一诗洪炎记云，得于江中石刻；又五詩，谢仁伯记云，得于盛文肃家故书中，犹是吳越錢氏所录。"虽然周紫芝也说，"要之皆得于流传，安得

无好事者乱真”，但总可证明王安石以后，杜甫詩并未完全见于世。不过王洙编为二十卷，南宋的蔡夢弼本刊和千家注本也还是编为二十卷，知南宋所获不多，所以辑逸掇亡的采录之功，大体应当归之北宋诸人，对当时及后来的詩坛都起很大的作用，有很大的影响。

四　孙仅孙何等的推崇李杜

李杜詩在五代时散失，象征着五代人的轻视；在宋初辑校，象征着宋初人的尊崇。宋初人的辑校，杜难于李，宋初人的尊崇，也杜重于李。孙仅读杜工部詩集序云：

> 中古而下，文道繁富，风若周，騷若楚，文若西汉，咸角然天出，万世之衡軸也。后之学者，瞽实聾正，不守其根，而好其枝叶。由是日誕月艳，蕩而莫返，曹、刘、应、楊之徒唱之，沈、謝、徐、庾之徒和之，爭柔斗葩，联組擅綉，万鈞之重，爍为錙銖，眞粹之气，殆將灭矣。洎夫子之为也，剔梁陈，乱齐宋，抉晋魏，瀦其淫波，遏其煩声，与周楚西汉相准的。其夐邈高耸，則若凿太虛而噭万籟；其馳驟怪駭，則若仗天策而騎箕尾；其首截峻整，則若儼鈎陈而界云汉；樞机日月，开闔雷电，昂昂然神其謀，挺其勇，握其正，以高視天壤，趋入作者之域：所謂眞粹气中人也。

杜甫并不卑弃曹、刘、应、杨和沈、谢、徐、庾，（详四篇三章三节）可是孙仅偏要说他“剔梁陈，乱齐宋，抉晋魏”。这一则见他对杜甫的尊视极高，二则见他的崇高杜甫是取其粹正，和石介崇高韩愈的取其“粹然一出于正”，（详八节）正是同一意念。

为了取其粹正，所以韩柳文的尊崇，柳不及韩；（详八、九节及三章一节）为了取其粹正，所以李杜詩的尊崇，李不及杜。孙仅的老兄孙何作读子美集云：

逸气应天与，厚风自我还。鋒鋩堪定霸，徽墨可綑姦。进退軍三令，回旋馬六間。楚詞休独步，周雅合重删；李白从先达，王維亦厚顏。（杜少陵集詳注，附录）

后来王安石选李、杜、韩、欧四詩家，首杜末李，也是嫌李“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王琦注李太白集，附录四）

柳的地位始终沒有超过韩，李的地位则有时超过杜。欧阳修曾优李劣杜，（详三章五节）苏轼次韵张安道读杜詩云：“谁知杜陵杰，名与谪仙高”，（东坡集卷二）杜甫的可尊在“名与谪仙高”，则谪仙尤高可知。但同輩的王安石已先杜后李，后輩的黄庭坚更专门学杜，所领导出来的江西詩派，笼罩了两宋詩坛，李的地位遂无法与杜抗爭。后来宋人注李者甚少，注杜者至今还流传着千家注本；称李的詩文不多见，称杜的詩文几乎人人皆有。不过那止是顺适潮流的应时作品，有之不加多，无之不加少，不能和宋初人在举世不知时的蒐辑鼓吹，相提并论，所以我们也便不一一提叙了。

五 柳开的始得韓柳文

欧阳修只见到了六卷的昌黎集，便作记旧本韩文后，说发现提倡是他的首功，（详三章一节）实则首先发现提倡的是柳开，洪迈容斋续笔有详辨。（卷九“国初古文”条）最要的证据是张景集中的柳开行状云：

天水赵生，老儒也，持韓文仅百篇授公曰：“質而不丽，意若难曉，子詳之何如？”公一覽不能舍，歎曰：“唐有斯文哉？”因为文直以韓为宗尙。时韓之道独行于公，遂名肩愈，字紹先。韓之道大行于今，自公始也。

张景集已佚，所作柳开行状，今存柳开河东集卷十六，“仅百篇”

作“数十篇”。柳开自称东郊野夫，作东郊野夫传云:“始年十五六，学为章句。越明年，赵先生指以韩文，野夫遂家得而诵读之。”(河东集二) 答梁拾遗改名书亦云:“年十六七时，得赵先生言，指以韩文，遂酷而学之，故慕其古而乃名肩矣。”自注:“其事实在野夫赵先生传中。”(集五) 可惜赵先生传已佚，否则一定有更详的记载。

区区数十文的指授，值得这样大书特书，这说明当时一般人不知韩愈，不知有韩愈文章。柳开是宋代的第一个提倡古文的人，十六七岁便读韩文。东郊野夫传称赵先生指授韩文的时候，“天下无言古者，野夫复以其幼，而莫有与同者焉，但朝暮不释于手，日渐自解。先大夫见其酷嗜此书，任其所为，亦不责可不可于时矣。迨年几冠，先生以称讳，野夫深得其韩文之要妙，下笔将学其文”。可见他的改革今文，倡导古文，深受韩文影响。

柳开的初名肩愈是肩韩愈，字绍先是绍柳宗元。答梁拾遗改名书说:“复以绍先字之，谓将绍其祖而肩其贤也。”自注:“以其韩柳偕名于唐时，欲绍其子厚也。”(其下当脱祖字) 他何时得到柳文不可考，但韩文的得到既多亏老儒赵先生的指授，则柳文的得到恐也不似我们的到书店购买即得。柳集出于后来的穆修，穆修说，“常恐柳不全见于世，出人间者才百余篇”，(详下节) 一直到他的晚节才喜出望外的得到全集。柳开在穆修前数十年，更当然不会俯拾草芥般的容易得之。

柳开是柳宗元的后人，可是对韩柳的尊崇，却先韩后柳。在东郊野夫传设为或问退之子厚优劣，野夫说:“文近而道不同。”或人不谕，野夫又说:“吾祖多释氏，于以不迨韩也。”

六　智圓的始見韓柳集

赵先生指授柳开的韩文仅数十篇，依洪迈所引也不过百篇，欧阳修所得到也仅止六卷，都不是韩集之全。韩愈死后，他的弟子李汉，“收拾遺文，无所失墜，得賦四，古詩二百一十，联句十一，律詩一百六十，杂著六十五，书启序九十六，哀词祭文三十九，碑志七十六，笔砚鱷鱼文三，表状五十，总七百，并目录合为四十一卷”，编为昌黎先生集。（李汉昌黎先生集序，见昌黎集及全唐文卷七四四）是柳欧所见，都不过六七分之一。首先见到全集的是沙门智圆，所作读韩文云：

> 文不可終否，天生韓吏部，叱伪俾归眞，鞭今使复古，异端維旣絕，儒宗缺皆补。高文七百篇，炳若日月悬，力扶姬孔道，手持文章权，来者知尊儒，孰不由玆焉！我生好古风，服讀長灑蒙，何必唐一經，文道方可崇。（閑居編卅九）

又作述韩柳云：

> 退之排釋氏，子厚多能仁，韓柳道旣同，好惡安得倫，一斥一以贊，俱令儒道伸。…后生学韓文，于釋長狺狺，未知韓子道，先学韓子嗔，忘本以竞末，今古空劳神。（編卅九）

他所见的柳集全残不可知，韩文七百篇当然是全集，而且恐即李汉原本。

智圆不止见到韩柳文，而且对韩柳文推崇备至，止是不赞成释氏的学韩排佛。作师韩议云：

> 吾門中有为文者，而反斥本敎以尊儒术，乃曰师韓愈之为人也，师韓愈之为文也，則于佛不得不斥，于儒不得不尊；理固然也，吾謂之不然。斯人也，非韓之徒，乃韓之罪人尔。請为陈之：韓愈冠儒冠，服儒服，口誦六經之文，心味五常之道，乃仲尼之徒也，由是擯黜釋老百

家之說以尊其教，固其宜矣。釋子果能师韓也，則盖演經律以为文，飾戒慧以为行，广慈悲以为政，使能仁之道，巍巍乎有功，則可謂师韓矣。(編廿八)

这自然是基于智圆是佛家，佛家怎么会赞成斥佛？当时有种徵君作嗣禹说，谓韩愈排佛可以嗣禹湮洪水，智圆特作驳嗣禹说。(编廿八)但竟说韩愈斥佛为理所固然，可见对韩愈尊崇备至，就是骂到自己的宗教信仰，也可以曲说原谅。

七 穆修的搜刻韓柳集

智圆虽在方外寺院见到韩柳集，大夫学者却不能在都鄙人间见到韩柳集，在都鄙人间见到而且刻传的始于穆修(九七九——一〇三二)，所作唐柳先生集后序云:

予少嗜观二家(韓柳)之文，常病柳不全見于世，出人間者殘落才百余篇。韓則虽目(穆集无目字，据朱竹垞抄本增，疑为見字殘文)其全，至所缺墜亡(穆集作忘)字失句，独于集家为甚。志欲补其(穆集其上多一得字)正而傳之，多从好事訪善本，前后累数十，得所長輒加注竄，遇行四方远道，或他书不暇持，独賫韓以自隨，幸会人所宝，有就假取正，凡用力于斯，已蹈二纪外，文始几定矣

明言韩"见其全"，当然是全集，大概也就是李汉原本。穆修曾从种徵君学易，种乃道士，尊韩愈排佛，(见前节)说不定他的学古文，师韩愈，也系种徵君的启发，韩集全本也系得之种徵君。至柳集的搜求获得，更晚于韩。后序接云:

久(朱本作而)惟柳之道，疑其未克光明于时，何故伏其(穆集作眞)文而不大耀也，求索之莫获，則既已矣于怀，不图晚节遂見其书，联为八九大編，夔州前序其首，以卷别者凡四十有五，眞配韓之鉅文歟。(穆集作与)书字甚朴，不类今迹，盖往昔之藏书也。从考覽之，或

卒卷莫迎其脱誤，有一二廢字，由其陈故剧灭，讀无甚害，更資研証就真耳。因按其旧，录为别本，与隴西李之才參讀累月，詳而后止。（河南穆公集，四部叢刊本卷二）

案“前序其首”的夔州就是刘禹锡，柳宗元死后，刘禹锡编序柳集，于时正为夔州刺史，所以穆修所见的仍是刘禹锡原本。后来沈晦在徽宗政和四年校刻柳集，据所作四明新本河东先生集序，知所依据的有四种本，第一种就是穆修本，并言“云是刘梦得（禹锡）本”。其余元符间京师本，曾承相家本，晏元献家本，都晚于穆修本。沈晦说：“柳文出自穆修，又是刘连州（禹锡）旧物。”（柳河东集附录）可见穆修以前，沒有人传授柳集。

穆修得到韩柳二集，极为得意，在后序中惊喜若狂的说：“呜呼！天厚予者多矣，始而饜我以韩，旣又飫我以柳，謂天不吾厚，岂不诬也哉！”由是设法校刻。参军遗事云：

家有唐本韓柳集，乃丐于所亲厚者，得金，募工鐫板，印百数集，攜入京师相国寺，設帳鬻之，伯長（穆修）坐其旁。有儒生数輩，至其肆輒取閱，伯長夺取怒視，謂曰：“先輩能讀一篇，不失一句，当以一部为贈。”自是經年不售。（穆集附录，又見东軒笔录，惟止言柳集，未言韓集）

可见宋初的一班儒生文士，不惟沒有读过韩柳集，也沒有读韩柳集的能力。穆修在这个时候搜求校刻，使人得据以倡导古文，改革今文，对宋初文学的复古革新，有不可磨灭的功蹟，对后世的古文也有极大影响。因为韩柳——尤其是韩愈的成为古文家不祧之祖，当然植基于他们的作品，所以湮沒后的搜求校刻，不能和普通的刻书等量齐观。欧阳修在穆修后三四十年，穆修已校刻昌黎全集，欧阳修还视他所见的六卷本为稀世秘笈，说“时天下未有道韩文者”，虽涉孤陋，但也足以说明宋初文人的不知韩

柳文，不读韩柳文，而柳开的倡导，穆修的搜刻，也就更有意义，更值得提叙了。

八 石介的尊韓道

搜刻韩集柳集的作用当然在鼓吹仿效，但同样的鼓吹仿效，程度却有很大的差别。柳开已经说过了，韩柳的“文近而道不同”，柳“多释氏，于以不迨韩也”。本来宋初的古文在“传道明心”，所以“闲圣道，辟佛老”的韩愈，被他们特别尊崇，“多释氏”的柳宗元被他们逐渐冷淡。

尊崇韩愈是他们的共同目标，共同论调，而推奉最高的要算石介和宋祁。石介偏重“道”一方面，尊韩愈为“贤人之至”；宋祁偏重“文”一方面，尊韩文为“完然王法”。

石介尊韩愈为“贤人之至”的文章就以“尊韩”名篇，文云：

> 道始于伏羲而成終于孔子。道已成終矣，不生圣人可也，故自孔子来二千余年矣，不生圣人。若孟軻氏、楊雄氏、王通氏、韓愈氏，祖述孔子而师尊之，其智足以为賢。孔子后道屡廢塞，辟于孟子，而大明于吏部，道已大明矣，不生賢人可也，故自吏部来三百余年矣，不生賢人。若柳仲涂、孙汉公、張晦之、賈公竦，祖述吏部而师尊之，其志实降。噫！伏羲氏、神农氏、黃帝氏、少昊氏、顓頊氏、高辛氏、唐堯氏、虞舜氏、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者，十有四圣人，孔子为圣人之至。噫！孟軻氏、荀况氏、楊雄氏、王通氏、韓愈氏五賢人，吏部为賢人之至。（至原作卓，此从正誼堂本）不知更几千万亿年复有孔子，不知更几千百数年复有吏部。孔子之易春秋，自圣人来未有也；吏部之原道、原毁、行难、禹問、佛骨表、諍臣論，自諸子来未有也。嗚乎至矣！（集七）

直然和孔子相提并论。韩愈始终是韩愈，二百年前的刘昫斥为

“败马害群”，二百年后的石介尊为“贤人之至”，前者的厄运，韩愈当然想不到，后者的幸运恐也非始料所及。别的时候也有人批评韩愈，但决没有象刘昫的诋之逾当，也没有象石介的誉之过实。

石介不止誉韩愈为“贤人之至”，简直是害着“韩愈狂”。他一方面说柳仲涂、孙汉公、张晦之、贾公竦，都不足继韩愈之绪，一方面却又逢人便劝为今之孟、荀、王、韩，尤其是今之韩愈。上赵先生书说：“传曰，五百年一贤人生。孔子至孟子，孟子至杨子，杨子至文中子，文中子至吏部，吏部至先生，其验欤！…今淫文害雅，世教隳坏，扶颠持危，当在有道，先生岂得不为乎？”（集十二）与士建中书也劝他继续孔子的“删詩书，定禮乐，赞易象，修春秋”；孟子的“正人心，息邪说，距詖行，放淫辞”；杨雄的“著太玄”；文中子的“续詩书，正禮义，修元经，赞易道”；以及韩愈的“排毁佛老”。说：“庶几其道由吾徒而后巍存。”（集十四）与君贶书也说：“常思得如孟轲、荀、杨、文中子、吏部崇仪者推为宗主，使主盟于上，以恢张斯文，而不知有盟主在目前。”（集十五）上孙少傅书更劝效法孔、孟、王、韩传圣学之道，他自己甘愿从学。上范思远书也说：“距退杨墨，然后孟子之功胜也；排去佛老，然后吏部之道行也。思远亦尝思之乎？介尝谓他日有功于此者，必在思远与士建中熙道者。”（集十六）与裴员外书也说：“往年在汶上，始得士熙道，今春来南郡，又逢孙明复，韩孟兹遂生矣。”（集十六）其实这些人，除孙明复外，都不是了不得的人物，那及得上柳仲涂孙汉公，柳孙还不足继韩愈之绪，这些人更不必谈。假使每个都能继韩愈之绪，那末韩愈又不足贵了。理论上无论如何讲不通，心理上我们却可替他找到解释；就是既然害了“韩愈狂”，又无法使韩愈复活，当然止有逢人便請他做今之韩愈了。

九　宋祁的尊韓文

宋祁的尊韩文为"完然王法"见他的新唐书文艺传序：

>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高宗太宗，大难始夷，沿江左余风，絺句繪章，揣合低卬，故王揚为之伯。玄宗好經术，群臣稍厌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气益雄渾，則燕許擅其宗。是时唐兴已百年，諸儒爭自名家，大历正元間，美才輩出，擩嚌道眞，涵泳圣涯，于是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翺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严，抵轢晋魏，上轧汉周，唐之文完然为一王法，此其极也。（新唐书卷二〇一）

又同书韩愈传赞云：

> 唐兴，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弊質穷，𡍩俚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討究儒术，以兴典宪，熏醲涵浸，殆百余年，其后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为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刓以朴，剗伪以眞。然愈之才，自視司馬迁楊雄，至班固以下不論也。当其所得，粹然一出于正，刊落陈言，横騖别驅，汪洋大肆，要之无抵捂圣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荀况楊雄为未淳，宁不信然？

又云：

> 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余岁，撥衰反正，功与齐而力倍之，所以过况雄为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完然王法"和"贤人之至"都是至高无上的称颂。自然我们知道王以上还有皇有帝，贤人以上还有圣人。但在封建专制时代，天子以外不能称皇帝，所以地位的至高无上的称颂便只有"完然王法"；孔子以后，沒有人能称圣人，所以才德的至高无上的称颂便只有"贤人之至"。韩愈对于道不过自比孟轲，宋祁却谓"功与齐而力倍之"。韩愈对于文不过自比三代两汉，宋祁却谓"上轧汉周"。他和石介的崇信韩愈，可以说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所

不同者，止是石介比较崇信其道，宋祁比较崇信其文而已。

因为崇信韩文，所以好以韩文为事证论准，据赵翼廿二史劄记所考索，宋祁"于唐书列传，凡韩柳文可入史者，必采摭不遗。张巡传则用韩愈文，段秀实传则用柳宗元书逸事状，吴元济传则用韩愈平淮西碑文，张籍传又载愈答籍一书，孔戣传又载愈請勿听致仕一疏，而于宗元传载其贻萧俛一书，许孟容一书，貞符一篇，自儆一篇，可见其于韩柳二公有癖嗜也。"(卷十八，新书好用韩柳文条)但对韩柳二公的癖嗜，柳绝不及韩。本来韩柳并称，宋祁却说"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翺、皇甫湜等和之"，无形中把柳宗元推到韩愈的弟子行，好象柳宗元的作古文，也和李翺皇甫湜一样的受了韩愈领导。宋祁作新唐书，不会不知韩柳关系，止是衷心的尊崇韩愈，遂不知不觉的使柳宗元委屈。宋代中世以后颂扬韩愈的人更多，止以"韩愈论"名篇者就屡见各家文集。但同中世以后的颂扬杜甫一样，虽足以考见一代风尚，却不能与早期的颂扬同日而语了。

第三章　欧阳修的复古革新意见

一　学韩与辟佛

宋代诗文的复古运动，到欧阳修（一〇〇七——一〇七二）总集大成，后此的发展，便逐渐分化。四朝国史欧阳修传云："由三代以降，薄乎秦汉，文章……均有先王之遗烈，涉魏晋而弊，至唐韩愈氏乃复起；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修复起。"（欧阳文忠公文集，附录四，四部丛刊本）是的，欧阳修步趋韩愈，负起复古革新的重任，自言至韩愈而止；可是韩愈止改革文体，未改革诗体，欧阳修却同时改革；还有韩愈以后的古文不久衰灭，欧阳修以后则源远流长，蔚为文章正宗；所以他在宋代的文学地位，较韩愈的在唐代殆尤过之。记旧本韩文后云：

> 予少家汉东，汉东僻陋无学者，吾家又贫无藏书。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彦辅颇好学。予为儿童时多游其家，见有弊筐储故书在壁间，发而视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脱落颠倒无次序，因乞李氏以归，读之，见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犹少，未能悉究其义，徒见其浩然无涯若可爱。是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能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未尝有道韩文者，予亦方举进士，以礼部诗赋为事。年十有七，试于州，为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韩氏之文复阅之，则喟然叹曰：学者当至于是而止尔。因怪时人之不道，而顾己亦未遑学，徒时时独念于予心，以谓方从进士干禄以养亲，苟得禄矣，当尽力于斯文以偿

其素志。后七年举进士及第，官于洛阳，而尹师鲁之徒皆在，遂相与作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补缀之，求人家所有旧本而校定之。其后天下学者亦渐趋于古，而韩文遂行于世，至于今盖三十余年矣。（欧阳文忠公文集，四部丛刊本七三）

这好象不及石介尊为“贤人之至”和宋祁尊为“完然王法”的大吹大擂，但谓“学者当至是而止”，实在是规规矩矩的奉为圭臬，步趋学习。韩琦作欧阳修墓志铭云：“自汉司马迁没数千年而唐韩愈出，愈之后数百年而公始出。”（欧集附录二）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一书亦云：“执事之文章”，“与孟子韩吏部之书，相为倡和”。（元丰类藁十五）苏轼居士集叙亦云：“（韩）愈之后三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东坡集廿四）这是大家公认的，三人以外的这样论调还很多，兹不一一征引。

石介的崇韩比较偏重道，宋祁的崇韩比较偏重文，欧阳修许是受了二人的影响，同时又惩于二人的各有所偏，他道文同样推重，一方面步趋韩愈的卫儒辟佛，一方面又步趋韩愈的复古非今。

唐代佛老并盛，所以韩愈兼辟佛老；宋代老学较衰，所以欧阳修侧重辟佛。欧阳修卫儒辟佛的文章很多，最重要的是本论上下两篇。上篇云：

佛法为中国患千余岁，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尝去矣，而复大集，攻之暂破而愈坚，扑之未灭而愈炽，遂至于无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盖亦未知其方也。……佛为夷狄，去中国最远，而有佛固已久矣。尧舜三代之际，王政修明，礼教之义充于天下，于此之时，虽有佛无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阙，礼教废，后二百余年而佛至乎中国。由是言之，佛所以为吾患者，乘其阙废之时而来，此其受患之本也。补其阙，修其废，使王政明而礼义充，则虽有佛无所施于吾民矣。（集十七）

由是返复的说礼义为胜佛之本，同时又在下篇说"莫若修其本以胜之"。陈善扪蝨新话云："退之原道辟佛老，欲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于是儒者咸宗其语。及欧阳公作本论，谓莫若修其本以胜之，何必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也哉？此语一出，而原道之语几废。"(卷七，韩退之辟佛老条)但这并不足以说明欧异于韩，相反的更足以说明欧出于韩，都卫儒辟佛，只是方法不同罢了。

二　黜时文与复古文

卫儒辟佛是学韩之道，复古非今是学韩之文。与荆南乐秀才书云:

> 仆少孤貧，貪祿仕以养亲，不暇就师穷經以学圣人之遺业，而涉獵书史姑隨世俗作所謂时文者，皆穿蠹經傳，移此儷彼，以为浮薄，惟恐不悦于时人，非有卓然自立之言如古人者。然有司过采，屡以先多士。及得第已来，自以前所为不足以称有司之举而当長者之知，始大改其为，庶几有立。然言出而罪至，学成而身辱，为彼則获誉，为此則受禍，此明效也。……天圣中，天子下詔书，勅学者去浮华，其后风俗大变，今时之士大夫所为，彬彬有兩汉之风矣。(集四七)

字里行间，显然在非薄时文。就"为彼则获誉，为此则受祸"看来，知时文的势力披靡一世，不可向邇。惟其如此，所以使欧阳修不能不随世俗习作；可也唯其如此，所以更激起欧阳修的努力改革。四朝国史本传载：嘉祐二年，欧阳修知贡举，"士子尙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事毕，向之嚣薄者，伺修出，聚噪于马头，街邏不能制。然场屋之习从是遂变。"(集附录四)韩琦所作墓志銘也说，"文格终以复古"，苏轍所作神道碑也说，"文章自是变而复古"。(附录三)这确是巨大的文学改革，无怪韩苏及后来的作史者都大书特书(宋史本传亦有记

载），虽然他以前已有很多人在作复古革新的运动。

无疑的，欧阳修的所以非薄时文是恶其"穿蠹经传，移此俪彼"，没有人生价値，也没有文学价値。与石推官第二书云："雕刻文章，薄者之所为。"（集六六）隋太平寺碑云："南北文章至于陈隋其弊极矣，以唐太宗之治治，几乎三代之盛，独于文章不能少变其体。……至于元和，然后蕪秽蕩平，嘉禾秀草争出，而葩华蕡实烂然在目矣。"（集一三八）可见他卑弃一切的雕刻蕪秽之文，不止对时文为然，而卑弃时文的原因也观此益可了然。

卑弃时文自然便倡复古文。欧阳修的倡复古文受尹洙（字师鲁）苏舜钦（字子美）诸人影响，不惟记旧本韩文后言之，苏氏文集序亦云：

> 子美之齿少于予，而予学古文反在其后。天圣之間，予举进士于有司，見时学者务以言語声偶擿裂，号为时文，以相夸尙。而子美独与其兄才翁及穆参軍伯長，作为古歌詩杂文，时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后天子患时文之弊，下詔书諷勉学者以近古，由是其风漸息，而学者稍趋于古焉。（集四一）

尹苏虽然倡导在前，但必待欧阳修的倡导才使古文得到伟大的新力量，精湛的新旨趣。与乐秀才第一书云：

> 聞古人之于学也，講之深而信之篤，其充于中者足，而后发乎外者大以光，譬夫金玉之有英华，非由磨飾染濯之所为，而由于其質性坚实而光輝之发自然也。易之大畜曰："剛健篤实，輝光日新。"謂夫畜于其內者实，而后发为光輝者日益新而不竭也。故其文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之謂也。古人之学者非一家，其为道虽同，言語文章未尝相似，孔子之系易，周公之作书，奚斯之作頌，其辞皆不同，而各自以为經；子游、子夏、子張与顏回同一师，其为人皆不同，各由其性而就于道耳。今之学者或不然，不务深講而篤信之，徒巧其詞以为华，張其言以为大。强为則用力艰，用力艰則有限，有限

则易竭。又其为辞不规模于前人，则必屈曲变态以随时俗之所好，鲜克自立，此其充于中者不足而莫自知其所守也。（集六九）

然则欧阳修所倡复的古文是充中发外的创作，和时文的奇僻穿蠹固然不同，和一班人所想象的规模前人的古文也不同。是的，古文是仿古为文，但仿古为文是仿效古人为文的深讲笃信，以俟充中发外，不是句摸字拟的规模前人。这是欧阳修的古文新解释，同时也就是他给予古文的新义意。不过这种新义意，从它的渊源说，也来自韩愈。韩愈答李翊书告以"根之茂者其实远，膏之沃者其光晔"，就是充中发外的启示。又说"唯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就是不规模前人的启示。

三 "道胜文至"与"事信言文"

"充于中"的是道，"发于外"的是文。答祖择之书云：

学者当师經，师經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純，道純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施于事者果毅。（集六八）

"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的实质就是"道胜文至"。答吳充秀才书云：

夫学者未始不为道，而至者鲜为，非道之于人远也，学者有所溺焉尔。盖文之为言，难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世之学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则曰吾学足矣，甚者至弃百事不关于心，曰吾文士也，职于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鲜也。昔孔子老而归魯，六經之作，数年之頃尔，然讀易者如无春秋，讀书者如无詩，何其用功少而至于至也！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书，荀卿盖亦晚而有作；若子云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語，此道未足而彊言者也。后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为学者文而已，故用力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于軒序，不能縱横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虽行乎天地，入于淵泉，无不之也。（集四七）

送徐无党南归序云:

今之学者，莫不慕古圣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尽心于文字之間者，皆可悲也。(集四三)

"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以为学者文而已"，则"用力愈勤而愈不至"，这种见解，大概是推演韩愈答李翊书所说的道归则文归和答刘正夫书所说的师意不师辞。不过韩愈置重建立道统，在原道说：吾所谓道传自尧、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欧阳修也沒有轻视道统，但更重视道的事功。与张秀才第二书云:

足下之意，岂非閔世病俗，究古明道，欲拔今以复之古，而翦剃齐整凡今之紛殽駮冗者歟?然后益知足下之好学甚有志也。然而述三皇太古之道，舍近取远，务高言而鮮事实，此少过也。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見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軻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則六經所載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集六六)

是道依于事，那末道胜而自至之文，更当然要依于事了。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云:

某聞傳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君子之所学也，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于后世。詩、书、易、春秋皆善載事而尤文者，故其傳尤远。荀卿孟軻之徒亦善为言，然其道有至有不至，故其书或傳或不傳，犹系于时之好恶而兴廢之。其次楚有大夫者善文其謳謌以傳，汉之盛时有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楊雄能文其文辞以傳。由此以来，去圣益远，世益薄或衰，下迄周隋，其間亦时时有善文其言以傳者，然皆紛杂灭裂不純信，故百不傳一，幸而一傳，傳亦不显，不能若前数家之焯然暴見而大行也。甚矣言之难行也，事信矣須文，文至矣又系其所恃之大小，以見其行远不远也。书載堯舜，詩載商周，易載九圣，春秋載文武之法，荀孟二家載詩、书、易、春秋者，楚

之辞載风雅，汉之徒各載其时主声名文物之盛以为辞。后之学者蕩然无所載，則其言之不純信，其傳之不久远，势使然也。至唐之兴，若太宗之政，开元之治，宪宗之功，其臣下又爭載之以文其詞，或播乐歌，或刻金石，故其間鉅人碩德閎言高論流鑠前后者，恃其所載之在文也。故其言之所載者大且文，則其傳也章，言之所載者不文而又小，則其傳也不章。（集六七）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事信矣须文”，这可见他虽重道重事，可也不忽略文，和韩愈答刘正夫书所说“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尙其能者”，正是词异意同。基于这种观念，所以他俩都成为古文家，沒有成为道学家。

欧阳修步趋韩愈的地方确是很多，但进于韩愈的地方也不少，最重要的就是“事信言文”。他以“事信”释“道胜”，认为只是“知古明道”还不够，必须“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之于文章”。文章的至不至及传不传，决定于事的信否大小与言的文或不文。言的文不文是韩愈所颇计较的，事的信否大小韩愈幷未言及。这是欧阳修的新见解，这种新见解对宋代文学的影响极大，一方面直接领导了议论派的事理文学，一方面间接领导了经卫派的政教文学，另一方面又激起了道学派的力言作文害道，别创道流为文的文说。

四 詩穷益工

韩愈在荆潭唱和诗序说：“懽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辞易好。”又说：“王公贵人，气滿志得，非性而好之，则不暇以为。”这种见解，欧阳修也颇为诠发。梅圣俞诗集序云：

予聞世謂詩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巔水

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集四二）

薛简肃公文集序云：

君子之学，或施之事业，或见于文章，而常患于难兼也。盖遭时之士，功烈显于朝廷，名誉光于竹帛，故其常视文章为末事，而又有不暇与不能者焉。至于失志之人，穷居隐约，苦心危虑，而极于精思，与其所感激发愤，惟无所施于世者，皆一寓于文辞。故曰，穷者之言易工也。（集四四）

前篇说明穷苦的诗容易工妙，后者说明穷苦的人有时间作为文辞，总之是诗穷益工。前篇推演韩愈所说“穷苦之辞易好”，后篇推演韩愈所说贵人无暇为诗，止是韩愈的话很简单，欧阳修进而有多方面的论证而已。

五 韩柳李杜优劣说

观上所述，足证欧阳修的改革文学，大体遵循韩愈路线，因此尊崇韩文，而对柳文则认为不能与韩文并称。唐柳宗元般舟和尚碑跋尾云：

子厚与退之皆以文章知名一时，而后世称为韩柳者，盖流俗之相传也，其为道不同，犹夷夏也。然退之于文章每极称子厚者，岂以其名并显于世，不欲有所贬毁，以避争名之嫌；而其为道不同，虽不言顾后世当自知之欤？不然，退之以力排释老为己任，于子厚不得无言也。（集一四一）

唐南岳弥陀和尚碑跋尾云：

自唐以来，言文章者惟韩柳；柳岂韩之徒哉，真韩门之罪人也！盖世俗不知其所学之非，第以当时辈流言之尔。今余又多录其文，惧益后人之惑也，故书以见余意。（集一四一）

韩柳文的优劣不易一言判断，欧阳修崇韩抑柳是基于韩愈辟佛而柳宗元作和尚碑文。这种论调，柳开已启其端绪。（详二章五节）宋祁作新唐书文艺传，以柳宗元和韩门弟子的李翱皇甫湜并列，现在欧阳修又说，“柳岂韩之徒哉，真韩门之罪人也”。实则柳宗元是韩愈友人，不是韩愈门徒，他们淆混二人关系，就是出于崇韩抑柳的既定观念，而这种既定的观念就笼罩了两宋以至以后的文坛，遂使韩愈巍然独尊，柳宗元瞠乎落后。

欧阳修不止尊崇韩文，而且尊崇韩诗，集中效韩门体的诗歌很多，如秋怀二首寄圣俞，一本作“拟孟郊体秋怀”，（集三）此外还有弹琴效贾岛体，（集四）刑部看竹效孟郊体，（集六）春寒效李长吉体，（集五三）又读蟠桃诗寄子美云：

> 韩孟于文词，两雄力相当，篇章缀谈笑，雷电击幽荒，众鸟谁敢和，鸣凤呼其皇。孟穷苦累累，韩富浩穰穰，穷者啄其精，富者烂文章，发生一为宫，揫敛一为商，二律虽不同，合奏乃锵锵。（集二）

又诗话云：

> 退之笔力无施不可，而常以诗为文章末事，故其诗曰，“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也。然其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此在雄文大手固不足论，而予独爱其工于用韵也。盖其得韵宽，则波澜横溢，泛入傍韵，乍还乍离，出入四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类是也。得韵窄，则不复傍出，而因难见巧，愈险愈奇，如“病中赠张十八”之类是也。余尝与圣俞论此，以谓譬如善驭良马者，通衢广陌，纵横驰逐，惟意所之；至于水曲蚁封，疾徐中节，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集一二八）

可是韩愈究竟“以诗为文章末事”，虽然“无施不可”，究竟文章尤高。欧阳修赠王介甫云：

>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集五七）

陈鹄耆旧续闻卷一说欧公自言吏部指谢朓，想是传闻之误，吏部

当然指韩愈，欧文宗韩愈，并不宗谢朓。至翰林指李白，尽人无异辞。这可见他文宗韩愈，诗宗李白。苏轼也说："欧阳子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并且申明说："此非予言也，天下之言也。"（居士集叙，欧集卷首，苏集廿四）欧阳修作太白戏圣俞云：

> 开元无事二十年，五兵不用太白閑，太白之精下人間，李白高歌蜀道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李白落笔生云烟，千奇万险不可攀，却視蜀道犹平川。宫娃扶来白已醉，醉里成詩醒不記。忽然乘兴登名山，龙咆虎啸松风寒，山头婆娑弄明月，九城尘土悲人寰。吹笙飲酒紫阳家，紫阳眞人駕云車，空山流水空流花，飄然已去凌青霞。下看区区郊与岛，螢飞露湿吟青草。（集五）

是自欧阳修看来，韩门的孟郊贾岛，虽也"篇章綴谈笑，雷电击幽荒"，但比之李白，便有仙凡之别。又笔说中有"李白杜甫诗优劣说"一条云：

> "落日欲沒岘山西，倒著接籬花下迷，襄阳小儿齐拍手，攔街争唱白銅鞮"，此常言也；至于"清风明月不用一錢买，玉山自倒非人推"，然后見其横放。其所以警动千古者，固不在此也。杜甫于白得其一节，而精强过之；至于天才自放，非甫可到也。（集一二九）

明人李崆峒说李全乎天才，杜全乎学力，清人赵翼颇不谓然。（瓯北诗话二）实则如李白自己所说，"横经枕籍，制作不倦"，（上安州裴长史书）何尝没有学力？杜甫自己说，"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壮游）何尝没有天才？天才学力不是二人的区别，二人的区别在：李白采取积极浪漫主义的方向方法，杜甫采取现实主义的方向方法，作风不同，各极其妙，衡论高下，殊属不易。后人的优劣说，无价值的不谈，有价值的也不在抑扬李杜，而在提示积极浪漫主义的或现实主义的风格。元稹抑李扬杜，说杜诗的长

处在："铺陈终始，排比声韵，风调清新，属对律切。"（详四篇四章一节）正是提示了现实主义的风格。欧阳修抑杜崇李，说李诗的长处在："天才自放"，"落笔云烟"，千奇万险，不可追攀，正是提示了积极浪漫主义的风格。

六 苏梅評讚

欧阳修的改革文体有尹洙苏舜钦作前导，改革诗体也有苏舜钦梅尧臣作先锋。但文一方面必待他的领导始能推倒时文，奠定宋朝一代的文体，诗一方面也必待他的主持始能推倒"昆体"，奠定宋朝一代的诗风。

梅尧臣曾经很愤慨的说："永叔自要作韩退之，强差我作孟郊。"（邵博闻见后录卷十八）实则这倒是最恰当的比附，孟郊长于韩愈，他的诗名却有赖韩愈的鼓吹，梅尧臣长于欧阳修，他的诗名也与欧阳修的鼓吹有关。苏梅的努力创作诚然不可磨灭，可是假使没有欧阳修的揄扬，则声名影响恐怕都要减损。欧阳修与苏梅——特别是梅的倡和诗，占全诗十分一二，所作诗话不过二三十条，称述苏梅的多至九条，最重要的一条云：

圣俞（梅堯臣字）子美（苏舜欽字）齐名于一时，而二家詩体特异：子美笔力豪儁，以超迈横絕为奇；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閑淡为意，各极其長，虽善論者不能优劣也。余尝于水谷夜行詩略道其一二云："子美气尤雄，万窍号一噫，有时肆顚狂，醉墨灑滂霈。譬如千里馬，已发不可杀，盈前尽珠璣，一一难拣汰。梅翁事淸切，石齿漱寒瀨，作詩三十年，視我犹后輩，文辞愈精新，心意虽老大，有如妖韶女，老自有余态。近詩尤古硬，咀嚼苦难嘬，又如食橄欖，眞味久愈在。苏豪以气轢，举世徒惊駭；梅穷独我知，古貨今难卖。"語虽非工，謂粗得其髣髴，然不能优劣之也。（集一二八）

水谷夜行赠子美圣俞见全集卷二，又卷五有再和圣俞见答云："嗟哉我岂敢知子，论诗赖子初指迷。子言古淡有眞味，太羹岂须调以齏？怜我区区欲彊学，跛鼈曾不离汙泥。"卷五十三有答梅圣俞丞见寄云："文会忝予盟，诗坛推子将。"又有答苏子美离京见寄云："是以子美辞，吐出使人惊。其于诗最豪，奔放何纵横！众弦排律吕，金石次第鸣。间以险绝句，非时震雷霆；两耳不及掩，百痾为之醒。"眞是揄扬备至。

上面引的这些诗都是寄赠苏梅，还可解为酬应之作，不得不尔，文集卷九有感二子一首，是苏梅死后的追感之作，当然发于至诚。诗云：

> 自从苏梅二子死，天地寂默收雷声；百虫坏戶不启蟄，万木逢春不发萌；岂无百鳥解言語，喧啾終日无人听。二子精思极搜抉，天地鬼神无遁情；及其放笔騁豪俊，笔下万物生光荣。

由此诗的发于至诚，知前引寄赠苏梅诸诗也都发于至诚。苏梅既死，欧阳修为撰著墓志銘，(苏銘载集卅一，梅銘卅三) 叙录文集，作书梅圣俞藁后，至与汉代的苏李，魏代的曹刘，唐代的陈子昂、李、杜、沈、宋、王维、孟郊、贾岛幷称。(集七三)我们不能忘记欧阳修是一代的诗文宗匠，同时又是朝廷名臣，这样的赞许苏梅，自然可以直接鼓励苏梅的创作兴趣，间接转移一时的诗坛风格，对诗体改革，关系甚大。

七 杂文瑣談

欧阳修虽反对四六文，可也作了不少的四六文。这是因为一则"少为进士时，不免作之"。(答陕西安抚使范龙图辞辟命书，集四七)二则后来"在翰林六年"，"凡朝廷之文，所以指麾号令，训戒约束"，"取便于宣读，常拘于世俗所谓四六之文"。(内制集

序，集四三）又自言“少习为銘章，因得论次当世贤士大夫功行，自明道景祐以来，名卿巨公，往往见于余文矣。”（江邻几文集序，集四四）因也作了不少的碑銘文。又有志修史，和宋祁合作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自作新五代史七十四卷。久在朝廷，策论颇多，今存奏议十八卷（集九七至一一四），河东奏草二卷（集一一五，一一六），河北奏草二卷（集一一七，一一八），奏事录一卷（集一一九），濮议四卷（集一二〇至一二三）。因此对四六文，碑銘文，史传文和策论文也都曾表示意见。

先述对四六文的意见。內制集序说：“世俗所谓四六之文……果可谓之文章者歟？”又说自己所作，“拘牵常格，卑弱不振，宜可羞也。”弦外之音，当然是卑视四六文，尤其卑视常格的四六文。試笔中的“苏氏四六”条云：

> 往时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語及广引故事，以衒博学，而不思述事不暢。近时文章变体，如苏氏父子以四六述敘，委曲精尽，不減古人（一作文）。自学者变格为文，迨今三十年，始得斯人，不惟迟久而后获，实恐此后未有能繼者尔。自古异人間出，前后参差不相待，余老矣，乃及見之，岂不为幸哉！（集一三〇）

知他认为必不得已而作四六文，也要变体不守常格，而所谓变体是委曲述叙，不“多用古人语及广引故事”，和所倡导的古文正是同一趋向。

次述对碑銘文的意见。唐元稹修桐柏宮碑跋尾云：

> 既牵声韵，有述事不能詳者，则自为注以解之。为文自注，非作者之法。且碑者石柱尔，古者刻石为碑，謂之碑銘碑文之类可也；后世伐石刻文，既非因柱石，不宜謂之碑文；然习俗相傳，理犹可考；今特題“修桐柏宮碑”者，甚无謂也。此在文章，誠为小瑕病，前人时有忽略，然而后之学者不可不知。自汉以来墓碑，多题云“某人之碑”者，

此乃无害；盖目此石为某人之墓柱，非谓自题其文目也。今稹云"修桐柏宫碑"，则于理何稽也？（集一四一）

这是在讨论碑铭文的名称，至作法，则欧阳修似主张简要，与杜䜣论祁公墓志书："有意于传久，则须纪大而略小。"又云："所纪事皆录实，有稽据，皆大节与人之所难者。其他常人所能者，在他人更无巨美，不可不书，于公为可略者，皆不暇书。"（集六九）论尹师鲁墓志也慨叹"世之无识者，不考文之轻重，但责言之多少"。（集七三）

复次述对史传文的意见。碑铭是各人的专传，史传是众人的列传，碑铭主简要，史传更当然主简要。他的新唐书的特点，据进新修唐书表，就是"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后"。（集九一）与尹师鲁书云：

前岁所作十国志，盖是进本，务要卷多，今若便为正史，尽宜删削，存其大要；至如细小之事，虽有可纪，非干大体，自可存之小说，不足以累正史。数日检旧本，因尽删去矣，十亦去其三四。师鲁所撰，在京师时不曾细看，路中昨来细读，乃大好。……亦有繁简未中，愿师鲁亦删之，则尽妙也。（集六七）

对删繁就简，更再三致意。

复此述对策论文的意见。与黄校书论文章书云：

所示杂文十篇，窃尝览之，惊叹不已，其毁誉等数短篇，尤为笃论。然观其用意在于策论，此古人之所难工，是以不能无小阙；其救弊之说甚详，而革弊未之能至，见其弊而识其所以革之者，才识兼通，然后其文博辩而深切，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因若贾生论秦之失而推古养太子之礼，此可谓知其本矣。然近世应科目文辞，求若此者盖寡，必欲其极致，则宜少加意，然后焕乎其不可御矣。（集六七）

前论古文曾说"道胜者文不难自至"，此言策论文说"才识兼通，然后其文博辩而深切"，总之是"充于中者足，而后发于文者太以

光”。

此外对于书牍酬应之文，欧阳修也曾发表意见。有陈员外者，致书欧阳修，“前名后书，且状且牒，如上公府”。欧阳修认为“此乃世之浮道之交，外阳相尊者”，复书云：

> 古之书具惟有鉛刀竹木，而削札为刺，止于达名姓；寓书于簡，止于舒心意为問好。惟官府吏曹，凡公之事，上而下者則曰符曰檄；問訊列对，下而上者則曰狀，位等相以往来曰移曰牒；非公之事，長吏或自以意曉其下以戒以飭者則曰教；下吏以私自达于其屬長而有所候問請謝者則曰牋記书启。故非有狀牒之仪，施于非公之事相参。如今所行者，其原蓋出唐世大臣，或貴且尊，或有权于时，縉紳湊其門以傳嚮者，謂旧禮不足为重，务稍增之；然始于刺謁有参候起居，因为之狀。及五代，始复以候問請謝加狀牒之仪，如公之事；然止施于官之尊貴及吏之長者。其伪謬所从来旣远，世不根古，以为当然。居今之世，无不知此，而莫以为易者，蓋常俗所为积习已牢而不得以更之也。然士或同师友，締交游，以道誼相期者，尙有手书勤勤之意，犹为近古。(集六八)

由是致叹于“候问請谢，非公之事，有状牒之仪，以施于尊贵长吏，犹曰非古之宜”；况陈员外与己“肩从齿序，跪拜起居如兄弟者乎”。这虽止是说的书牍文的称谓与格式，但书牍文的应有“勤勤之意”，不应以浮道阳相尊崇，也流露言外了。

第四章　二程及其他道学派的道文分合説

一　学术文章的分成三派

欧阳以后，学术文章分成三大派。当时的程颢云：

今之学者歧而为三，能文者謂之文士，談經者泥为講师，惟知道者乃儒也。(河南程氏遺书六)

又云：

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訓詁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同书十八，㊀)

稍后的陈善云：

唐文章三变，本朝文章亦三变矣；荆公以經术，东坡以議論，程氏以性理，三者要各立門戶，不相蹈襲。然其末流，皆不免有弊，虽一时奉行之过，其实亦事势有激而然也。至今学文之家，又皆逐影吠声，未尝有公論，实不見古人用心处，予每为之太息。(捫虱新話卷五，唐宋文章皆三变末流不免有弊条)

程颢两次所说，一次指人，一次指学，文士的学问是文章之学，也就是陈善所说的以东坡为首的议论一派。讲师的学问是训诂之学，也就是陈善所说的以荆公为首的经术一派。至于儒者是程

㊀ 原题二先生語，参証前条，当亦出程顥。

颢自道，所以也就是陈善所说的以程氏为首的性理一派，宋史特立道学传，因而也可称道学派。

分派的主要原因由于代表的阶级阶层不同。如大家所熟知的，宋代虽仍是封建社会，但商业手工业却在唐代的基础上更大大地向前发展了。还在五代十国的时候，人们就用羡慕的口吻，称赞“一扬（扬州）二益（成都）”，说明都市的畸形的繁荣，已和农村的普遍雕弊成为鲜明的对比。到宋代统一，一方面农村苏息，恢复并发展了地主经济，一方面国内外贸易展开，工商经济也得到飞跃发展。开封、成都、兴元（南郑）、杭州、明州（鄞县）和广州各大都市，每年的税收都在五十万贯上下；官办的各种手工工厂，使用着成千成万的雇佣工人。这就使宋代的政治和文化，除了反映着封建阶级内部矛盾及与农民的矛盾外，更增加了与工商业者及城市市民的矛盾。换句话说，就是工商业者及城市市民也要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崭然露头角。各家的通史大都指出了，反对变法的以二程子为首的性理派代表着大地主封建贵族的意识，主张变法的以王安石为首的经术派代表着中小地主的意识，至先则主张改革后又反对变法的以苏轼为首的议论派，我们应当指出是代表着工商业者及城市市民的意识。

宋史对苏轼和他的父亲苏洵，都只说是眉州眉山人，没有说是眉山城市或乡下。据苏轼的弟弟苏辙所作伯父苏涣墓表，说“葬于眉山永寿乡”，知苏涣是永寿乡人。但文中说“辙生九年，始认公于其乡”。（栾城集卷二十五）而自作颍滨遗老传，又称“先君（洵）之葬在眉山之东”。（栾城后集卷十三）知他们父子兄弟大概居眉山城市。眉山距成都不远，无论经济或意识，恐都与有关联。苏洵作田制一文，愤恨的指出“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又说：“富民之家，地大业广，阡陌连接，募招浮客，分耕其中，鞭笞

驱役，视以奴仆，安坐四顾，指麾于其间。而役属之民，夏为之耨，秋为之获，无有一人违其节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于富强，耕者日食其半以至于穷饿而无告。”（嘉祐集卷五）苏轼上书反对王安石新法说：“昔汉武帝以财力匮竭，用贾人桑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于时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又说：“今坏常平而言青苗之功，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何以异此？”（宋史本传）所以他们父子兄弟及其他同派的人物，大体都是代表着——最低也是反映着当时的工商业者的意识，因而对学术文章，主张比较自由，比较进步的述意达辞，反对二程子一派的性理，也反对王安石一派的经术。

其次和政治当然有关系。宋代虽号称统一天下，实则不要说南渡以后，北宋也就偪促得可怜。辽夏常常内犯，不止国土日蹙，后来竟至按岁纳币。这样一个弱小的国家，偏要大开科第，广招士类。据曾巩本朝政要策，“自隋大业中始设进士科，至唐以来尤盛，岁取不过三十人”。可是到宋“太宗即位，兴国二年，以郡县阙官，旬浃之间”，就“拔士几五百”。至“八年，进士万二百六十人，淳化二年万七千三百人”。（贡举条，元丰类藁四九）有资格做官的人这样多，可以位置官的地方又那样少，自然要如苏辙上皇帝书所说：“吏多于上，士多于下，上下相窒，如决水于不流之泽，前者未尽，后者已至，填咽充满，一陷于其中而不能出。故布衣之士，多方以求官，已仕之吏，多方以求进，下慕其上，后慕其前，不愧诈伪，不耻争夺。”（栾城集廿一）争夺的最好武器是结党，争夺的自然结果也就是分派。王、苏、二程也许还不至于“不愧诈伪”的争夺，后生小子的依草附木，入主出奴，则显然与争夺政治地位有关。所以郡县阙官的太宗时代不分党派，难官难进

的仁宗神宗时代便党派分争。

再其次和学术文章的本身也有关系。本来学术文章就是逐渐发展，可也就逐渐分家的。宋初的以复古为革新的学术文章是遵循的韩愈路线，韩愈的路线是道文幷重。到欧阳修以后，从道一方面向前发展的便成为性理家的二程子，认为韩愈未免先文后道，由是反转来先道后文。从文一方面向前发展的是辞章家的三苏，认为韩愈的文章有弊，韩愈的道更未免太拘，由是主张"述意达辞"。从文道两方面向前发展的是经术家的王安石，认为韩愈的文章很好，韩愈的道有点迂阔，由是主张"治教政令"。程氏遗书载二程先生语云：

>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后，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卷一)

又载程颐语云：

> 退之晚年为文，所得处甚多。学本是修德，有德然后有言，退之却倒学了，因学文日有所至，遂有所得。(卷十八㊀)

前者是称赞韩愈之道，后者是指摘韩愈的后道先文。苏轼有谢南省主文启五首，其中的欧阳内翰一首云：

> 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后学韓而不至者为皇甫湜，学皇甫湜而不至者为孙樵，自樵以降，无足观矣。(东坡集廿六)

又作韩愈论云：

> 韓愈之于圣人之道，蓋亦知好其名矣，未能乐其实。(东坡应詔集十)

前者是说韩愈的文章末流有弊，后者是说韩愈不能体认道的实质，而他所体认的道的实质是贾陆议论和佛老思想。(详六章一

㊀ 优古堂詩話謂程顥"此意本之吳子經"，引子經法語云："古人好道而及文，韓退之学文而及道。"子經名孝宗，欧阳修有詩送吳生，王安石亦嘗与論文。

节）王安石上人书云：

自孔子之死久，韓子作，望圣人于千百年中，卓然也，独子厚名与韓并。子厚非韓比也，然其文章配韓以傳，亦豪傑可畏者也。韓子常語人以文矣曰云云、子厚曰云云。疑二子者，徒語人以其辞尔，作文之本意不如是其已也。（临川集七七）

又作韩子诗云：

紛紛易尽百年身，举世何人識道眞？"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憐无补費精神。（集卅四）

前者是说韩愈的文辞已经够了，对作文本意还沒有抓着要点，合后者观之，知指识道不眞，而王安石所识的眞道是"治教政令"。（详五章七节）

此外人事关系，也有一些影响。据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老苏之出，当时甚敬重之，惟荆公不以为然，故其父子皆切齿之。"同时王安石面垢身污，不修边幅，苏洵作辨奸论说："囚首丧面而谈诗书者，鲜不为大奸忒。"（宋文鉴九七，嘉祐集不载）由是王苏不睦。再据续资治通鉴卷十八：程颐在经筵，多用古礼，轼说不近人情，常加玩侮。司马光死，恰巧明堂降赦，臣僚在称贺以后，拟前往祭奠，程颐坚持不可，说："子于是日哭则不歌。"有人说："孔子言哭则不歌，不言歌则不哭。"苏轼说："此乃死市，叔孙通所制礼也。"众皆大笑，由是程苏不睦。鶴林玉露卷十五载："荆公少年不可一世，独怀刺候濂溪，三及门而三辞焉，荆公恚然曰：吾独不可自求于六经乎！乃不复见。"由是王与道学家不睦。各家既不相睦，由是学术也就更互相排斥，各走极端了。

二　邵雍的詩以垂訓說

宋史道学传中的人物以邵雍（一〇一一——一〇七七）为最

早，他的著作，除了与诗文无关的皇极经世以外，就是伊川击壤集二十卷，都是诗，因之也只有诗论，沒有文论。伊川击壤集序首引子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发于中而形于言，声成文则谓之音。"（出毛诗序，非子夏语，详二篇一章三节）好象是因用旧说，也认为诗当缘情。是的，他也认为诗当缘情，不过所缘的情与旧说不同。击壤集序云：

> 情有七，其要在二；二謂身也，时也。謂身則一身之休慼也，謂时則一时之否泰也。一身之休慼則不过貧富貴賤而已，一时之否泰則在夫兴廢治乱者焉。是以仲尼刪詩，十去其九，諸侯千有余国，风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蓋垂訓之道，善惡明著者存焉耳。近世詩人穷慼則職于怨憝，荣达則專于淫泆。身之休慼发于喜怒，时之否泰出于爱惡，殊不以天下大义而为言者，故其詩大率溺于情好也。（伊川击壤集，四部叢刊本卷首）

那末他是在提倡歌詠一时否泰，反对歌詠一身休慼。因之，集中的观诗吟亦云：

> 爱君难得似当时，曲尽人情莫若詩。无雅岂明王教化，有风方識国兴衰。（集十五）

诗画吟亦云：

> 不有风雅頌，何由知功名？不有賦比兴，何由知廢兴？观朝廷盛事，壯社稷威灵。有湯武締構，无幽厉敝傾。知得之艰难，肯失之驕矜？知巨蠹奸邪，进不仕賢能，擇阴阳粹美，索天地精英，借江山清潤，揭日月光荣。收之为民极，著之为国經，播之于金石，奏之于大庭，感之以人心，告之以神明。（集十八）

这是在贊美诗经的歌詠"一时之否泰"，"善恶著明"，可以为"垂训之道"。读古诗云：

> 閑讀古人詩，因看古人意，古今时虽殊，其意固无异，喜怒与哀乐，貧賤与富貴。惜哉情何极，使人能如是！（卷十四）

这是在叹息古人的诗也往往流于歌詠一身之休感，无关善恶，不足垂训。垂训是儒家的旧说，但已往的儒家并沒有因为要垂训而反对歌詠一身休感。反对歌詠一身休感是邵雍的新说。他虽也责斥古人诗歌的也往往流于歌詠一身之休感，但最疾痛的还是近代诗人的"穷感则职于怨憝，荣达则专于淫泆"。近代诗人指谁，他沒有说明，大概也不便说明。石介拚命的攻击西昆体，止说西昆体的诗文，"穷妍极态"，"淫巧侈丽"，(详一章三节)沒有说西昆体的作家"怨憝淫泆"。反之，也不提苏轼说杨亿是"忠清鲠亮之士"。(详六章三节)那末邵雍所指斥的近代诗人当不是西昆体作家。朱熹批评欧阳修"以文人自立"，"平日只是以吟诗饮酒戏谑度日"。(朱子语类一三〇)又批评苏舜钦梅尧臣"虽是君子党，然轻儇戏谑"，尝"尽招两军女妓作乐烂饮，作为傲歌"。(同书一二九)正是"荣达则专于淫泆"。欧阳修作苏舜钦墓志銘，载贬逐后，"时发其憤闷于歌诗"，(欧集卅一) 正是"穷感则职于怨憝"。欧阳修又作书梅圣俞稿后云："其体长于本人情，状风物。"(同书七三) 又正是"溺于情好"。邵雍喜欢唱酬，与共唱酬的人很多，独沒有欧阳苏梅，使我们感觉他所指摘的近代诗人恐怕包括欧阳、苏、梅。果尔，可以知道学家的别创宗派另建文论与不满当时的文学家有关了。

垂训是儒家的旧说，也就是儒家的一贯企向，邵雍为了实现这种企向，提出最好"以道观道"，其次"以道观性"的写诗方法。伊川击壤集序云：

> 以道观性，以性观心，以心观身，以身观物，治则治矣。然犹未离乎害者也。不若以道观道，以性观性，以心观心，以身观身，則虽欲相伤，其可得乎？若然，則以家观家，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亦从可知矣。

何谓“以道观性”、“以道观道”？击壤集序又云：

> 性者道之形体也，性伤則道亦从之矣。心者性之郛郭也，心伤則性亦从之矣。身者心之区宇也，身伤則心亦从之矣。物者身之舟車也，物伤則身亦从之矣。

为什么性是道的形体，这是道学家的性理哲学，我们不必深究。我们要深究的，一则是“以道观道”的表现为具体方法则是：“以家观家，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二则据击壤集序，他说性伤由于“溺于情好”，“溺于情好”的人，“身之休感发于喜怒，时之否泰出于爱恶，殊不以天下大义而言”。换言之，也就是以自己的喜怒爱恶观家国天下，不“以家观家，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所以他所提出的具体的写诗方法是：“以家观家，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换成现在的话，就是站在家国的立场上，从家国的利害出发，不要从自己的利害或喜怒出发。在他看来，这样才能“善恶明著”，这样才合“垂训之道”。

三 周敦頤的文以載道說

邵雍创导诗以垂训，周敦颐（一〇一七——一〇七三）创导文以载道。周子通书中特辟“文辞”一章，说：

>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从，徒飾也，况虛車乎？文辭艺也，道德实也，篤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則爱，爱則傳焉。賢者得以学而至之是为教。故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然不賢者，虽父兄临之，师保勉之，不学也，强之不从也。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辭为能者，艺焉而已。噫，弊也久矣！（周濂溪集，正誼堂叢书本卷六）

又有“陋”一章说：

> 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彼以文辞而已者，陋矣！（同上）

载道是周秦儒家和唐代古文家旧有的意念，虽然他们沒有鲜明的标出"载道"二字。李汉序韩昌黎集说:"文者贯道之器也。"照字面观察，和载道并沒有多大差别。朱熹不赞成贯道，在语类说:"文皆是从道流出，岂有文反能贯之理?"但文旣是从道中流出，则不能反而贯道，也不能反而载道。朱熹注通书说:"文所以载道，犹车所以载物。故为车者必饰其轮辕，为文者必善其词说，皆欲人之爱而用之。然我饰之而人不用，则犹为虚饰而无益于实，况不载物之车不载道之文，虽美其饰，亦何为乎?"（周集六）文之载道旣同于车之载物，则文道仍为二事，并不同于他所谓"文从道流"，（九章二节）同时也就并不异于李汉所谓"文以贯道"。止是韩愈虽重道，但说"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尙其能者。"（详四篇七章二节）由是结果成为文章家；周敦颐说:"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陋矣"！由是结果成为道学家而已。

四　二程的道为文心說

周敦颐虽反对徒饰，但说道是实，文是艺，"笃其实而艺者书之"，那末载道的文辞仍然需要修饰。张载便不同了，他的书很少论到文辞，止是在经学理窟说:"圣人文章无定体，诗、书、易、礼、春秋止随义理如此而言。"（张横渠集，丛书集成本卷五）直然不要修饰文辞。由周张到二程，更干脆反对文辞，认为对道有害。有人问"作文害道否"？程颐（一〇三三——一一〇七）答云:

害也。凡为文不專意则不工，若專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书曰:"玩物喪志。"为文亦玩物也。吕与叔有詩云:"学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类俳，独立孔門无一事，只輸（一作惟傳）顏

氏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学者惟务养情性，其他则不学。今为文者専务章句，悦人耳目。既务悦人，非俳优而何？（河南程氏遺书，四部备要二程全书本卷十八）

作文害道，吟诗更当然害道。或问诗可学否？程颐说：

既学时须是用功方合詩人格，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詩云，"吟成五个字，用破一生心"。又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当。（同上）

这自然是周张说的更进一步，但周张时的文坛气氛是欧阳修的"道胜文至"，二程时的文坛气氛是三苏的"述意达辞"，因而使道学家更感觉道和文不能两立。

不过道学家虽反对文学，可是他们的道学也不能不借文学表现，所以周敦颐主张文以载道，二程主张道为文心。程颐答朱长文书云：

人能为合道之文者知道者也，在知道者所以为文之心。（二程文集，正誼堂叢书本卷八。原注"或云明道先生文"）

程氏遺书第二上也载二先生语云：

学者須学文，知道者进德而已。有德则不习无不利，未有学养子而后嫁，盖先得是道矣。学文之功，学得一事是一事，二事是二事，触类至于百千，至于穷尽，亦只是学，不是德。有德者不如是。故此言可为知道者言，不可为学者言。（四部备要本）

道为文心是就文章的成分说，德成为文是就文章的创作说；总之文是道的流露，较邵周都更为深刻。这种深刻的见解，便启示了朱熹的文由道流说，由反对诗文，而替诗文开拓了许多方法与意境。（详九章二节）

五 楊时的詩可兴善說

道学替诗文开拓的方法是"文由道流"，替诗文开拓的意境

是兴善气象。程氏遗书载二先生语:

夫子言兴于詩,观其言是兴起人善意,汪洋浩大,皆是此意。(第二上)

又外书云:

兴于詩者,吟詠性情,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动之,有吾与点之气象。(第三)

兴善的目的当然是教人为善,所以仍是儒家的垂教旧说,特别是邵雍提出了诗以垂训,更予程子很多的直接鼓励。但程子的目的虽与邵雍不异,手法却不相同。邵雍所用的手法是训示诰戒,程子所用的手法是感发兴起。训示诰戒止能成为文学意识,感发兴起则能成为文学意境。

程氏所提出的这种文学意境,他的弟子杨时颇能增补扩充。龟山语录云:

狼跋之詩曰:"公孙碩胅,赤舄几几",周公之遇謗,何其安閑而不迫也。学詩者不在語言文字,当想其气味,則詩之意得矣。(四部叢刊續編本卷一)

又云:

考槃之詩言"永矢弗过",說者曰誓不过君之朝,非也;矢陈也,亦曰永言其不得过耳。……孟子曰:"王庶几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心盖如此。考槃之詩,虽其时君使賢者退而穷处为可罪,夫苟一日有悔过迁善之心,复以用我,我必复立其朝,何終不过之有?

后一条显见是受之程子,前一条程子也有类似言论。遗书载"上称介甫之学"。程子云:"臣常读诗言周公之德云:'公孙硕肤,赤舄几几。'周公盛德,形容如是之盛;如王安石其身犹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二上)也是赞颂狼跋诗的气味。不同者,止是程子沒有说"学诗者不在語言文字,当想其气味,则诗之意得矣"。

不但杨时秉承了程子的说法，注重诗文气象，他的同门尹焞也于师说云：

读者要识贤者气象。（尹和靖集，正谊堂丛书本）

又谓学圣人之学有三要，二曰涵养，自释云：

涵泳自得，蕴蓄不挠，存养气质，成就充实，至于刚大，然后为得也。（同上）

虽是就读书学人而言，但读文自然也包括在读书之内。

杨时引考槃诗指出说者之误，引狼跋诗指出读者之法，都是就鉴赏而言。鉴赏侧重兴善气象，创作也当然侧重兴善气象。龟山语录云：

为文要有温柔敦厚之气，对人主语言及章疏文字，温柔敦厚尤不可无。如子瞻诗多于讥玩，殊无恻怛之爱君意，荆公在朝论事多不循理，惟是争气而已，何以事君？君子之所养，要令暴慢邪僻之气不设于身体。（卷一）

温柔敦厚的气象就是可以兴善的气象。礼记经解云："温柔敦厚，诗之教也。"据知仍是儒家的旧说。不过旧说偏于温柔敦厚的旨趣，此偏于温柔敦厚的气象。虽然气象源于旨趣，但旨趣与气象并不全同。杨时提到苏轼的多讥玩和王安石的争意气，程子也据以指斥王安石，知这种论调是针对王苏而发，而王苏与程之别，也于此益可了然。至诋毁辞章、尊重道德，是道学家的一贯主张，程门弟子自也有论列，以其并无新义，故兹从略不述。

六　司马光的文止通意说

倒是不列在道学派可接近道学派的司马光（一〇一九——一〇八六），对重道德、轻辞章，说出了一点比较言之成理的论证。他在答孔文仲司户书云：

闻诸师友曰：学者贵于行之而不贵于知之，贵于有用而不贵于无用。故孔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子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此德行之所以为四科首者也。孔子又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夫国有诸侯之事，而能端委束带，与宾客言，以排难解纷，徇国家之急，或务农训兵，以扞城其民，是亦学之有益于时者也。故言语政事次之。若夫习其容而未能尽其义，诵其数而未能行其道，虽敏而传，君子所不爱。此文学所以为末者也。然则古之所谓文者，乃所谓礼乐之文，升降进退之容，弦歌雅颂之声，非今之所谓文也。今之所谓文者，古之辞也。孔子曰："辞达而已矣。"明其足以通意斯止矣，无事于华藻宏辩也。必也以华藻宏辩为贤，则屈、宋、唐、景、庄、列、杨、墨、苏、张、范、蔡，皆不在七十子之后也。颜子不违如愚，仲弓仁而不佞，夫岂尚辞哉？（温国文正司马文正公文集，四部丛刊本卷六十）

不过这也不是说绝对的不要文辞，而是说文辞的作用在对德行、言语、政事的"通意斯止"，"通意斯止"的文辞还是需要的。所以在送胡宏夫序，称赞胡宏夫的策论："非特文辞之美也，迺能发明圣人之渊源，叶(协)于古而适于今，信乎其言能中于道者也！"（集六四）

司马光的所以提出这种文说，在当时显然是针对着苏氏父子而发。苏氏父子除了倡导文辞而外，在思想方面，他们祖述贾陆，耽恍佛老，（详六章一节）文章近似苏张。司马光在答孔文仲司户书，也正除了反对"华藻宏辩"以外，还斥责庄、列、苏、张。另外又在论风俗札子说："近岁公卿大夫好为高奇之论，喜诵老庄之言。"奏请"指挥礼部贡院，豫先晓示进士，将来程式，着有僻经妄说，其言涉老庄者，虽复文辞高妙，亦行黜落。"（集四五）又作贾生论，驳斥"世皆以贾生聪明辩博，晓练治体"。（集七十）作机

权论，说"世之命机权也妄。"（集七一）也都是在反对三苏的学术和言论。

不只反对三苏，他也反对王安石。王安石对科举主张罢诗赋，改试经义。司马光也作论选举状（集十七）、贡院定夺科场不用诗赋状（集廿八）、选人试经义劄子（集卅五）等文。但他的重视试经义，目的在引导着士子走向经明行修，和王安石的目的在从经中吸取治术者，完全不同。他作乞先行经明行修科劄子，力斥"举人经义文体"的"有王氏新学"（集五二），又作论科试官状，指责有司的"以上文下注为问"（集廿一），也是反王安石等的新法。（参五章六节）所以司马光虽不列道学传，但见解确同于道学派。

第五章　王安石及其他經術派的政教文学說

一　范仲淹的崇經术与黜詩賦

经术派和道学派一样的宗经非辞，可是结果却互相水火，这是因为道学派所矜重的是"道"，经术派所矜重的是"术"。道学派既然矜重道，由是对政治要求尊王贱霸，对文学要求载说道理；经术派既然矜重术，由是对政治要求王霸并用，对文学要求阐述政教。

完成经术派的是王安石，创始经术派的应推范仲淹（九八九——一〇五二）。吕祖谦治体论云："范文正之于庆历，亦犹王安石之于熙宁。"（范文正公集，四部丛刊本卷末）虽止是就变法而言，但也足以证明他们的主张相近。本来经是儒家的典籍，术是法家的权谋，追溯渊源，经术派原为儒法的混合，所以他们主张宗经，同时也主张变法。不过，这对文学批评没有直接关系，此处不拟详论。

宋代的科举分进士、诸科及制科。制科是特科，诸科包括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进士试诗赋论策，诸科试帖经墨义。仁宗庆历中，范仲淹为参知政事，答手诏条陈十事，第三事是精选举，他说：

> 六經傳治国治人之道，而国家乃專以辭賦取进士，以墨义取諸

科，士皆舍大方而趋小道，虽济济盈庭，求有才有識者十无一二。（集，奏議上）

由是建议“依贾昌朝等起請，进士先策论而后诗赋，诸科墨义之外更通经旨，使人不专辞藻，必明理道”。此外，上时相议制举书也摘斥当时“学者不根乎经籍，从政者罕议乎教化，故文章柔靡，风俗巧伪”。又说：“善国者莫先育材（善下疑脱治或为字），育材之方莫先劝学，劝学之要莫尚宗经；宗经则道大，道大则才大，才大则成功大。”（集九）

他傍经提出的是“道”不是术，好象是道学派不是经术派。但陈十事云：“今后进士三人內及等者，一任回日许进于教化经术文字十轴，下两制看详。”是已言及“经术”。议制举书强调所举之士的“皆能熟经籍之大义，知王霸之要略”，本旨上是术不是道。上执政书先指摘不宗经而尚文的弊端说：“今士林之间，患不稽古，委先王之典，宗权世之文，词多纤秽，士惟偷浅。”又指摘止宗经而不通术的弊端说：“至于明经之士，全暗指归，讲义未尝闻，威仪未尝学，官于明上，贻笑不暇，责其能政，百有一焉。”一方面反文辞纤秽，一方面也反明经迂腐，正是经术派的见解。

二　李覯的治物說

范仲淹对于后学极喜欢李覯（一〇〇九——一〇五九），李覯的直讲李先生文集附有年谱，载皇祐元年和二年，范两荐于朝。朱子语类卷百三十九，曾巩携欧阳修书见范，范云：“亦欲少款，适闻李先生（覯）来，欲出郊迓之。”另条载朱子云：

李泰伯（覯字）文实得之經术，虽浅，然皆大处起議論。……老苏父子自史中战国策得之，故皆自小处起議論，欧公喜之。李不軟貼，不为所喜。范文正公好处欧不及。

这可见苏近欧，李近范，又可见李近范就是由于"得之经术"。范不赞成专以诗赋取士，李上范待制（仲淹）书也愤慨的说：

古道不还，辞科浸长，不由經济，一出声病，源而海之，以至今日。……腐儒小生，去本逐末：父謂其子曰，何必讀书，姑誦賦而已矣。兄教其弟曰，何必有名，姑程試而已矣。（直講李先生文集，四部叢刊卷廿七）

上叶学士书亦云：

当今取人，一出于辞賦，曰策若論，姑以备数。（集廿七）

范提倡经术，李上宋舍人书亦云：

近年以来，新进之士……不求經术，而撫小說以为新，不思理道而專雕鏤以为丽，句千言万，莫辨首尾，览之若游於都市，但見其晨而合，夜而散，紛紛借借，不知其何氏也。（集廿七）

上富舍人书也自述"生三十余年，所务唯学，所好唯经"。（集廿七）还有他由经引伸出来的术，也同于范的王霸并用。寄上范参政书，指斥"儒生之论，但恨不及王道耳，而不知霸也强也，岂易可及哉"。（集廿七）另外在常语上也据春秋论语，反驳孟子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说"霸者岂易与哉"。（集卅二）朱子语类卷百二十九说他"贵王贱霸"。恐怕止是朱子自己的想法。

李觏不止同于范仲淹的崇经术，黜诗赋，王霸并用，还据此建立了文学理论。上李舍人书云：

賢人之业，莫先乎文。文者岂徒笔扎章句而已，誠治物之器焉：其大则核礼之序，宣乐之和，繕政典，飾刑书。上之为史，则怙乱者惧；下之为詩，则失德者戒；发而为詔誥，则国体明而官守备；列而为奏議，则闕政修而民隐露；周还委曲，非文曷济？禹、益、稷、皐陶之謨，虺之誥，尹之訓，周公之制作咸曰兴国家，靖生民矣。自周道消，孔子无位而死，而秦嬴以烈火劫之，汉由武定，晚知儒术，至今越千載，其

間文教，一盛一衰。大抵天下治則文教盛而賢人达，天下乱則文教衰而賢人穷。欲观国者，观文而可矣。（集廿七）

这种治物说的骨子里是政教，是引伸的经之术，不是引伸的经之道。虽然上叶学士书也曾说："为学必欲见根本，为文必欲先义理。"但与此合而观之，知并不同于道学派的义理。

文的旨趣既在治物而不在笔札章句，所以非薄文士的摹掠孟韩。答黄著作书云：

圣賢之言，翕張取与，无有定体，其初殊涂，归則一焉，犹李汉所謂千态万貌卒泽于道德仁义，炳如也，何須开口便隨古人，汉杰使我效李习之，膠柱矣。今之学者，誰不为文，大抵摹勒孟子，劫掠昌黎，若为之文道止此而已，則但誦古文十数篇，拆南补北，染旧作新，尽可为名士矣，何工拙之辨哉？（集廿八）

李覯对韩愈颇推崇，对孟子当然更无闲言。如答李观书云："退之之文，如大饗祖庙，天下之物，苟可荐者莫不在焉。佐平淮西，解深州围，功德卓犖，在听闻者不一，诚哉其命世也。子厚得韩之奇，于正则劣矣。"（集廿八）可是这里却责斥学者的摹孟劫韩，知不是非薄孟韩本人，而是鍼砭当时文士的"不求经术"，"但诵古文"，拆补渲染，便自谓"名士"。前者与道学派异趣，这里又显然是批判议论派。

三　祖無擇的礼乐文学說

生在李覯前三年，卒在李覯后二十六年的祖无择（一〇〇六——一〇八五），和李覯倡和颇密。李覯有寄祖无择诗（李集卅五题寄祖祕丞诗，龙集十二题寄龙学长篇），长一千六百字。祖无择在袁州兴学，李覯为作袁州学记（李集廿三，龙集十二）。李覯自集所作文二百三十五篇，分为十二卷，题曰退居类藁，祖

无择为作序云:

孔子沒千有余祀，斯文衰敝，其中作者孟軻、荀卿、賈誼、董仲舒、楊雄、王通之徒，异代相望，而不能兴衰救敝者，位不得而志不行也。苟得位以行其志，則三代之风，吾知其必复。嗟乎，秦汉以来，礼乐則不为，而任刑以毆其民，將納于治，适所以乱之也。历史寖久，皆謂天下当如是可以致治，而不治者时耳，故有奋笔舌(原誤作古)为章句，卒不及于礼乐者，末哉文也。(祖无擇龙学文集，南京图书館藏旧抄本卷八，李集卷首)

又说李覯"夙夜讨论文、武、周公、孔子之遗文旧志，兼明乎当世之务，悉著于篇。"可见二人的志趣脗合，都注重儒经，同时又都注重时务；李覯是经术派，祖无择也当是经术派。祖无择上安抚张雅(原作杂，疑误)端书，荐孙复牛仲容云:"二人之才，非今之组绣文士(士疑为辞)以为进士者。"(集八)又于河南穆公集序云:"积于中者之谓道，发于外者之谓文。"(集八)前者是轻视辞藻，后者是说文发于道。文发于道好象是道学派的见解，但合退居类藁序观之，知他所谓道是可以治世，可以为当世之务的礼乐，与道学派所提倡性理之道不同。

四　曾巩的道法事理說

曾巩(一〇一九——一〇八三)见奇于欧阳修(墓志称欧公一见奇其文)，也见重于范仲淹。上范资政书云:"阁下欲收而教焉，而辱召之，巩虽自守，岂敢自固于一邪，故进于门下。"(元丰类藁，四部丛刊卷十五)答范资政书云:"阁下犹记其人，而不为年輩爵德之间有以存之。"(集十六)可见曾已进于范仲淹门下。张渊微在直讲李先生文集书后，引盱江旧志说，曾巩为李覯高第弟子，(李集卷末)虽未必可信，但李是盱江人，曾是南丰人，相去

不远。王安石答王景山书云:“江南士大夫能为文者,而李泰伯曾子固豪士,某与纳焉。”(临川集七十九)二人并称,似非绝无来往。

就学问而言,曾巩也确近范李。本集附墓志云:“公于经微言奥旨,多所自得。”上欧阳舍人书,力言学者“策之经义当矣”。又云:“经于天地,人事无不备者也。”(集十五)显然是经术派的见解。

“人事无不备”的经义,曾巩归纳为道、法两类,上欧阳学士第一书云:

> 夫道之难全也,周公之政不可見,仲尼生于干戈之間,无时无位,存帝王之法于天下,俾学者有所依归。仲尼旣沒,析辨詭詞,驪駕塞路,观圣人之道者宜莫如孟、荀、楊、韓四君子之书也,舍是醨矣。退之旣沒,驟登其域,广开其辞,使圣人之道复明于世,亦难矣哉!(集十五)

孔子制作删存的是经,经所存的是道,可也是“帝王之法”。道是一成不变的,法则可以随时改换。战国策目录序云:

> 夫孔孟之时,去周之初已数百岁,其旧法已亡,旧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独明先王以謂不可改者,岂將强天下之主以后世之不可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变固殊,其法固异,而其为国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集十一)

唯其道不可不一,所以新序目录序也说:“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风俗。盖九州之广,万民之众,千岁之远,其教已明,其习一成之后,所守者一道,所传者一记而已。故诗书之文,历世数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尝不为终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由是慨叹后人的“不知学之有统,道之有归”。(集十一)唯其法不必同,

所以礼阁新仪目录序也说:“古今之变不同,而俗之便习亦异,则亦屡变其法亦宜之,何必一二以追先王之迹哉?其要在于养民之性,防民之欲者,本末先后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同上)

依据这种道和法的观点作文章，最重要的是事理。王子直文集序云：

> 至平之极,教化既成,道德同而风俗一,言理者虽异人殊世，未尝不同其指。何则？理当无二也。……自三代教养之法废，先王之泽熄,学者人之异见,而诸子各自为家,岂其固相反哉,不当于理,故不能一也。由汉以来,益远于治，故学者虽有魁奇拔出之材，而其文能驰骋上下伟丽可喜者甚众，然是非取舍不当于圣人之意者，亦已多矣，故其说未尝一，而圣人之道未尝明也。士之生于是时，其言能当于理者亦可谓难矣。由是观之,则文章之得失,岂不系于治乱哉?(集十二)

王容季文集序云：

> 叙事莫如书,其在尧典，述命羲和定土测日，晷星候气，揆民缓急,兼蛮夷鸟兽,其财成辅相,备三才万物之理,以治百官,授万民，兴众功,可谓博矣,然其言不过数十(原误作一)。其于舜典,则曰:“在璿玑玉衡,以齐七(原误作西)政。”盖尧之时观天以历象,至舜又察之玑衡,圣人之法,后世益备也。(集十二)

前者是说理,理出于道,道不可不一，所以言理者也“当无二”。无二就是一于经,一于圣人,不象诸子的“各自为家”。后者是叙事,事出于法,法随时改变,譬如尧时止是“观天以历象”,到舜便“又察之玑衡”,所以叙事者也便“后世益备”。

刘壎的隐居通义云:“朱文公评文专以南丰为法者，盖以其于周程之先,首明理学也。”是的,曾巩说到理的不止王子直文集序一篇,张文叔文集序也说:“喜从余问道理,学为文章。”(集十三)赠黎安二生序也说:二人之文,“穷尽事理”。(集十三)但那

是指源于道法的事理，和道学派所说的性理不同。他在筠州学记，叹息汉儒的“言道德者，务高远而遗世用；语政理者，务卑近而非师古”。称赞能以特起千载的少数学者，“论道德之旨而知应务之非近，议从政之体而知法古之非迂”。（集十八）纯是经术派的说法。

既然注重道、法、事、理，当然反对专务辞章。答李沿书云：

足下自称有悯时病俗之心。信如是，是足下之有志乎道，而予之所爱且畏者也。末曰其发憤而为詞章，則自謂淺俗而不明，不若其始思之銳也，乃欲以是質于予。夫足下之书，始所云者，欲至乎道也，而所質者則辭也，无乃务其淺，忘其深，当急者反徐之歟？夫道之大归非他，欲其得諸心，充諸身，扩而被之国家天下而已，非汲汲乎辭也。其所以不已乎辭者，非得已也。（集十六）

是和辞章派也显然不同。

五 史銘同異說

从这个观点看文章，自然轻视辞章之文，尊重学术之文。上欧阳学士第一书，特别提出“孟、荀、杨、韩四君子之书”，说是“可以观圣人之道”。又称赞欧阳修的文章，说是“六经之羽翼，道义之师祖”。（集十五）都是置重学术。学术的文章很多，史文是极重要的一种，曾巩甚为重视。南齐书目录序云：

將以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而为法戒，則必得其所托而后能傳于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托不得其人，則或失其意，或乱其实，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辞之不善，故虽殊功韙德非常之迹，將闇而不章，郁而不发，而檮杌嵬瑣奸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尝試論之：古之所謂良者，其明必足以周万物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集十一）

合乎这四个条件的，他认为止有唐虞的史家，大概指尚书作者，后来就是司马迁班固也未全备具。他说这是由于“圣贤之高致，迁固有不能纯达其情而见之于后者矣”。“不能纯达其情”，就是周理、适用、通意、发情的明智不够。周理适用仍然是道、法、事、理的另一说法。

和史相近的是铭，曾巩对史铭同异有很精密的分析。寄欧阳舍人书云：

> 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其辞之所作，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则以媿而惧；至于通材达识，义烈节士，嘉言善状，皆见于篇，则足以为后世法；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近？（集十六）

史铭的同点是都在“警劝”，史铭的异点是史并书善恶，铭有善始书。可也就因为有善始书，所以为子孙者都想为父祖勒铭，由是铭遂不实，也没有意义。欲恢复铭的“警劝”意义，与史文并传不朽，必须作者的畜道德，能文章，拒恶人，辨情伪。寄欧阳舍人书续云：

> 及世之衰，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故虽恶人皆务勒铭以夸后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铭始不实。后之作铭者，常观其人，苟托之非人，则书之非公与是，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故千百年来，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铭，而传者盖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书之非公与是故也。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盖有道德者之于恶人则不受而铭，之于众人则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恶相悬而

不可以实指，有实大于名，有名侈于实，犹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恶能辨之不惑，議之不徇？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辞之不工，則世犹不傳，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同上）

这是在讲作铭的道德和文章，却也可与南齐书目录序所提出的作史四条件，互相发明。这里所说的拒恶辨情的畜道德，就是目录序说的"明足以周万物之理，智足以通难知之意"；这里所说的工辞的能文章，就是目录序说的"文足以发难显之情"。这里说惟有畜道德的人始能辨名实情伪，目录序也说马班的不能备具四条件，由于不能纯达圣贤高致。这似乎是很迂阔，但从事文史者确是应当有忠于事实的道德；否则歪曲奸谄，毫无价值。答李沿书说不必汲汲于文辞，这里又说须有工辞的文章，二者并不矛盾。答李沿书说得明白，"所以不已乎辞者，非得已也"。文章的目的是道、法、事、理，可是"设辞不善"，便不足"发难显之情"，所以虽不同于辞章派的重视工辞，却也不能忽略工辞，这是经术派与道学派的极大差别。

六　王安石的罢詩賦与試經义

王安石（一〇二一——一〇八六）和祖无择、李觏、曾巩都很有关系。纳交李曾的过程，见前引答王景山书。（见四节）他与祖择之（无择）书云，"执事欲收而教之"，（临川集，四部丛刊本卷七十七）直然以晚辈自居。曾巩两次向欧阳修推荐他（上欧阳舍人书及再与欧阳舍人书，曾集十五），才得列名门墙；又向蔡学士推荐（上蔡学士书，曾集十五），未考有无结果。他寄曾子固诗云："吾少莫与合，爱我君为最。"（集十二）大概是实情，不是客气。曾巩与王介甫（安石）第一书云："欧公更欲足下少开廓其文，勿

用造语及模拟前人，請相度示及。欧云：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曾集十六）纯是老学长教导小学弟的口气，虽然曾巩不过比王安石大两岁而已。

友谊对学术或不无影响。程子云：“王介甫与曾子固（巩）善，役法之变，皆曾参酌之。”（程氏外书十二）黄震云：“南丰（曾巩）与荆公（王安石）俱以文学名当世，最相好，且相延誉。其论学皆主考古，其师尊皆主杨雄，其言治皆纤悉于制度，而主周礼。荆公更官制，南丰多为拟制诰以发之。岂公与荆公抱负亦略相似，特遇于时者不同耳。”（黄氏日抄六三）

王安石在论文方面，也接受了范仲淹、李觏、曾巩诸人的影响。宋史范仲淹传，仁宗采用了他对科举的建议，（宋史三一四）但仲淹既去，据选举志，便又诏“一切如故”，（宋史一五五）就是仍以诗赋墨义为主试科目。这中间有反对的，就是李觏，可是一直沒有能改革；后来实现了改革的是王安石。他很早就对诗赋墨义不满意，上仁宗皇帝书云：

> 方今取士，强記博誦而略通于文辞謂之茂才异等賢良方正；茂才异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选也。記不必强，誦不必博，略通于文辞而又尝学詩賦則謂之进士；进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选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为公卿，不待論而后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为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为公卿者常出于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后得也，其亦蔽于理矣。

又云：

> 其次九經、五經、学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尝患其无用于世，而稍責以大义矣；然大义之所得，未有賢于故也。今朝廷又开明經之选，以进經术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通于文辞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于天下国家之用者，顧未必得与于此选也。（集卅九）

又在“论议”中的“取材”一篇，痛斥策进士者，“但以章句声病，苟尚文辞”，策经学者，“徒以记诵为能，不责大义”；致使属文者涉猎巫艳，不关政事，守经者传写诵习，不关义理。（集六九）

他曾任试官，曾详定试卷，作试院中诗云：

> 少年操笔坐中庭，子墨文章頗自輕，圣世选才終用賦，白头来此試諸生。（集十八）

又作详定试卷二首，第二首云：

> 童子常夸作賦工，暮年羞悔有楊雄。当时賜帛倡优等，今日論才將相中。細甚客卿因笔墨，卑于尔雅注魚虫。汉家故事真当改，新詠知君胜弱翁。（集十八）

由二诗看来，他所最卑薄的是“诗赋”；由上仁宗书看来，不但卑薄“诗赋”，也卑薄“明经”。卑薄“诗赋”是恶其只是记诵文辞，卑薄“明经”是恶其不能明“经”——就是不能开发经术。答姚辟书说得明白：“离章绝句，解名释数”，不是圣人之术，止是“守经而不苟世”而已，并没有什么用处。“圣人之术，修其身，治天下国家，在于安危治乱，不在章句名数焉”。（集七五）

后来神宗嗣位，安石当国，乞改科条制劄子：“先除去声病对偶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又云：“所对明经科欲行废罢，并诸科元额內解明经人数添解进，及更俟一次科场，不许新应诸科人投下文字，渐令改习进士。”（集四二）神宗也便据下诏云：“四方执经艺者专于诵数，趋乡举者狃于文辞，与古所谓三物宾兴，九年大成，亦已盭矣。”（宋史一五五，选举志）由是罢诗赋、帖经、墨义，改试经义。王安石仍以为学官试文，有的文胜而违经旨，由是和他的儿子王雱、门人陆佃等，作诗、书、周礼三经新义。熙宁八年，奏准颁试。无疑的，试三经新义的目的，是为的通经致用，就是采用经术。周礼义序云：

士弊于俗学久矣，圣上闵焉，乃以经术造之。

又云：

惟道之在政事，其贵贱有位，其后先有序，其多寡有数，其迟数有时，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时。其法可施于后世，其文可见于载籍，莫具乎周官之书。（集八四）

周礼新义的作用如此，诗书新义的作用不问可知。

七 治教政令说

这种观点与这种措施下的文学，应当是治教政令。王安石与祖择之书云：

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书之策，引而被之天下之民，一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则有本末先后权势制义，而一之于极；其书之策也，则道其然而已矣。彼陋者不然，一适焉，一否焉，非流焉则泥，非过焉则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当后者反先之，无一焉不悖于极。彼其于道也非心得之也，其书之策也独能不悖耶？故书之策而善，引而被之天下之民反不善焉，无矣。二帝三王引而被之天下之民而善者也，孔子孟子书之策而善者也，皆圣人也，易地则皆然。（集七七）

上人书亦云：

尝谓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其书诸策而传之人，大体归然而已；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云者，徒谓辞之不可以已也，非圣人作文之本意也。

又云：

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不适用非所以为器也，不为之容其亦若

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集七七）

礼教治政也就是治教政令，这是文章的主要任务，至文辞是“不可以已”，不是作文的本意。不可以已不是废置，所以和曾巩的意见相同，不象辞章派的揣练文辞，可也不象道学派的卑弃文辞。

治教政令不是纵横议论，可也不是心性义理。固然他也曾说“文以贯道”，如上邵学士书云：

非夫至诚发乎文，文贯乎道，仁思义色，表里相济者，其孰能至于此哉？（集七五）

又如答吴孝宗书云：

若子经（孝宗字）欲以文辞高世，则世之名能文辞者已无过矣；若欲以明道，则离圣人之经，皆不足以明也。（集七四

但王安石所意识的经既是安危治乱的经术，则所谓道仍是治教政令，并不同于道学派的心性义理。

他也曾说“文以述志”，如上张太傅书云：

夫文者，言乎志者也。（集七七）

又如答王景山书云：

读其文章，庶几乎得其志所存。（集七七）

但志仍是治教政令。先大夫集序云：

君子于学，其志未始不欲张而行之，以致君下膏泽于无穷。唯其志之大，故或不位于朝，不位于朝而势不足以自效，则思慕古之人而作为文辞，亦不失其所志也。（集七一）

可以“致君下膏泽于无穷”的还是治教政令，所以也不同于辞章派的自由意志。

治教政令的渊源出于经，斟酌损益则在于己，因此王安石提倡治教政令的文章，同时又强调文章自得。上人书云：

自孔子之死久，韩子作，望圣人于百千年中，卓然也。独子厚名与

韓并，子厚非韓比也，然其文章卒配韓以傳，亦豪杰可畏者也。韓子尝語人以文矣曰云云，子厚亦曰云云，疑二子者徒語人以其辭耳，作文之本意不如是其已也。孟子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诸左右逢其源。"孟子之云尔，非直施于文而已，然亦可托以为作文之本意。（集七七）

送孙正之序亦云：

时然而然，众人也；己然而然，君子也。（集八四）

这是基于治教政令的必需适时有用，可也基于王安石为人的刚愎自是，无怪苏轼说他"好使人同己"了。（详六章三节）

八　刘弇的"变"說及"氣"說

曾巩有两个弟弟，一名布，一名肇，今传肇曲阜集四卷（豫章丛书本），卷一有上哲宗皇帝书，請别立经明行修一科，使"学者知尊经术，笃行谊"，但沒有据建文学評论。王安石也有两个弟弟，一名安礼，一名安国，今传安国王魏公集八卷（豫章丛书本）；继承王安石经学的有龚原陆佃，今传陆佃陶山集十六卷（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也都沒有重要的文学評论。有较重要的文学評论的倒是曾王的后学刘弇（一〇四八——一一〇二），在上陆农师书，说六经自"王荆公始以粹完绝世之学，解剥顽阴，揭之明光"。（龙云集，豫章丛书本卷十五）又作祭王荆公文，更称颂王荆公的经学"睨圣人之阃而直跻"。（集卅）至谈到文章，他对于体裁强调"变"，对于风格重视"气"。上曾子固先生书云：

閣下所以能文者，非徒能文，正在能变耳。

又云：

文章之难也，从古則然，虽有博者莫能該也，則处此有一道焉，变是已。

接著列举经、史、诗、骚的无一不变云:

> 自朴散以来,誰非从事乎文者。其間重見亦出,虽列屋兼兩,犹不能既其实。然其大約有四:曰經,曰史,曰詩,曰騷,而諸子蓋不預也,則亦不离乎变而已。經之作也,使讀詩者如无书,讀书者如无易,其讀礼春秋也亦然。岂惟句讀而已,其取名布义也亦然。禹貢載禹治水,北徂东漸,計往返无虑数万里,足所投者几所,身所尝者几事,而首尾才千余言焉。及丘明之傳經也,件为編年而侈数百倍焉;迁之为紀、傳、世家、书、表,則又倍焉;其后有班范晋阳秋魏略之类,則又倍焉:不害其为史也。詩之約也二言而已,曰"肇禋";已而三言,曰"盧重鋂";已而至于五言,曰"贈之以芍藥";甚者如"誰知烏之雌雄",乃有六言;而由汉閱唐,又有七言焉:不害其为詩也。离騷之文則固异乎招魂矣,招魂之文則固异乎大招矣,于流而为楊馬之丽賦,則亦无适而不异。經也,史也,詩也,騷也,其每变乃如此。昔之人倘徉不根,宜莫如庄周,至其卒收之也乃有天下篇焉;賈生之书,如陈政事一篇,其劫束世故仅如卑卑之申韓,及讀怀沙悲鵩,至欲拔堯之外鍵而直將以此世与夫未始有极者游也,夫是之謂善变。此殆韓愈所謂"惟陈言之务去",陆机所謂"怵他人之我先"者歟?唐元和長庆間,文章号有前代气骨,何則,知变而然也。如李翺皇甫湜尙恨有未尽,下是則虫讙鳥聒,过耳已泯,蓋无以議为也。(集十五)

梁朝的萧子显已提倡"新变",(详三篇六章五节)不过刘弇恐怕不是接受的他的意见。刘弇提到陆机韩愈,知他颇受二人影响。但最直接的影响,恐怕还是曾巩和王安石。曾巩和王安石都力主改变政治,由政治转到文学,当然也需要改变。曾巩和王安石都被人誉为成功的文学家,可是他们并不以文学家自居。他们以文学为政治工具,因此全副的精力用在变政,不用在变文。刘弇出于曾巩王安石,却不谈政治,止是致力文学。上蹇司諫书云:"于世事仕官进取,曾不能过庸;徒以读书为文,粗不在流輩

后。”(集十六)上提刑邹度支书也说：自六经以下，尽读各家书，“以昀其文”。(集十八)这样，遂将曾巩王安石的变政观点，移于变文。萧子显止说“新变”，沒有说向哪里“新变”；陆“怵他人我先”，韩倡“务去陈言”，也止是不同古人；刘弇例举古简后繁，显然向繁转变。是的，繁是简的进步，止要不是浮文滥调。

体裁应当“变”，风格重视“气”。上运判王司封书，先例举六博书画斗士刺客的无一不恃气，然后说最需要恃气的是文章：

> 其气完者其辞浑以壮(以壮二字据原注引京本增)，其气削者其藻局以卑。是故排而跃之非怒張也，敛而留之非惧胁也，道縱捷发非吝而驕也，紆徐不肆非戀而凄也，时出冷汰以示其清，別为龐渾以示其厚，如将不得已以示其平，无适而不在于理以示其專，破觚扫梗以示其数鼓而不竭也，丹雘續繪以示其朝御而更新也，有毅然不可犯如汲直之面折者，有时女守柔如回車以避廉頗者，有省語徑說如曾子之守約者，有灑落快辨无敢校对如季布之呵曹武阳者。故曰文章以气为主，岂虛言哉？孔子之气，周天地，該万变，故六經无余辞焉，而其小者犹足以叱夾谷之强齐。孟子抃視万鍾，小晏嬰管仲，而其自养則有所謂浩然者，故其书卒貽后世。語賦者莫如相如，相如似不从人間来者，以其慕藺也。語史者莫如子長，瑰瑋豪爽，視古无上者，以其上会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以作其气也。唐之文士固无出退之者，其入王庭湊軍也，視若幷槊小儿，則足以知其气矣。若夫持正褊中，禹錫浮躁，元稹緣宦人取寵，吕溫茹便僻规进，而宗元戚嗟于放廢之湘南，皆其气之不完者，故其文章終餒于(原作和，兹依注引京本)理，亦其势然也。(集十八)

这远源虽可溯于孟子曹丕，近源显然得之苏辙，就中孟子司马迁两例，与苏辙如出一口。(详六章六节)曾王与二苏，虽或主经术，或主议论，但互相影响的地方自然很多。刘弇已放弃了政治

斗争，专力文学，又在苏辙的故乡峨嵋做过官（集附录墓志），更容易接受苏辙意见。不过苏辙止置重于养气以为文，刘弇更进而指出气影响于文学的风格而已。

第六章　苏軾及其他議論派的述意达辞說

一　賈陆議論与佛老思想

苏軾说欧阳修以文章主盟付某(见李廌师友谈记)，魏了翁说欧阳修尹师鲁的变文体賴着苏軾的辞章。(详九章八节)的确，欧阳修道文并重，苏軾所接受而且光大的是文，是古文。古文在唐代已由韩愈完成，可是不久又被四六文革替，直到欧阳修再度完成，才浩蕩绵延，形成文章正宗，虽有其他因素，最重要的确是賴着苏軾的辞章，賴着苏軾的以古文兼并骈文的辞章。嘉祐二年(一〇五七)，苏軾应礼部试，欧阳修擢置第二，苏軾作谢启，感叹皇甫湜孙樵的"学韩不至"，(引见四章二节)又云：

> 伏維內翰执事，天之所付以收拾先王之遺文，天之所待以覚悟学者，恭承王命，亲执文柄，意其必得天下之奇士，以塞明詔。(謝南省主文启五首，欧阳內翰，見东坡集，四部备要东坡七集本廿六)

言外正是以"天下奇士"自居，同时又隐言奇士的责任是继承欧阳修的改革文学，不蹈皇甫湜孙樵的学韩不至的复轍。

苏軾的改革文学，主要的是由欧阳修的"道胜文至"，改为"述意达辞"。述意是內容的解放，达辞是形式的解放。述意是由儒道扩展到贾陆议论和佛老思想，而又不受儒佛和贾陆的限制；达辞是由古文扩展到骈文的修辞，而又不受古文和骈文的限

制。

韩欧都卫道辟佛，很少提到贾陆，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一书却云："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长，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让，有执事之态。陆贽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当，有执事之实。"（嘉祐集十一）苏轼作欧阳修居士集叙亦云："论事似陆贽。"（东坡集廿四）实则不是欧文似陆贽，而是三苏景仰陆贽，又景仰陆贽可以比美的贾谊。苏洵上韩枢密书云：

> 洵著书无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嘉祐集，四部叢刊本卷十）

上田枢密书亦云：

> 常以为董生得圣人之經，其失也流而为迂；鼂錯得圣人之权，其失也流而为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誼）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集十）

苏轼答虔倅俞括奉议书云：

> 文人之胜莫如近世，然所敬慕，独陆宣公（贄）一人。（东坡后集十四）

答王庠书亦云：

> 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实用，賈誼陆贄之学殆不傳于世，老病且死，独欲教子弟。（后集十四）

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銘云：

> 少与轍皆师先君，初好賈誼陆贄书，論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欒城后集廿四，东坡集卷首作东坡先生墓志銘）

历代论中的"陆贽"第四十亦云：

> 昔先君博观古今議論，而以陆贄为賢。吾幼而讀其书，其賢比汉賈誼，而詳練过之。（后集十一）

父子三人都异口同声的说在绍述贾陆，这和欧阳修的绍述孟韩显然不同。贾陆的长处，苏洵以为既得圣人之经，又得圣人之

权。自我们看来，经确是儒家的教义，权则是纵横家的法宝。王安石修仁宗实录说，"老苏之书，大抵皆纵横者流。"(朱子语类百卅)朱熹答程允夫说小苏，"早拾苏(秦)张(仪)之绪余，晚醉佛老之糟粕。"(朱公文集四十一)指斥为纯粹的纵横家，自近于诋諆，罗大经的鶴林玉露卷九就说朱子的话是"弹文"。但苏轼的弟子秦观作韩愈论，鲜明的倡言论事要如"苏秦张仪之所作"，(详七节)不能说毫无苏轼影响。总之，贾陆近似儒家(汉志列贾子儒家)，可也近似纵横家，苏洵的书分名"几策""权书""衡论"，苏轼苏辙也都以策论史论著称，正是绍述贾陆的纵横议论。

苏洵止是绍述贾陆议论，苏轼苏辙后来又加上佛老思想；佛是兄弟从同的，老则弟优于兄，兄好祖述老子的庄子。苏辙的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銘云：

> 既而讀庄子，喟然叹曰：昔吾有見于中，口未能言，今見庄子，得吾心矣。

苏籀欒城遗言云：

> 公(辙)为籀講老子数篇，曰：高于孟子二三等矣。(百川学海本)

苏轼喜好庄子，所以偏于爽朗自放；苏辙喜好老子，所以偏于深湛自守。朱子引刘大諫对刘草堂说，"子瞻却只是如此，可由可畏。"(朱子语类百卅一)虽是诽谤，确能道出二苏区别。

二苏的醉心释氏似乎更在醉心老庄之后，虽然醉心释氏以后仍然醉心老庄。苏洵彭州圆觉禅院记云：

> 自唐以来，天下士大夫爭以排釋老为言，故其徒之欲求知于吾士大夫之間者，往往自叛其师以求容于吾，而吾士大夫亦喜其来而接之以禮，灵师文暢之徒，飲酒食肉以自絕于其教。

这是苏洵以前的情形。记又云：

> 嗚呼，归尔父子，复尔室家，而后吾許尔以叛尔师；父子之不归，

室家之不复，而师之叛，是不可以一日立于天下。傳曰“人臣无外交”，故季布之忠于楚也，虽不及蕭曹之先觉，而比于丁公之貳則为愈。（嘉祐集十四）

这是苏洵的态度。到二苏便不同了，不止不强僧叛释，相反的自己也要归释。苏轍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銘云：

后讀釋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辯无碍，浩然不見其涯也。

苏轼文集有“释教”三卷（正集四十，后集十九，廿），至和僧道的书简往还诗酒唱酬，更多至一时无从统計。门庭的嘉宾，除了四学士六君子，还有佛印参寥子。妻王氏卒，請李公麟画释迦文佛及十大弟子。（释迦文佛颂并引，后集十九）妾朝云病且死，“诵金刚经四偈以绝”。（朝云墓志銘，续集十二）自己临死的时候，錢济明问他“端明平生学佛，此日如何？”他说，“此语亦不受。”（释德洪跋李豸弔东坡文，石门文字禅廿七）答刘贡父云：

禪理气术，比来加进否？此間关身事，特有此耳。（續集六）

直然视释氏为唯一归宿。苏轍也一样。书楞严经后云：

予自十年来，于佛法漸有所悟。（欒城后集廿一）

书传灯录后亦云：

予久习佛乘，知是出世第一妙理。（三集九）

至转依释氏的年代，大概在熙宁元丰遭贬以后。苏轍天竺海月法师塔碑云：

余杭天竺有二大士，一曰海月，一曰辯才。……熙宁中，予兄子瞻通守余杭，从二公游，敬之如师友。……后十有六年，子瞻守余杭，复从辯才游。（欒城后集廿四）

据王宗稷东坡年谱，熙宁四年（一〇七一）以议科举触王安石党，通判余杭，七年移胶西。是苏轼的皈依释氏在熙宁年间。

苏轍逍遥聪禅师塔碑云：

予元丰中(一〇七八——一〇八五)，以罪謫高安，既涉世多难，知佛法之可以归。是时洞山有文，黄蘗有全，圣寿有聪，是三老人皆具正法眼，超然无累于物，予稍从之游，既久而有见也。(后集廿四)

是苏辙的皈依释氏在元丰年间。

老苏止是不强僧叛释，二苏却进而师僧归释。既归释便应舍孔，可是他们偏要顶着孔子衣冠。苏辙说苏轼读佛书后仍"参之孔老"，苏轼也同样称赞苏辙的老子解云：

使战国有此书，则无商鞅韓非；使汉初有此书，则孔老为一；晉宋間有此书，则佛老不二。(跋子由老子解，津逮秘书本东坡题跋一)

可见都是在糅合孔老佛氏，和韩愈欧阳修的卫道辟佛全然牴牾。

苏轼和海月、辯才，苏辙和文、全、聪诸释氏的契合来往，止是人事姻缘；造成转变，还有社会政治的原因。朱熹云：

熙宁更法，亦是势当如此。凡荆公所变更者，东坡亦欲为之；及見荆公做得紛扰狼狈，遂不复言，却去攻他。(朱子語类一三〇)

变法练兵，不是"多空文而少实用"的儒学所能奏效，所以王安石尊"经"而特别注重"术"，(详五章六节)三苏则崇奉有"经"有"权"的贾陆。后来一则见王安石变得狼狈，二则遭贬畏罪，明哲保身，遂又由有经有权的贾陆，转到"出世妙理"的佛老。佛教、道教，几乎可以说是完全反动的，佛老思想则有一定的解放意义。特别是出于老学的庄学，正是苏轼所最推崇的。总之，三苏的家庭是否原出工商业者虽不可知，但如我们在第四章第一节所分析，他们确是代表着工商业者及市民的意识。他们反对大地主贵族的虚伪保守，空谈心性，也不滿意改良者的独断独行，治絲益棼。但因代表的工商业者及市民的阶层还很薄弱幼稚，提不出自己的具体的方案，零碎的提出一些，也得不到有力的支持。因而只有思想的由儒家扩展贾陆佛老和文章的由古文扩展到一

切的辞章，然后吸收熔铸，成为自由的思想和辞达的文章。我们应当指出，就是这自由的思想和辞达的文章，对推动文学和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二　苏洵的文章四用说

苏洵既绍述贾陆议论，因而对文章的具体要求是事、词、道、法。史论上云：

> 大凡文之用四：事以实之，词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检之，此经史所兼而有之者也。虽然，经以道法胜，史以事词胜；经不得史无以证其褒贬，史不得经无以酌其轻重；经非一代之实录，史非万世之常法，体不相沿，而用实相资焉。夫易、礼、乐、诗、书，言圣人之道与法详矣，然弗验之行事，仲尼惧后世以是为圣人之私言，故因赴告策书以修春秋，旌善而惩恶，此经之道也。犹惧后世以为己之臆断，故本周礼以为兄（案疑有误），此经之法也。至于事则举其略，词则务其简，吾故曰经以道法胜。史则不然，事既曲详，词亦夸耀，所谓褒贬论赞之外无几，吾故曰史以事词胜。使后人不知史而观经，则所褒莫见其善状，所贬弗闻其恶实，故曰（故上当有吾字）经不得史无以证其褒贬。使后人不通经而专史，则称谓不知所法，惩劝不知所沮（当为祖），吾故曰史不得经无以酌其轻重。经或从伪赴而书，或隐讳而不书，若此者众，皆适于教而已，吾故曰经非一代之实录。史之一纪一世家一传，其间美恶得失，固不可以一二数，则其论赞数十百言之中，安能事为之褒贬，使天下之人动有所法如春秋哉？吾故曰史非万世之常法。（嘉祐集八）

这虽是在分析经史，但首冠以“文之用四”一句，知也就是在讨论文章。古文家大都奉经为至高无上的文章典型，他却说“经以道法胜，史以事词胜；经不得史无以证其褒贬，史不得经无以酌其轻重”，经已不得独尊。又史论下云：“迁固史虽以事词胜，然亦

兼道与法而有之。”（集八）那末史又兼经之长，当然更重于经。在古文家中，我们不能不指出这是苏洵的新说，过去是没有的。他所提出的事、词、道、法四用，止有道是古文家的传统见解，事是欧阳修曾经说过，词与法则都是他所新创。重法所以走到策士议论，重词所以走到文人辞章。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云：

> 洵少年不学，生二十五岁，始知读书。……其后困益甚，然后取古人之文而读之，始觉其出言用意，与已大异。时复内顾自思其才，则又似夫不遂止于是而已者。由是尽烧曩时所为文数百篇，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观于其外而骇然以惊。及其久也，读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当然者。然犹未敢自出其言也。时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试出而书之，已而再三读之，浑浑乎觉其来之易矣。然犹未敢以为是也。（集十一）

这和韩愈答李翊书的自述为文经过似乎相象，但韩愈不惟“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而且“非圣人之志不敢存”；不惟“游之乎诗书之源”，而且“行之乎仁义之途”；所涵泳的不止是“文”，而且有“道”。（详四篇七章三节）苏洵所涵泳的则止是论孟韩“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上欧阳内翰第一书又云：

> 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不为巉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执事之文，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此三者皆断然自为一家之文也。

称道赞许的也止是孟、韩、欧阳之文，不是孟、韩、欧阳之道。上田枢密书云：

> 数年来，退居山野，自分永弃，与世俗日疏阔，得以大肆其力于文章，诗人之优柔，骚人之清深，孟韩之温醇，迁固之雄刚，孙吴之简切，

投之所向，无不如意。

学习取法的也止是诗、骚、孟、韩以至孙吳之文，也不是诗、骚、孟、韩之道。这和韩欧之称贊孟韩、学习孟韩的意旨，逈然不同。然则四用的列道一种，不过是因袭点綴，实在致力的乃是议论文章。

三　苏軾的述意达辞說

苏軾的思想不止扩展到贾陆，还扩展到佛老，更当然不再步趋韩欧的卫道辟佛，也不再步趋韩欧的文以载道。朱子引苏軾云："吾所谓文，必与道具。"（朱子语类一三九）据苏軾所作祭欧阳文忠公文，实在是欧阳修语。（东坡续集十六，欧集附录二）苏軾日喻云："道可致而不可求。"又云："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但一则他沒有说以道为文。二则那好象是在讽刺王安石的以经术取士，所以文中又云："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至于道；今者以经术取士，士求道而不务学。"（东坡集廿三）三则苏軾所谓道的含义非常广泛，如虔州崇庆禅院新经藏记云："论道之大小，虽至于大菩萨，其视如来如天渊然，及其以无所得故而得，则承蜩意鉤履狶画墁，未有不与如来同者也。"（东坡续集十二）是不惟包括佛老，还包括承蜩意鉤履狶画墁，和韩欧的专指儒道，截然不同。

载道失了重要性，代之而来的是述意。葛立方韻语阳秋卷三，洪迈容斋四笔卷十一，尤袤梁溪漫志卷四，王构修辞鉴衡卷二，都载苏軾在儋耳，葛延之问作文方法，苏軾答云：

> 儋州虽数百家之聚，州人之所須，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攝之，然后为己用；所謂一物者，"錢"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經子史中，不可徒得，必有一物以攝之，然后为己用；所謂

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钱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据韵语阳秋，他书字有出入）

何薳春渚纪闻卷六载苏轼告刘景文云：

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踰此者。（津逮秘书本）

前者是教人，后者是自述，都归结于"意"。意是极端自由的，可取之儒佛，也可取之贾陆，可一成不变，也可随时改换。朱子云：

东坡议论，大率前后不同，如王介甫当国时是一样议论，及后又是一样议论。（朱子语类一三〇）

又云：

初年论甚生财，后来见青苗之法行得狼狈，便不言生财；初年论甚用兵，如曰"用臣之言，虽北取契丹可也"，后来见荆公用兵用得狼狈，便不言用兵。他分明有两截底议论。（同上）

虽出敌党后学，确能抓着苏学要点。他不止论生财用兵前后不同，论人论道也一样的前后不同。譬如贾谊是他父子极端崇奉的，但上神宗皇帝书却云：

贾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时之良策，然请为属国，欲系单于，则是处士之大言，少年之锐气。昔高祖以三十万众困于平城，当时将相群臣岂无贾生之比，三表五饵，人知其疎，而欲以困中行说，尤不可信。

又云：

使贾生常历艰难，亦必自悔其说，用之晚岁，其术必精，不幸丧亡，非意所及。（续集十一）

推断贾谊晚年的必自悔其说，正是苏轼自悔其说的画供。又如佛老是他兄弟所醉心的，但作居士集叙却云：

自汉以来，道术不出于孔氏，而乱天下者多矣。晋以老庄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余年而后得韩愈，学者以愈配孟子，盖庶几焉。

愈之后三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东坡集廿四）

又极力的赞扬韩欧的肩负儒家道统，辟斥释氏老庄。作潮州韩文公庙碑，也赞扬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后集十五）这好象是在崇奉韩愈，崇奉韩愈的卫道辟佛，但又作韩愈论。却云：

韩愈之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何者，其为论甚高，其待孔子孟子甚尊，而拒杨、墨、佛、老甚严。（应诏集十）

又不赞成韩愈的"拒杨、墨、佛、老甚严"。此外，如对于科举，他是赞成诗赋，反对经义的。议学校贡举状云：

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近世士人纂类经史，缀缉时务，谓之策括，待问条目，搜抉略尽，临时剽窃，窜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为文也，无规矩准绳，故学之易成；无声病对偶，故考之难精；以易学之士，付难考之吏，其弊有甚于诗赋者矣。（奏议集一）

但谢秋赋试官启又云：

近世……场屋后进，挟声技以相夸，王公大人，顾雕虫而自笑，旧学无用，古风遂忘，终始之意，曾不相沿，贵贱之间，亦因遂阔。下之士有学古之志，而无学古之功，上之人有用儒之名，而无用儒之实，顾兹媮弊，常窃悯嗟。（集廿六）

由是希望"使天下知文章诚可以制治，知声律不足以入官"，和议贡举状的指责不试"声病对偶，故考之难精"，显然违牾，真是"两截底议论"。朱子说："东坡平时为文论利害，如主意在那一边，利处只管说那利，其间有害处亦都知，只藏匿不肯说。"（朱子语类百卅）的确，论生财用兵是意，反生财用兵也是意；绍述贾陆议论是意，反对贾陆议论也是意；赞扬韩欧的卫道辟佛是意，讥贬韩愈的峻拒佛老也是意。意是极端自由的，可以揭取各种

学说，但不接受任何限制。答张文潜书云：

> 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所同也。（东坡集卅）

这固然说中了王安石的强人同己，但也说明了苏轼的意志自由。朱子曾反驳说："倶入于是，何不可之有？今却说未尝不善而不合要人同，成何说话？若使弥望皆黍稷，都无稂莠，亦何不可？"（朱子语类百卅）自现在看来，这就是苏学与王学朱学的根本差异，王学和朱学都有自己的一成不变的根本观念，苏学则始终是自由思想。

文章的内容是"述意"，文章的形式当然是"辞达"——就是达意的文辞。与王庠书云：

> 孔子曰："辞达而已矣。"辞至于达止矣，不可以有加矣。（后集十四，又续集十一）

答谢民师书云：

> 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又曰："词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则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景，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了然于口与手乎？是之谓词达。词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后集十四，又续集十一作与谢民师推官书）

孔子说"辞达而已矣"的意思是重质轻辞，"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则相反的是注重文辞，不过引见左传，恐非真出孔子。（详一篇三章三节）这种矛盾的学说居然在苏轼手里统一，则苏轼所谓"辞达"，虽不能说是重视文辞，可也不能说是轻视文辞，而是

"求物之妙，使其了然于口与手"。换言之，就是辞的不多不少的恰好达意。

辞的不能恰好达意，正同孔子说的不易依乎中庸一样，不是"过"就是"不及"。不及便不能辞达，过则违反辞达。不能辞达的毛病是尽人皆知的，违反辞达的毛病首由苏轼举发。他在谢南省主文启五首的"欧阳内翰"一首云：

> 自昔五代之余，文教衰落，风俗靡靡，日以涂地。圣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诏天下，晓谕厥旨。于是招来雄俊魁伟敦厚朴直之士，罢去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将以追两汉之余，而渐复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过当，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余风未殄，新弊复作，大者镂之金石以传久远，小者转相摹写，号称古文。（集廿六，又续集十一作谢欧阳内翰书）

这里最令我们注意的是非毁古文，相反的当然就不十分反对骈文。议学校贡举状云：

> 近世士大夫文章华靡者莫如杨亿，使杨亿尚在，则忠清鲠亮之士也，岂得以华靡少之？通经学古者莫如孙复石介，使孙复石介尚在，则迂阔矫诞之士也，又可施之于政事之间乎？（奏议集一）

杨亿是骈体文作家，苏轼不惟不反对杨亿的华靡，反倒讥刺反杨亿的孙复石介的学古矫诞，那末他所谓辞达当然有取于骈文了。

有取于骈文，不是全取于骈文，骈文的"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他也认为违反辞达。不过苏轼的时代已经是古文的时代，骈文的违反辞达，止剩下一点未殄的余风，古文的违反辞达，则已有"求深""务奇"的两种新弊。苏轼与鲁直书云：

> 凡人文字，务使平和，至足余溢为奇怪，盖出于不得已。（续集四）

也是在贬斥"务奇"。答谢民师书云：

> 扬雄好为艰深之词，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

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物也，而独悔于赋何哉？终身雕虫，而独变其音节，便谓之经，可乎？（后集十四，又续集十一）

也是在贬斥"求深"。骈文的"丛错采绣"违反辞达，古文的"求深务奇"也违反辞达，那末究竟怎样才能以辞达呢？答谢民师书云：

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文说云：

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四部丛刊本经进东坡文集事略五十七，又津逮秘书本东坡题跋作"自评文"）

由此知辞达的具体方法就是"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这似乎有点不可捉摸，但与反对"丛错采绣"和"求深务奇"，合而观之，知就是恰好达意而止，不要拘于骈文家的"丛错采绣"，也不要拘于古文家的"求深务奇"。所以说立意是内容的解放，辞达是形式的解放。

"文以意为主"是晚唐的杜牧已经说过的，（详五篇一章三节）但苏轼的"立意"说有崭新的意义；"辞达而已矣"是周朝的孔子已经说过的，但是苏轼的"辞达"说也有崭新的意义。这种崭新的意义完成于苏轼，造端的则是苏洵。苏洵以贾陆授苏轼，使他的文章内容不拘于儒道。苏洵作仲兄字文甫说云：

风行水上涣，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岂有求乎文哉？无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风之文也；二物者，非能为文而不能不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于其间也。故此天下之至文也。（嘉祐集十四）

这是就自然的文采而言。自然的文采生于"不能不为文"，则作

文也当以“不能不为文”为鹄的。苏轼南行前集叙云：

> 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山川之有云，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自少闻家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集廿四)

两文比观，马上可以看出苏轼的接受了苏洵意旨，苏轼也明言，“少闻家君之论文”，“不能不为”的引伸，就是辞达的“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

四　诗论及词论

文主辞达，所以诗主自得。书黄子思诗集叙云：

> 予尝论书，以谓锺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锺王之法益微。至于诗亦然。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非余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图崎岖兵乱之间，而诗文高雅，犹有承平之遗风。其论诗曰，“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盖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恨当时不识其妙。予三复其言而悲之。(后集九)

在苏轼看来，一个诗人有一个诗人的作风，这种作风是“天成”的，“自得”的，“超然”的；混合古今诗人的作风而一之，自然是集大成之作，但独特的作风，却也因之泯灭，所以作诗者应当发展自得的作风，不必追寻他人的方法。止要是自得的作风，都有一种独特的味道。这种味道当然借文字表现，但表现的味道却超出文字之表，所以称赞司空图的味外味的诗说。

独特味道的爱好，人各不同，苏轼所爱好的，如书黄子思诗集叙所说，是苏、李、曹、刘、陶、谢、李、杜、韦、柳及司空图，而这些人中间，又特别的爱好陶渊明，所以作和陶诗。与子由书云：

吾于詩人无所甚好，独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实綺，癯而实腴，自曹、刘、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后和其詩凡一百有九篇，至其得志，自謂不甚愧淵明。（引見續集卷三，又欒城后集卷二十一，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

其次是柳宗元，奉陶柳为二友。答程全父云：

书籍举无有，惟陶淵明一集，柳子厚詩文数冊，常置左右，目为二友。（續集卷七）

东坡诗话云：

柳子厚詩在淵明下，韋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險則过之，而溫丽精深不及也。所貴乎枯澹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边皆枯澹，亦何足道？佛云，"如人食蜜，中边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別其中边者百无一二也。（兩宋詩話輯校本，又見东坡題跋卷二，評韓柳詩条）

爱好渊明诗，是因为它"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爱好子厚诗，是因为它"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由此知他所提倡的诗味了。

苏轼"以诗为词"，因此专对于词的言论很少；有之就是说"词为诗裔"。祭张子野文云：

微詞婉轉，蓋詩之裔。（集卅五）

与蔡景繁云：

頒示新詞，此古人長短句詩也，得之惊喜。（續集五）

词为诗裔的意旨，是在将词由歌儿舞女的艺坛，提到文人学士的书斋。答陈季常云："又惠新词，句句警拔，诗人之雄，非小词也。"（续集五）可见他不赞成小词，欲将小词变为"诗人之雄"，所以卑薄"依红偎翠"的柳永词。与鲜于子骏云："近却颇作小词，

是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同上）又尝责秦观云：“不意别来，公却学柳七作词。”（两宋诗话辑校本，又曾慥高斋诗话）既然欲将词变为“诗人之雄”，所以谓“词为诗裔”；由“词为诗裔”，便演为后人的词名“诗余”。草堂诗余是南宋人所编，竹斋诗余是南宋黄机所作，可见“诗余”之名，在南宋即已成立。从词的渊源而言，“十五国风息而乐府兴，乐府微而歌词作”，（成肇麐七家词选序）与诗之不必可歌者，判然两途，所以以“诗余名词，盖非朔也”。（同上）词为诗裔，也当然是牵强附会。从词的变迁而言，“以诗为词”，是词的一种革新，“词为诗裔”就是革新的论证。用这种说法考史固然错误，但苏轼的意思，本来是用以创派。后人据此谓词源于诗，或谓苏轼昧于词源，都是痴人前说不得梦也。

五　鉴赏、批評、文学價値

文学是立意的，但表达立意的方法则有直言与曲说之异。特别是诗一部门，更是曲说多于直言，因此读诗者必先了解作诗者的曲说方法，然后才能认识作诗者的深微意志。既醉备五福论云：

> 夫詩者，不可以言語求而得，必將深观其意焉。故其譏刺是人也，不言其所为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車服之美，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也；“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是也。其頌美是人也，不言其所为之善，而言其冠佩之华，容貌之盛，而民安之，以見其无媿也；“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为兮”，“服其命服，朱黻斯皇”，是也。（后集十）

这种鉴赏法的渊源或者与孟子的“以意逆志”有关；不过孟子的“以意逆志”是针对修辞的增溢而发，此则针对修辞的曲说而发。

苏轼很看重鉴赏，却卑视批评。太息一首送秦少章云：

昔吾举进士，試于礼部，欧阳文忠公見吾文曰，"此我輩人也，吾当避之"。方是时，士以剽裂为文，聚而見訕且訕公者，所在城市。曾未数年，忽焉若潦水之归壑，无复見一人者，此岂复待后世哉？今吾衰老廢学，自視缺然，而天下不吾弃，以为可以与于斯文者，犹以文忠公之故也。张文潜秦少游此两人者，士之超逸絕尘者也，非独吾云尔，二三子亦自以为莫及也；士駭于所未聞，不能无异同，故紛紛之言常及吾与二子。吾策之审矣，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价，岂可以爱憎口舌貴賤之歟？（后集九）

所谓"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价"，乃指士的文章而言，所以答毛滂书亦云："文章如金玉，各有定价，先后进相汲引，因其言以信于世，则有之矣；至其品目高下，盖付之众口，决非一夫所能抑扬。轼于黄鲁直张文潛輩数子，特先识之耳。始诵其文，盖疑信者相半，久乃自定，翕然称之。轼岂能为之轻重哉？"（集三十）彼言讥评于文章无损，此言褒扬于文章无益，总之是"文章如金玉，市有定价"，不能以"爱憎口舌贵贱之"。换言之，就是批评不能提高文学价値，也不能贬低文学价値，文学价値，决定于文学本身，不决于一二人的批评。

六　苏轍的养气説

养气说始于孟子，但并未以之适用于文学。（详一篇三章四节）以气适用于文学者始于曹丕，但谓"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所以并不主张养气。（详三篇四章一节）主张养气的始于刘勰，但刘勰的养气基于"惧为文之伤命，叹用思之困神"，所以是写作的休息，不是养气以为文。（详三篇八章五节）养气以为文，首由苏轍提倡。上枢密韩太尉书云：

轍生好为文，思之至深，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学而能，

气可以养而致。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间，称其气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此二子者，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栾城集，四部丛刊本卷廿二）

他的长孙苏籀也记他的遗言说："子瞻诸文皆有奇气。"（粤雅堂丛书本双溪集附录）又说唐开元燕许"文气不振"。可见他对于文章特别注重气。对于诗亦然。在"诗病五事"，赞杜甫哀江头云：

予爱其词气如百金战马，注坡蓦涧如履平地，得诗人之遗法。（栾城三集卷八）

至养气的方法，他所列举的孟子的"浩然之气"，乃"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是从品德培养；"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杰交游"，是从识见培养，他自己似与太史公相近。上枢密韩太尉书又云：

辙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与游者，不过其邻里乡党之人；所见不过数百里之间，无高山大野可登览以自广；百氏之书虽无所不读，然皆古人之陈迹，不足以激发其志气；恐遂汩没，故决然舍去，求天下奇闻状观，以知天地之广大。过秦汉之故都，恣观终南嵩华之高，北顾黄河之奔流，慨然想见古之豪杰。至京师，仰观天子宫阙之壮，与仓廪府库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后知天下之巨丽。见翰林欧阳公，听其议论之宏辩，观其容貌之秀伟，与其门人贤士大夫游，而后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无忧，四夷之所惮以不敢发，入则周公召公，出则方叔召虎，而辙也未之见焉。……故愿得观贤人之光耀，闻一言以自壮，然后可以尽天下之大观而无憾者矣！

这也可见他不是近于经生的古文家，而是近于策士的古文家，养气不是为的淑善品德，乃是为的据以为文。曹丕说，"气之清浊

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苏辙却说“文不可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这是因为曹丕所言是先天的体气，苏辙所言是后天的气势。体气对于文学的影响是“清浊”，气势对于文学的影响是“节度”，遗言说：“余少年苦不达为文之节度，读上林赋，如观君子佩玉冠冕，还折揖让，音吐皆中规矩，终日威仪，无不可观。”好的节度，就是“宽厚宏博”，“疏荡颇有奇气”。换一个名词，也就是有波澜，所以遗言里好以“波澜”衡量文章。如说：“张十二之文，波澜有余，而出入整理，骨骼不足；秦七波澜不及张，而出入劲健，简捷过之。”又徐蒙献书，他说：“甚佳，但波澜不及李方叔。”

七　秦观的事理説

苏门弟子很多，最有名的为四学士和六君子。四学士是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六君子是再加上陈师道和李廌。黄陈与苏异趣，别于下章论次。秦观（一〇四九——一一〇〇）通事说云：

> 文以說理为上，序事为次，古人皆备而有之。后世知說理者或失于略事，而善序事者或失于悖理，皆过也。盖能說理者始可以通經，善序事者始可以修史。（淮海集，四部叢刊本后集六）

会稽唱和诗序云：

> 切尝以为激者辞溢，夸者辞淫，事謬則語难，理悖則气索，人之情也。（集卅九）

前者论文，后者论诗，都以事理为重。事指事业是无疑的，可疑者好象秦观这位风流词人，不屑侈谈事业。实则他的淮海集有进策七卷（十二至十八），进论四卷（十九至二十二），据知正和他的老师一样，也是一位对政治事业跃跃欲试的人物，重视事业是不足奇异的。理是什么，就“能说理者始可以通经”看来，好象指

儒经的仁义道德，但参照他文，知指列庄的道德性命。所作韩愈论云：

> 夫所謂文者，有論理之文，有論事之文，有叙事之文，有托詞之文，有成体之文。探道德之理，述性命之情，发天人之奥，明死生之变，此論理之文，如列御寇庄周之所作是也。别白黑阴阳，要其归宿，决其嫌疑，此論事之文，如苏秦張仪之所作是也。考同异，次旧聞，不虚美，不隐惡，人以为实录，此叙事之文，如司馬迁班固之所作是也。原本山川，极命草木，比物屬事，駭耳目，变心意，此托詞之文，如屈原宋玉之所作是也。鈎列庄之微，挾苏張之辯，摭班馬之实，獵屈宋之英，本之以詩书，折之以孔氏，此成体之文，韓愈之所作是也。（集廿二）

这不惟可以证明他所提倡的理是列庄的道德性命，还可以证明他所提倡的事是苏张的决疑献策。苏轼虽有这种倾向，但还沒有彰明较著的标榜列庄之理，也沒有彰明较著的标榜苏张之事；他所崇奉的贾谊陆贽，还是儒家与纵横家的混合人物。说韩愈的文章集各体大成是宋人的公言，说所集各体包括列、庄、苏、张是秦观的己见——也就是秦观的新说。韩愈的进学解说到“下逮庄骚”，但那是就形式的文辞而言，不是就内容的道理而言。就道理而言，韩愈所矜重的是孔孟之道，和列庄不同。至于苏张，他根本不谈。秦观说韩文包括列、庄、苏、张，是因为他自己要效法列、庄、苏、张。列庄的性命是本体，苏张的策画是功用。本体重于功用，所以“说理为上，序事为次。”

这种思想当然受之苏氏兄弟。有傅彬老者，致书秦观云：“蜀之锦绮妙绝天下，苏氏蜀人，其于组丽也独得之于天，其文章如锦绮焉。”秦观答云：

> 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其次則器足以任重，識足以致远。至于議論文章，乃其与世周旋，至粗者也。閣下論苏氏，而其說

止于文章，意欲尊苏氏，适卑之耳。（答傅彬老简，集三十）

傅彬老文云："三苏之中，所愿学者登州（轼）为最优于此。"秦观答云：

> 老苏先生，仆不及识其人，今中书（轼）补阙（辙）二公则仆尝身事之矣。中书之道，如日月星辰，经纬天地，有生之类，皆知仰其高明。补阙则不然，其道如元气行于混沦之中，万物由之而不知也。故中书尝自谓吾不及子由，仆窃以为知言。（同上）

苏轼偏于器识高明，对事业比较更能任重致远；苏辙偏于元气混含，对性命比较更能体会精微。他作老子新解，苏轼叹为"奇特"。（见一节）秦观谓理重于事，当然说轼不及辙；而此种思想的受轼辙影响，也于此可见了。

不过他虽注重事理，但也并非轻视文辞，他所推尊的韩愈的成体之文，就包括托词在内。就个人的治学说，他曾经"取经、传、子、史之可为文用者，得若干条，题曰精骑集"。（精骑集序，后集六）就国家的取士言，他的进策中有论议下一篇，主张"文词、经术、德行各自为料"。换言之，也就是不废诗赋，和苏轼的主张也正是相同。文中先说文词起于"贤人失志之赋"和"屈原离骚之词"。然后再说隋唐以声律取士的害处是："敦朴根柢之学，或以不合而罢去；靡曼剽夺之伎，或以中程而见收。自非豪杰不待文王而兴者，往往溺于其间。"这好象应当废弃了。但是不然，他接着反对以经义代诗赋说："熙宁中，朝廷深鉴其失，始诏有司削去诗赋，而易以经义，使学者得以尽心于六艺之文，其意信美矣。然士或苟于所习，不能博物洽闻，以称朝廷之意，至于历世治乱兴衰之迹，例以为祭终之刍狗，雨后之土龙，而莫之省焉。此何异斥桑间濮上之曲，而奏以举动劝力之歌，虽华质不同，其非正音一也。"（集十四）所以他的成就虽不及苏轼，可也和苏轼同一道

途，都是议论辞章一路。

八　張耒的脈理說及至誠說

秦观注重事理，同时不废辞章，张耒（一〇五四——一一一四）就进而提倡文章脉理。洪迈容斋随笔说他"誨人作文，以理为主"。引他的著论云：

> 自六經以下，至于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以为寓理之具也。故学文之端，急于明理。欲知文而不务理，求文之工，此未尝有是也。（五笔卷一）

此论见所作答李推官书，和秦观不同者，秦是先理后辞，张是为文求理。答李推官书又云：

> 夫文何为而設也？知理者不能言，世之能言者多矣，而能文者独傳。豈独傳哉？因其能文也而言益工，因其言工而理益明，是以圣人貴之。（柯山集，叢书集成本卷四六）

可见自他看来，知理并不难，难在能言能文，能言能文然后才能使理益明。那末文成了第一位，必须全力钻研；理降为第二位，它的"明"要靠着能言能文。这结果，必然不如他表面所说的文为寓理之具，相反地倒是理为工文之方。因而他所谓理，不但不同于道学家所谓义理之理，也和秦观说的事理之理有差别。他所谓理，主要的是作为文章方法的条理、脉理。所以答李推官书又云：

> 夫决水于江河淮海也，水順道而行，滔滔汩汩，日夜不止，冲砥柱，絕呂梁，放于江湖而納之海，其舒为淪漣，鼓为波濤，激之为风飆，怒之为雷霆，蛟龙魚黿，噴薄出沒，是水之奇变也；而水初豈如此哉，是順道而决之，因其所生而变生焉。溝瀆东决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蟹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达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无見于理，而欲以言

語句詭為奇之文也。六經之文，莫奇于易，莫簡于春秋，夫豈以奇与簡為务哉，势自然耳。自唐以来至今，文人好奇者不一，甚或以缺句断章，使脉理不属，又取古书訓詁希于見聞者，挦撦而牵合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或得其句，不得其章，反复咀嚼，卒亦无有，此最文之陋也。

所斤斤顾虑的是脉理的属不属，不是道理的真不真，所以是重文轻理，不同于秦观的先理后文。渊源当出于苏轼的“辞达”，由“辞达”转于“理达”，其势甚顺。

张耒注意文章脉理，对哲学道理却不甚了了。所作韩愈论云：“韩退之以为文人则有余，以为知道则不足。”“以为文人则有余”，是宋人公认的，何以“以为知道不足”？文云：

愈之原道曰：“博爱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义，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果如此，则舍仁与义而非道也。“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虛位，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吉有凶。”若如此，道与德特未定，而仁与义皆道也。是愈于道本不知其何物，故其言紛紛异同而无所归。而独不知子思之言乎？“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曰性，曰道，曰教，而天下之能事毕矣。礼乐刑政所謂教也，而出于道；仁义礼乐所謂道也，而出于性；性則原于天。論至于此而足矣，未尝持一偏曰如是謂之道，如是謂之不道，曰定名，曰虛位也。則子思实知之矣；愈者，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而健于言者歟？（集卅八）

这已够模糊不清了。更有模糊不清的，在这里说韩愈“知道不足”，上曾子固龙图书却又云：

嗟乎！韓愈之于唐，盖不遇矣。然其犯人主，忤权臣，临义而忘难，剛毅而信实，而其学文又能独出于道德灭裂之后，纂孔孟之余緒，以自立其説，則愈之文章，虽欲不如是，盖不可得也。（集拾遺十二）

这种矛盾自陷，就是由于对道理的认识不清。对道理的认识不清是一种短处，可也是一种长处；长处在不再谈载道明理，而别

寻一种文学的内容，就是"诚"。上曾子固龙图书文云：

其尝以謂君子之文章，不浮于德，則剛柔緩急之气，繁簡舒敛之节，一出于其誠，不隐其所已至，不强其所不知。譬之楚人之必为楚声，秦人之必衣秦服也。惟其言不浮乎其心，故因其言而求之，則潛德逸志不可隐伏。盖古人不知言則无以知人，而世之惑者，徒知夫言与德二者不可以相通，或信其言而疑其行。嗚呼！其徒知其一，而不知夫君子之文章，固出于其德，与夫无德而有言者异也。

文学是人生的表白，"不浮其德"，"不浮乎其心"，自易条达有序；故作违心之论，便往往虚伪凌乱。张耒以这种理由称赞韩愈，在同一文里，也以这种理由称赞屈原、司马迁和欧阳修，这里不一一征列。

文章要出于诚，诗更要出于诚，上文潞公献所著诗书云：

夫詩之兴，出于人之情，喜怒哀乐之际，皆一人之私意，而至大之天地，极幽之鬼神，而詩乃能感动之者何也？盖天地虽大，鬼神虽幽，而惟至誠能动之。彼詩者，虽一人之私意，而要之必发于誠而后作。故人之于詩，不感于物，不动于情而作者，盖寡矣。……夫情动于中而无伪詩，其导情而不苟，則其能动天地，感鬼神者，是至誠之悦也。（拾遺十二）

不怕是私意，止要是出于至诚，不是伪诗，就能动天地，感鬼神，这完全是置重于诚不诚，不问是否合于理。就理言，是一种缺陷；就文言，则是一种进步的說法。

九　晁补之的事文无关說

张耒将事理之理变为脉理，晁补之（一〇五三——一一一〇）更将事理之事与文学分家。所作海陵集序云：

文学古人之余事，不足以发身。春秋时，齐、鲁、秦、晉、宋、郑、吳、楚列国之大夫，上名諸侯，相与聘問交接，賦詩揚礼，見于言辞，人称

之至今，想見其为人若不可及者，皆有它事业，尊君芘民，举大而任重，排难而解紛，用之如谷米藥石，一日不可无；而言辞者，特以緣飾而行之耳。战国异甚，士一切趋利邀合，朝秦而暮楚不恥，无春秋时諸大夫事业矣，而言辞始專为賢，雄夸虛誕，听者为夺，虽义理皆亡，而文章可喜，以其去三代春秋时犹近也。其用以发身，亦不足言。（鷄肋集，四部叢刊本卅四）

这就是说文章与事业是两回事，事业是不可无的，文章不过"缘饰而行"罢了。假使沒有事业，止有文章，就个人說不足以发身，就国家说更可有可无。文章如此，诗更无用。海陵集序续云：

至于詩，又文学之余事。始汉苏李流离异域，困穷仳别之辞，魏晉益竞，至唐家好而人能之。然为之而工，不足以取世資，而經生法吏咸以章句刀笔致公相，兵家斗士亦以方略膂力專斧鉞，詩如李白杜甫，于唐用人安危成敗之际，存可也，亡可也。故世称詩人少达而多穷，由汉而下枚数之，皆孙樵所論相望于穷者也。

这不免是在发牢骚，他能诗能文，沒有因此发身，反之倒如海陵集序所说，作者"与吾穷类"。但与秦观同处苏门，秦说文章以事理为主，他却说文章与事业无关，或系纠矫秦说，也说不定。本来苏轼和他的门人虽是文学家，但总想建立一番事业，可惜主观及客观的条件都不适合，以致无从建立。秦观从志愿方面说，便是文主事理，晁补之从遭遇方面说，便是事文两歧。既然事文两歧，那末文的可贵不在事，倒在与事无关，所以海陵集序又云：

士有无意于取世資，或其間千一好焉，惟恐其学之而力不逮，营度雕琢，至忘食寢，会其得意，脩然自喜，不啻若鐘鼎錦綉之获顧，他者好皆无足以易此者，虽数用以取訴而得禍犹不悔，曰吾固有得于此也。以其无益而趋为之，又有患难而好之滋不悔，不反賢乎？

这样才将文学看为是一种嗜好，一种艺术（若钟鼎锦绣）。既认为是一种嗜好，一种艺术，所以注重修养，注重功力，注重夸婉。

题陶渊明诗后云:"诗以一字论工拙。"(集卅三)书鲁直题高求父扬清亭诗后云:"鲁直于治心养气,能为人所不为,故用于读书为文字,致思高逸,亦似其为人。"(卷同)景暉洛都序云:"听廉者语,不若听夸者语,夸易好也。听狡者语,不若听婉者语,婉易从也。"(集卅四)这都是秦观㊀张耒所不琐琐计较的,晁补之却认为非常重要。

十 李廌的文章四要説

晁补之说文学与事业无关,李廌又说文辞与事理并重。答赵士舞德茂宣义论宏词书云:

> 凡文章之不可无者有四,一曰体,二曰志,三曰气,四曰韵。述之以事,本之以道,考其理之所在,辨其义之所宜,庳高巨細,包括并載而无所遗,左右上下各若其序而不乱者,体也。体立于此,折衷其是非,去取其可否,不徇于流俗,不謬于圣人,抑揚損益以称其事,弥縫貫穿以足其言,行吾学問之力,从吾制作之用者,志也。充其体于立意之始,从其志于造語之际,生之于心,应之于言,心在和平則溫厚尔雅,心在安敬則矜庄威重,大焉可使如雷霆之奋,鼓舞万物,小焉可使如脉(原作派,依国学图书舘藏本校改)絡之行,出入无間者,气也。如金石之有声,而玉之声清越;如草木之有华,而蘭之臭芬薌;如鶏鶩之間而有鶴,淸而不群;如犬羊之間而有麟,仁而不猛;如登培塿之丘以观崇山峻嶺之秀色,涉潢汙之泽以观寒溪澄泽之淸流;如朱絃之有余音,太羹之有遺味者,韵也。(济南集,中央图书舘藏旧鈔本卷八)

四要中的"体"和"志"是文章的内容,"气"和"韵"是文章的形式。本来普通所谓"体"指文章体裁,但李廌所谓"体"既说明是:"述

㊀ 李廌师友談記載秦观論作賦計声律字句,但那是就应試的律賦而言,他已声明与杂文不同。

之以事，本之以道，考其理之所在，辨其义之所宜”，则当指文章本体。既然要述事、本道、考理、辨义，当然注重事理无疑。苏轼已经对“道”冷淡，李廌反倒说要“本之以道”，这是因为李廌在苏门中独偏向儒家，憎恶释氏。他作圣学论，劝皇帝“发挥孔孟之正道，锄薙百家之邪说”。（集六）作浮图论，慨叹“前世之弊，及其甚也，必有有为之主以拯救之，独千世承袭其弊而安受之者，浮图而已！”（集六）这样，遂使他在不重视儒道的文学集团中，独呼吁文学要和儒道联系。但本道的前面先须述事，仍是贾、陆、苏、张的事功思想。“志”是苏轼所谓“意”的一转手，陈师道业已说“文以述志”。（详七章四节）“气”是苏辙已经提倡的，但苏辙所说的是养气以为文，李廌说的是从志造语的辞气。远在晚唐，司空图的论诗就注重韵味，但李廌是移用于文章。就此看来，李廌的文章四要，内容的“体”与“志”都是旧说，形式的“气”与“韵”倒有新义，这也足以证明他们已经走到辞章家的道路。

也许就是基于“气”“韵”赋有新义，所以特别矜重。不错，对于创作文章，他确是说四者同样不可无，而且把“体”和“志”列在前面，但对于鉴评文章，他便只以“气”“韵”为标准。同文又云：

> 其言迂疎矯厉，不切事情，此山林之文也，其人不必居薮泽，其間不必論岩谷也，其气与韵則然也。其言鄙俚猥近，不离尘垢，此市井之文也，其人不必坐廛肆，其間不必論財利也，其气与韵則然也。其言丰容安豫，不儉不陋，此朝廷卿士之文也，其人不必列官守，其間不必論职业也，其气与韵則然也。其言寬仁忠厚，有任重容天下之风，此庙堂公輔之文也，其人不必位台鼎，其間不必論相业也，其气与韻則然也。正直之人其文敬以則，邪諛之人其言夸以浮，功名之人其言激以毅，苟且之人其言懦而愚，捭闔从衡之人其言辨以私，刻忮殘忍之人其言深以尽。則士欲以文章显名后世者，不可不慎其所言之文，不

可不慎其所养之德也。

这可见他视气韵重于体法，也就是视形式重于内容。同文又说："训、典、书、诏、赦、令、文、赋、诗、骚、箴、诫、赞、颂、乐章、玉牒、露布、羽檄、疏、议、表、笺、碑、铭、谥、诔，各缘事类以别其目，各当体要以称其实。""若乃或混沦而无辨，或散漫而无纪，或错杂而无序，或晦暗而不显，虽曰谓之文，亦不足观矣。"更显然是重视文章形式。不过在苏门中，他总算较近儒家，比张耒较重事理，如此而已。

十一　李之仪的才性説及方法説

此外和苏轼有关系的晚学有李之仪，完全割断文学与事业的关联。吴芾说他晚年"锐于进取，有所附丽"。（姑溪居士文集序）但他的文集止有普通诗文，沒有进策进论。他从沒有说过文学与事业发身有关，无论是正面或反面。他止是就文论文，止是说怎样才可以作出好的文章。他认为这一则需要有接近的才性，二则需要有适当的方法。他的折渭州文集序云：

> 师旷之聪，离娄之明，非得之天，則岂能晃之于視听？庖丁之解牛，輪扁之断輪，非得之心，則岂能应之于手？其用虽不同，要之非勉强而至者也。昔之能文之士亦莫不然：司馬相如楊雄之于詞賦，司馬迁刘向之于叙事，李陵苏武之于詩，是以其所長自得，而因其所自得者发之于言耳。至于离婁之視，不能代师旷之聪，輪扁庖丁不能互易其手，故能叙事者未必工于詩，而諳詞賦者未必达于叙事，盖各有所專，而其他虽通，終不得而胜也。（姑溪居士集，粤雅堂叢书本卷卅五）

这种说法是古已有之的，如曹丕已经说，"文非一体，鲜能备善"。（详三篇三章一节）柳宗元更说，"秉笔之士"，对著述比兴，"恆偏

胜独得，而罕有兼者焉”。（详四篇七章八节）但曹柳所说都不及李之仪的更为详明。苏轼通擅各体，李之仪却说“各有所专”，知他和苏轼走的道路不同。

李之仪和苏轼的不同，还可取证于他的作文方法说。他跋吳思道诗云：

> 文章要当先凌厉而后收斂，正如坐而后立，立而后走也，岂遂以得坐立間者，便期于行走，自下图高，固余所病。（集四〇）

跋荆公所书药方后云：

> 作字为文，初必謹严，相时造語須有所出，行笔須有所自，往往涉前人轍迹，則为可喜。久之，語以不蹈襲为工，字則縱横皆中程度，故能名家傳世，自成标准。（集四一）

杂题跋云：

> 作詩字字要有来处，但將老杜詩細考之，乃見其工。若无来处，即謂之乱道可也。王舒解字云：“詩从言从寺，寺者法度之所在也。”可不信哉！（后集十五）

“先凌厉而后收斂”，还勉强可以說略近于苏軾所说的，“少时峥嵘，漸老平淡”；“造语须有所出”，“字字要有来处”，便无论如何，和苏轼所说的“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止”相反。苏轼虽“为辞章之宗”但还不忘情事理志业，到黄庭坚陈师道的刻镂学诗，晁补之李之仪的刻镂学文，才眞是纯粹的辞章家，和谈道的性理家，谈事的经术家，各不相侔了。

十二　三孔的怨刺說及文难說

淸江三孔——文仲、武仲、平仲，父延之，宋元学案列周敦頤讲友，武仲有谢曾学士（巩）举升擢启（集十），又有谒苏子瞻因寄诗（集三），其他涉及曾巩及苏门的诗文甚多，知和周、曾、苏都有

关系。宋史孔武仲传，仲"尝论科举之弊，诋王氏学，請复诗赋取士"，和苏軾的意见相同。集中有张子厚睦州唱和集序，力言怨伤讥刺的难能可贵云：

> 夫詩之用于世久矣，其言隐約而出入于风諭比兴之間，使人可以喜，可以慍。三代会同燕享必賦詩以見其志，所以察臧否，省禍福，为国者又以此占治乱，知兴亡；至于怨伤譏刺道人情之所难言，而莫以为忌。后世风俗寖衰，士之克己好善者少，于是有因詩之一言而得罪于世者，刘夢得弃置累年，白乐天謗及母子，凡坐此也。甚者父子相語朋友相戒曰：詩不利于身，不可为也。（宗伯集，豫章叢书清江三孔集本卷十三）

虽然他归咎于作者"不善处之"，又赞美张子厚诗"皆喜慕称歎，欲追而从之，又何怨怒之有"，最后推出"诗之不能为害"的结论。但称扬古时的不忌怨伤讥刺，显然在反证后人的因诗得罪，是由于士之不"克己好善"。换言之，怨伤讥刺并非过错，过错在为国者不"以此占治乱，知兴亡"，反倒因此陷害作者。这种意见是很古就有的，特别是白居易在唐代曾强调鼓吹，孔武仲言及白居易，当然受了白居易的影响。不过他把怨伤讥刺视为难能可贵，较白居易的止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详四篇四章二节)更进一步。这种更进一步的说法，很象有感于苏軾的因诗获罪(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白居易与元九书曾说朋友劝他如"牛僧孺之戒"，又说"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为非"。(同前六节)但眞正劝勿作诗的是苏軾的兄弟朋友。苏軾与程正辅提刑云："子由及诸相识皆有书痛戒作诗(自注"有说不欲详言")，其言甚切，不可不遵。"另一书亦云："子由近有书深戒作诗，其言切至，当焚砚弃笔，不但作而不出也。"答程全父推官亦云："仆焚毁笔砚已五年。"(并东坡续集七)孔武仲先列举"刘夢得弃置累年，白乐天谤

及母子”，然后说：“甚者父子相语朋友相戒，诗不利于身，不可为也。”当然不再是指的白居易，而情形则与苏轼恰合。黄庭坚曾说苏诗的“短处在好骂”，（详七章一节）孔武仲却说怨伤讥刺不为过，说不定就是在驳正黄说，崇护苏诗。果尔，他虽和周曾也有关系，但接近尊崇的是苏轼。他作南斋集藁序云：“余自少喜为文辞。”也正是苏轼派——就是辞章派的习好。南斋集藁序又云：

> 文章于詩者之事末矣。昔之賢人，有达而在上者，其言甚簡，而录于尙书，皋陶是也；有穷而在下者，其言甚簡，而录于論語，顏淵是也。彼其粹美积于中，輝光发于外，一言出，四海傳之以为师法，遂以不朽于无穷，岂区区自异于文墨耶？后世著书者莫多于蕭梁父子，当其盛时，布于四方，盈衍竹帛，及其寖久，寖以零落，求一語之傳不可得，卒与愚者均于沒世而无聞；然則文章岂可恃而久長哉？（集十三）

又似轻视文章。这我们应知南斋集藁是他的自选集，“文章岂可恃而久长”，是在警惕自己，努力做到可恃久长的地步。可恃久长的地步在“使世后虽有作者无以过之”。代史大卿谢欧阳永叔书云：

> 夫天下之物，美者恆难得，异者恆难見，而莫甚于文章也。盖非为之者难，而工之者难也；非工之者难，而可以傳于久远之难也；非傳于久远之难，而能使后世虽有作者无以过之之难也。誠使后人有以过之，則前人之作，又將頹謝曖昧而不称于世矣。自秦汉以来，翰墨擅名于当时者不可胜数，而其傳于今者无多，以此也。（集十四）

柳宗元与友人论文书说文章之难，在得之难与知之难。（详四篇七章七节）盖即孔武仲所本。但孔武仲更提出工难、传难、使后世无以过之之难。同时他又指出后世的作品有以过之，则前世的作品便将颓谢曖昧而不称于世。自现在看来，颇有历史眼光，

较柳宗元的归于“幸不幸”，进步多了。

十三　黃裳的性理說

著演山集的黃裳㊀不是苏轼门人，却和苏门有来往，文学见解也很接近。田悦演山集序云：

> 东坡先生方童稚游乡校，覩徂徠所为庆历圣德詩，則知敬爱范文正公。及来京师，竟以不及見为恨。旣而得公之文而为之序；且自喜获挂名文字間，以自托于門下士之末。（演山集，四庫珍本卷首）

苏序已佚，田序说他“自托于门下士之末”，似黃裳是苏轼前輩。但苏轼嘉祐二年（一〇五七）举进士，年二十二。后二十五年，就是元丰五年（一〇八二），黃裳始举进士，苏轼已四十七岁。四库提要引福建通志称政和宣和间三舍法行，裳上书云云。集中书太原王子命书后亦題宣和己亥（集卅五），即宣和元年（一一一九），上距苏轼卒于建中靖国元年（一一〇一）已十八年，不应是苏轼前輩，苏轼亦不应“自托于门下士之末”。黃裳有次魯直烹蜜云龙之韻，有简无咎学士（幷集一），又有上黃学士书（集廿三），疑亦即魯直，都是苏轼门人，故不惟不似苏轼前輩，反之倒象苏轼晚輩，至少学术声誉不会前于苏轼。

苏轼的后期思想偏近佛老，黃裳也“素喜道家”（四库提要），对佛家也喜称颂（集廿九，卅六，两卷皆颂佛），作順兴讲庄子序，力言“老庄之不可废”（集十九），又作“自然子书”，自为书后云：

> 尝謂道家之徒蔽于說气，儒家之徒蔽于說理，釋氏之徒蔽于說性。……予之为书，泛观而旁采，有可述者，皆其是非有理，取舍有义，本于自然之道。（书自然子书后，集卅五）

㊀ 宋史卷三九三有黃裳傳，楼鑰攻媿集九十九有墓志銘，字文叔，先居江夏，晚徙梓之安泰，孝宗乾道五年进士，与此非一人。

不惟糅合儒释道与苏相近，归于自然也正同于苏轼。上黄学士书云：

道德之失，其弊害法；文章之失，其弊害道。世之为文章者，采摭袭蹈，苟致文华，文章之所自来者，曾不及知之，则其害道也，何可胜言哉！论文章者谓气之所寓，此固是也；而气之所以寓乎文章，未有能言者。尝谓气之高下，自夫学之远近。古人之学，由心而见性，由性而见天，由天而见道，然后其志高明，其气刚大，出乎万物之表，我无物而交之，物无我而引之，故其气之来也本乎性天，发乎德机，而形见乎声色。声色不足寓之也，一写于文辞也。与万物之理相得于无穷，与万事之变相适于无常。有如泉源，自山之幽，决为长江大河，时于平流之中，涌为洪澜惊湍，出人不意，开哲其耳目，然后滔滔其东下，岂非其志高明，其气刚大，世气俗趣，不足以系累其灵台者耶？（集廿三）

对文章的形容与企向，也近于苏轼。所不同者，苏归于才，黄归于学——归于性理之学。上黄学士书又云：

盖文生于性实，而性实出乎诚心之虚一。故其为文章也，迹方而意圆，迹实而意虚，非才人之文也，有道者之文耳。

又形容有道者之文云：

尝谓有道者之气，其犹天元也欤！当夫杳冥而未发也，万物之理含孕乎其中；及其天行也，葩华枝茎发出于草木，好音幽情发出于禽鸟，天理自现，在人之视听，使人欣然爱之，乌知其造之者耶？然而春之华万物也，岂常用意于其间哉，太和之气，其来远矣。性天高明，空空无物，随所感寓，发为辞章者，无以异乎天元之华万物也。岂徒华之哉，华之所以求其实焉。非文其言也，言理而文之耳。

当时的道学家都好言性理，黄裳说却与彼不同，张载正蒙太和篇云："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是心性源于天道。黄裳谓"由心而见性，由性而见天，由天而见

道”，则天道源于心性。道学家虽受佛老影响，但反对佛老，黄裳则自言博采儒、佛、老三家，实则偏近佛老两家。秦观答傅彬老简云："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也是来自佛老的性命自得。不过黄裳耽研更深，分析更密。他尝自编诗文为"言意文集"，自为序云：

道本于心，以性为体，以情为用。志者存于心而行者也，意者思于心而作者也，言者发于心而应者也。著述之士，虽累千百万言，反本而求之，則貫乎一而已。言意之为书，識性为之根蒂，才性为之文飾，記性为之証据，合是三性而本于心，稟其可否，著为群言，犹之讀书万卷，历历可引其文义，胸間洞然，曾无一点实乎其中。善观夫言意，亦如是而已。彼我之心一也，有道則通乎一。愚不肖，不敢以为有道观者考焉。（言意文集序，集十九）

又自编元丰己未所为序记启古律诗若干篇为"书意集"，自为序云：

常回顧性分中，求其所謂养心治气之道，立之以志，作之以情，有感而后动，合养而为意，思一寓之翰墨，則其所书者意耳，不主乎言。（书意集序，集廿一）

与上黄学士书合而观之，知他所斤斤矜重的是"有道之文"。有道之文源于心性，是意的表现。"意"也是苏轼极力提倡的。

惟其接近苏门，所以对道学派和经术派都有所抨击。文轩记云：

余謂学士大夫，或馳騖于名山，入傳注，涉獵百家之小說，以博为功，以辨为能，終日牽援以为至乐，然其于德性也略。或悟履迹，做名数万物之理，危坐默观，有感而后应，謂彼百家之說，不足挂吾齿牙間，靜按其文，吾能以理断其眞伪，然其于学問也略。

前者是抨击经术派，后者是抨击道学派。文轩记又云：

日月风云，天之文也，吾以是观其象；山川草木，地之文也，吾以

是究其理；君臣父子，人之文也，吾以是明其义。发悟以天，考信以人，不滞于一曲，则其动而有所偶，发而有所应，著于形色名声之间，如春之华，如衣之章，如天之有河汉，如地之有嵩华，伪无与于其间，斯其所以为文欤！（集十六）

博采尚文，也正是苏轼所领导的议论派的见解。

第七章　江西派的詩文方法

一　黄庭坚的反訕謗与重法度

欧苏的改革文学，奠定了文的楷模，诗则成就虽大，规矩苦少，指示后人规矩的要推黄庭坚（一〇四五——一一〇五）。他是苏门学士，却与苏轼异趣：

第一，苏诗时含讥刺，黄则反对訕謗。答洪驹父书云：

> 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罵，愼勿襲其軌也。（豫章文集，四部叢刊本卷十九）

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云：

> 詩者人之情性也，非强諫争于廷，怨忿詬于道，怒鄰罵坐之为也。其人忠信篤敬，抱道而居，与时乖逢，遇物悲喜，同床而不察，并世而不聞，情之所不能堪，因发于呻吟調笑之声，胸次釋然，而聞者亦有所劝勉，比律呂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詩之美也。其发为訕謗侵陵，引頸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以为詩之禍，是失詩之旨，非詩之过也。（集廿六）

这一则恐怕是惩于苏轼的因诗获罪，几至丧命。二则苏轼是诗人，也是文人，还勉强可以说也是政治家，有抱负，有见解，所以他对于文学主张"立意"，见到与他的意志相反的措施，自然不免讥刺。黄庭坚则是纯粹的诗人，不惟对政治没有多少兴趣，对议论文章也感觉淡漠。陈师道说他"短于散语"。（后山诗话卷二）

他与秦少章书云:“庭坚心醉于诗与楚词,似若有得,然终在古人后。至于议论文字,今日乃得付之少游及晁张。”(集十九)自然会觉得无须讪谤。

第二,苏重天成自得,黄则讲求布置法度,与王庠周彦书云:“见东坡书黄子思诗卷后,论陶谢诗、锺王书,极有理,尝见之否?”(集十九,目录作与王商彦书)止是重视他的“论陶谢诗,锺王书”,并不重视他的天成自得的论旨。王直方诗文发源(即直方诗话)引山谷云:

作詩如作杂剧,初时布置,临了須打一諢了,方是出場。(引見王構修辞鉴衡,指海本卷一,又見陈善捫虱新話卷二)

范温潛溪诗眼引山谷云:

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后学,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后予以概考古人法度,如贈韦见素诗云,“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誤身”,此一篇立意也,故使人靜听而具陈之耳。自“甫昔少年日”,至“再使风俗淳”,皆儒冠事业也。自“此意竟蕭条”,至“蹭蹬无縱鱗”,言誤身如此也;則意举而文备,故已有是詩矣。然必言其所以見韋者,于是有“厚愧眞知”之句。所以眞知者,謂傳誦其詩也。然宰相职在荐賢,不当徒爱人而已,士故不能无望,故曰“窃效貢公喜,难甘原宪貧”。果不能荐賢,則去之可也,故曰“焉能心怏怏,只是走踆踆”,又將入海而去秦也。然其去也,必有迟迟不忍之意,故曰“尙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則所知不可以不别,故曰“常拟报一飯,况怀辞大臣”。夫如此是可以相忘于江湖之外,虽見素亦不得而见矣,故曰“白鷗沒浩蕩,万里誰能馴”,終焉。此詩前贤录为压卷,盖布置最得正体,如官府甲第厅堂房屋,各有定处,不可乱也。韓文公原道与书之堯典盖如此,其他皆謂之变体可也。盖变体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質,出于精微,夺乎天造,不可以形器求矣。然要之以正体为本,自然法度行乎其間。譬如用兵,奇正相生;初若不知正而徑出于奇,則紛然无复綱紀,終于

败乱而已矣。（引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又见草堂诗话卷一，竹庄诗话卷五，诗话总龟后集卷卅一，修辞鉴衡卷二）

他矜重布置法度的正体，以为若不知正体，而径出于“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的变体，“则纷然无复纪纲，终于败乱而已矣。”和苏轼的“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显然违牾，说不定就是对苏而发。与王观复书第一首云：“往年尝请问东坡先生作文章之法，东坡云：‘但熟读礼记檀弓当得之。’既而取檀弓二篇读数百过，然后知后世文章不及古人之病如观日月也。”（集十九）好象黄的讲求布置法度系得之于苏。葛延之问作文之法，苏轼告以天下事散在经子史中，可以“意”摄用，黄庭坚分析杜诗，也首拈“一篇立意”。但二者差别很大：苏所重视的是“意”，有意才能摄用经子史中之事；黄所重视的是“法”，有法才能安置一篇之意。次韵报杨明叔云：“文章者，道之器也。”（集六）题王子飞所编文后云：“鄙文不足传，世既多传者，因欲取所作诗文为内篇，其不合周孔者为外篇。”（集廿六）好象不止重视意，而且重视道，——重视周孔之道。但道是针对不道而言，所以韩愈原道必要辟佛老，元白作诗必要“泄道人情”，“补察时政”。黄氏既不作议论文字，又反对讪谤侵陵之诗，则其谓文章为道之器，不过是借重旧说，装点门面而已。既不要内容的议论讪谤，当然止有专力于形式的法度布置，由是又使诗由人间世上转于艺术宫里。不过止是转于艺术宫里，并未转于淫丽窠臼，所以与六朝五代不同。自然，这也是政治社会与文学历史的促之使然。本来这时期的文学已走上载道述志，不料王安石一派当国，对元祐党人，狠狠的贬谪流放，虽不及汉末党锢的残酷，可是善感的诗人已经怵目惊心，不敢议论，不敢讪谤，不得不躲到艺术宫里，专门致力于布置谨严、格律精善的技术。

致力技术的为功为罪，我不愿多嘴饶舌，我止愿指出在宋代实始于黄氏。吴坰五总志云：

山谷老人……始受知于东坡先生，而名达夷夏，遂有苏黄之称；坡虽喜出我門下，然胸中似不能平也。故后之学者，因生分别，师坡者萃于浙右，师谷者萃于江右。以余观之，大是云門盛于吴，林济盛于楚。云門老婆心切，接人易与，人人自得，以为得法，而于众中求脚根点地者，百无二三焉。林济棒喝分明，勘辯极峻，虽得法者少，往往崭然見头角，如徐师川、余荀龙、洪玉父昆弟、欧阳元老，皆黄門登堂入室者，实自足以名家。（知不足齋叢书本）

这是苏黄两派的盛衰主因，一般人大都缺乏创作的天才，也缺乏独辟蹊径的能力，心心念念的希望着有一位大师指示方法，自己好死心踏地的追随模仿。所以苏轼的教人"随物赋形"，虽"老婆心切"，"而于众中求脚根点地者，百无二三"；他死了以后，人亡政息，更很少有人效法。黄庭坚有布置法度，使人容易描绘，可以"崭然见头角"；他死了以后，人亡法在，更形成有力的诗派。

黄庭坚的讲求布置法度，自然基于他的轻视议论讪谤，可也因为出于苏轼，求所以胜于苏轼——最低异于苏轼，不能不有所转变。王若虚滹南诗话云：

魯直欲为东坡之迈往不能，于是高談句律，旁出样度，务以自立而相抗，然不免居其下也，彼其劳亦甚矣哉！向使无坡压之，其措意未必至是。（滹南遺老集，四部叢刊本卷卅九）

除了诋諆之词，是很合事实的。

二　陶杜詩的规摹

天成自得发于己，法度布置得于人，所以黄庭坚教人规摹古人，在无数的古人之中尤要规摹陶杜，陶杜二人中尤要规摹杜

甫，杜甫诗中尤要规摹到夔州以后所作。赠高子勉云：

> 拾遗句中有眼，彭泽意在无弦；顾我今年六十，付公以二百年。（集十二）

与王庠周彦书云：

> 所寄詩文，反复讀之，如对談笑也。意所主張，甚近古人，但其波瀾枝叶不若古人尔。意亦是讀建安作者之詩与淵明子美所作，未入神尔。（集十九）

跋书柳子厚诗云：

> 予友生王观复作詩有古人态度，虽气格已超俗，但未能从容中玉珮之音、左准繩、右規矩尔。意者讀书未破万卷，观古人之文章未能尽得其規摹，及所总覽籠絡，但知玩其山龙黼黻成章耶？故手书柳子厚詩数篇遺之，欲知子厚如此学淵明，乃为能近之耳。（集廿六）

这都是在教人规摹古人，尤其要规摹陶杜。与王观复书第一首云：

> 好作奇語，自是文章病，但当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順，文章自然出群拔萃。观杜子美到夔州后詩，韓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集十九）

第二首亦云：

> 但熟观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詩，便得句法簡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无斧凿痕，乃为佳作耳。（同上）

“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是陪衬，“杜子美到夔州后诗”，是主旨，所以第二首便止说杜诗，不言韩文。黄氏常請人建大雅堂，刻杜子美在东西川及夔州所作诗，并不刻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所作文。刻杜子美巴蜀诗序云：

> 自予謫居黔州，欲屬一奇士而有力者，尽刻杜子美东西川及夔州詩，使大雅之音，久湮沒而复盈三巴之耳。而目前所見，录录不能办

事，以故未尝发于口。丹稜杨素翁拏扁舟，蹴犍为，略陵云，下郁鄢，访余于戎州，闻之，欣然请攻坚石，募善工，约以丹稜之麦，三食新而毕，作堂以宇之，予因名其堂曰"大雅"，而悉书遗之。（集十六）

又作大雅堂记云：

丹稜杨素翁，……闻余欲尽书杜子美两川夔峡诸诗，刻石藏蜀中好文喜事之家，素翁粲然向余请从事焉。又欲作高屋广楹，庥此石。因请名焉。余名之曰"大雅堂"，而告之曰：由杜子美以来四百余年，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随世所能，杰出时辈，未有升子美之堂者，况室家之好耶？余尝欲随欣然会意处，笺以数语，终以汩没世俗，初不暇给。虽然，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于文。夫无意而意已至，非广之以国风雅颂，深之以离骚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闯然入其门耶？故使后生辈自求之，则得之深矣。（集十七）

这都是在教人规摹杜诗，尤其要规摹到夔州以后所作。黄庭坚与徐师川书第一首云："其未至者探经术未深，读老杜、李白、韩退之诗未熟耳。"（集十九）又题李白诗草后亦云："余评李白诗如黄帝张乐于洞庭之野，无首无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槧人所可拟议。吾友黄介读李杜优劣论曰："论文政不当如此，余以为知言。"（集廿六）潜溪诗眼引山谷云："学者若不见古人用意处，但得其皮毛，所以去之更远。"所举的例证系李太白诗，并盛称太白妙处。（引见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又竹庄诗话卷五，诗林广记卷一）据知他也教人规摹李白韩退之，但比观确论，知以陶杜为主，陶杜中又以杜甫为主，杜甫诗中又以夔州以后作为主。陈师道后山诗话卷一引黄鲁直云："杜之诗法，韩之文法也。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尔。"（后山集卷廿八）知对于韩诗比较轻视。李白长于杜甫，普通都称李杜，不称杜李。黄庭坚以杜甫置李白之上，正同于王安石选四家诗的首杜末李，意谓杜高于李。称赞黄介的反对优劣李杜，亦见后山诗话卷二，

(后山集廿九)疑彼袭此，非此袭彼。黄以前的优劣李杜的，首为元稹的崇杜卑李，见所作杜工部墓志铭，(详四篇四章一节)不名李杜优劣论；次为欧阳修的崇李卑杜，见所著笔说，正名李杜优劣说，疑指此而言。果尔，则是不赞成优李劣杜，正是因为他推崇杜甫，所以不容人抨击。后山诗话卷一云："唐人不学杜甫，惟唐彦谦与今黄亚夫庶、谢师厚景初学之。鲁直，黄之子，谢之婿也，其于二父，犹子美之于审言也。" 此外，王安石也学杜甫，辑老杜诗后集，在序里说："世之学者至乎甫而后为诗，不能至，要之不知诗焉尔。"(临川集八四)黄是王的乡后辈，虽政学异派，但学杜颇疑受其影响。吴聿观林诗话引山谷云，"余从半山(王安石)得古诗句法"，那末律诗或也有得于半山。但有理论有方法的规摹杜甫，还是应当首推黄氏。黄氏所领导的江西派也都以杜甫为法，由是杜甫遂逐渐的成为"诗圣"，而李白遂相形见拙了。

黄的规摹杜甫不足奇异，重视格律，主张多读融古，都与杜甫相近。(参四篇三章三节)陶诗简放自然，黄也奉为圭臬，看似奇异，实也有他的渊源与原因。黄是苏门学士，虽与师门异趣，但也不无同好。苏喜爱陶诗，又以柳配陶，奉为二友，黄也以柳为学陶阶梯，可见他的规摹陶潜，大概受于苏轼。黄讲求法度布置，举杜赠韦见素诗为正体，可是尤喜到夔州以后诗的"无意于文"，"不烦绳削而自合"，这便与陶诗相近。所以黄的规摹陶杜，是由杜以至于陶；黄的讲求布置法度，是由有法以至于无法。

杜甫多读融古，但对陶潜很少称道，有之如遣兴五首云："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达生岂是足，默识盖不早，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杜集七)虽不是就诗而

言，但也可见他对陶并不十分推崇，这也是由于气味的不大相同。黄庭坚也不是不知陶杜异趣，跋欧阳元老诗云：“此诗入陶渊明格律，颇雍容，使高子勉追之或未能；然子勉作唐律五言数十韻，用事稳贴，置字有力，元老亦未能也。”（集廿六）跋高子勉诗云：“高子勉作诗以杜子美为标准，用一事如军中之令，置一字如关门之鍵。”（同上）则陶诗的格律是“雍容”，杜诗的格律是“用事稳切，置字有力”。可是他偏要以陶杜并称，都奉为规摹的范本，这也是由于他的要以有法做到无法，——做到“无意于文”。

“无意于文”是诗的最高境界，登到最高境界的阶梯仍是法度。名贤诗话载：

> 黄魯直自黔南归，詩变前体。且云：“須要唐律中作活計，乃可言詩，以少陵淵蓄云萃，变态百出，虽数十百韵，格律益严，盖操制詩家法度如此。”（引見修辞鉴衡卷一）

据宋史本传，黄氏自黔南归已在晚年，仍要“操制诗家法度”，并不能“无意于文”。题意可诗后云：“渊明则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者。”又云：“巧于斧斤者多疑其拙，窘于检括者辄病其放。孔子曰，宁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渊明之拙与放，岂可为不知者道哉？”（集廿六）的确他也止是道得出，并未做得到。

三　点铁成金与夺胎换骨

规摹的范本是陶杜，规摹的方法是“点铁成金”与“夺胎换骨”。答洪驹父书第二首云：

> 老杜作詩，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讀书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为文章者，眞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鉄成金也。（集十九）

宋谷祥野老纪闻引山谷云：

> 诗意无穷，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能尽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规模其意，形容之，谓之夺胎法。（野客丛书附录，稗海本，又见范晞文冷斋夜话）

“点铁成金”还可以勉强说是推陈出新，“夺胎换骨”则直然是偷梁换柱。吴曾能改斋漫录云：“山谷作诗所谓一洗凡马万古空，岂肯教人以蹈袭为事乎?”但“点铁成金”见黄氏文，绝无可疑；以“点铁成金”证“夺胎换骨”，似亦可信据。本来古体诗完成于汉魏南北朝，律体诗完成于唐，自宋以后并没有新的体裁，因亦没有新的创造，止有旧的模仿。旧的模仿的绝好方法就是“点铁成金”与“夺胎换骨”，特别是“夺胎换骨”尤为不二法门，自黄庭坚以后的诗人，尤其江西诗派，大都奉为不传之秘。耳目所知，宋代谈诗的书，野老纪闻冷斋夜话以外，如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二），严有翼艺苑雌黄（引见渔隐丛话后集卷十九），诗话总龟（后集卷一），诗人玉屑（卷八），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八），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十九），阮阅诗话总龟（后集卷二），李颀古今诗话（引见修辞鉴衡卷一），陈善扪虱新话（卷五，㊀），马永卿嬾真子（卷二），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三），吴坰五总志，都对夺胎换骨有所讲述，而讲述得最详的当为俞成的萤雪丛说卷上云：

> 文章一技，要自有活法；若胶古人之陈迹而不能点化其句语，此乃谓之死法。死法专祖蹈袭，则不能生于吾言之外；活法夺胎换骨，则不能毙于吾言之内。毙吾言者生吾言也，故为活法。伊川先生常说："中庸'鸢飞戾天'，须知天上者更有天；'鱼跃于渊'，须知渊中更有地。会得这个道理，便活泼泼地。" 吴处厚尝作剪刀赋，第五隔对："去

㊀ 陈氏云："古人自有夺胎换骨法，所谓灵丹一粒点成金也。"以两法为一，与他书不同。

爪为牺，救汤王之旱岁；断须烧药，活唐帝之功臣。”当时屡窜易，唐帝上一字不妥帖，因看游鳞，顿悟“活”字，不觉手舞足蹈。吕居仁尝序江西宗派诗，若言灵均自得之，忽然有入，然后惟意所出，万变不穷，是名活法。杨万里又从而序之，若曰学者属文，当悟活法。所谓活法者，要当优游厌饫。是皆有得于活法也如此。吁！有胸中之活法，蒙于伊川之说得之；有纸上之活法，蒙于处厚、居仁、万里之说得之。（文章活法条，稗海本）

可见自作江西诗社宗派图的吕居仁，至“始学江西诸君子”（荆溪集序）的杨万里，都沿用这种方法，宣扬这种方法，并且锡以嘉名，叫做“活法”。直到金时的王若虚始痛加针砭，所作诗话三卷，大旨就在崇苏抑黄，斥“夺胎换骨”与“点铁成金”云：

鲁直论诗有“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喻，世以为名言，以予观之，特剽窃之黠者耳。（滹南遗老集，四部丛刊本卷四十）

又常因为“山谷于诗，每与东坡相抗，门人亲党，遂谓过之，而今之作者亦多以为然”，由是“戏作四绝”，后两绝云：

戏论谁知是至公，蝉蜷信美恐生风，夺胎换骨何多样，都在先生一笑中。

文章自得方为贵，衣钵相传岂是真？已觉祖师低一着，纷纷法嗣复何人？（集卷四五）

前者斥黄的“夺胎换骨”，后者斥后人的纷纷法嗣。黄于“夺胎换骨”外，还有“点铁成金”，后人的法嗣则止是“夺胎换骨”，这是因为模仿愈久，愈无新意可出，无从“点铁成金”，止有“偷梁换柱”。

四　陈师道的诗文方法

宋代的诗文意识大体合流发展，方法则并不全同，特别是陈师道（一〇五三——一一〇一）更主张不能互用。后山诗

话㊀卷一引黄鲁直云：

> 詩文各有体，韓以文为詩，杜以詩为文，故不工尔。（后山集，适园丛书本卷廿八）

因此他可以诗遵黄，文遵苏。诗话卷一云：

> 苏詩始学刘禹錫，故多怨刺，不可不愼也；晚学太白，至其得意則似之矣，然失于讇，以其得之易也。

答秦觀书云：

> 仆于詩初无师法，然少好之，老而不厌，数以千計；及一見黃豫章，尽焚其藁而学焉。豫章以謂譬之弈焉，弟子高师一著，仅能及之，爭先則后矣。仆之詩，豫章之詩(一作誨)也。（集十四）

前者是背苏，后者是学黄。背苏嫌"多怨刺"，正是接受黄的意见，所以学黄是他的诗学路线。不过路线不是目的；目的是学杜。自他看来，后生小子不能直接学杜，学杜之前应当先学黄。后山诗话卷一云：

> 黃詩韓文有意故有工，左杜則无工矣。然学者先黃韓，不由黃韓而为左杜，則失之拙易矣。

治学为文都应当取法乎上，学杜就直接学杜好了，为什么又要先学黄呢？这是因为黄陈所致力的本来都是模仿，黄已发明了"点铁成金"与"夺胎换骨"的模仿方法，颇能予人规矩，所以黄以后的江西诗派，都以学黄为学杜的阶梯，陈师道就是首先发明这条阶梯的人。次韵答秦少章云："学诗如学仙，时至骨自换。"（集八）是他的"换骨法"不全同于黄，但究竟同样重视"换骨"。

其实不止学黄是因为他能以予人规矩，学杜也是因为他能以予人规矩，后山诗话卷一云：

㊀ 陆游跋謂"妄人窃其名以为此书"。四庫提要謂"旧稿散佚，南渡后好事以意补之"，但又謂"不妨存备一家"。至以不满苏、黃、秦观为不类陈語，則不然，陈有已見，不能一味阿随也。

学詩当以杜子美为师，有規矩故可学。退之于詩本无解处，以才高而好耳。淵明不为詩，写其胸中之妙尔。学杜不成，不失为工；无韓之才与陶之妙，而学其詩，終为白乐天尔。

杜有规矩，故可学当学，陶韩无规矩，故不可学也不必学，这就是陈师道的模仿论。张表臣珊瑚鉤诗话卷二载陈师道云：

今人爱杜甫詩，一句之内，至窃取数字以髣象之，非善学者；学者之要，在乎立格命意用字而已。

张表臣问"如何等是?"陈师道云：

冬日謁玄元皇帝庙詩，叙述功德，反复外意，事核而理長；閬中歌辞致峭丽，語脉新奇，句清而体好：兹非立格之妙乎？江汉詩言乾坤之大，腐儒无所寄其身；縛鷄行言鷄虫得失，不如兩忘而寓于道：兹非命意之深乎？贈蔡师魯詩云，"身輕一鳥过"，力在一"过"字；徐步詩云，"蕊粉上蜂鬚"，功在一"上"字：兹非用字之精乎？学者体其格，高其意，煉其字，則自然有合矣；何必規規然髣象之乎？（历代詩話本）

这种模仿方法与上述换骨方法，都较黄庭坚更高一筹。陈师道答秦觀书云："谈者谓仆诗过于豫章，足下观之，则仆之所有，从可知矣。"谦抑中隐寓矜满。可惜他止活了四十九岁，不然也许青胜于蓝，较黄庭坚更会模仿杜诗。

上述是诗法，至文法，后山诗话卷二云：

魏文帝曰："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輔，以詞为卫。"㊀魏文不足以及此，其有所傳乎？（集廿九）

说魏文不足以及此，正是以此自矜。此外，送邢居实序亦云：

夫学以明理，文以述志，思以通其学，气以达其文。古之人导其聰明，广其見聞，所以学也。正志完气，所以言也。王氏之学，如脫墼耳，案其形模而出之，不待修飾而成器矣，求为桓壁彝鼎，其可得乎？

㊀ 按見魏文帝詩格，五代宋初伪书，詳五篇三章一节。

（集十三）
答江端礼书亦云：

> 言以述志，文以成言，約之以义，行之以信。近則致其用，远則致其傳，文之質也。大以为小，小以为大，簡而不約，盈而不余，文之用也。正心完气，广之以学，斯至矣。（集十四）

都是以意志为主，以词气为辅，正是苏軾的述意达辞说的注解与引申。送邢居实序和答江端礼书都引到曾子——就是曾巩，似乎是承受的曾巩之说。魏衍后山陈先生集记云："初先生学于曾公（巩），誉望甚伟。"（后山集卷首）是陈师道不止是苏軾的门人，也是曾巩的门人。但曾巩重视道法事理，（详五章四节）与陈师道的重理而转于志，旨趣较远。明弘治本的后山集㊀脱落送邢居实序后半，因之不见上引一段，而明人遂以"送人序"的題目编入东坡续集卷八，自然我们可据何焯校的嘉靖以前旧抄本改正，㊁但由这种错乱，也可知苏陈师徒在这方面的论调相近了。

还有苏軾不贊成杨雄的"好为艰深之词"，（详六章三节）后山诗卷二亦云：

> 楊子云之文，好奇而卒不能奇也，故思苦而詞艰。善为文者，因事以出奇。江河之行，順下而已；至其触山赴谷，风搏物激，然后尽天下之变。子云惟好奇，故不能奇也。

这也可以证明他走的是苏軾路线。

五　韓駒的禪悟說

呂本中编江西诗社宗派图，共收二十五人，论诗有见解的，

㊀ 今行世赵駿烈本同，大概即出于弘治本。

㊁ 适园丛书本就是复印的嘉靖以前旧抄本，后附何焯記云："此卷弘治間刻本，送邢居实序脫后半，章善序脫前半，凡二十行。已丑七月，得嘉靖以前旧鈔对校，因为补录。"

陈师道以外，只有韩驹，他指出作法的基本方法是“禅悟”。赠赵伯鱼云：

> 学詩当如初学禪，未悟且徧参諸方；一朝悟罢正法眼，信手拈出皆成章。(陵阳詩鈔，宋詩鈔本)

此外，如次韵曾通判登拟岘台云：“篇成不敢出，畏子诗眼大，唯当事深禅，诸方参作么。”送东林珪老游闽云：“诗如雪窦加奇峭，禅似云居更妙明。”也都以禅诗并列。范季随所记陵阳(韩驹)先生室中语云：

> 詩道如佛法，当分大乘小乘邪魔外道，惟知者可以語此。(説郛本)

后来严羽作沧浪诗话，特标禅悟，又以大乘小乘分列汉唐诗高下(详十一章五节)，成为诗学的著名之论，显见受韩驹影响。和韩驹同时的李之仪与季去言书云：“说禅作诗本无差别，但打得过者绝少。”(姑溪前集廿九) 又赠祥瑛上人云：“得句如得仙，悟笔如悟禅。”(后集一)宋史载李之仪从学苏轼(详卷三四四本传)，刘克庄谓韩驹也出于苏轼(江西诗派小序)，苏轼好佛，说不定禅悟之说，始由苏轼启迪。

不过吕本中强韩驹入江西诗派，也并不错误。陵阳室中语云：

> 仆尝請益下字之説法当如何?公曰：“正如弈棋，三百六十路都有好著，顧临时如何耳。”仆复請益曰：“有二字同意而用此字則穩，用彼字則不穩，岂牽于平仄声律乎?”公曰：“固有二字一意而声且同，可用此而不可用彼者。选詩云：‘亭皋木叶下，云中辨烟树’，还可作‘亭皋树叶下，云中辨烟木’否?至此惟可默曉，未易言傳耳。”

又云：

> 凡作詩使人讀第一句知有第二句，讀第二句知有第三句，次第終

篇，方为至妙。

大概作詩要从首至尾，語脉連屬，有如理詞狀。

前者论下字，后者论谋篇，都近于黄，不近于苏。下字的要诀，"唯可默晓，未易言传"，还不是得之禅悟？可惜室中语今已大部残佚，否则也许有禅悟与下字谋篇关联的言论。

六 范温的詩眼說

范祖禹子范溫，学于黄庭坚，著诗眼一卷，今残存于说郛、诗话总龟、苕溪渔隐丛话等书。（详附录十节）何谓诗眼，现在各条沒有明确的解说：

山谷言学者若不見古人用意处，但得其皮毛，所以去之更远。如"风吹柳叶滿店香"，若人复能为此句，亦未是太白。至于"吳姬压酒劝客尝"，"压酒"字他人亦难。及"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觴"，益不同。"請君試問东流水，別意与之誰短長"，至此乃太白眞妙处，当潛心焉。故学者先以識为主，禪家所謂正法眼，直須具此眼目，方可入道。

就标拈"压酒"二字，似诗眼指句中字眼；就"学者当以识为主"，又似指篇中意眼。书中发挥鼓吹的，确也偏重"字"与"意"：

世俗所謂乐天金針集，殊鄙淺。然其中有可取者，"煉句不如煉意"，非老于文学不能道此。又云，"煉字不如煉句"，則未安也。好句要須好字，如李太白詩"吳姬压酒喚客尝"，見新酒初熟，江南风物之美，工在"压"字。老杜画馬詩"戏拈禿笔扫驊騮"，初无意于画，偶然天成，工在"拈"笔。柳詩"汲井漱寒齿"，工在"汲"字。工部又有所喜用字，如"修竹不受暑"，"野航恰受兩三人"，"吹面受和风"，"輕燕受风斜"，"受"字皆入妙。老坡尤爱"輕燕受风斜"，以謂燕迎风低飞，乍前乍却，非"受"字不能形容也。（漁隐前集八）

此外如云:“句法之学,自是一家工夫。昔尝问山谷‘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山谷云:‘不如千岩无人万壑静,十步回头五步坐。’此专论句法,不论义理。”(渔隐前集四一)他论句法者还很多,兹不具引。论意者,如云:

> 文章貴众中傑出,如同賦一事,工拙尤易見。余行蜀道,过筹笔驛,如石曼卿詩云,“意中流水远,愁外旧山青”,膾炙天下久矣。然有山水处便可用,不必筹笔驛也。殷潛之与小杜诗甚健丽,亦无高意。惟义山詩云,“魚鳥犹疑畏簡书,风云長为护儲胥”。簡书盖軍中法令約束,言号令严明,虽千百年之后,魚鳥犹畏之也。儲胥盖軍中藩籬,言忠誼貫神明,风云犹为护其壁壘也。誦此兩句,使人凛然复見孔明风烈。至于“管乐有才真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屬对亲切,又自有議論,他人亦不及也。(漁隐前集廿二)

下面接着又举马嵬驿,也比较众作,指出李义山诗的“高情远意”。

这里所谓“意”,出于黄庭坚的“立意”,与苏轼的“述意”不同。述意是先有意然后借文抒述,立意是先有题而后立意制作。黄庭坚赠高子勉云:“拾遗句中有眼”,(详二节)是句中字眼也出于黄。韩驹云:“僧中初无具诗眼者”,(渔隐前集五六)大概只是泛指诗学眼光。李季可拙斋百说有诗眼一条云:“凡诗言之有眼者,盖不滞于题,诗外有所见,大抵谓道也,岂特风花雪月,区区以自蔽惑而已。”(知不足斋丛书本)和范温所谓诗眼全不相干。

七 吕本中的活法与悟入

编江西诗社宗派图的吕本中(绍兴进士),标举“活法”与“悟入”。所作夏均父集序云:

学詩当識活法。所謂活法者，規矩备而能出于規矩之外，变化不測而亦不背于規矩也。是道也，蓋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知是者，則可以与語活法矣。謝元暉有言，"好詩轉圓，美如彈丸"，此眞活法也。近世豫章黄公首变前作之弊，而后学者知所趋向。必精尽知左規右矩，庶几至于变化不測。然余区区浅末之論，皆汉魏以来有意于文者之法，而非无意于文者之法也。子曰："兴于詩。""詩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識于鳥兽草木之名。"今之为詩者，讀之果可使人兴起其为善之心乎？果可使人兴、观、群、怨乎？果可使人知事父事君而能識鳥兽草木之名之理乎？为之而不能使人如是，則如勿作。(引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四部丛刊本卷九五)

俞成说活法就是夺胎换骨，(见三节)就此序观之，似比夺胎换骨活泼广阔，可以说是进步的夺胎换骨法。吕本中要"规矩备而能出于规矩之外"，杨万里更止要"优游厌饫"，可以说是进步的活法。俞成述活法先引程子所谓"活泼泼地"，大概"活"字确是来自程子，吕本中也确受程子影响，为诗要"使人兴起其为善之心"，就自程子而来。(参四章六节)这样，便与黄庭坚的专重诗法不同了。

不过"活"字来自程子，"活法"还是源于江西，所作童蒙训云：

潘邠老言七言詩第五字要响，如"返照入江翻石壁，归云拥树失山村"。"翻"字"失"字是响字也。五言詩第三字要响，如"园前浮小叶，細麦落輕花"，"浮"字"落"字是响字也。所謂响者，致力处也。予窃以为字字当活，活則字字自响。(引見漁隐前集十三)

潘邠老列江西宗派图，指出作诗注重响字，吕本中进而指出响字的方法是活字，活的培养是悟入。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引吕云：

作文必要悟入处，悟入必自工夫中来，非僥倖可得也。如老苏之于文，魯直之于詩，盖尽（一作得）此理。（知不足齋丛书本卷二）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吕与曾吉甫论诗两帖，第一帖云：

楚辞杜黄，固法度所在，然不若徧考精取，悉为吾用，則姿态横生，不窘一律矣。如东坡太白詩，虽規摹广大，学者难依，讀之使人敢道，澡雪滯思，无穷苦艰难之狀，亦一助也。要之此事須令有所悟入，則自然超越諸子。悟入之理，正在工夫勤惰間耳。如張長史見公孙大娘舞劍，頓悟笔法。如張者，專意此事，未尝少忘胸中，故能遇事有得，遂达神妙。使他人观舞劍，有何干涉，非独作文学书而然也。（海山仙館叢书本前集卷四九，又見何溪汶竹庄詩話卷一）

吕本中的"悟入"说，当然受李之仪韩驹的"禅悟"说的影响，更直接的，范温业已说到"悟入"，詩眼云："识文章者，当如禅家有悟门。夫法门百千差别，要须自一转语悟入。如古人文章，直须先悟得一处，乃可通其他妙处。"（渔隐前集十九）至吕本中的贡献，則在指出"悟入必自工夫中来"，"徧考精取，悉为吾用，則姿态横生，不窘一律矣"。

八　楊萬里的风味說

杨万里（一一二七——一二〇六）和陆游（一一二五——一二一〇）都出于曾几，曾几出于吕本中。但吕本中的活法已转于"兴善"，杨万里的活法更转于"优游厌飫"，就是先津溉于法，然后再摆脱法的拘束。自序诚斋荆溪集云：

予之詩始学江西諸君子，既又学后山五字律，既又学半山老人七字絕句，晚乃学絕句于唐人。……戊戌三朝时节，賜告少公事，是日即作詩，忽若有寤，于是辞謝唐人及王陈江西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誠齋集，四部叢刊本卷八〇）

文中没有提到黄庭坚，实则也是始学终弃。作宜州新豫章先生祠堂记，很得意的述张公致书云："子学诗山谷者，微子莫宜记之。"（集七二）但跋徐恭仲省干近诗却云："传派传宗我替羞，作家各自一风流，黄陈篱下休安脚，陶谢行前更出头。"（集廿六）酹阁皂山碧崖道士甘叔怀亦云："问侬佳句如何法，无法无盂也没衣。"（集卅八）是不惟不在黄陈篱下安脚，直然摆脱一切衣钵方法。

外形摆脱衣钵，内涵遂注重风味，所作江西宗派诗序云：

江西宗派诗者，诗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人非皆江西，而诗曰江西者何？系之也。系之者何？以味不以形也。东坡云："江瑶柱似荔子。"又云："杜诗似太史公书。"不惟当时闻者呒然阳应曰诺而已，今犹呒然也。非呒然者之罪也，舍风味而论形似，故应呒然也。形焉而已矣，高子勉不似二谢，二谢不似三洪，三洪不似徐师川，师川不似陈后山，而况似山谷乎？味焉而已矣，酸咸异和，山海异珍，而调𩜇之妙，出乎一手也。似与不似，求之可也，遗之亦可也。（集七九）

颐庵诗藁序云：

夫诗何为者也？尚其词而已矣，曰：善诗者去词。然则尚其意而已矣，曰：善诗者去意。然则去词去意则诗安在乎？曰：去词去意而诗有在矣。然则诗果焉在？曰：尝食夫饴与荼乎？人孰不饴之嗜也，初而甘，卒而酸。至于荼也，人病其苦也，然苦未既而不胜其甘。诗亦如是而已矣。昔者暴公赞苏公，而苏公刺之，今求其诗无刺之之词，亦不见刺之之意也。乃曰："二人从行，谁为此祸？"使暴公闻之，未尝指我也，然非我其谁哉？外不敢怒，而其中媿死矣。三百篇之后，此味绝矣，惟晚唐诸子差近之。寄边衣曰："寄到玉关应万里，戍人犹在玉关西。"吊战场曰："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折杨柳曰："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三百篇之遗味，黯然犹存也。近世惟半山老人得之。（集八三，又欧庵居士集，知不足斋丛书本卷

首）

止就前篇观之，"味"或"风味"好象指作家的异点；合后篇观之，知指作品的同点。所以说形焉不似，味焉则"调腼之妙出乎一手"。那末共同的风味是什么呢？诚斋诗话云：

> 太史公曰："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乱。"左氏傳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此詩与春秋紀事之妙也。近世詞人閑情之靡，如伯有所賦，赵武所不得聞者，有过之无不及焉。是得为"好色而不淫"乎？惟晏叔原云："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可謂"好色而不淫"矣。唐人長門怨云："珊瑚枕上千行泪，不是思君是恨君。"是得为"怨誹而不乱"乎？惟刘長卿云："月来深殿早，春到后宫迟。"可謂"怨誹而不乱"矣。近世陈光詠李伯时画宁王进史图云："汗簡不知天上事，至尊新納寿王妃。"是得为微、为晦、为婉、为不污穢乎？惟义山云："侍燕归来宫漏永，薛王沈醉寿王醒。"可謂微婉显晦，尽而不污矣。（集一〇四）

然则他所谓风味，是三百篇的"好色不淫，怨诽不乱"，是春秋的微婉显晦，尽而不污，直然是怨刺。不过不是谩骂的怨刺，而是委婉的怨刺，与苏轼的怨刺不同，与黄庭坚的反讪谤更异。所作习斋论语讲义序云："读书必知味外之味，不知味外之味而曰我能读书者，否也。"（集七七）好象来自司空图，但他所谓味与司空图并不相同。（参五篇四章五节）

他所提倡的这种风味，三百篇以下，晚唐最工，他不惟在颐庵诗藁序与诗话言之，在周子益训蒙省题诗序亦云：

> 唐人未有不能詩者，能之矣亦未有不工者。至李杜极矣，后有作者，蔑以加矣。而晚唐諸子虽乏二子之雄渾，然好色而不淫，怨誹而不乱，犹有国风小雅之遺音。（集八三）

此外，黄御史集序（集七），唐李推官披沙集序（集八一），也都说晚唐诗最工。读笠泽丛书云："晚唐异味同谁赏，近日诗人轻晚

唐。"(集廿七)以今所知,当时的葉適和四灵正提倡晚唐,反对江西,(详八章七,九两节)故轻晚唐当是江西,不是永嘉。杨万里恐也深知,所作双桂老人詩集后序云:"近世此道之盛者莫盛于江西。然知有江西者不知有唐人,或者左唐人以右江西,是不惟不知唐人,亦不可謂知江西者。"(集七八)旁人左唐人以右江西,他偏要混同唐人与江西,而且說唐人与江西的好处都在"风味",那么他所意识的江西与前人迥不同了。

九　作詩三等——兴、賦、賡和

既然重风味,轻形似,所以主张"信己俟人",反对"舍己徇人"。見苏仁仲提举书云:

> 韋苏州之詩,天下之所同美也。客有效韋公之体以見公者,而公不悅;既而以己平生之詩見公,而公悅之。当其效人之詩体以求合于人,自以为巧矣,而其巧适所以为拙,則夫舍己以徇于人,与夫信己以俟于人,其巧拙未易以相过也。(集六四)

既然要"信己俟人",不要"舍己徇人",所以重兴、轻賦,卑视賡和。答建康府大军库监门徐达书云:

> 大氐詩之作也,兴上也,賦次也,賡和不得已也。我初无意于作是詩,而是物是事适然触乎我,我之意亦适然感乎是物是事,触先焉,感随焉,而是詩出焉,我何与哉,天也。斯之謂兴。或屬意一花,或分題一草,指某物課一詠,立某題征一篇,是已非天矣,然犹專乎我也。斯之謂賦。至于賡和,則孰触之,孰感之,孰題之哉,人而已矣。出乎天犹惧戕(疑为戕)乎天,專乎我犹惧弦(疑为眩)乎我,今牽乎人而已矣,尚冀其有一銖之天,一黍之我乎?盖我未賞觀是物,而逆追彼之觀,我不欲用是韵,而抑从彼之用,虽李杜能之乎,而李杜不为也。是故李杜之集无牽率之句,而元白有和韵之作。詩至和韵而詩始大坏矣,故韓子蒼以和詩为詩之大戒也。(集六七)

兴和赋的原始意义当然并不如此，但这没有关系，我们不必追求，我们要追求的不是兴赋的旧名，而是兴赋的新义。照他的解释，兴出乎天，赋专乎我，赓和牵乎人。出乎天的最为可贵，专乎我的也还有价值，牵乎人便毫无可取。他的朋友陈晞颜有和简斋诗集，他在序文里虽惊异晞颜的“举前人数百篇之诗而尽赓之”但又云：

> 昔韩子苍答士友书，谓诗不可赓也，作诗则可矣，故苏黄赓韵之体不可学也。岂不以作焉者安，赓焉者勉故欤。不惟勉也，而又困焉。意流而韵止，韵所有，意所无也，夫焉得而不困？（陈晞颜和简斋诗序，集七九）

仍是卑薄赓和，而且指出赓和的另一缺点是意流韵止，韵有意无。文中也曾称赞陈晞颜的赓和诗，“宽乎其不逼也，畅乎其不塞也”，“是赓和人者也，而非赓和人者也”。但接着又说：“此文人之奇也，亦文人之病也。”又说：“而诗人至于犯风雪，忘饥饿，竭一生之心思，以与古人争险以出奇，则亦可怜矣。然则险愈竞，诗愈奇，病愈痼矣。”弦外之音，更是极端的卑薄。

十 作文五譬

诗要先津溉于法，然后再摆脱法的拘束，文亦然。徐赓问科目文词利病，杨万里答云：“文者文也，在易为贲，在礼为缋。”又设为五喻：

第一喻：

> 譬之为器，工师得，不（不字疑衍）必解之以为朴，削之以为质，丹雘之以为章，三物者具，斯曰器矣。有贱工焉，利其器之速就也，不削，不丹，不雘，解焉而已矣，号于市曰，器莫吾之速也。速则速矣，于用奚施焉？时世之文，将无类此。

第二喻：

抑又有甚者，作文如宫室，其式有四，曰門，曰廡（据下文当为應），曰堂，曰寢，缺其一，紊其二，崇卑之不倫，广狹之不类，非宮室之式也。今則不然，作室之政，不自梓人出，而杂然听之于众工，堂則隘而廡有容，門則納千駟而寢不可以置一席，室成而君子弃焉，庶民哂焉。今其言曰，文烏用式，在我而已。是廢宮室之式，而求宮室之美也。

第三喻：

抑又有甚者，作文如治兵，擇械不如擇卒，擇卒不如擇將。尔械鍛矣，授之羸卒則如无械；尔卒精矣，授之妄校尉則如无卒。千人之軍，其裨將二，其大將一；万人之軍，其大將一，其裨將十。善用兵者，以一令十，以十令万，是故万人一人也。雖然犹有陣焉。今則不然，乱次以济，陣乎？驅市人而战之，卒乎？十羊九牧，將乎？以此当筆陣之勁敌，不敗奚归焉？借弟令一胜，所謂适有天幸耳。

第四喻：

抑又有甚者，西子之与惡人，耳目容貌均也，而西子与惡人异者，夫固有以异也。顧凱之曰："傳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又曰："頰上加三毛，殊胜。"得凱之論画之意者，可与論文矣。今則不然，远而望之，巍然九尺之干，追而视之，神气索如也，惡人而已乎？

第五喻：

抑又有甚者，昔三老董公說高帝曰："仁不以勇，义不以力。"惟文亦然。由前之說，亦未离乎勇力邦域之中也，盍見董公而問之？問而得之，則送君者自崖而返矣。（答徐賡书，集六六）

第一喻是說的文辞修饰，第二喻是說的文章法式，第三喻是說的文意主从，第四喻是說的神气，总之是注重文章的谋篇修辞。第五喻不甚了了，大概是說最后还要自谋篇修辞，以至于不谋而自合，不修而自工。徐賡向他問的是"今日科目文词"，就是当时的

科场文字。他的答书最后说："若夫前辈所谓古文者，某亦尝耳剽而手追矣。顾足下方业科目。夫业科目者，固将有以合乎今之律度也。合乎今，未必不违乎古；合乎古，未必售于今。"那末所说的谋篇修辞，当然是指的科目文词。科目文词的谋篇修辞，不全同古文，所以说"合乎今，未必不违乎古"。但这并不是说古文就不重视谋篇修辞，相反的古文也要谋篇修辞，也要有律度格式。与刘子和言古文样辙，答云：

> 文之于道未为尊固也，然譬之琢璞为器，固璞之毁也，若器成而不中度，琢就而不成章，则又毁之毁也，君子不近，庶人不服，亦奚取于斯?（答刘子和书，集六五）

仍是答徐赓的第一喻，可见古文同样的注重谋篇修辞，大概最后也同样的希望篇不谋而合，辞不修而工。不过与科目文体裁不同，方法亦异罢了。

十一 陆游的詩外工夫

陆游诗有一首题为："追怀曾文清公，呈赵教授，赵近尝文诗"，诗云：

> 忆在茶山听說詩，亲从夜半得玄机。常忧老死无人付，不料穷荒見此奇。律令合时方帖妥，工夫深处却平夷。人間可恨知多少，不及同君叩老师。（劍南詩藁，四部备要陆放翁全集本卷二）

又吕居仁集序云：

> 晚見曾文清公，文清謂某，君之詩淵源殆自吕紫微，恨不一識面。（渭南文集，四部叢刊本卷十四）

文清是曾几的謚号，茶山是曾几讲学的寺院，后来便自号茶山，紫微就是吕本中，可见陆游渊源江西诗派，重视律令工夫。示儿诗云：

文能换骨余无法，学但穷源自不疑，齿豁头童方悟此，乃翁見事可憐迟。(詩廿五)

夜吟云:

六十余年妄学詩，工夫深处独心知，夜来一笑寒灯下，始是金丹换骨时。(詩五一)

也确与吕本中的"悟入换骨"相近。不过自陆游看来，吕曾的诗学工夫不在诗，而在学问道德。吕居仁集序云:

公自少时，既承家学，心体而身履之，几三十年，仕愈躓，学愈进，因以其暇尽交天下名士，其講习探討，磨礱浸灌，不极其源不止。故其詩文汪洋宏肆，兼备众体，間出新意，愈奇而愈渾厚，震耀耳目，而不失高古，一时学士宗焉。

曾文清公墓志銘云:

道学既为儒者宗，而詩益高，遂擅天下。(文卅二)

跋曾文清公诗藁亦云:

早以学术文章擅大名，为一世龙門。(文卅)

实则吕曾虽不象黄庭坚的专力于诗，但他方面的成就不大，陆放翁偏要说他们的诗源于道德学问，是因为陆放翁认为学诗学文须从道德学问下手。示子遹云:

汝果欲学詩，工夫在詩外。(詩七八)

诗外的工夫就是道德学问。何君墓表云:

詩岂易言哉，一书之不見，一物之不識，一理之不穷，皆有憾焉，同此世也，而盛衰异，同此人也，而壮老殊，一卷之詩有淳漓，一篇之詩有善恶，至于一联一句，而有可玩者，有可疵者，有一讀再讀至十百讀乃見其妙者，有初味可人意，熟味之使人不滿者。大抵詩欲工，而工亦非詩之极也。鍛煉之久，乃失本指，斲削之甚，反伤正气，虽曰名不可幸得，以名求詩，又非知詩者。纖丽足以移人，夸大足以盖众，故論久而复工，名久而后定，嗚呼艰哉!(文卅九)

这是说从学问培植。方德亨诗集序云：

诗岂易言哉，才得之天，而气者我之所自养。有才矣，气不足以御之，淫于富贵，移于贫贱，得不偿失，荣不盖媿，诗由此出，而欲追古人之逸驾，讵可得哉？(文十四)

这是说从道德培植。自陆游看来，有了真道德与真学问，自然可作出真的好诗文。上辛给事书云：

君子之有文也，如日月之明，金石之声，江海之涛澜，虎豹之炳蔚，必有是实，乃有是文。夫心之所养，发而为言；言之所发，比而成文；人之邪正，至观其文则尽矣，决矣，不可复隐矣。爝火不能为日月之明，瓦釜不能为金石之声，潢汙不能为江海之涛澜，犬羊不能为虎豹之炳蔚，而或谓庸人能以浮文眩世，乌有此理也哉？使诚有之，则所可眩者，亦庸人耳。……贤者之所养，动天地，开金石，其胸中之妙，充实洋溢，而后发见于外，气全力余，中正闳博，是岂可容一毫之伪于其间哉！(文十三)

与道学家朱熹一派的见解很相近，所以朱熹论诗常称赞陆游。

十二　诗文非小技

发于道德学问的诗文，自然不是"小技"。答陆伯政上舍书云：

古声不作久矣，所谓诗者遂成小技。诗者果可谓之小技乎？学不通天人，行不能无愧于俯仰，果可以言诗乎？仆绍兴末在朝路，偶与同舍二三君至太一宫中，闻中有高士斋，皆名山高逸之士，欣然访之，则皆扃户出矣。裴回老松流水之间，久之，一丫髻童负琴引鹤而来，风致甚高。吾辈相与言曰："不得见高士，得见此童亦足矣。"及揖而问之，则曰："今日董御药生日，高士皆相率往献香矣。"吾辈遂一笑而去。今世之以诗自许者，大抵多太一高士之流也，不见笑于人几希矣，而望其有陶渊明杜子美之余风，果可得乎！(文十三)

这里说诗非小技，上执政书却说："夫文章小技耳，特与至道同一

关捩，惟天下有道者，乃能尽文章之妙。”（文十三）那是因言遣言，意思是说：世俗以文章为小技，我们也姑说是小技，可是这种小技，“与至道同一关捩”，不是真的以小技看文章，相反的倒是以至道看文章，“惟天下有道者乃能尽文章之妙”，止有技是不成的。

诗文非小技是针对当小技的诗文而发。当时“以诗自许者”，“学不通天人，行不能无愧于俯仰”，遂致沦为小技。这种小技的诗人，陆游说不能“望其有陶渊明杜子美之余风”，知大概是江西派的末流人物。矫正江西的是四灵的模仿晚唐，陆游认为一样的“学不通天人，行不能无愧于俯仰”，一样引导诗到“小技”的深渊。陈长翁文集序云：

> 我宋更靖康祸变之后，高皇帝受命中兴，虽艰难颠沛，文章独不少衰。……久而寖微，或以纖巧摘裂为文，或以卑陋俚俗为詩，后生或为之变，而不自知方。（文十五）

答邢司戶书云：

> 近时頗有不利場屋者，退而組織古語，剽裂奇字，大书深刻，以眩世俗。……足下謂此等果可言文章乎？尙不可欺仆輩，安能欺足下哉？（文十三）

“变而不知方”，以至“组织古语，剽裂奇字，大书深刻，以眩世俗”的，大概指四灵一派。示子遹云：

> 元白才倚門，溫李眞自鄶。（詩七八）

答宋都曹云：

> 陵迟至元白，固已可憤疾；及观晚唐作，令人欲焚笔。此风近忽熾，隙穴殆难窒，淫哇解移人，往往喪妙質。苦言告学者，切勿有所怵，航川必至海，为道当擇术。（全題作“宋都曹屡寄詩，且督和答，作此示之”，詩七九）

在当时忽煽晚唐风的是四灵，因此卑弃晚唐也就是卑弃四灵。读近人诗云："琢琱自是文章病，奇险尤伤气骨多，君看大羹玄酒味，蟹螯蛤柱岂同科。"（诗七八）他反对近人的琢琱，无论是江西或四灵。和张功父见寄云："叮嚀一语宜深听，信笔题诗勿太工。"他主张不必求工，应求学通天人，行不愧于俯仰。

十三 姜夔的"詩説"

杨万里寄张功甫姜尧章进退格云："尤杨范陆四诗翁，此后谁当第一功，新拜南湖为上将，更差白石作先锋。"（诚斋集四一）南湖为张功甫，名鎡。白石为姜尧章，名夔。张鎡撰有仕学规范四十卷，卷三十三至三十五论作文，明人胡文焕收入格致丛书论文类，命名文学规范；卷三十六至四十论作诗，胡文焕收入格致丛书评诗类（此类单行名诗法统宗），命名诗学规范。但都是抄撮成书，不足以考见他自己的见解。姜夔撰有诗说一卷，诗集自叙云：

> 近过梁谿見尤延之（袤）先生，問余詩自誰氏，余对以异时泛閱众作，已而病其駁如也，三熏三沐，师黄太史氏（庭坚），居数年，一語噤不敢吐，始大悟学即病，顧不若无所学之为得，虽黄詩亦偃然高閣矣。

又云：

> 余識千巖（蕭德藻）于瀟湘之上，东来識誠齋石湖（范成大），尝試論兹事，而諸公咸謂其与我合也。（白石詩集，四部叢刊本卷首）

因此论诗也是江西一路。诗说云：

> 学有余而約以用之，善用事者也；意有余而約以尽之，善措辭者也，乍叙事而間以理言，得活法者也。

虽不同于吕本中杨万里的活法，但究竟仍重活法。诗说又云：

> 难説处，一語而尽；易説处，莫便放过；僻事实用，熟事虚用；説理

要簡切，說事要圓活，說景亦微妙。多看自知，多作自好矣。

“圆活”之活，就是“活法”之活。最早的活法是“夺胎换骨”，吕本中的活法是“圆转”“变化”，杨万里的活法是“优游厌饫”，姜夔的活法可以说是“轻松圆活”。所以又云：“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难言，我易言之，自不俗。”易者寡言，止是避忌；难者易言，非“轻松圆活”不可。

轻松圆活是方法，也是风格，达到这种风格，须注意气象、体面、血脉、韵度四个方面。诗说云：

> 大凡詩自有气象、体面、血脉、韵度。气象欲其渾厚，其失也俗；体面欲其宏大，其失也狂；血脉欲其貫穿，其失也露；韵度欲其飄逸，其失也輕。

浑厚、宏大、贯穿都是圆活，飘逸是轻松。风格要圆活轻松，意境则要高妙深远。诗说云：

> 意格欲高，句法欲响，只求于句字，亦末矣。故始于意格，成于句字，句意欲高欲远，句調欲清欲古欲和，是为作者。

格与调都是风格，意是意境。诗说又云：

> 詩有四种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碍而实通，曰理高妙；事出意外，曰意高妙；写出幽微，如清潭見底，曰想高妙；非奇非怪，剝落文彩，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

也是就意境而言，不过前者说深远，此说高妙。欲深远高妙，固然要注意全篇的理、意、想，尤要注意：

> 篇終出人意表，或反終篇之意，皆妙。
>
> 一篇全在尾句，如截犇馬，辞意俱尽；如临水送將归，意尽辞不尽；㊀若夫辞尽意不尽，剡溪归棹是已；辞意俱不尽，溫伯雪子是已。

㊀ 原作“辞尽意不尽”，据后文及历代詩話本校改。

所謂辞意俱尽者，急流中截后語，非謂辞穷理尽者也。所謂意尽辞不尽者，意尽于未当尽处，則辞可以不尽矣，非以長語益之者也。至如辞尽意不尽者，非遺意也，辞中已仿佛可見矣。辞意俱不尽者，不尽之中固已深尽之矣。

姜夔自言"诗说之作，非为能诗者作也，为不能诗者作，而使之能诗"。惟其是"为不能诗者作"，所以切实可用，尤以说尾句，他家虽也曾论及，但就余所知，都不及姜夔的明白简当。

十四　刘克庄的变体法

为陈起收入江湖群贤小集的刘克庄（一一八七——一二六九）戴复古，也都出于杨陆，源于江西。刘克庄刻楮集序云：

初余由放翁入，后喜誠齋，又兼取东都南渡江西諸老，上及于唐人。（后村大全集，四部叢刊本卷九六）

又为江西诗社宗派图作总序小序，以吕本中继宗派之后（集九五）。选茶山诚斋诗，譬山谷为初祖，吕曾为南北二宗，诚斋为临济德山，放翁学于茶山而青于蓝（集九七）。也足证明确出江西杨陆。但江西派至吕本中接受程学，陆游接近朱学，本已逐渐改变，刘克庄又接受莆田诸林（光朝，亦之，希逸）和浙东葉氏（適）之学，由是又与江西杨陆有别。題戴贡士诗卷云：

百家衣莫劳針指，九轉丹能蜕肉身。（集廿）

是也承接了换骨法，但他所特别矜重的是"变"。王南卿集序云：

蓋公之言曰："□（当为文字）恶蹈襲，其妙在于能变，惟淵源者得之。"岂惟文哉，議論亦然。故公之諸文，变态无穷，不主一体，論事必□古今，据义理，不祖旧說；詩高处逼陵阳（韓駒）茶山，四六□□不減汪綦。（集九四）

梁朝的萧子显已提倡"新变"，（详三篇六章五节）但刘克庄所謂

"变"与彼不同;萧子显的"变"是全面的，刘克庄的"变"是变体裁，不变情性。用他的话说，就是:风人之诗不变，文人之诗应变。题何谦诗云:

余尝謂以情性祀义为本，以鳥兽草木为料，风人之詩也。以书为本，以事为料，文人之詩也。世有幽人羇士，飢餓而鳴，語出妙一世;亦有碩师鴻儒，宗主斯文，而于詩无分者，此事之不可勉强歟?……君稍变体，借虚以发实，造新以易腐，因难以出奇。盖乃翁机軸，近于余所謂以书为本以事为料者，君又能以意为匠，书与料將受役于君矣。或曰:子評碩师鴻儒也甚严，取羇人幽士也太寬，可乎哉?余曰:子論人，余論詩，奚为不可?或又曰:古今詩不同，先賢有刪后无詩之說。夫自国风騷选玉台胡部，至于唐宋，其变多矣。然变者，詩之体制也;历千年万世而不变者，人之情性也。(集百卅六)

"借虚以发实，造新以易腐，因难以出奇"，是变体的方法;至目的则在使体裁辞格，不同前人。韩愈很推重孟郊，刘克庄在题滿领卫诗一文中，说是基于:"唐诗人自李杜外，万窍互鳴，千人一律"，独"东野(孟郊)诸诗，自出机轴，无一字犯唐人格律"。幷结云:"善拟古者，仿其意，不仿其辞。""不仿其辞"也就其"稍变其体"。

惟其要变体，所以不止自己不肯拘守江西规模，也惋惜永嘉胶攀晚唐。刘圻父诗集序云:

余尝病世之为唐律者，膠攣淺易，窘局才思，千篇一体;而为派者，則又馳騖广远，蕩弃幅尺，一臭味尽。(集九四)

为唐律者指永嘉四灵，为派者指江西诸子。刘克庄诗出江西，也和四灵中的赵紫芝翁灵舒为社友，(见题二藏诗卷，集一〇九)瓜圃集序云:

近岁詩人惟赵章泉五言有陶阮意，赵蹈中能为韋体，如永嘉詩人极力驰驟，才望見賈島姚合之藩而已。余詩亦然。十年前始自厌之，

欲息唐律，专造古体。赵南塘不谓然，其说曰："言意深浅，存人胸怀，不系体格，若气象广大，虽唐律不害为黄钟大吕，否则手操云和，而惊飙骇电，犹隐隐弦拨间也。"余感其言而止。（集九四）

这一则可见他的不满意四灵的沾沾贾姚，二则可见他自己却也徘徊不定。题李耘子所藏其兄公晦诗评也说："今举世病晚唐诗"，"然徒病之而无以变之，苛于评而谦于教，独何欤？"（集九九）更鲜明的希望学晚唐的改变。但林子显诗序又云："近世理学兴而诗律坏，惟永嘉四灵复为言，若吟过于郊岛，篇幅少而警策多。"（集九八）又颇表推崇，也是徘徊不定。因此，他虽提倡变体，但并不能指出变体的方向。宋希仁诗序云：

近世诗学有二，嗜古者宗选，缚律者宗唐。……余谓诗之体格有古律之变，久之，情性无今昔之异，选诗有芜拙于唐者，唐诗有佳于选者。常欲与同志切磋此事，然众作多而无穷，余论孤而少助。（集九七）

仍是想变于古，可又留恋于唐。平湖集序说：宋代"三百余年间，斯文大节目有二，欧阳公谓昆体盛而古道衰，至水心叶公则谓洛学兴而文字坏。"（集九八）据知变的观念，远宗欧阳，近承叶适。可惜未能象欧阳的以古道变昆体，也未能象叶适的以文字变理学，结果止有变的意念，没有变的路途。至分诗为风人文人两种，谓情性不变，开启后来的性灵说；硕师鸿儒，于诗无分，与同时的严羽契合，都极有价值。严羽以禅说诗，刘克庄题何秀才诗禅方丈云："诗家以少陵为祖，其说曰'语不惊人死不休'；禅家以达摩为祖，其说曰'不立文字'；诗之不可为禅，犹禅之不可为诗也。何君合二为一，余所不晓。"（集九九）又与严说不同。

十五　序诗论文之难

也许就是因为徘徊不定，所以对于序诗论文都感觉很难。

瓜圃集序云·

夫作詩难，序詩尤难。小序最古，最受攻，至朱文公始尽扫而去之，而詩之义自見，詩之显晦不在乎序之有无也决矣。(集九四)

杨彦侯集序云：

古作者皆自其文傳，不托人以傳也。托人以傳者，必其人之文与我相上下，如刘之序柳，苏之序欧，然后无媿。若赵得之序韓，殆似以莛撞鐘蠡測海矣。(集九七)

这是说序诗之难。题郑大年文卷云：

余尝为作文难，論文尤难。貌似者不若意似：貌似者，法言之似論語也，兩京兩都之似上林子虛也；意似者，杜詩之似史記也，貞符之似王命論也。(集一〇九)

这是说论文之难。论文之难，难于探意似，序诗之难，也是难于窥知情意。所以瓜圃集序指出"子夏孔门之高第，卫宏汉世之名儒"，"而有不能通匹夫匹妇之情性"。然后说："若余者，其敢自谓知朋友之意乎？"无已，止有诗人评诗，文人评文，词人评词，还可以得其仿佛。题刘澜诗集云：

詩必与詩人評之。今世言某人貴名揭日月，直声塞穷壤，是名节人也；某人性理际天淵，源派傳濂洛，是学問人也；某人窺姚姒，逮庄騷，摘屈宋，熏班馬，是文章人也；某人万里外建侯，某人立談取卿相，是功名人也。此数項人者，其門揮汗成雨，士群趋焉，詩人亦攜詩往焉。然主人不习为詩，于詩家高下浅深，未尝涉其藩牆津涯，虽彊評要未抓着痒处。(集一〇九)

题刘澜乐府云：

刘君澜尝請方蒙仲序其詩以示余，余曰：詩当与詩人評之，蒙仲文人，非詩人，安能評詩？今又請余評其詞，余謝曰：詞当叶律，使雪儿春鶯輩可歌，不可以气为色，君所作未知叶律否？前輩惟耆卿美成尤工，君其往問之。(集一〇九)

诗人始能评诗，词人始能评词，推之文，也必文人始能评定。

十六　戴复古的詩家小学須知

戴复古的石屏集有楼钥、吳子良、包恢、赵以夫、眞德秀、赵蕃诸人序，知接触的人物很多，可是最有关系还是杨陆，特别是陆游。楼序云："登三山陆放翁之门，而诗学大进。"所作諸诗人会吳门诗云：

楊陆不再作，何人可受降！（石屏集，台州叢书本卷三）

读放翁先生剑南诗草云：

茶山衣鉢放翁詩，南渡百年无此奇。入妙文章本平澹，等閑言語变瑰琦。三春花柳天裁翦，历代兴衰世轉移。李杜陈黄題不尽，先生摹写一无遺。（集六）

可见近出杨陆，远希陈黄，仍是江西衣钵。邵武太守王子文，日与李贾严羽共观前輩一两家诗及晚唐诗，作论诗十绝。前三首云：

文章随世作低昂，变尽风騷到晚唐，举世紛紛吟李杜，时人不識有陈黄。

古今胸次浩江河，才比諸公十倍过，时把文章供戏謔，不知此体誤人多。

曾向吟边問古人，詩家气象貴雄渾，彫鎪太过伤于巧，朴拙惟宜怕近村。

还是惓恋江西，贬抑晚唐。第四、五两首云：

意匠如神变化生，笔端有力任縱横，須教自我胸中出，切忌随人脚后行。

陶写性情为我事，留連光景等儿戏，錦囊言語虽奇絕，不是人間有用詩。

重性情，卑留连光景，斤计诗的有用无用，又和早期的江西诗派不同。第七八两首云：

欲参詩律似参禪，妙趣不由文字傳，箇里稍关心有悟，发为言句自超然。

詩本无形在窈冥，網罗天地运吟情，有时忽得惊人句，費尽心机做不成。

同于严羽的以禅说诗，异于刘克庄的分别诗禅。第十首云：

草就篇章只等閑，作詩容易改詩难，玉經彫琢方成器，句要丰腴字要安。（集七）

又略同于杨万里的论文须修饰。总之，是揉杂南宋末年的各家见解，邵子文评为，"无甚高论"，并非苛责；戴复古自言"可作诗家小学须知"，倒也的当。

第八章　浙东派的事功文学説

一　北宋三派的揉合

浙东派以溫州永嘉郡四县——永嘉、瑞安、乐清、平阳为主。据周行己所作赵彦昭墓志銘，元丰作新太学，溫州同游者有蔣元中、沈彬老、刘元承、刘元礼、許少伊、戴明仲、赵彦昭、张子充。（浮沚集七）葉適題二刘文集后云：“永嘉僻远下州，見聞最晚，而九人者，乃能违志开道，蔚为之前。”（水心集廿九）近代孙詒让跋横塘集（横塘集，永嘉丛书本卷末），仍沿用其说。惟王十朋作何提刑墓志銘云：“永嘉自元祐以来，士风寖盛。……至建炎绍兴间，异才輩出，往往甲于东南。”（梅溪文集，后集廿九）稍有不同。但元丰止有八年，随后就是元祐，疑一样的指元丰諸先生。

九先生以及其稍后的永嘉諸老的学术，渊源于北宋三派。王十朋送叶秀才序云：

> 吾乡誼理之学甲于东南，……后学士子群居学校，战艺場屋，笔横渠而口伊洛者，紛如也。（后集廿九）

楼钥溫州进士題名序云：

> 河南二先生起千載之絕学以倡学者，此邦之士，漸被为多。（攻媿集五三）

周行己戴明仲墓志銘，亦特別提出“尝从洛阳程氏问学”，（浮沚集七）孙詒让横塘集跋更考知自蔣赵张三先生外，皆学于程门。

是和道学派有渊源。邓广铭先生浙东学派探源引浙江通志云:

> 永嘉先辈以經鳴者，淵源皆出于(龔)原。(天津益世报讀书周刊第十三期)

又指出周行己沈子正墓志铭，载子正永嘉人，父资使从学程颐、吕大临、龚原。(浮沚集七)龚原是王安石门人，同时周行己又尝与曾巩倡和，知和经术派也有关系。四库提要谓周行己开永嘉学术之源，而导流者则推薛季宣(卷一六〇，浪语集提要)。周行己寄鲁直学士云:

> 当今文伯眉阳苏，新詞的皪垂明珠：我公江南独繼步，名誉借甚傳淸都。……嬰儿失乳投母哺，当亦飲食瓊漿壺。(浮沚集，武英殿聚珍版叢书本卷八)

薛季宣作读东坡和靖节诗(浪语集，永嘉丛书本卷八)，跋东坡诗案(集六)，又作专咏东坡的诗(集十二)，知对议论派也颇崇依爱好。周行己上祭酒书云:"又二年读书，盖见古人文章，浩浩如涛波，纚纚如春华，于是乎而慕之。又学为古文，上希屈宋，下法韩柳。"全同于欧苏意念。但又说:"又二年读书，益见道理，于是始知圣人作书遗后世，在学而行之，非以为文也，乃知文人才士不足尚。"(集五)又转于周程意念。薛季宣作反古诗说(集三有序)，后易名诗性情说(集廿七有书后)。又作香奁集叙，称"韩偓为诗有情致，形容能出人意表"。(集卅)作李长吉集序，称"他人之诗，不失之粗，则失之俗，要不可谓之诗人之诗。长吉无是病也，其轻飏纤丽，盖能自成一家"。(集卅)更接近辞章了。

二　王十朋的論讚韓柳欧苏

薛季宣生绍兴四年(一一三四)，卒乾道九年(一一七三)，比他大二十二岁的王十朋(一一一二——一一七一)，乐清人，也是

永嘉派的重要人物。曾作论文说一篇，指出文章与年共进，老来每悔少作，（前集十九）并没有多少见解。有见解的没有标题论文，如策问先引刘禹锡序柳宗元文云："文章与时高下。"又引苏轼记韩文公碑云："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归于正。"然后发问云：

> 尝因二子之论而验其时与人，必刘子之言是信耶？则吐辞为经，如孟荀二子，实战国人也，战国之分裂能病天下之文，曷为不能病二子乎？必苏子之言是信耶？则战国二儒贤过韩愈，愈能起八代之衰，而二儒乃不能起战国之病何也？我国朝四叶文章最盛，议者皆归功于仁祖文德之治，与大宗伯欧阳公救弊之力；沉浸至今，文益粹美，远出乎正元元和之上，而进乎成周之郁郁矣，是果时耶人耶？二者若兼有之，与刘苏二子之说又皆不同，何也？愿与诸君辩之。（梅溪文集，四部丛刊本前集十四）

言外之意，显然时与人并重，用现在的话说来就是"时人二元论"。时人二元论是在解释文学潮流，至文学利病，他从作者的有无刚气理解。蔡端明文集序云：

> 文以气为主，非天下之刚者莫能之。古今能文之士非不多，而能杰然自名于世者亡几，非文不足也，无刚气以主之也。孟子以浩然充塞天地之气，而发为七篇仁义之书，韩子以忠犯逆鳞勇叱三军之气，而发为日光玉洁表里六经之文，故孟子辟杨墨之功不在禹下，而韩子觝排异端攘斥佛老之功又不在孟子下，皆气使之然也。若二子者，非天下之至刚者欤！（后集廿七）

这受苏辙影响是很明显的，实也受道学家影响。道学家的本体论是理与气，因此也每以理与气论文。不过王十朋改为刚气，便成为他的新说，而这种新说也正是永嘉派所氤氲。北宋三派的经术议论两派都有事功的意味，都有史学的倾向。传至永嘉，以时局及其他关系，事功与史学的意味益浓。时人二元论是史学

家的通常见解，刚气是事功家的应具性格，不过王十朋移来论文，便成为他的贡献。

王十朋的另一贡献，是：韩、柳、欧、苏的并提与分辨。绍兴庚午(一一五〇)七月上澣日，读东坡大全集于会趣堂，作读苏文云：

> 唐宋文章未可优劣，唐之韓柳，宋之欧苏，使四子并駕而争馳，未知孰后而孰先，必有能辨之者。
>
> 不学文則已，学文而不韓、柳、欧、苏，是观誦讀虽博(观字疑当在韓柳字上)，著述虽多，未有不陋者也。
>
> 韓欧之文，粹然一出于正，柳与苏好奇而失之駁；至論其文之工，才之美，是宜韓公欲推遜子厚，欧阳子欲避路放子瞻出一头地也。(前集十九)

前两则是并提，后一则是分辨。分辨的还有杂说云：

> 唐宋之文可法者四，法古于韓，法奇于柳，法純粹于欧阳，法汗漫于东坡；余文可以博观，而无事乎取法也。
>
> 賈誼賦过相如，楊子云不知也；柳子厚平淮西雅过韓退之，子厚自知之。子厚之文，溫雅过班固；退之之文，雄健过司馬子長；欧公得退之之純粹，而乏子厚之奇；东坡馳騁过諸公，簡严不及也。(前集十九)

读苏文的分辨兼及辞意，杂说的分辨专论文辞。自现在看来，这种并提与分辨，止是平庸的常识，并沒有新鲜的意义。要知这就是后人承受了这种意见，而王十朋首先在若干作家中，选提出来分析比较，作为楷模，当然应标出特书。至韩柳的"指意不同"，王十朋在策问也曾详论，(前集十五)兹从省不述。还有对于诗，他不满意"学江西诗者谓苏不及黄，又言韩欧二公诗乃押韵文耳"；特作读东坡诗，(后集十四)抗辯闡扬，兹亦不述。

三　吕祖谦的看史方法

寿春人吕祖谦(一一三七——一一八一)，全祖望改编的宋元学案自为东莱学案，黄宗羲的原本则标为永嘉学案之一，引朱熹谓永嘉之学，伯恭(祖谦字)兼君举(陈傅良)同父(陈亮)之长。吕祖谦与朱侍讲(熹)书云："所论永嘉文体一节，乃往年为学官时病痛，数年来深知其缴绕狭衲，深害心术，故每与士子语，未尝不以平正朴实为先。去夏与李仁甫议文体，政是要救此弊。"(东莱文集，金华丛书本卷三)知确为永嘉派，不过后来又趋向道学。与陈同父书云:

某窃謂若实有意为学者，自应本末幷举；若有体而无用，則所謂体者，必参差鹵莽无疑也。

又云:

詞章古人所不廢。(集五)

一面重视本末体用，一面又不废词章，所以要融合道学辞章，而归于史文。吴子良篔窗集续集序云："自元祐后，谈理者祖程，论文者宗苏，而理与文分为二。吕公(祖谦)病其然，思融会之，故吕公之文，早葩而晚实。"(篔窗集卷首)一点不错。吕祖谦著史说一卷，第一条言看通鉴之法云:

昔陈瑩中尝謂通鉴如藥山，隨取隨得。然虽是藥山，又須是会采；若不能采，不过博聞彊記而已。壺子問于列子曰:"子好游乎?"此可取以为看史之法。大抵看史見治則以为治，見乱則以为乱，見一事則止別一事，何取观史?当如身在其中，見事之利害，时之禍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当作如何处之。如此观史，学問亦可以进，知識亦可以高，方为有益。(集十九)

只说到学问知识，没有说到史学文学，但永嘉派的史学文学本来

最重学问知识，所以学问知识的方法，也就是史学文学的方法。吕祖谦编文海（就是宋文鉴），朱熹说“何补于治道于后学？”（东莱学案）恐怕正是针对吕祖谦希望有补于治道后学而发。吕祖谦太学策问云：

今日与諸君共訂者，將各发身之所实然者，以求实理之所在，夫岂角詞章記誦事无用之文哉？（集二）

“实理所在”的文章就是有补治道的文章，各家文集中自也不乏这种作品，但主要的还是史文，所以特提看史之法。朱熹说他“爱说史学”，（东莱学案）诚然。

四　陈傅良的批評經生文士

同样归依史文的还有瑞安陈傅良（一一三七——一二〇三），答贾端老云：

閑居須課一书，要当自古文书始，踰年便可到春秋之末，而及通鉴可也。

又云：

示諭看过左氏传，甚善。疏问数条，只是小小事，自未是穿貫五霸之变。五霸功罪未分，则东迁之不竟，与历年多处未見着落。春秋同是圣人經世之用，要其托史見义，以五霸为据案；而左氏合諸国之史，发明經所不书，以表見其所书，因五霸之兴衰，究观王道之缺，则战国之事起，周亡而秦汉出矣。此其大略。若夫精詳，非面莫究。太史公书又以接尙书春秋之統緒，而下逮秦汉，其用功略与左氏同；而不敢比拟春秋，是以变为紀傳书表耳。何当合并，共講其指。（止齋文集，四部叢刊本卷卅五）

“经世之用，要其托史见义”，是重视史文的原因，同时也是对史文的要求。就史文而论，他更重视正史。答薛子长云：

諭方閱南北二史，尽佳，然一代沿革，附見表志者，往往不收，未

免遺恨，則諸史要不可廢。自荀袁二紀以来，下逮司馬通鉴，大率欲祖左氏。諡左氏本依經为傳，縱橫上下，旁行溢出，无非解剝經誼，而非自为书。今乃合太史公紀世书傳，系之編年，則其間事辞膠轕，势必至得此遺彼。由此观之，类不如正史之悉也。（集三十六）

正史就是纪传体的史书。徐得之作左氏国纪，就编年改为国别，与纪传体相仿，陈傅良为之作序，称"学者诚得国纪伏而读之，因其类居而稽之经，某国事若干，某事书，某事不书，较然明矣"。（集四十）也是重视纪传体的言论。吕祖谦虽说编年纪传二体都不可废（史说），但止论读编年体的通鉴之法，弦外之音，自然是编年优于纪传。可见二人虽同重史文，但所重的史文并不同。吕祖谦的看重编年，是喜其"体统源流相承"；陈傅良的看重纪传，是恶编年的"事辞膠轕"，"得此遺彼"：喜恶不同，同是站在事功的观点。

吕陈二人还有一点小小的不同。朱熹说"伯恭于史分外子细，于经却不甚理会"。（东莱学案）陈傅良更进而援经入史。徐得之左氏国纪序云：

古者事言各有史。凡朝廷号令与其君臣相告语为一书，今书是已。被之弦歌，謂之乐章，为一书，今詩是已。有司臧焉，而官府都鄙邦国习行之，为一书，今仪礼若周官之六典是已。自天子至大夫士氏族傳序，为一书，若所謂帝系书是也。（集四十）

直然是说"六经皆史"，也就是说六经都是"圣人经世之用"，而托之以见义的。依据这种观点，自然不满意当时的经生，也不满意当时的文士。答刘公度云：

經生徇偏，何者为全？文士逐末，其本安在？（集卅八）

文章策云：

三代无文人，六經无文法。非无文人也，不以文論人也；非无文

法也，不以文为法也。是故文非古人所急也。古者道德同而风俗一，天下未尝惟文之尙也，学校进士无文教也，乡党选士无文科也，朝廷爵士无文品也。士之有文，皆涵养之素，而談笑之发，蹈履之熟，而議論之及，非有意也。是故虽其所出，而非其所为；虽其所有，而非其所知。文之在天下，郁郁矣。

又云：

道盛則文俱盛，文盛則道始衰矣。射策之晁錯，不如木强之申屠；談經之公孙，不如戇愚之汲黯。自汉以来，甚矣文之日盛，而士之俗日漓，人才之日乏，而国家之日不理也；华藻之厚，而忠信之薄也；詞辯之工，而事业之陋也；学問之該，而器識之淺也。吾不意夫文之为天下患如此也！汉之文，楊雄其尤，美新之作，庸人耻之；唐之文，韓愈其尤，諛墓之謅，在当世固不免。嗚呼，他何望哉？(集附录)

答刘公度书自然是经生文士同样非斥，文章策好象止非文士，但举例及于谈经之公孙，则经生亦在非斥之例。南宋的经生大半是道学家，文士当然是辞章家，反对经生文士就是反对道学家和辞章家。

不过他反对道学家，可也接受了道学家的意见。如说："道盛则文俱盛，文盛则道始衰矣。"所不同者，道学家的道指心性而言，他则重在理国材能与事业器识。他反对辞章家，也接受了辞章家的意见。如答丁子齐，劝他"磨礲乎事业，奋发乎文章"。并且说："古之大人，未有不兼通此而后可以应天下之故者。"(集卅六)不同者，辞章家专重文章，他则要植基于"磨礲事业"。

五　陈亮的文章責任說

浙东派的另一主力是永康，永康的领袖人物是陈亮，黄宗羲特撰永康学案(全祖望改为龙川学案)，但朱熹则一样视为永嘉

之学。陈亮送吴允成运干序云：

往三十年时，亮初有识知，犹记为士者必以文章行义自名，居官者必以政事书判自显，各务其实而极其所至，各有能有不能，卒亦不敢强也。自道德性命之说一兴，……于是天下之士，始丧其所有，而不知适从矣。为士者耻言文章行义，而曰尽心知性；居官者耻言政事书判，而曰学道爱人。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龙川文集，四部备要本卷十五）

这显然是攻击道学，提倡辞章。不过他的提倡辞章，是与行义连举，与政事书判并称，仍是站在事功的立场。

惟其趋近辞章，提倡辞章，所以他的文学意见较周、薛、吕、陈都丰硕。有人认为当时的文章，尤其是科举文，纵弛浮浅，应改变文格。陈亮作变文法云：

古人重变法，而变文尤非变法所当先也。

这就是说法是不好轻易改变的，而变文更要在变法之后。从理论上言之：

天下之士，岂不欲自为文哉？举天下之文，而皆指其不然，则人各有心，未必以吾言为然也。然不然之言，交发并至，而论者始纷纷矣。纷纷之论既兴，则一人之力，决不能胜众多之口。此古人所以重变法，而尤重于变文也。

可见改变文格，不是一二人的力量所能奏效。从例证上言之：

夫文弊之极，自古岂有踰于五代之际哉？卑陋萎弱，其可厌甚矣。艺祖一兴，而恢廓磊落，不事文墨，以振起天下之士气，而科举之文，一切听其所自为，有司以一时尺度律而取之，未尝变其格也。其后柳仲涂以当世大儒，从事古学，卒不能麾天下以从己。及杨大年刘子仪因其格而加以瑰奇精巧，则天下靡然从之，谓之崐体。穆修张景专以古文相高，而不为骈俪之语，则亦不过与苏子美兄弟唱和于寂寞之滨而已。故天圣间，朝廷盖知厌之，而天下之士，亦终未能从也。其后

欧阳公与尹师鲁之徒，古学既盛，祖宗之涵养天下，至是盖七八十年矣。故庆历间，天子慨然下诏书，风厉学者以近古，天下之士，亦翕然丕变，以称上意。于是胡翼之、孙复、石介以经术来居太学，而李泰伯梅尧臣辈又以文墨议论游泳于其中，而士始得师矣。当是时，学校未有课试之法也，士之来者至接屋以居而不倦，太学之盛，盖极于此矣。乘士气方盛之际，虽取三代两汉之文，立为科举取士之格，奚患其不从？此则变文之时矣，艺祖固已遂知其如此矣。然当时诸公，变其体而不变其格，出入乎文史，而不本之以经术，学校课士之法，又往往失之太略，此王文公所以得乘间而行说于熙宁也。

可见必须法变而后文格始变。现在的文格，纵弛浮浅，"议者思所以变之，其意非不美矣，而其事则艺祖之所难，而嘉祐之所不及也。三年课试之文，四方场屋之所系，此岂可一朝而变乎？"那末怎样办呢？陈亮续云：

昔庆历有胡翼之学法，熙宁有王文公学法，元祐有程正叔学法，今当请诸朝廷，参取而用之，不专于月书季考，以作成大学之士，以为四方之表仪，则祖宗之旧可以渐复，岂必遽变其文格以惊动之哉？（集十一）

这是因为陈亮是事功家，很看重政治，也很看重历史，由是对于纵弛浮浅的文章，主张请诸朝廷，积极诱导，不必消极变革；至欲以一二人的力量改变文格，他认为绝对的无济于事。他不附合议者的改变文格，并不是赞成当时的纵弛浮浅的文章，特别是科举的骈俪之文，尤为卑薄。有吴叔异者，以自己所作骈俪之文赠陈亮，陈亮复书云：

亮闻古人之于文也，犹其为仕也，仕将以行其道也，文将以载其道也。道不在我，则虽仕何为？虽有文，当与利口者争长耳。韩退之原道，无愧于孟荀，而终不免以文为本，故程氏以为倒学；况其止于驰骋语言者，固君子所不道，虽终日哓哓，欲以陵轹一世，有识者固俛首

而笑之耳，岂肯与之辩论是非哉？君子不成人之恶，岂愿其至此？然而彼既不可晓，虽与之辩论，如水投石，而又甚焉。何者？水投石，不入而止尔；人之难晓，必且取辱，是以君子不为也。（集廿一）

喜笑怒骂，一至于此，则对于骈俪文当然是极端非斥。非斥骈俪文，相反的便称赞古文。他就欧阳修的文中选出一百三十篇，题名欧阳文粹，作书后云：

公之文根乎仁义，而达之政理，盖所以翼六经，而载之万世者也，虽片言半简，犹宜存而弗削，顾犹有所去取于其间，毋乃诵公之文，而不知其旨，敢于犯是不韪而不疑也！初天圣明道之间，……其文犹袭五代之卑陋，中经一二大儒，起而麾之，而学者未知所向，是以斯文独有愧于古。天子慨然下诏书，以古道饬天下之学者，而公之文遂为一代师法。未几而科举禄利之文，非两汉不道，于是本朝之盛极矣。公于是时，独以先王之法度未尽施于今，以为大阙。其策学者之辞，慇懃切至，问以古今繁简浅深之宜，与夫周礼之可行与不可行。而一时习见百年之治，若无所事乎此者，使公之志弗克遂伸。……迄于宣政之末，而五季之文，靡然遂行于世，然其间可胜道哉！二圣相承，又四十余年，天下之治，大略举矣。而科举之文，犹未还嘉祐之盛，盖非独学者不能上承圣意，而科制已非祖宗之旧，而况上论三代？始以公之文，学者虽私诵习之，而未以为急也。故予姑掇其通于时文者，以与朋友共之。由是而不止，则不独尽究公之文，而三代两汉之书，盖将自求之而不可御矣。先王之法度犹将望之，而况于文乎？则其犯是不韪，得罪于世之君子而不辞也。虽然，公之文雍容典雅，纡余宽平，……读之蔼然，足以得祖宗政治之盛，其关世教，岂不大哉？（集十六）

一则说欧阳修的文章，“根乎仁义而达之政理”。再则说欧阳修的志业，“独以先王之法度，未尽施于今”。三则说读文粹，“足以得祖宗政治之盛”。称颂揄扬，都归本于政教事功，可见他是以政教事功的观点评赞欧文，以政教事功的责任托于文章。

以政教事功的责任托于文章，最有厚望的是论，陈亮书作论法后云：

大凡論不必作好語言，意与理胜，則文字自然超众。故大手之文，不为詭异之体，而自然宏富；不为險怪之辞，而自然典丽；奇寓于純粹之中，巧藏于和易之內。不善学文者，不求高于理与意，而务求于文彩詞句之間，則亦陋矣。故杜牧之云："意全胜者，辞愈朴而文愈高；意不胜者，辞愈华而文愈鄙。"昔黄山谷云："好作奇語，自是文章一病，但当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順，文章自然出群拔萃。"（集卷十六）

幷沒有说出作论法的是何人，可能就是陈亮自己。俞成萤雪丛说亦引列陈亮论作文之法（稗海本卷上），知他对作文作论的方法，颇重视，也有研究。

六　葉適的教事說

比陈亮更攻击道学，更趋向辞章的是葉適（一一五〇——一二二三），永嘉人，不止是永嘉派的集大成者，也是浙东派的集大成者，特别是关于文学方面。吳明辅问"道学名实眞伪"，葉適答书引列诗书两经，谓"皆以学致道，而不以道致学"。又云：

道学之名，起于近世儒者，其意曰"举天下之学皆不足以致其道，独我能致之"，故云尔。其本稍差，其末大弊矣。（水心文集，四部叢刊本卷廿七）

这是攻击道学。罗袁州文集序云：

夫文如珠玉焉，人之所挟以自貴重也。蔚豹之泽必霧隐，孔鸞之舞必日中，快讀而疾愈，爭傳而紙貴，烏有輕涸瓦石，芒芒不决耶？（集十二）

这是趋重辞章。陈亮已将政教事功的责任托于文章，但鲜明的说文章应以政教事功为职志的是葉適。贈薛子长云：

讀书不知接統緒，虽多无益也；为文不能关教事，虽工无益也；篤

行而不合于大义，虽高无益也；立志不存于忧世，虽仁无益也。（集廿九）

文章以教事为职志，诗也要矩于教。跋刘克逊诗云：

自有生人，而能言之类，詩其首矣。古今之体不同，其詩一也。孔子誨人詩无庸自作，必取中于古，畏其志之流，不矩于教也。后人詩必自作，作必奇妙殊众，使忧其材之鄙，不矩于教也。水为沅湘，不專以清，必达于海。玉为珪璋，不專以好，必荐于郊庙。二君（克庄克逊）知此，則詩虽极工，而教自行，上規父祖，下率諸季，德艺兼成，而家益大矣。（集廿九）

“关教事”的诗文要基于理，因此陈亮说作论要理胜，叶適更说文章当以义理为主。周南仲文集后序云：

夫文者言之衍也。古人約义理以言，言所未究，稍曲而伸之尔。其后俗益下，用益浅，凡随事逐物，小为科举，大为典冊，虽刻濃損华，然往往在义理之外矣，岂所謂文也？君子于此寄焉則不足以訓德，学者于此习焉則足以害正，力且尽而言不立，去古人不愈远乎？（集十二）

又于习学记言讚吕祖谦文鉴云：

按上世以道为治，而文出于其中。战国至秦，道統放灭，自无可論。后世可論惟汉唐。然既不知以道为治，当时見于文者，往往訛杂乖戾，各恣私情，极其所到，便为雄長，类次者复不能归一，以为文正当尔，华忘实，巧伤正，蕩流不反，于义理愈害而治道愈远矣。此书刊落浩穰，百存一二：苟其义无所考，虽甚文不录；或于事有所該，虽稍質不廢；鉅家鴻笔，以浮浅受黜；稀名短句，以幽远見收。合而論之，大抵欲約一代治体归之于道，而不以区区虛文为主。（敬乡楼叢书本卷四七）

表面看来，曰“道”，曰“义理”，好象同于道学家，但道的标准是义有所考，事有所该，所重在“用”，和道学家的所重在“体”，

大相迳庭。

七 文肆诗切说

教事是诗文的内容，至形式，叶适主张文肆诗切。观文殿学士知枢密院事陈公文集序云：

> 经欲精，史欲博，文欲肆，政欲通。（集十二）

"文欲肆"，所以反对拘限四六。奏议中的宏词一篇云：

> 若乃四六对偶，铭檄赞颂，循沿汉末，以及宋齐，此真两汉刀笔吏能之而不作者，而今世谓之奇文绝技，以此取天下士而用之于朝廷，何哉？自词科之兴，其最贵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为陋而无用。士大夫以对偶亲切、用事精的相夸，有以一联之工，而遂擅终身之官爵者。此风炽而不可遏，七八十年矣。前后居卿相显人，祖父子孙相望于要地者，率词科之人也。其人未尝知义也，其学未尝知方也，其才未尝中器也，操纸援笔以为比偶之词，又未尝取成于心，而本其源流于古人也，是何所取而以卿相显人待之，相承而不能革哉？（集三）

依据这种观点，古代的文章最称赞建安，宋代的文章最称赞元祐，当代的文章最称赞陈亮。题陈寿老文集后云：

> 建安中，徐、陈、应、刘，争饰词藻，见称于时，识者谓两京余泽，由七子尚存。自后文体变落，虽工愈下，虽丽愈靡，古道不复庶几，遂数百年。元祐初，黄、秦、晁、张，各擅毫墨，待价而显，许之者以为古人大全，赖数君复见。及夫纷纭于绍述，埋没于播迁，异等不越宏词，高第仅及科举，前代遗文风流泯绝，又百有余年矣。（集二十九）

龙川集序云：

> 同甫（陈亮）既修皇帝王霸之学，上下二千余年，考其合散，发其秘藏，见圣贤之精微，常流行于事物，儒者失其指，故不足以开物成务。其说皆今人所未讲，朱公元晦意有不与，而不能夺也。（集十二）

又作书后，说陈亮的文章："海涵泽聚，天霁风止，无狂浪暴流，而

回旋起伏，縈映妙巧，极天下之奇险。”（集廿九）大概陈亮是他的同调学侣，黄、秦、晁、张是他们所从出。陈亮三国纪年论建安七子云：“汉兴，文章浑厚典雅，最为近古，武昭以后衰矣，……至若建安七子之风概似矣。”（陈集十二）和葉適的论调正是肸蠁相通。

“文欲肆”，不可“以对偶亲切相夸”；诗欲精，不可“汗漫广莫”。徐斯远文集序云：

> 庆历嘉祐以来，天下以杜甫为师，始黜唐人之学，而江西宗派章焉。然而格有高下，技有工拙，趣有浅深，材有大小，以夫汗漫广莫，徒枵然从之，而不足以充其所求，曾不如脰鸣吻决，出豪芒之奇，可以运转而无极也。故近岁学者已复稍趋于唐，而有获焉。（集十二）

这是反对汗漫广莫。徐道暉墓志銘云：

> 盖魏晉名家多发兴高远之言，少驗物切近之实。及沈約謝朓永明体出，士爭効之，初犹甚艰，或仅得一偶句，便已名世矣。夫束字十余，五色彰施，而律吕相命，岂易工哉？故善为是者，取成于心，寄妍于物，融会一法，涵受万象，豨苓桔梗，时而为帝（帝字原毁，据永嘉叢书本补），无不按节赴之，君尊臣卑，宾順主穆，如丸投区，矢破的，此唐人之精也。然厌之者，謂其纖碎而害道，淫肆而乱雅，至于廷設九奏，广袖大舞，而反以浮响疑宫商，布縷繆組綉，則失其所以为詩矣。然則发今人未悟之机，四百年已廢之学，使后复言唐詩者自君始，不亦詞人墨卿之一快也！（集十七）

题刘潛夫南嶽诗藁云：

> 往岁徐道暉諸人，擺落近世詩律，斂情約性，因狹出奇，合于唐人，夸所未有，皆自号四灵云。于时刘潛夫年甚少，刻琢精丽，語特惊俗，不甘为雁行比也。今四灵丧其三矣，冢鉅淪沒，（冢原作家，据永嘉叢书本校改），紛唱迭吟，无复第叙。而潛夫思益新，句愈工，涉历老練，布置闊远，建大將旗鼓，非子孰当？昔謝显道謂陶冶尘思，模写

物态，曾不如颜谢徐庾留连光景之诗。此论既行，而诗因以废矣。悲夫！潜夫以谢公所薄者自鉴，而进于古人，不已参雅颂，轶风骚可也，何必四灵哉？（集廿九）

前者赞奖四灵，后者又说"何必四灵"，抑扬不同，同是提倡精切。有刘子至者，致书叶适，鼓吹"天机自动，天籁自鸣，不待琱琢"，而至"浑脱圆成"地位。叶适答书云："子至得从来下功深之力，方有今日，第其间尚有短乏未坚等，滓垢未明净者，以下功犹未深也。若便要放下，随语成章，则必有退落，反不逮琱刻把持者矣，切须审详。"（集廿七）也是反对汗漫，提倡精切。

八 楼钥的和平正直说

永嘉永康以外的鄞人楼钥（一一三七——一二一三），宋元学案列晦翁私淑，但引袁容延祐四明志，永嘉王和叔楫亦尝以经世之学授之。又冯云濠引行状，官永嘉时，闻薛季宣深于兵略，屡请问焉。（宋元学案七十九，邱刘诸儒学案）据知不止籍隶浙东，学问的渊源也出于浙东一派，虽然也私淑朱熹。他的攻媿集有答朱晦庵书，自称"尚庶几在弟子之列"。（集六十六）但祭薛寺正（季宣）也说，"尝登公之门。"祭吕太史（祖谦）也说，"登公之门，尝闻余论之一二。"（并集八十三）是对朱熹止是私淑，对薛季宣吕祖谦才是亲炙，祭薛文特别标出"施之政事，著之文章"，也正是浙东派的意念。答綦君（更生）论文云：

来书谓长江东流不见其怪，瞿唐滟滪之所迫束而后有动心骇目之观，诚是也；然岂水之性也哉？水之性本平，彼遇风而纹，遇壑而奔，浙江之涛，蜀川之险，皆非有意于奇变，所谓湛然而平者固自若也。滟滪之立中流，或谓其乃所以为平，此言尤有深致。故乐之未亡也，与天地同和，可以感发人之良心；而其既亡也，史纪其精者，谓能使人

叹息悽怆至泣下霑襟者，然后可以为声之妙，曾不知哀以思者乃亡国之音，所谓安以乐者何在耶？清庙之瑟，一唱而三叹，其亦异于后世之乐矣。妄意论文者，当以是求之，不必惑于奇，而先求其平。

以水喻文似本于苏洵的仲兄字文甫说，（详六章三节）历险求平似本于张耒的答李推官书，（详六章八节）这更可知他和“护苏氏尤力”的吕祖谦关系尤深，所以宗仰相同。不过张耒的企响是“不求奇而奇至”，楼钥的企响是“不必惑于奇而先求其平”，意念并不一致。苏轼与鲁直云：“凡人文字，务使平和，至足余溢为奇怪，盖出于不得已。”（东坡续集卷四）楼钥的意见似与相近，但也不全同。一则苏轼视奇怪为“至足余溢”，楼钥视奇怪为诗文之病。二则苏轼求之文字，楼钥索之心平气和。答綦君论文书又云：

唐三百年，文章三变而后定，以其归于平也。而柳子厚之称韩文公乃曰文益奇，文公亦自谓怪怪奇奇，二公岂不知此，盖在流俗中以为奇，而其实则文之正体也。宋景文公知之矣，谓其粹然一出于正。至其所自为文，往往奇涩难读，岂平者难为工，奇者易以动，文人习气终未免耶？典谟训诰无一语之奇，无一字之异，何其浑然天成如此！文人欲高一世，或挟战国策士之气以作新之，诚可以倾骇观听，要必有太过处。呜呼，如伊川先生之易传，范太史之唐鉴，心平气和，理正词直，然后为文之正体，可以追配古作，而遽读之者未必深喜，波平水静，过者以为无奇，必见高崖悬瀑而后快。韩文公之文非无奇处，正如长江数千里，奇险时一间见，皆有触而后发；使所在而然，则为物之害多矣。故古文之感人如清庙之瑟。若孟郊贾岛之时穷而益工者，悲忧憔悴之言，虽能感切，不近于哀以思乎！（攻媿集，四部丛刊本卷六六）

北海先生文集序亦云：

夫唐文三变，宋之文亦几变矣，止论骈俪之体，亦复屡变。作者争名，恐无以大相过，则又习为长句，全引古语，以为奇倔，反累正气；

况本以文从字顺，便于宣读，而一联或至数十言者，识者不以为善也。（集五一）

这又象是本于王禹偁的反难尚易，但也不尽同；王禹偁是在提倡易道易晓，（详一章五节）楼钥是在提倡“心平气和，理正词直”。易道易晓纯是修辞问题，“心平气和，理正词直”则与持身立言有关。答杜仲高（旃）书云：

> 杜之诗，韩之文，如王右军之书，皆古今一人而已。近世士大夫水墨积习之工类不甚至，唐人多能书，欧虞褚薛是其尤颖异者，疲精竭神，各自名家，终不足以望右军阃域，若诗与文可以力取而强进之耶？诋之为村夫子者，固自难言。然王荆公以为与元气侔，盖极言诗之高致，若曰“所以拜公象，再拜涕泗流”，正为茅屋为秋风所破，叹一诗用意之大。东坡谓“自是稷契等辈口中语”，正谓其语似稷契辈尔。唐史赞之：“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皆极口称其诗。工部之诗真有参造化之妙，别是一种肺肝，兼体众体，间见层出，不可端倪，忠义感慨，忧世愤激，一饭不忘君，此其所以为诗人冠冕。后人著意形似，亦有可杂之诗中而不可辨者，至其奔逸绝尘，虽诸名公，恐未免瞠乎若后。此难与不知者道也。（集六六）

也是在就杜诗的能成为“古今一人”，说明不在“著意形似”，而在有“忠义感慨，忧世愤激”的“一种肺肝”。换言之，也是在修身立言。“著意形似”的模杜诗的是江西诗派，此言可能是针对江西诗派而发，浙东派本来是反对江西诗派的。至归重修身立言，无疑的与私淑朱熹亲炙薛吕有关。吕祖谦曾注唐鉴，并就原本十二卷扩编为二十四卷，当然推许爱好。朱子语类卷百三十九载一日说作文云：“不必著意学如此文章，但须明理，理精后文字自典实。伊川晚年文字如易传，直是盛得水住。”可见他的称赞易传唐鉴，也大概是接受的朱吕的意见。

九　四灵的論詩碎唾

葉適贊许的四灵——徐照、翁卷、徐璣、赵师秀。徐照字道暉，一字灵暉，翁卷字续古，一字灵舒，徐璣字致中，号灵渊，赵师秀字紫芝，号灵秀，皆永嘉人。他们刻鏤诗律，却沒有著为诗论，零咳碎唾，一见于葉適徐璣墓志銘，引徐璣与徐照、翁卷、赵师秀议曰：

昔人以浮声切响，單字只句計工拙，盖风騷之至精也。近世乃連篇累牘，汗漫而无禁，岂能明家哉？（水心文集廿一）

二见于刘克庄野谷集序，引赵紫芝论五言律体曰：

一篇幸止四十字，更增一字，吾未如之何矣！（后村大全集九四）

三见于韦居安梅磵詩话，引杜小山问句法于赵紫芝，赵答云：

能飽喫梅花数斗，胸次玲瓏，自能作詩。

片片断断，见不出具体的意见，但重锤鍊，反汗漫，总可借窥一二。

十　陈耆卿吳子良的文学三要

车若水脚气集引王象祖云：“水心持作者之权，一时门人孰为升堂，孰为入室，晚得陈篔窗而授之柄。”是葉適的文学传于陈篔窗，名耆卿，临海人。上楼內翰书云：“窃以文于天地间，为物最钜。”（篔窗集，四库珍本本卷五）但自序篔窗集却云：“今而后当涵浸乎义理之学；詞章之习，不惟不敢，亦不暇。”（集首）徬徨却顾，沒有铸成坚定的意见。铸成坚定的意见的倒是门人吳子良。吳子良亦临海人，十六从学陈耆卿，廿四又从学葉適（篔窗集续集序）。跋陈耆卿篔窗集云：

为文大要有三，主之以理，張之以气，束之以法。篔窗先生探周

程之旨趣，貫欧曾之脉絡，非徒工于文者也。（篔窗集末）

序篔窗集续集云：

文有統緒，有气脉。統緒植于正，而綿延枝派旁出者无与也；气脉培之厚，而盛大华藻外飾者无与也。……宋南渡之文，以吕、葉倡，接之者，寿老（耆卿）其徒也。……不幸吕公不及見，而葉公晚見之，惊詫起立，为序其所著論孟紀蒙若干卷，篔窗初集若干卷，以为学游謝而文晁張也。（篔窗集卷首）

三要之说，又见于所作林下偶谈卷二，知是他的坚定的意见。理是周、程、游、谢的义理，法是欧、曾、晁、张的脉络，气是宋人的常谈，所以这种意见正是得之陈耆卿，而陈耆卿又得之吕祖谦、葉適。（参三节，六节）林下偶谈引葉、陈的言论最多，也可为旁证。

基于三要的意见，自然不会讚成刻鏤精奇。偶谈卷二云：

文虽奇，不可損正气；文虽工，不可掩素質。（宝顏堂秘笈本）

因此颇非薄四灵，偶谈卷四云：

水心之門，赵师秀紫芝、徐照道暉、璣致中、翁卷灵舒，工为唐律，專以賈島、姚合、刘得仁为法，其徒尊为四灵，翕然傚之，有八俊之目。水心广納后輩，頗加称奨，其詳見徐道暉墓志，而末乃云："尙以年不及乎开元元和之盛，而君既死。"蓋虽不沒其所長，而亦終不滿也。

又引葉適王木叔诗序云：

木叔不喜唐詩，聞者皆以为疑。夫爭妍斗巧，极外物之意态，唐人所長也；及要其終，不足以定其志之所守，唐人所短也。木叔之評，其可忽諸。

又引跋刘潛夫诗卷，（见七节）并据加案语云：

此跋既出，为唐律者頗怨，而后人不知，反以为水心崇尙晚唐者，誤也。水心称当时詩人可以独步者，李季章赵蹈中耳。近时学者歆艳四灵，剽窃模仿，愈陋愈下，可叹也哉！

作葉为说诠释，可以说是非参半：葉適的主要思想是不赞成江西末流的汙漫广莫，希望矫以精切，而四灵的规模晚唐，恰与相合，所以“颇加称奖”。但葉適还要诗“矩于教”，四灵则止是流连光景，所以又告诉作诗者，“参雅颂，軼风骚”，“何必四灵”？这可见葉適有褒有贬，而吳子良则释为全然讥斥；这是吳子良的意旨，不是葉適的意旨。偶谈卷三云：“大序云，亡国之音哀以思。退之论魏晉以降以文鸣者，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近世诗人爭效唐律，就其工者论之，即退之所谓魏晉以降者也，而况其不能工者乎？”也是在讥斥诗人的爭效唐律，那末首效唐律的四灵当在讥贬之列。

第九章　理学派的詩文道流說

一　朱熹的家学——朱松的詩文軌道說

道学派到南宋分为理心两派，对于诗文，理学派主张从道流出，心学派主张从心发出。

理学派的领袖是朱熹（一一三〇——一二〇〇）。朱熹的走向道学，与他的家学有关。他的父亲名松，著韦斋集十二卷，中有上赵丞相劄子（原脫子字）云：

> 某自儿童知喜文艺。年及冠，去場屋，未尝一日而舍笔砚也。……行年二十七八，聞河南二程先生之余論，皆圣賢未发之奥，始捐旧习，袚除其心，以从事于致知誠意之学，虽未能窺其藩籬，然自是所为文，視十年之前，无十之三四。（韦齋集，四部叢刊本卷七）

这可见朱松本来致力文艺，到后来得闻二程子余论，觉得文艺去道很远，"始捐弃旧习"，由是对于诗文，企望能与道接近。上赵漕云：

> 蓋尝以为学詩者，必探賾六經以浚其源，历观古今以益其波，玩物化之无极以穷其变，窺古今之步驟以律其度。虽知其然，而病未能也。窃尝叹夫自詩人以来，莫盛于唐，讀其詩者皆粲然可喜，而考其平生，鲜有軌于大道而厌足人意者；其甚者曾与閭閻儿童之見无以异。此风也，至唐之季年而尤剧，使人鄙厌其文，惟恐持去之不速。夫詩自二南以降，三百余篇，先儒以为二南周公所述，用之乡人邦国，以风动一世；其余出于一时公卿大夫，与夫閭巷匹夫匹妇之所作，其

辞抑揚反复，蹈厉頓挫，极道其忧思佚乐之致，而卒归之于正，圣人以是为先王之余泽，犹可見其髣髴，足以聳动天下后世，故删而存之，至今列于六經，焯乎如日月。

又云：

唐李杜出而古今詩人皆廢，自是而后，賤儒小生，膏吻鼓舌，决章裂句，青黃相配，組綉錯出，穷年沒齿，求以名家，惴惴然恐天下之有軋己以取名者。其甚者恃才以犯上，罵坐以貽讒，擯斥顚沛，足迹相及，此何为者邪？嘗聞夫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嗟夫！圣人之意，其可思而知也。（集九）

诋毁唐代诗人"鲜有轨于大道"，称述诗三百的"思无邪"，希望诗与道接近是明显的。诗尙如此，文不言可知。松有弟名槹，著玉瀾集一卷，附刻韦斋集后，尤袤跋云："韦斋之子南康使君（熹），今又以道学倡，其诗源远而流长矣。"是朱熹受家学影响，尤袤早已说过了。

二　朱熹的貢献——道文一貫說

程子站在道的立场反对诗文，说诗文是害道的；（详四章五节）朱熹也站在道的立场，但不反对诗文，而包举诗文，说道文是一贯的。有汪尙书者，致书朱熹，"语及苏学，以为世人读之，止取文章之妙，初不于此求道"。朱熹答云：

夫学者之求道固不于苏氏之文矣。然旣取其文，則文所述有邪有正，有是有非，是亦皆有道焉，固求道之所不可不讲也；讲去其非，以存其是，則道固于此乎在矣，而何不可之有？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复議其理之是非，則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为道；且文而无理，又安足以为文乎？蓋道无适而不存者也，故即文以講道，則文与道兩得而一以貫之，否則亦將兩失之矣。（与汪尙书，朱文公文集，四部叢刊本卷卅）

答吕伯恭亦云：

> 夫文与道果同耶异耶？若道外有物，则为文者可以肆意妄言而无害于道。惟夫道外无物，则言而一有不合于道者，则于道为有害，但其害有緩急淺深耳。（集卅三）

这都是在说明道文一贯，不可分开。因此他不赞成李汉的贯道说，也不赞成欧阳修的俱道说。他的弟子陈才卿问韩文李汉序的"文者贯道之器"一句甚好，他说：

> 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岂有文反能貫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吃飯时下飯耳；若以文貫道，却是把本为末，以末为本，可乎？（朱子語类一三九）

又驳俱道说云：

> 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于道，所以发之于文者皆道也。三代圣賢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今东坡之言曰，"吾所謂文必与道俱"，则是文自文，道自道，待作文时旋去討箇道来放入里面，此是他大病处。（前书卷同）

所引东坡语，实出欧阳修。（详六章三节）由反对李汉欧阳修的话看来，可以知他的道文一贯的理论是：从性质上说，"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部分不同，但同为一体。从表现上说，"文是从道中流出"，当然与道为一贯。总之，道与文是统一的，不是分立的。这和古文家的韩欧自然不同，和道学家的周程也更不同。我们必先分析清楚，然后才能理解他的旨趣，认识他的贡献——在文学理论上的贡献。

朱熹和韩欧不同的止是量的分寸问题。在朱熹看来，视文为"貫道之器"，便是临作文时才以文貫道；视"文与道俱，便是临作文时才讨道放入：都是文自文，道自道，道文沒有统一。和周程的不同倒是质的差别问题，尽管他宗仰周程，称述周程。最有

趣的有力证据就在朱熹的注周子通书文辞章云:

> 或疑有德者必有言，则不待艺而后其文可傳矣，周子此章似犹别以文辞为一事而用力焉何也?曰:人之才德偏有長短，其或意中了了，而言不足以发之，則亦不能傳于远矣。故孔子曰，"辞达而已矣"。程子亦言，"西銘吾得其意，但无子厚笔力不能作耳"。(周濂溪集，正誼堂叢书本卷六)

周书归结于"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当然是重道德，轻文辞;(详四章四节)朱注说"或意中了了，而言不足以发之，则亦不能传远矣"，显然是不忽视文辞。不错，朱熹曾说古文时文，都"如浮声美色，不敢一识其趣"。(答徐载叔，集五六)又说:"近世诸公作诗费工夫要何用?元祐时有无限事合理会，诸公却尽日唱和而已。今言诗不必作，且道恐分了为学工夫，然到极处当自知作诗果无益。"(语类一四〇)但作楚辞集注，作韩文考异，集中有诗词十卷，语类中有论文两卷，书牍序跋有很多的研讨诗文的文章，在在表示并不轻视。这就是因为周程视道与文为对立的，一个人对诗文的用力愈多，对道的体认便愈疏，既站在道的立场，当然就反对作文吟诗;朱熹视道与文为统一的(他的名词叫一贯)，道流为文，文亦含道，所以就求学而言，应当"即文以讲道"，就作文而言，应当"从道中流出"。

三　說出的詩文与做出的詩文

"道是根本，文是枝叶"，枝叶枯茂，全看根本浅深，所以作文但须明理，不必研钻华采。语类云:

> 今人学文者，何曾作得一篇，枉費許多气力;大意主乎学問以明理，則自然发为好文章。詩亦然。(卷一三九)

> 一日說作文曰:不必著意学如此文章，但須明理，理精然后文自

典实。(卷同)

> 貫穿百氏及經史，乃所以辨驗是非，明白义理，岂特欲使文詞不陋而已。义理既明，又能力行不倦，则其存諸中者，必也光明四达，何施不可？发而为言，以宣其心志，当自发越不凡，可爱可傳矣。今执笔以习研鑽华采之文，务悦人者，外而已，可耻也矣。(卷同)

反之，文章的不能典实明白，就是由于见理不精。语类云：

> 今人作文，皆不足为文，大抵專务节字，更易新好生面辞語，至說义理处，又不肯分曉。前輩欧苏諸公作文，何尝如此？圣人之言，坦因明白，因言以明道，正欲使天下后世由此求之；使圣人立言要教人难曉，圣人之經，定不作矣。若其义理精奥处，人所未曉，自是其所見未到耳，学者須玩味深思，久之自可見。何尝如今人欲說又不敢分曉說，不知是甚所見，毕竟是其自家所見不明，所以不敢深言，且鶻突說在里。(卷同)

重道重行，仍是北宋道学家的衣鉢，以理释道，以文的明白典实由于理精，鶻突由于见理不明，则是朱熹的新说。与陆子静书云："凡有形有象者卽器也，所以为是器之理者则道也。"(集卅六)本来他已由道学家进为理学家，当然以理释道，而作为文学所从出的道也当然是理。

由明理而流出来的文章，是说出的，不是做出的。语类载有人"问离骚卜居篇內字"，朱熹云：

> 字义从来曉不得，但以意看可見。如"突梯滑稽"，只是軟熟迷迎，随人倒，随人起底意思。如这般文字，更无些小窒碍，想只是信口恁地說，皆自成文。林艾軒尝云，"班固楊雄以下皆是做文字，已前如司馬迁司馬相如等只恁地說出"。今看来是如此。古人有取于"登高能賦"，也須是敏，須是会說得通暢。如古者或以言揚說得也是一件事，后世只是紙上做。如就紙上做，則班楊便已不如已前文字。当时如苏秦張仪都是会說，史記所載，想皆是当时說出。(卷一三九)

另一条也说：

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説，而意自長；后人文章，务意多而酸澀。如离騷初无奇字，只恁説將去，自是好。后来如黄魯直，恁地著力做，却自是不好。（卷同）

说出来的文章之所以"无些小窒碍"，因为是"从此心写出"，"从道中流出"；做出来的文章之所以"酸涩"，因为既不是"从此心写出"，又不是"从道中流出"，只是"恁地著力做"，结果反倒不好。

四　反对摹拟与提倡摹拟

说出来的文章只是靠实说，明理就说得头头是道，不明理便无从说起，学习摹拟，都无用处。朱熹答曾景建云：

文字之設，要所以达吾之意而已；政便极其高妙，而于理无得焉，則亦何益于吾身，而何用于斯世？乡来前輩蓋其天資超异，偶自得之，未必專以是为务也。故公家舍人公謂王荆公曰："文字不必造語及摹拟前人，孟韓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况又圣賢道統正傳見于經傳者，初无一言及此乎？（集六一）

做出来的文章则靠"恁地著力做"，必需学习，必需摹拟。语类云：

古人作文作詩，多是摹仿前人而作之。蓋学之旣久，自然純熟。（卷一三九）

又云：

人做文章，若是仔细看得一般文字熟，少間做出文字，意思語脉，自是相似，讀得韓文熟便做出韓文底文字，讀得苏文熟便做出苏文底文字；若不仔细看，少間却不得用。向来初見拟古詩，將謂只是学古人之詩，原来却是如古人説"灼灼園中花"，自家也做一句如此；"迟迟澗畔松"，自家也做一句如此；"磊磊澗中石"，自家也做一句如此；"人生天地間"，自家也做一句如此；意思語脉皆要似他底，只换却字。其后来依如此做得二三十首詩，便覺得長进，蓋意思句語血脉势向，皆

效它底。(卷同)

此外,如说:"前辈作文者,古人有名文字,皆模拟作一篇,故后有所用时,左右逢原。"(卷同)如说:"某后生见人做得诗好,锐意要学,遂将渊明诗平侧用字,一一依他做,到一月后便解自做,不要他本子,方得作诗之法。"(卷一四〇)都是提倡摹拟,都是说摹拟是作文作诗的唯一好方法。因此就是他奉为作诗本经的李杜,也认为"李太白终始学选诗,所以好;杜子美诗好者亦多是效选诗,渐放手,夔州诸诗则不然也"。(卷同)这和答曾景建的反对摹拟好象矛盾,实则并不矛盾;因为诗文既有做来的与说出的差别,方法自然也就有摹拟与反摹拟的不同。

五　遵守旧格与反对新格

说出的文章可以"信口恁地说",做出的文章必需遵守旧格,不可自出规模。朱熹说杜甫的夔州诸诗不好,据语类是因为:

夔州以后,自出规模,不可学。(卷一四〇)

又云:

人多說杜子美夔州詩好,此不可曉;夔州詩却說得郑重煩絮,不如他中前有一节詩好。(卷同)

说杜甫夔州以后诗好的是黄庭坚,他的作诗方法也是摹拟,特别提倡摹拟杜甫夔州以后诗,(详七章二节)朱熹的作诗方法同样是摹拟,却特别薄弃杜甫夔州以后诗。这是因为黄庭坚从规律渐至自然,从有法渐至无法,(同上)朱熹则始终遵守旧格,反对新格。语类云:

前輩做文字只依定格,依本分做,所以做得甚好;后来却厌其常格,則变一般新格做,本是要好,然未好时先差(去声)异了。(卷一三九)

有病翁先生作闻筝诗,"规模意态全是学文选乐府诸篇,不杂近

世俗体”，极得朱熹称赞，作跋病翁先生诗云：

余尝以为天下万事皆有一定之法，学之者须循序而渐进。如学诗则且当以此等为法，庶几不失古人本分体制。向后若能成就变化，固未易量。然变亦大是难事，果变而不失其正，則縱横妙用何所不可；不幸一失其正，却反不若守古本旧法以終其身之为稳也。（集八四）

尊重旧格是爱其拙謹，反对新格是恶其新巧。语类中鼓吹拙謹，贬斥新巧的话很多。最详悉的如说：

国初文章皆严重老成，尝观嘉祐以前誥詞言語有甚拙者，而其人才皆是当时有名之士。蓋其文虽拙，而其辞謹重，有欲工而不能之意，所以风俗淳厚。至欧阳公文字好底便十分好，然犹有甚拙底，未散得他和气。到东坡文字便馳騁忘巧了。及宣政間，則穷极华丽，都散了和气。所以圣人取先进于礼乐，意思自是如此。（卷一三九）

别条也说“到东坡便伤于巧”。又说“自三苏文出，学者始日趋于巧，如李泰伯文尚平正明白，然而已自有些巧了”。（卷同）又说江西文章，“至黄鲁直一向求巧，反累正气”。（卷同）文集中的答陈肤仲也慨叹当时科举文字，“玩得鬼怪百出，都无诚实正当意思，一味穿穴，旁支曲径，以为新奇，最是永嘉流伪纤巧，不美尤甚”。（卷四九）随时都贬斥新格，同时也就随时都鼓吹拙謹。

新巧的毛病，朱熹指出最易弄得不明不白。譬如苏轼的文章，自朱熹看来，就常常“如搏謎子，更不可晓”。在语类批评云：

所以貴乎文之足以傳远，以其議論明白，血脉指意曉然可知耳。文之最难曉者无如柳子厚，然細观之，亦莫不自有指意可見，何尝如此不說破？其所以不說破者，只是吝惜，欲我独会而他人不能，其病在此。大概是不肯蹈襲前人議論，而务为新奇；惟其好为新奇，而又恐人皆知之也，所以吝惜。（卷一三九）

又泛论当时作文者的好务新奇云：

今人作文皆不足为文，大抵專移节字，更易新好生面辞語，至說

义理处又不肯分晓。(卷同)

这也是因为朱熹提倡道文统一，所求于文的是坦易明白，当然反对晦暗的新巧。所以对做出的诗文，力主遵守旧格，反对自创新格。

六 天生腔子与稳当底字

说出的诗文之所以不可摹拟，是要还它本来样子；做出的诗文之所以必守旧格，也是要还它本来样子。本来样子的组织部分是天生腔子，修辞部分是稳当底字。语类云：

> 前辈云：文字自有稳当底字，只是始者思之不精。又曰：文字自有一箇天生成腔子，古人文字自贴这天生成腔子。(卷一三九)

"古人文字自贴这天生成腔子"，当然不用摹拟；后人作文要追求这箇天生成腔子，便非摹拟不可。所以语类又云：

> 陆教授谓伯恭有箇文字腔子，作文字时便将来入箇腔子做，文字气脉不长。先生曰：他便是眼高看得破。(卷同)

"入箇腔子做"，就是摹拟箇"天生成腔子"，也就是求箇组织部分的本来样子。

至修辞部分的本来样子之稳当底字，也一样的是说出的诗文不用摹拟，"只恁地说出"，做出的诗文必需摹拟追求。语类云"始者思之不精"，就是说还没有追求到。此外如云：

> 苏子山有一段论人做文章自有合用底字，只是下不著。又如郑齐叔云："文字自有稳底字，只是人思量不著。"横渠云："发明道理，惟命字难。"要之做文字下字实是难，不知圣人说出来底也只是这几箇字，如何铺排得恁地安稳！(卷同)

又如因改谢表云：

> 作文自有稳字，古之能文者才用便用着这样字，如今不免去搜索

修改。（卷同）

也是在指出"圣人说出来底"文章，对于字"铺排得恁地安稳"；后人做出底文章要追求"铺排得恁地安稳"的字，便不能不去"搜索修正"。

七 文三世与诗三等

不过朱熹虽研求做诗文的方法，而且也作诗作文，但究竟认为作诗文是有害的。语类云：

> 才要作文章，便是枝叶害着学问，反两失之也。
>
> 诗笔杂文不须理会，科举是无可奈何。（并一三九）

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六也载："胡澹庵上章荐诗人十人，朱文公（熹）与焉，文公不乐，誓不复作诗，迄不能不作也。尝同张宣公游南岳，唱酬至百余篇，瞿然曰：吾二人得无荒于诗乎？"（涵芬楼本）这是因为在朱熹看来，做出来的诗文，既不必是"从此心写出"，又不是"从道中流出"，自然往往有害。所以就是对于他所推崇的韩柳，也说：

> 大率文章盛则国家却衰，如唐贞观开元都无文章，及韩昌黎柳河东以文显，而唐之治已不如前矣。（语类一三九）

至有益无害的文章，止有圣人说出来的六经，所以称六经为治世之文，余则斥为衰世之文或乱世之文。语类云：

> 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乱世之文。六经、治世之文也。如国语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是时语言议理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于乱世之文则战国是也，然有英伟气，非衰世国语之文之比也。（卷一三九）

这自然也是就文章的气象而言，所以注里举饶录曰："国语文字极困苦，振作不起。战国文字豪杰，便见事情非你杀我，则我杀

你。”又举黄云:“观一时气象如此,如何遏捺得住, 所以启汉家之治也。”然特称六经为治世之文, 当然也是认为六经是圣人“从此心写出”,“从道中流出”的含有治世之道的文章。

文分三世,诗也分为三等。答巩仲至云:

> 頃年学道未能專一之时,亦尝間考詩之原委, 因知古今之詩, 凡有三变: 盖自书傳所記,虞夏以来,下及魏晋,自为一等。自晋宋間顏謝以后, 下及唐初,自为一等。自沈宋以后,定著律詩,下及今日, 又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 其为詩者, 固有高下,而法犹未变。至律詩出, 而后詩之与法皆大变,以至今日, 益巧密而无复古人之风矣。故尝妄欲抄取經史諸书所載韵語, 下及文选汉魏古词, 以尽乎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 自为一編,而附于三百篇楚辞之后, 以为詩之根本准則。又于其下二等之中, 擇其近于古者,各为一編, 以为詩之羽翼輿卫。其不合者, 則悉去之,不使其接于吾之耳目,而入于吾之胸次,要使方寸之中, 无一字世俗言语意思, 则其为诗不期於高远而自高远矣。然顾为学之务, 有急于此者, 亦复自知材力短弱,决不能追古人而与之并,遂悉弃去不能复为。(集六四)

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六誉为“本末兼该”。现在看来, 他最尊崇诗三百篇和楚辞, 都是说出来的诗歌。其次“书传所记”“下及魏晋”的一等,可以“附于三百篇楚辞之后”, 因为最近于三百篇楚辞,也就是最近于说出来的诗歌。其次“自晋宋间颜谢以后, 下及唐初”的一等,“其为诗固有高下,其法犹未变”,就是犹有三百篇楚辞的余法,犹有说出来的诗歌的余风。最卑弃的是“自沈宋以后,定著律诗, 下及今日”的一等, “法皆大变”“无复古人之风”,就是毫无说出来的诗歌的风味,纯是做出来的诗歌。

八 張栻魏了翁的学文合一說

朱熹主张道文一贯,文由道流,而何以明道明理,则“主乎学

问”，那么文的直接本源是道，间接本源是学。讲友张栻（一一三三——一一八〇）就鼓吹学者之诗，私淑弟子魏了翁（一一七八——一二三七）更倡言学文合一。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载：

有以詩集呈南軒先生（栻号），先生曰："詩人之詩也，可惜不禁咀嚼。"或問其故，曰："非学者之詩，学者詩如讀著似質，却有无限滋味，涵泳愈永，愈覚深長。"又曰："詩者紀一时之实，只要据眼前实說。古詩皆是道当时实事，今人做詩多爱裝造語言，只要斗好，却不思一語不实便是欺。这上面欺，將何往不欺？"

魏了翁私淑朱熹，也私淑张栻。张栻家广汉，魏了翁家邛州蒲江，同为蜀人，又受学于张栻弟子范荪，虽然答朱择善书，说看朱子书后始由词章转经学（集卅五），但疑受张栻影响尤深。学文合一，正是学者诗的自然演绎。所作攻媿楼宣献公文集序云：

今之文古所謂辞也。古者即辞以知心，故即其或慚、或枝、或游或屈、而知其疑叛，知其誣善与失守也；即其或詖、或淫、或邪、或遁、而知其蔽陷，知其离且穷也。盖辞根于气，气命于志，志立于学，气之薄厚，志之小大，学之粹駁，則辞之險易正邪从之，如声音之通政，如蓍蔡之受命，积中而形外，断断乎不可揜也。（鶴山大全集，四部叢刊本卷五六）

朝议大夫知叙州魏公墓志铭云：

今之学曼与古异，今之文古所謂辞，今之政古所谓事，今之才则古所謂使人任人也。夫使学而本諸眞知，著于实踐，則发为辞，辞泽而理，施之政，政裕而密，非今之所謂文与才也。（集八一）

跋胡复斗楼诗藁云：

古之为文，皆以德盛仁熟流于既溢之余，故虽肆笔脱口而动中音节；非特歌詩为然也，礼辞易象亦莫不然。自离騷作，而文辞之士与世之以声律为文者，傅会牵合，始与事不相儷，文人才士习焉而不之察也。（集六二）

今之文是古所谓辞，古之文基于学，“学之粹驳，则辞之险易正邪从之”。大邑县学振文堂记历叙天地人伦以至孝弟谨信勤学好问之文，然后说：“圣人所谓斯文，亦曰能道云耳，而非文人之所以玩物肆情，进士之所以哗众取宠者也。”（集四十）也是在说明古人所谓文基于学行，不似今人的“玩物肆情”，“哗众取宠”之文。

不过魏了翁少时“喜记诵词章”（答朱择善书），他并不根本反对文辞，而是反对不本于学的文辞。杨少逸不欺集序云：

> 人之言曰：尚辞章者乏风骨，尚气节者穷辞令。某谓不然。辞虽末伎，然根于性，命于气，发于情，止于道，非无本者能之。且孔明之忠忱，元亮之静退，不以文辞自命也，若表若辞，肆笔脱口，无复雕缋之工，人谓可配训诰雅颂，此可强而能哉？唐之辞章称韩柳元白，而柳不如韩，元不如白，则皆于大节焉观之。苏文忠论近世辞章之浮靡，无如杨大年，而大年以文名，则以其忠清鲠亮大节可考，不以末伎为文也。眉山自长苏公以辞章自成一家，欧尹诸公赖之以变文体，后来作者相望，人知苏氏为辞章之宗也，知其忠清鲠亮临死生利害而不易其守，此苏氏之所以为文也。（集五五）

可见他不反对文辞。坐忘居士房公文集序云：

> 古之学者，自孝弟谨信汎爱亲仁，先立乎其本，迨其有余力也，从事于学文。文云者，亦非若后世哗然后（疑误）众取宠之文也；游于艺以趣博其趣，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得，本末兼该，内外交养，故言根于有德，而辞所以立诚，先儒所谓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盖非有意于为文也。后之人稍涉文艺，则沾沾自喜，玩心于华藻，以为天下之美尽于是，而本之则无，终于小技而已矣。（集五一）

可见他反对的是不根于实的文辞，也就是不“根于气，命于志，立于学”的文辞。

学文合一还有一种绝大的好处，就是不受老少穷达的影响。

江淹才尽的故事是大家熟知的，魏了翁作浦城夢笔山房记释云：

每惟由周而上，圣賢之生鮮不百年，盖历年弥久，則德盛仁熟，故从心所欲，罔有擇言，皆足以信今貽后。詩三易圣賢忧憤之所为者十六七，六艺之作，七篇之书，亦出于历聘不遇，凡皆坦明敷暢，日星拱而江河流也。圣人之心，如天之运，純亦不已，如川之逝，不舍晝夜，虽血气盛衰所不能免，而才壯志坚，純修弗貳，曷尝以老少为锐惰，穷达为荣悴者哉？灵均以来，文詞之士兴，已有虚驕恃气之习；魏晋而后，則直以纖文丽藻为学問之极致。方其年盛气强位亨志得，往往时以所能譁世眩俗；岁慆月迈，血气随之，則不惟形諸文詞衰颯不振，虽建功立事，蓄縮顧畏，亦非复盛年之比。此无他，非有志以基之，有学以成之，徒以天資之美，口耳之知，才驅气駕而为之耳。（集四九）

这是魏了翁的新说，他所服膺的朱熹就不这样主张。朱子语类卷百卅九云：“人老气衰文亦衰。欧阳公作古文，力变旧习，老来照管不到，为某诗序，又四六对偶，依旧是五代文习。东坡晚年文虽健不衰，然亦疏鲁，如南安军学记，海外归作，而有弟子扬觶序点者三之语，序点是人姓名，其疏如此。”同卷又云：“人晚年做文章如秃笔写字，全无锋锐可观。”又或曰：“人之晚年，知识却会长进。”朱熹答云：“也是后生时都定，便长进也不会多；然而能用心于学问底，便会长进，若不学问，只纵其客气底，亦如何会长进，日见昏了。有人后生气盛时说尽万千道理，晚年只恁地闒靸地。”或引程先生曰：“人不学便老而衰。”朱熹答云：“只这一句说尽了。”是朱熹的观点虽谓年老文衰，但“用心于学问底便会长进”，魏了翁从此点演绎，遂鲜明的分别文不根学的文章，才尽文弱，学文合一的文章至老不衰。他的弟子吳泳在给他的书里说：“异时迁人逐客，躓于忧患，伤于感慨，耗于血气，既衰困而无精采，而侍郎（魏了翁）养熟道凝，动全志壹，作为文章，天力自到。”并且特别指出“夢笔山记捻起老去才尽一段”。（与魏鶴山书，鶴

林集卷廿八)知此不仅是他的新说,也是他的体验得力处。后来刘克庄作刘忻父诗序云:"世谓鲍照江淹晚节才尽,予独以气为有惰,而才无尽。"(刘集九四)远不及魏说切实。

九　眞德秀的理用並重說

魏了翁说和他"生同志死当同传"的是眞德秀(一一七八——一二三五),同学于朱熹弟子詹体仁,因也和朱熹的意见很接近。编文章正宗,分为:辞命、议论、叙事、诗歌四类,纲目诗歌类下引朱熹答巩仲至论诗分三等,依准选列。但编王十朋梅溪续集(题梅溪续集,集卅四),又作跋著作正字二刘公墓志铭云:"永嘉葉公(適)之文,于近世为最。"(集卅五)知也受永嘉派影响。文章正宗纲目云:

> 夫士之于学,所以穷理而致用也,文虽学之一事,要亦不外乎此。故今所輯,以明理义切世用者为主,其体本乎古,其指近乎經者,然后取焉;否則辭虽工亦不录。(同治甲子刊本)

明理义是朱熹的意见,切世用是葉適的意见。周敬甫晉评序云:

> 儒者之学有二,曰性命道德之学,曰古今世变之学,其致一也,近世顧析而为二焉。尙評世变者指經术为迂,喜談性命者詆史学为陋,于是分朋立党之患兴,而小人乘之借以为摒中庸者之术,甚可畏也。(眞文忠公集,四部叢刊本卷廿八)

性命道德是朱熹之学,古今世变是葉適之学,眞德秀说"其致一也",知在揉合两派;以揉合两派的观点选文,也以揉合两派的观点评文。沈简斋四益集序云:"文辞末也,事业本也。……惟其以实学见实用,以实志起实切,卓然有益于世,而又闻之以君子之文,于是为可贵尔。"(集廿八)是以葉適的"用"的观点赞扬沈简斋。跋欧阳四门集云:"自世之学者离道而为文,于是以文自命

者，知黼黻其言，而不知金玉其行，工骚者有登墙之丑，能赋者有滌器之汙，而世之寡识者，反矜诧而慕望焉。曰：夫所谓学者文而已矣，华藻患不缛，何以修敕为？笔力患不雄，何以细谨为？呜呼！倘若是，则所谓文者，特饰敎之具尔，岂曰贯道之器哉！”（集卅四）是以朱熹的观点摘贬文士。

明理义切世用的文章，真德秀以为上者出于元气，次则决于气质学力。日湖文集序云：

> 盖圣人之文元气也，聚为日星之光耀，发为风尘之奇变，皆自然而然，非用力可至也。自是以降，则舐其資之薄厚与所蓄之淺深，不得而遁焉。故祥顺之人其言婉，峭直之人其言劲，嫚肆者无庄語，輕躁者无确詞，此气之所发者然也。家刑名者不能折孟氏之仁义，祖权譎者不能暢子思之中庸，沈涵六艺，咀其菁华，則其形著亦不可掩，此学之所本者然也。是故致飾語言不若养其气，求工笔札不若励于学，气完而学粹，則虽崇德广业亦自此进，况其外之文乎？此人之所可用力而至也。（集廿八）

励学的意见与魏了翁相近，求气则是将道学家的“变化气质”引用于文。

十　吴泳的理文难好华詞易工說

魏了翁的弟子很多，论文有见解的止有吴泳。吴泳强调的说理文难好，华詞易工。答唐伯玉书云：

> 文以理为主，体次之，学而无統則悖，言而无法則支。而古今文人学士見諸紀載者不知其几，而文公独取古灵先生天台孔子庙記，曾南丰宜州及筠州二学記，盖华藻之辨易工，而义理之文难好也。（鶴林集，四庫珍本本卷卅一）

答刘成道书云：

> 某近来看詩，覚得須是以三百五篇为标本，以汉苏、李、枚生、建

安諸子、晋宋陶謝等詩为风骨，然后能長一格。盖詞之华者易工，趣之淡者难詣。故退之每爱張文昌，只称其"学古淡"，每喜僧无本，但謂其"往往造平淡"，則詞語抑揚之間，是犹未純乎澹也。（集卅二）

前书言文，后书说诗，都指出华词易工，也就是说止有华词不够，文当以义理为主，诗当以平淡为极。如书中所举，韩愈就提倡古淡；就我们所知，苏舜钦梅尧臣也提倡古淡。（详一章十二节）但吳泳所提倡的古淡，和韩愈、苏、梅不同，韩愈、苏、梅纯就风格言，吳泳则兼就意识言。吳泳所奉为"标本"的诗，就是朱熹所奉为"准则"的一等诗。罗大经鶴林玉露卷十六，引列朱熹的诗三等说，释谓旨在"借物以明道"。吳泳陈侍郎文集序云：

> 离、文明之象也，而曰"黄离元吉"；賁、文柔之卦也，而曰"白賁无咎"。矜词章以为富，负靡語以为奇，皆文人之病也。古之人抱道含章，閟潏晋于窈窕，宿至味于淡泊，未尝务为炳炳烺烺，求以眩俗惊世。如邻蓍詘楚，吕相絕秦，子产对晋，臧孙辰告齐，乐毅报燕，皆沛然如肝肺中流出一片議論。当其放言援笔时，曷尝有意于祈当世之知，卜后世之傳哉，亦不过曰辞达而已矣。今人之为文者，略无古人舒暇之态，一字之不工，一言之不文，則日煎月礪，不姸不止，非惟提数寸之管，敝盈尺之紙，与其所为文，献之王公大人，而名未成，盖棺之事未定，往往编帙鋟梓，已徧滿于书坊經肆矣。君子为己之学，果如是耶？（集卅六）

"宿至味于淡泊"，基于"抱道含章"，则所提倡的古淡，也是在"借物以明道"。朱子语类卷百四十云："合义理谓之道。"然则吳泳所谓"趣淡难诣"和"理文难好"正是脉鑾相通，指理趣古淡，和韩愈、苏、梅的风趣古淡，并不全同。

理趣古淡是理学派的应有之义，也是江西永嘉两派的当然反响。朱子语类卷百四十云：

> 今江西学者，……不知穷年穷月做得那詩要何用？江西之詩，自

山谷一变，至楊廷秀(万里)又再变，遂至于此。

吳泳沈宏甫齋琹录序，先言宏甫"放于古而豪于诗"，"而叙者乃谓祖之以黄陈"。然后歎云：

夫三百五篇，詩之祖也；离騷十九章，詩之宗也；文选所载，自补亡而下，詩旁支别派也。今舍上世譜牒不論，而認幼子童孙为之祖，几何不墮于倒学哉？(集卅六)

都是攻击江西派。朱熹答陈肤仲云：

科举文字固不可廢，然近年翻弄得鬼怪百出，都无誠实正当意思，一味穿穴旁支曲径以为新奇，最是永嘉浮伪纖巧，不美尤甚；而后生多宗师之，此是今日最大之弊。(朱集四九)

吳泳张仁溥詩稾跋云：

风气日降，边幅益窄，竟趋晚唐以为鲜好，抑又下矣。(集卅八)

都是攻击永嘉派。

十一　王柏的正气説

朱熹的三传弟子王柏(一一九七——一二七四)，受学于黄干弟子何基。论文论诗都注重正气，发遣三昧序云：

文章有正义，所以載道而紀事也。古人为学，本以躬行講論义理融会貫通，文章从胸中流出，自然典实光明，是之謂正气。后世專务辞章，雕刻纂組，元气漓矣。間有微見义理，因得以映帶点綴于言語之中，是之謂倒学。(鲁齋集，金华叢书本卷四)

跋邵絜矩诗云：

自詩之六义不明而后世始伤于太巧，詩益巧而正气益漓，不复有寬厚溫柔之教矣。近世論作詩者須有夙根，有記魄，有吟骨，有远心，然后陶咏諷誦，卽声成文，豁然穎悟。吁，美則美矣，是非所以言古人之詩也。三百篇之作，虽有出于閭巷小夫幽閨女子之口，而亦自有以得吟咏情性之正者，豈必刻苦用心于琢句鍊字之工哉！(集五)

文章的正气是载道纪事，诗的正气是吟咏情性之正；载道纪事与吟咏情性之正都是道学家的共同主张，不是王柏的新说。“倒学”是程子指出的，(详四章五节)“文章从胸中流出”是朱子提倡的，(详三节)都不是王柏的新说。王柏的新说止是命名“正气”。虽然同时的刘克庄作退庵集序亦云：“杂博伤正气，絺绘损自然。”(刘集九四)但那是偶然流露，不似王柏的郑重提出。正气止是名称，却有囊括或革替文学家的文气说的功能。王柏题碧霞山人王公文集后云：

> 文以气为主，古有是言也；文以理为主，近世儒者尝言之。李汉曰“文者貫道之器”，以一句蔽三百年唐文之宗，而体用倒置不知也。必如周子曰“文者所以載道也”，而后精确不可易。夫道者形而上者也，气者形而下者也，形而上者不可见，必有形而下者为之体焉，故气亦道也。如是之文，始有正气也。气虽正也，体各不同；体虽多端，而不害其为正气足矣。盖气不正不足以傳远。学者要当以知道为先，养气为助。道苟明矣，而气不充，不过失之弱耳；苟道不明，气虽壮，亦邪气而已，虛气而已，否则客气而已，不可謂載道之文也。(集五)

朱熹已经称赞载道反对贯道，可是我们看不出本质的差别(详四章四节)，王柏又称赞载道反对贯道，我们仍然看不出本质的差别。大概因为贯道说倡于古文家韩愈的弟子，载道说倡于道学家大师的周子，他们认为韩愈是“倒学”，是“体用倒置”，由是遂据载道说以非贯道说，借以说明，“古人为学，本以躬行讲论义理融会贯通，文章从胸中流出，自然典实光明”。就字义言是没有多大区别的，因此也没有多少新义。有新义的是“气亦道也”。依据这种新义，文章便不应当依照古人——就是文学家的说法，“以气为主”；而应当依照近世儒者——就是道学家的说法，“以理为主”。这样，气便包括在道理之内，“苟道不明，气虽壮，亦邪

气而已，虚气而已，否则客气而已，不可谓载道之文”。文学家的文气说便被革替了。

王柏所反对的近世作诗论出于吴泳，吴泳的东皋唱和集序云：

> 学詩者須是有夙根，有記魄，有吟骨，有远心，然后陶咏諷誦，即声成文，脫然穎异于众；咸无焉，則虽穷日誦五千卷，援笔书数百言，殆如跛羊上山，盲龟入谷，終不能望其至也。（鶴林集卅六）

吴泳此说虽在诠发诗心，也在矫正雕饰。答罗嗣贤书云：“昔之圣贤，所以修身立命，体受归全，自有可尊可贵者在，而直不以文字语言为业。就文字中言之，则又当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而后为之也。”（鶴林集卅二）度郎中乡会诗跋亦云：“牵俪偶以为律，剽声病以为工，诗之下也。”（同书卅八）可是自王柏看来，仍不免“用心于琢句鍊字之工”，不得“吟咏情性之正”。吴王同源于朱熹，但吴学于魏了翁，王学于何基，魏吴的文学气味较浓，何王的理学气味更重，因此吴泳所持为反雕饰的诗说，又被王柏视为雕饰。

第十章　心学派的詩文心发説

一　陆九渊的前驅——胡銓的詩文心发説

心学派的领袖是陆九渊(一一三九——一一九二)，可是稍前的胡銓(一一〇二——一一八〇)已説诗文心发。胡銓是庐陵人，陆九渊是金谿人，相去不远。陆九渊赠俞文学云："观其所得澹庵诗，则盖有识之者。"(陆集二十) 胡銓恰字澹庵，疑即指胡銓。果尔，陆九渊确知胡銓其人，那么他的建立心学，建立文从心发的理论，当受胡銓影响。只以胡銓抗疏非和，统兵却金，他的学问遂为事业所掩；陆九渊谓六经注我，非我注六经，他的远绍程颐，幸未淹没，近宗胡銓，则人鲜究知了。

陈允忠集论语中语为洙泗文集，胡銓序云：

> 学者能如伊川先生眞积力久，味其言以契圣人之心，则道可几也，独文乎哉，独文乎哉?(洙泗文集序，胡忠簡公集十五)

秦希甫作灞陵文集，胡銓序力言"凡文皆生于不得已"，"非有心为文"。并历举谷、陶、禹以至韩、柳、李、杜，假使不是"不得已"，"书皆不作矣"。设问"然则其何以传道而永后世哉"?序云：

> 书所以卫道，而非所以傳道也，书者道之文也。韓愈原道曰，"其文則詩书易春秋"，是詩书易春秋道之文也，而不可以謂之道，况諸子百家之书而謂之道，可乎? 道之傳以人而不以书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堯傳之舜，舜傳之禹，禹傳之湯，湯傳之文、武、周公、

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是傳道者以人不以书也。孔子于詩薇之一言曰，“思无邪”，孟子于书之武城止取二三策，是圣賢盖以心傳道，而非專取于詩书之文辞而后已也。道苟得于心，书虽不作可也，文何有哉？（灊陵文集序，集十五）

传道以心，则不得已而作书作文，当然要发于心。策问四云：

誦其詩，讀其书，不知其人可乎？知其人者非他，知其心与道也。心与道岂不同条而共貫哉？（集五）

又答譚思顺云：

詩、书、禮、乐、易、春秋，盖尧、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数圣之心法在焉。（集九）

是读书贵在知心，作书贵在传心。此外，如僧祖信诗集序，先说：“自得于心，不假少鑠，则德全神王，虽复却万方陈乎前，不得入其舍，圣人之道，贤人之于学。”皆成于此。然后说诗至杜甫而极，也是基于“耽作诗，不事他业”。“工学甫者，善否必烛，无爽秋毫，机应于心，失得交关于前，茫乎若迷，于是乎一断于诗，而后甫可希也”。又说：“信师桑门氏，解天弢，脱世梏，是其方寸澹乎若深渊之靓，其在大块泛乎若不维之舟，况与淡値，寂无所著，无聊不平，一吐胸奇，句句如洗出，无一尘染，岂非得于心者本无垢乎，其视甫也奚愳？”（集十五）也是在说明诗的发于心，得于心。观其对杜甫信师的形容，似颇受庄子影响。朱熹说陆九渊杂二氏之学，胡銓也正不非二氏，文集卷二十，都是阐发二氏的文章。据此知胡銓是陆九渊的前驱。北宋的柳开、赵湘、尹洙已言及文与道与心的关系，（详一章六节）程颐更鲜明的说：“人能为合道之文者、知道者也，在知道者所以为文之心。”（详四章五节）陆九渊受程颐影响是人所共知的，观胡銓洙泗文集序，无疑的也受程颐影响。

韩愈答李翊书论文，曾以水为喻云："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胡铨答江宾庭和答谭思顺，都娓娓引述。但前书是与江宾庭论不敢当"孟氏之道"，后书更明白冠以"自古论圣人之道，以江海为喻者多矣"。（并集九）知都不是论文。

二　陆九渊的理会本心說

胡铨说诗文发于心，陆九渊也说诗文发于心。语录载问李伯敏"作文如何"？李答以"茫然无入处"。陆云：

> 孔門惟顏曾傳道，他未有聞。蓋顏曾从里面出来，他人外面入去。今所傳者，乃子夏子張之徒外入之学，曾子所傳至孟子不复傳矣。吾友却不理会根本，只理会文字。实大声宏，若根本壯，怕不会做文字？今吾友文字自文字，学問自学問，若此不已，岂止兩段，將百碎。（象山全集，四部叢刊本卷卅五）

"从里面出来"就是从心里出来，"理会根本"就是理会本心。李问："如何是尽心？性才心情如何分别？"陆云："若理会得自家实处，他日自明；若必欲说出，则在天者为性，在人者为心。"可见"实"也就是心。陆问李："近日用常行觉得精健否？胸中快活否？"李云："近日不管别事，只理会我，亦有适意时。"陆云："此便是学问根源也。"可见学问也就是理会本心。

文从心里发出，作文须理会本心，此意胡铨已经有之，不过没有象陆九渊的明白说出。胡说传道以心不以书，尧舜以迄周孔之道，至孟子而绝，陆也说孔门从里面出来之道，至孟子不传，今所传都是子夏子张之徒的外入之学，这样的若合符节，似不是全出偶然。但二人也有不同，胡重视心的专一，陆重视心的理会。陆与吳仲诗云：

五哥心志精神尽好，但不要被場屋富貴之念羈絆，直截將他天下事如吾家事相似，就实論量，却随他地步，自有可观。他人文字议论，但謾作公案事实，我却自出精神与他批判（批原作披，依四部备要本校改），不要与他牽絆，我却会斡旋运用得他，方始是自己胸襟。途間除看文字外，不妨以天下事逐一自題評研覈，庶几观他人之文，自有所发。所看之文，所論之事，不在必用，若能曉得血脉，则为可佳。若胸襟如此，縱不得已用人之說，亦自与只要用人之說者不同。若看文字时有合意志或紧要事节，不妨熟讀，讀得文字熟底，虽少，亦胜鹵莽而多者。（集六）

语录载李伯敏问"作文法"，陆答云：

讀汉史、韓、柳、欧、苏、尹师鲁、李淇水文不誤，后生惟讀书一路。所謂讀书須当明物理，揣事情，論事势。且如讀史，須看他所以成，所以败，所以是，所以非处，优游涵泳，久自得力。若如此讀得三五卷，胜看三万卷。（集卅五）

是理会本心有两条路，一是论事，一是读书。论事要"自题评研覈"，"看他所以成，所以败，所以是，所以非处"。读书要"謾作公案事实，我却自出精神与他批判，不要与他牵绊，我却会斡旋运用得他"。自陆九渊看来，这样便能"晓得血脉"，"怕不会做文字"。

陆与曾敬之云："读书本不为作文。"（集四）同样论事也不为作文，可是作文却须要有论事读书的准备。准备时务必理会本心，作文时仍须理会本心。陆与饶寿翁云："文理未通，散文字句害碍极多。"由于"大体不振，精神昏弱，故观书下笔皆不得力。"（集十二）与蔡公辨云："老夫平时最检点后生言辞书尺文字，要令入规矩。"又云："来书辞语病痛极多，读之甚不满人意，用助字不得律令，尤为缺典。"又云："安详沉静，心神自应自灵，轻浮驰鶩，则自难省觉。心灵则事事有长进，不自省觉即所为动皆乖

缪，适取以贻羞取诮而已。”(集十四)都是在说作文时仍须理会本心。

三 江西诗赞

朱熹卑薄江西诗，陆九渊则称赞江西诗，与程帅云：

> 伏蒙宠贶江西诗派一部二十家，异时所欲寻绎而不能致者，一旦充室盈几，应接不暇，名章傑句，焜耀心目，执事之赐伟哉！诗亦尚矣：原于赓歌，委于风雅。风雅之变，壅而溢焉者也。湘纍之骚，又其流也。子虚长杨之赋作，而骚几亡矣。黄初而降，日以澌薄。唯彭泽一源，来自天稷，与众殊趣；而淡泊平夷，玩嗜者少。隋唐之间，否亦极矣。杜陵之出，爱君悼时，追蹑骚雅，而才力宏厚，伟然足以镇浮靡，诗家为之中兴。自此以来，作者相望，至豫章(黄庭坚)而益大肆其力，包含欲无外，搜抉欲无秘，体制通古今，思致极幽眇，贯穿驰骋，工力精到。一时如陈、徐、韩、吕、三洪、二谢之流，翕然宗之，由是江西遂以诗社名天下，虽未极古之源委，而其植立不凡，亦宇宙之奇诡也。(集七)

与沈宰云：

> 某乡有复程帅惠江西诗派书，曾见之否？其间颇述诗之源流，非一时之说，愚见大概如此。国风雅颂固已本于道，风之变也亦皆发于情，止乎礼义，此所以与后世异。若乃后世之诗，则亦有当代之英，气禀识趣，不同凡流，故其模写物态，陶冶情性，或清或壮，或婉或严，品类不一，而皆条然各成一家，不可与众作浑乱，字句音节之间，皆有律吕，皆诗家所自异者。曾子固文章如此，而见谓不能诗，其人品高者，又借义理自胜，此不能不与古异。今若但以古诗为师，一意于道，则后之作者，又当左次矣。何时合并，以究此理？(集十七)

这固然由于陆是江西人，不免为江西捧场，与程帅结云，“某亦江西人也，敢不重拜光宠”，已经情见乎词。但黄庭坚的包含搜抉，思致幽眇，贯穿驰骋，工力精到，确也与陆九渊的重视理会检点，

旨趣相近。与沈宰说得明白：就“后世之詩”而言，凡“条然各成一家”者，皆难能可贵；“若借以古詩为师，一意于道”，則此“又当左次矣”。

四 袁燮包恢家鉉翁的言志新說

由陆九渊的理会本心的专用于詩，引导出他的门人后学的“言志”新说。袁燮（一一四四——一二二四）題魏丞相诗云：

古人之作詩，犹天籟之自鳴尔，志之所至，詩亦至焉，直已而发，不知其所以然，又何暇求夫語言之工哉？故圣人断之曰：“思无邪。”心无邪思，一言一句，自然精粹，此所以垂百世之典刑也。魏晉諸賢之作，虽不逮古，犹有舂容恬暢之风，而陶靖节为最，不煩雕琢，理趣深長，非余子所及。故东坡苏公言：“淵明不为詩，写其胸中之妙尔。”唐人最工于詩，苦心疲神以索之，句愈新巧，去古愈邈。独杜少陵雄傑宏放，兼有众美，可謂难能矣。然“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惊人死不休”，子美所自道也。詩本言志，而以惊人为能，与古异矣。后生承风，熏染积习，甚者推敲二字，毫厘必計，或其母忧之，謂“是儿欲嘔出心乃已”。鐫磨鍛煉，至是而极。孰知夫古人之詩，吟咏情性，渾然天成者乎？（絜齋集，武英殿聚珍版叢书本卷八）

包恢答曾子华论诗云：

在心为志，发言为詩，今人只容易看过，多不經思。詩自志出者也，不反求于志，而徒外求于詩，犹表邪而求其影之正也，奚可得哉？志之所至，詩亦至焉，岂苟作者哉？后世詩之高者，若陶若李杜者难矣。陶之冲澹閑靜，自謂是羲皇上人，此其志也。“种豆南山”之詩，其用志深矣。“羲皇去我久”一篇，又直叹孔子之学不傳，而竊有志焉。惟其志如此，故其詩亦如此。今人讀其詩，不知如何而讀之哉？如李如杜，同此其选也。李之“晏坐寂不动，湛然冥真心”，杜之“愿聞第一义，回向心地初”，虽未免杂于异端，其志亦高于人几等矣，宜其詩至

于能泣鬼神，驅瘧癘，非他人所敢望也。今之言詩者，不知其果何如哉？近世名公尝有言曰："人心惟危，天命不易。"学者于日用之間，如排浮萍，画流水，随止合，則見于紙上，山小水浅，无足疑者，此可以言詩与志矣。（儆帚稿略，宋人丙編本卷二）

家鉉翁志堂说云：

昔日讀詩，深有味于詩序"在心为志"之旨，以为在心之志，乃喜怒哀乐欲发而未发之端，事虽未形，几則已动，圣賢学問每致謹乎此，故曰"在心为志"。若夫动而見于言，事而見于事，則志之发見于外者，非所謂"在心之志"也。是以夫子他日語門弟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无邪之思，在心之志，皆端本于未发之际，存誠于几微之間。迨夫情动而言形，为雅，为頌，为风，为賦，为比，为兴，皆思之所发，志之所存，心之精神，实在于是，非外襲而取之也。序詩者即心而言志，志其詩之源乎？本志而言情，情其詩之派乎？自心而志，由情而詩，有本有末，不汩不迁，盖門人高第，亲得之圣师，而述之于序，非后儒所能到也。（則堂集，四庫珍本本卷三）

三人都就诗序的"诗言志"立论，都较诗序的意义深邃。"诗言志"是周秦的通常意念，并沒有什么隐晦难明的深思奥义，如字面所示，不过指明诗是心志的表现而已。诗序取以入文，加解释说："在心为志，出言为诗"，意思更为显豁，更表示沒有深思奥义。包恢说"今人只容易看过，每不经思"，就是他要在习见的旧说中注入深奥的新义。家鉉翁云："在心之志，乃喜怒哀乐欲发而未发之端。"包恢答傅当可论诗亦云：

某素不能詩，何能知詩？但尝得于所聞，大概以为詩家者流，以汪洋澹泊为高，其体有似造化之未发者，有似造化之已发者，而皆归于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也，所謂造化之未发者，則冲漠有际，宴会无迹，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欲有执著，曾不可得，而自有尸居而龙見，淵默而雷声者焉。所謂造化之已发者，眞景見前，生意呈露，混然天成，

无补天之縫罅，有各肖物，无刻楮之痕迹，蓋自有純眞而非影，全是而非似者焉。故观之虽若天下之至質，而实天下之至华，虽若天下之至枯，而实天下之至腴，如彭泽一派来自天稷者，尚庶几焉，而亦豈能全合哉?然此惟天才生知，不假作为，可以与此，其余皆須以学而入。学則須习，恐未易遽造也，所以前輩尝有"学詩渾似学参禪"之語。彼参禪固有頓悟，亦須有漸修始得。頓悟如初生孩子，一日而肢体已成；漸修如長养成人，岁久而志气方立。此虽是异端語，亦有理，可施之于詩也。半山云："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某謂寻常容易須从奇崛艰辛而入，又安意以为其"先難而后易"，益"長裕而不設不外"，是詩法。况造物气象，須自大化混浩中沙汰陶鎔出来，方見精彩也。唐称韋柳有晉宋高风，而柳实学陶者。山谷尝写柳詩与学者云："能如此学陶，乃能近似耳。"此語有味。（稿略二）

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包恢家铉翁以未发已发论诗，当然系自中庸移殖。朱陆都尊奉中庸，家铉翁以"存诚"与"未发"并举，与陆更近。袁燮象山先生文集序云："此心此理贯通融会，美在其中，不劳外索，揭诸当世曰：学问之要，得其本心而已。"(陆集卷首，袁集卷八)是陆九渊说心即理即善。语录云："三百篇之诗，周南为首；周南之诗，关雎为首；关雎之诗，好善而已。"(集卅五)是陆九渊说诗是善的。袁燮家铉翁都引孔子说"思无邪"，也是在证明诗是善的；诗善源于心志，也正合陆九渊谓心即理即善之说。程子云："夫子言兴于诗，观其言是兴起人善意。"（详四章六节）是陆九渊的好善说，出于程子的兴善说；袁燮家铉翁的无邪说，又出于陆九渊的好善说。包恢述近世名公有言曰："人心惟危，天命不易。"陆九渊语录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解者多指人心为人欲，道心为天理；此说非是，心一也，人安有二心?"（集卅五）则包恢所谓名公恐即指陆，决非指朱，朱就是分人欲天理为二的。

袁燮是陆九渊门人，持论相近无可疑。宋史包恢传："自其父扬，世父约，叔父逊，从朱熹陆九渊学。"则可以近陆，也可以近朱。考集中答项司户书云："朱文公所神明不测者"，"与夫子(孔子)四言似差不同。"(稿略二)陆象山先生贊云："若先生者，眞可进乎夫子皜皜莫尙之明。"(稿略五)是虽同样从学，但尊陆疑朱，所以论文也远朱近陆。至家鉉翁虽是苏轼里人，张栻乡人，然其学问渊源实出于陆，四库提要已就集中的心斋说主静箴诸篇，疏通证明，成为定谳，论文近陆，自无足奇异。

五　包恢的自然新說

陆九渊矜重理会检点，可也矜重冲淡自然。语录云："资禀好底人，自然与道相近"；"资禀不好底人，自然与道相远，却去鍛炼。"又云："某自来非由乎学，自然与一种（备要本作称）人气相忤，才见一造作营求底人便不喜，有一种冲然淡然底人便使人喜。"（并集卅五）这是在论人论道，由论人论道转至论文也不会岐异，所以一方面称赞黄庭坚领导的江西诗"包含欲无外，搜抉欲无內，体制通古今，思致极幽眇，貫穿驰骋，工力精到"。一方面也称赞"淡泊平夷"的"彭泽一源"，誉为"来自天稷"。

这种识解传至包恢便产生一种奇崛艰辛的自然新說。包恢答傅当可论诗也誉"彭泽一派来自天稷"，可是又引王半山云："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答倪子华论诗亦云：

> 盖古人于詩不苟作，不多作，而或一詩之出，必极天下之至精；狀理則理趣渾然，狀事則事情照然，狀物則物态宛然，有穷智极力之所不能到者，犹造化自然之声也。盖天机自动，天籟自鳴，鼓以雷霆，豫順以动，发自中节，声自成文，此詩之至也。孰发揮是，帝出乎震，非虞之歌，周之正风雅頌，作乐殷薦上帝之盛，其孰能与于此哉？其次則所

謂未尝为詩，而不能不为詩，亦顧其所遇何如耳。或遇感触，或遇扣击，而后詩出焉，如詩之变风变雅，与后世詩之高者是矣。此蓋如草木本无声，因有所触而后鳴，金石本无声，因有所击而后鳴，无非自鳴也。如草木无所触而自发声，則为草木之妖矣，金石无所击而自发声，則为金石之妖矣，聞者或疑其为鬼物，而掩耳奔避之不暇矣。世之为詩者，鮮不类此。蓋本无情而牵强以起其情，本无意而妄想以立其意，初非彼有所触而此乘之，彼有所击而此应之者。故言愈多而愈浮，詞愈工而愈拙，无以异于草木金石之妖声矣。（稿略二）

是他分诗为三等，上者是自然之声，次者是触击之声，下者是无触击之声，就是妖声，也就是普通所谓"无病呻吟"。自然与触击、无触击对举，当指本体的"造化自然"，非指方法的"自然而然"。不过，表现"造化自然"的诗文，最好还是用"自然而然"的方法。包恢自识云：

文忠欧公有曰："文欲开广，勿用造語，及毋模拟前人，孟韓虽高，不必似之，取其自然尔。"至哉言乎，眞文法也。（稿略八）

追求"勿造语及毋模拟前人"的自然，并不容易。象"虞之歌，周之正风雅颂"，"天机自动，天籁自鸣"，"有穷智极力之所不能到者"。自余都要从奇崛艰辛入手。此意，包恢不止在答傅当可论诗言之，在书徐致远无絃稿后亦云：

王半山有謂："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今泛观远齋詩，或者見其若出之易而語之平也，抑不知其閱之多，考之詳，煉之熟，琢之工，所以磨礲圭角，而剝落皮肤，求造眞实者，几年于兹矣。故其字字句句，有依据，有法度，欲会众体众格，而无一字妄用，一語苟作者。切无謂其寻常容易，乃奇崛之最，实自其艰辛而得也。（稿略五）

这正是陆九渊的矜重检点的移用于诗，同时也与江西诗派的由"布置法度"以至"不烦绳削而自合"的企响契合。当时反对江西

诗派最力的是永嘉派，他们标榜晚唐。包恢书侯体仁存拙稿后云：

> 尝聞之曰：江左齐梁，竟争一韵一字之奇巧，不出月露风云之形状。至唐末则益多小巧，甚至于近鄙俚，迄于今则弊尤极矣。体仁之存拙，岂非欲矯时弊乎?（稿略五）

答傅当可论诗也称赞傅当可的“始终皆追晋宋之风，而绝不效晚唐之体”，说“此其过于人远矣”。卑薄晚唐就是反崇江西。包出于陆，陆论诗尊奉江西，所以包也尊奉江西。不过江西诗社的人物是纯粹诗人，陆包是心学派的道学家，诗人止讲求作诗方法，道学家则阐发诗学本体。这样，江西派的作诗方法，遂由陆包——特别是包的手里，寻求到本体的根据。

第十一章 詩話、詞話、文話、詩文評点

一 何謂詩話

“诗话”是公名，欧阳修径以名其书。稍后的司马光作续诗话，自序云：“诗话尚有遗者，欧阳公文章名声虽不可及，然记事一也。”所说的诗话，明指欧阳修书，足证欧阳修所作是最早一部，司马光所作是第二部。至渊源所自，言人人殊，追溯最远的要算明代的何文焕，他在历代诗话序说昉于三代；最后的要算清代的章学诚，他在文史通义诗话篇说源于鍾嶸诗品。三代的说法堕于玄渺，诗品确是勒成专书的论诗初祖，但不即是宋人诗话本源。欧阳修诗话自序云：“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与司马光的话合而观之，知早期的诗话止是在记事以资闲谈，和诗品的“第作者甲乙而溯厥师承”（四库提要语），并不相同。记事以资闲谈的著作在唐代已很发达，就是所谓笔记；所不同者，笔记的记事漫无限制，诗话的记事止于诗人诗作。四库提要说诗话“体兼说部”（卷一九五，诗文评类），最为有识。至名称的“话”字或来自“说话”“话本”，可也沒有确证。

诗话沒有兴起以前，除了鍾嶸诗品和司空图诗品，还有三种论诗的书，就是诗格、诗句图和本事诗。本事诗是诗话的前身，（详五篇五章七节）诗格及诗句图则与诗话的性质旨趣都不同，

诗话兴起以后，也还续有撰著，以其为晚唐五代余绪，故已于晚唐五代篇提前叙次。(五篇二、三、四章)

最早的诗话止是记事以资闲谈，后来便逐渐扩展。建炎戊申(一一二六)，许彦周自序所作诗话云：

> 詩話者，辨句法，备古今，記盛德，录异事，正訛誤也。若夫含譏諷，著过惡，誚紕繆，皆所不取。(彦周詩話，津逮秘书本)

绍兴末(约为一一五〇年以后)，黄徹作碧溪诗话，又提出辅名教和论当否两种。辅名教见黄氏自序云：

> 平居无事，得以文章为娱，时閱古今詩集以自遣适。故凡心声所底，有誠于君亲，厚于兄弟朋友，嗟念于黎元休戚，及近諷諫而輔名教者，与予平日旧游所經历者，輒妄意鋪凿，疏之窗壁間。未几，鈔录成书，而以碧溪詩話名之。至于嘲风雪，弄草木，而无与于比兴者，皆略之。(碧溪詩話卷一，历代詩話續編本)

论当否见于陈俊卿序引黄徹云：

> 时取古人詩卷，聊以自娛，因笔論其当否，且疏用事之隐晦者，以备遺忘。(同上)

纪盛德和录异事仍然是记事，特别是录异事仍然是在以资闲谈。后来颇有人反对，如乾道己丑(一一六九)，黄永思跋碧溪诗话云："诗话杂说行于世者多矣，往往徒资笑谈之乐，鲜有益于后学。"可是记事始终占着诗话的最大成分，批评赏鉴的意味很淡。辨句法是诗学方法，备古今是诗学源流，正讹误和论当否是诗学利病，辅名教是诗学观念，便都是颇重要的文学批评了。

二　两宋詩話年代存佚殘輯表

诗话起于宋，也盛于宋，存佚残辑，甚为繁杂，二十五年，我曾制表载师大月刊(第三十期)，兹增删迻录于下：

诗话出于笔记小说，许多名为诗话的书，目录家列入小说类，同时许多笔记，又事实就是诗话。这里对名为诗话者一概收入，至笔记小说之实为诗话者，则以曾经目录家列入"文史""诗话"或"诗文评"类者为限。

版本一栏，就普通易得者列举，但坊刻和铅石印本，错误太多，故从阙。说郛大都是节录，故止有说郛本的就是残书，兼有他种本的就往往不举说郛。

为了省字起见，对各种版本及依据书籍，每只简列二字。版本方面，百川指百川学海，津逮指津逮祕书，历代指历代诗话，续历指历代诗话续编，萤雪指萤雪轩丛书，学海指学海类编，辑校指两宋诗话辑校，读画指读画斋丛书，古今指古今说部丛书，湖北指湖北先正遗书，知不指知不足斋丛书，龙威指龙威祕书，七子指七子诗话，四部指四部丛刊，四备指四部备要，守山指守山阁丛书，聚珍指武英殿聚珍版丛书，诒经指诒经堂丛书，宝颜指宝颜堂祕笈，琳瑯指琳瑯祕室丛书，常州指常州先正遗书，艺圃指艺圃搜奇，续金指续金华丛书，珠丛指谈艺珠丛，武林指武林往哲遗著。备注方面，宋志指宋史艺文志，晁志指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录指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通考指通考经籍考，通志指通志艺文略，遂初指遂初堂书目，四库指四库全书总目，渔隐指苕溪渔隐丛书，总龟指诗话总龟，竹庄指竹庄诗话，玉屑指诗人玉屑，诗林指诗林广记，鉴衡指修辞鉴衡。

书　名	作者及年代	存佚残辑	版本	备　　注
詩話一卷	欧阳修撰 熙宁四年（一〇七一）致仕以后作	存	全集、百川、津逮、历代、螢雪等	后人或称六一詩話，六一居士詩話，欧公詩話，欧阳文忠公詩話。
六一詩話附录一卷	日人近藤元粹輯	輯	螢雪	就欧公試笔及归田录二书，抄出其似詩話者。
續詩話一卷	司馬光撰（一〇一九——一〇八六）	存	全集、百川、津逮、历代、螢雪等	后人或称司馬溫公詩話，司馬太师詩話，迂叟詩話。总龟引閑居詩話，与此多同，或亦即此书。
玉壺詩話一卷	釋文瑩撰 玉壺野史自序成书于元丰戊午（一〇七八）八月十日 佚名輯	輯	学海	就玉壺野史（即玉壺清話）中，輯其論詩之語。
王禹玉詩話一卷	王珪撰（一〇一九——一〇八五）	佚		見通志
中山詩話一卷	刘攽撰（一〇二二——一〇八八）	存	全集、百川、津逮、历代、螢雪等	或称刘貢父詩話，刘攽詩話。

书名	作者及年代	存佚残辑	版本	备注
詩話补遺一卷	潘兴嗣撰 熙宁(一〇六八——一〇七七)初，为筠州判官	佚		見宋詩紀事卷二十三，无卷数，江西通志艺文略詩文評类作詩話一卷。
东坡詩話一卷	苏軾撰 (一〇三六——一一〇一) 宋人佚名輯	残	説郛、螢雪	宋志一卷，通志作苏子瞻詩話，亦一卷。晁志二卷，称好事者，据苏軾杂书有及詩者集成。
同上一卷	罗根泽輯	輯	輯校	据説郛，益以总龟及詩林等书所引。
东坡詩話补遺一卷	日人近藤元粹輯	輯	螢雪	就东坡志林中抄出其系詩話者。
东坡詩談录三卷	元人陈秀明輯	輯	学海	
紀詩一卷	苏軾撰 罗根泽重輯	輯	輯校	据总龟輯
烏台詩案十三卷	朋九万撰	存	説郛、学海、旧抄本	説郛学海題东坡烏台詩案，仅一卷。陈录作烏台詩話。
眉山詩案广証六卷	清張鉴撰	存	刊本	
詩病五事一卷	苏轍撰 (一〇三九——一一一二)	存	説郛、螢雪、欒城集	

书　名	作者及年代	存佚残辑	版本	备　注
侯鯖詩話一卷	赵令畤撰 日人近藤元粹輯	輯	螢雪	就侯鯖录中抄出其涉及詩者。
刘咸临詩話	刘叔和撰 刘恕子	佚		王直方詩話載刘咸临醉中作詩話数十篇，未知成书否。
王直方詩話六卷	王立之撰 作于元祐（一〇八六——一〇九四）中 罗根泽輯	輯	輯校	或作归叟詩話，詩文发源。据渔隐，总龟及鉴衡等书輯。
西清詩話一卷	蔡絛撰 作于元祐（一〇八六——一〇九四）稍后	殘	說郛	宋志、陈录及通考俱作三卷。
同上三卷	罗根泽輯	輯	輯校	說郛外，益以渔隐、总龟、玉屑、詩林等书所引。
金玉詩話一卷	蔡絛撰	存	說郛、螢雪	說郛題蔡絛撰，并注"西清无为子"五字，螢雪題宋闕名，今案即西清詩話。
吕氏詩事录一卷	吕某撰 书中詳于苏黃元祐諸人	輯	輯校	据竹庄及能改齋漫录輯，竹庄作詩事，漫录作吕氏詩事录。

书名	作者及年代	存佚残辑	版本	备注
李希声詩話一卷	李錞撰 与徐师川潘邠老同时 罗根泽輯	輯	輯校	宋志作李錞詩話。据玉屑、詩林、鉴衡等书輯。
后山詩話一卷	陈师道撰 （一〇五三——一一〇一）	存	百川、稗海、历代、津逮、后山集等	陆游断为伪书，四库提要謂宋南渡后佚补。
陈輔之詩話一卷	陈輔撰 少从王安石游	殘	説郛	
同上一卷	罗根泽輯	輯	輯校	説郛外，益以漁隐及詩林等书所引。
优古堂詩話一卷	吳幵撰 紹圣丁丑（一〇九七）中宏詞科	存	讀画、續历等	
洪駒父詩話一卷	洪芻撰 紹圣元年（一〇九四）进士 罗根泽輯	輯	輯校	据漁隐及玉屑等书輯。
潘子真詩話一卷	潘淳撰 与洪芻同时	殘	説郛	宋人书或引作詩話补闕。
同上一卷	罗根泽輯	輯	輯校	説郛外，益以漁隐及师

书　名	作者及年代	存佚残辑	版本	备　注
				余录等书所引。
潛溪詩眼一卷	范温撰 学于黄庭坚	残	説郛	
同上一卷	罗根泽輯	輯	輯校	説郛外，益以漁隐、总龟及野客叢书等书所引。
历代吟譜五卷	蔡傳撰 蔡襄之孙	存	吟窗杂录、詩学指南	宋志二十卷，謂不知作者。陈录及通考俱著蔡傳吟窗杂录三十卷，謂中有吟譜，据知宋志作二十卷，盖并杂录而言，二或为三之誤。四庫存目五卷，蔡傳撰。指南題浩然子陈应行編，盖誤。
蔡寬夫詩話二卷	蔡启撰 崇宁（一一〇二——一一〇五）初为檢点試卷官 罗根泽輯	輯	輯校	据漁隐、玉屑、詩林等书輯。
临汉隐居詩話一卷	魏泰撰 崇宁大观时（一一〇二——一一一〇）章惇欲官之不就，此书为其晚年所作。	存	古今、知不、历代、学海、湖北、龙威、七子等	

书　　名	作者及年代	存佚残辑	版本	备　　　　注
冷齋夜話十卷	釋惠洪撰 大观中(一一〇七——一一一〇)游張商英門	存	稗海、説郛、螢雪等	詩林后集卷三，王荆公南浦詩条，引作冷齋詩話。
蔡寬夫詩史二卷	蔡居厚撰 大观初拜正言 罗根泽輯	輯	輯校	据总龟、玉屑、竹庄等书輯。
唐子西文录一卷	唐庚口述 口述起宣和己亥(一一一九)，訖明年正月。 强行父記录 追記于紹兴八年(一一三八)三月癸巳	存	古今、历代、螢雪等	或作唐子西語录、唐庚詩話、唐子西詩話。述記年月据强行父所作唐子西文录記。
詩話总龟前集四十八卷后集五十卷	阮閱撰 元丰八年(一〇八五)进士	存	明刊本、四部本	前集原名詩总，漁隐謂阮閱編于宣和癸卯(一一二三)。
石林詩話三卷	叶夢得撰 作于靖康(一一二六——一一二七)前	存	古今、历代、百川、津逮、覌古堂	以覌古堂本为最佳，因附入他书所引也。

书　名	作者及年代	存佚残辑	版本	备　注
			刻石林遺书等	
石林詩話拾遺附录一卷	清叶德輝輯	輯	观古堂刻石林遺书	
諸家老杜詩評五卷續一卷	方深道撰 宣和六年（一一二四）进士	存	北平图书館藏旧抄本	陈录及通考俱著五卷，續一卷，方深道集。宋志著方醇道集諸家老杜詩評五卷。福建通志詩文評类同于陈录通考，而良吏傳又以續一卷屬醇道，二人为兄弟，合撰分著，抑一人所作，皆不可考。
續老杜詩評五卷	方銓撰	未詳		見宋志，是否即陈录通考所謂續一卷，不可考。
藏海詩話一卷	吳可撰 当在宣和（一一二〇——一一二五）末年	存	知足、函海、續历、螢雪、昌平叢书等	
古今詩話六卷附录一卷	李頎撰 作于建炎（一一二七——一一三〇）前 罗根泽輯	輯	輯校	据漁隱、总龟、玉屑、詩林、竹庄、鉴衡等书輯。宋志著李頎古今詩話录七十卷，与此疑为一书。

书　名	作者及年代	存佚残辑	版　本	备　　注
許彥周詩話一卷	周𣏌撰 自序于建炎戊申（一一二八）六月初吉日。	存	百川、稗海、历代、津逮、螢雪等	
漫叟詩話一卷	闕名撰 作于建炎中	殘	說郛	
同上一卷	罗根泽輯	輯	輯校	說郛外，益以漁隐、詩林、竹庄等书所引。
艺苑雌黃一卷	严有翼撰 南渡（一一二七）前后时人	殘	說郛	宋志、陈录、通考、俱作二十卷。
同上十卷		未詳		四庫据江苏巡撫采进本存目，断为伪书。
同上四卷	罗根泽輯	輯	輯校	說郛外，益以漁隐、总龟、詩林、草堂等书所引。
唐詩紀事八十一卷	計有功撰 南渡时人	存	刊本、四部本	
覌林詩話一卷	吳聿撰 南宋初人	存	学海、湖北、守山、續历、墨海金壺等	通考作張律撰

书　名	作者及年代	存佚残辑	版本	备　注
詩說雋永一卷	佚名撰 建炎时人 罗根泽輯	輯	輯校	据漁隐、詩林等书輯。遂初著詩話雋永，疑即此书。
瑤溪集一卷	郭思撰 作于吳曾（一一五三年为丞奉郎）之前 罗根泽輯	輯	輯校	或称郭思詩話。又宋史著文史类，通志著詩話类，故知确为詩話。原十卷。玆据漁隐、竹庄及能改齋漫录等书輯。
汉皋詩話一卷	張某撰 作于吳曾之前	殘	說郛	原題闕名撰，据能改齋漫录及周煇清波杂志，知撰者姓張。
同上一卷	罗根泽輯	輯	輯校	說郛外，益以漁隐、詩林、能改齋漫录等书所引。
垂虹詩話一卷	周知和撰 周煇从叔	佚		宋志謂不知作者，考周煇清波杂志卷八云:“从叔知和，尝尉吳江，作垂虹詩話。”
靑瑣詩話一卷	刘斧撰 至迟作于紹兴（一一三一——一一六二)初年 佚名輯	殘	說郛	原題元刘斧，誤。宋志、晁志俱載所作靑瑣高議，此即从中采輯者。晁志成于紹兴二十年，此在前无疑。
碧溪詩話十卷	黃徹撰 紹兴十五年(一一四五)进	存	聚珍、知不、学海、	遂初載黃微詩話，当即此书，微徹形近而誤。

书　名	作者及年代	存佚残辑	版本	备　注
	士		續历、七子、螢雪等	
环溪詩話一卷	吳沆后人撰 沆于紹兴六年（一一三六）詣行在献书。	殘	說郛、学海	原题吳沆撰，四庫考知为沆后人追記沆論詩語，及他人品評吳沆詩語。学海出于說郛，說郛率皆节录，故疑殘缺。
紫薇詩話一卷	呂本中撰 紹兴中进士	存	百川、历代、津逮、螢雪等	
竹坡老人詩話一卷	周紫芝撰 紹兴中登第	存	百川、古今、历代、津逮、螢雪等	或題竹坡詩話。
詩讞一卷	周紫芝撰	存	学海	
珊瑚鈎詩話三卷	張表臣撰 紹兴終司农丞	存	百川、历代、螢雪等	
岁寒堂詩話上下卷	張戒撰 紹兴間人	存	学海、聚珍、續历、螢雪等	
风月堂詩話二卷	朱弁撰 自序称庚申	存	詁經、宝顏	

书　名	作者及年代	存佚残辑	版本	备　注
	閏月，庚申为紹兴十年（一一四〇）			
桐江詩話一卷	不知撰者 作于紹兴十年（一一四〇）前后	殘	說郛	
同上一卷	罗根泽輯	輯	輯校	說郛外，益以漁隐、玉屑、竹庄、詩林等书所引。
艇齋詩話一卷	曾季貍撰 作于紹兴二十年（一一五〇）前后	存	琳瑯、續历等	
苕溪漁隐叢話前集六十卷后集四十卷	胡仔撰 前集自序于戊辰（一一四八）三月上巳，后集自序于丁亥（一一六七）中秋日	存	海山仙館叢书、四部备要等	
韻語阳秋二十卷	葛立方撰 书成于隆兴元年（一一六三）。	存	历代、学海、常州、艺圃等	
高齋詩話	曾慥撰	輯	輯校	据漁隐、总龟、玉屑、詩

书　名	作者及年代	存佚残辑	版本	备　注
一卷	作于孝宗前 罗根泽辑			林等书輯。
庚溪詩話三卷	陈岩肖撰 作于淳熙中（一一七四——一一八九）	存	百川、学海、續金、續历、艺圃、螢雪等	
詩話一卷	陈日华撰 孝宗时（一一六三——一一八九）人	未詳		四庫集部詩文評类存目
容齋詩話六卷	洪迈撰 （一一二三——一二〇二） 佚名輯	輯	学海	就容齋五笔，輯其論詩語。
二老堂詩話二卷	周必大撰 （一一二六——一二〇六）	存	历代、津逮、螢雪、全集等	
晦庵詩說一卷	朱熹撰 （一一三〇——一二〇〇） 陈文蔚等录	輯录	珠叢	

书　名	作者及年代	存佚残輯	版本	备　　注
全唐詩話六卷	旧題尤袤撰 自序称书成于甲午（一二三四），而序文則作于咸淳辛未（一二七一）。	存	历代、津逮、清孙濤校刻本	四庫提要謂賈似道假手于廖瑩中，瑩中又窃唐詩紀事以成此书。按周密志雅堂杂抄卷下：“賈师宪……又开全唐詩話三帙，盖即唐本事詩中事也。”知提要之言是也。
老学庵詩話一卷	陆游撰 （一一二五——一二一〇） 日人黑崎朴齋飯村岳麓原輯 日人近藤元粹补輯	輯	螢雪	黑崎飯村二子从老学庵笔記中，抄出其涉及詩者为放翁詩話。近藤以有遺漏，补輯为此书。
陆游山阴詩話一卷	李兼撰 开禧三年（一二〇七），以朝請郎知台州	佚		見宋志、陈录及通考。宋志止題陆游山阴詩話，未言李兼撰，似以为陆游撰，盖誤。
誠齋詩話一卷	楊万里撰 （一一二七——一二〇六）	存	續历、螢雪、全集等	生卒依儲皖峯先生楊万里生卒年月考。
詩学規范一卷	張鎡撰 胡文煥輯	存	詩法統宗	录自仕学規范卷三十六至四十，詩法統宗为格致叢书之一部分。

书　名	作者及年代	存佚残辑	版本	备　注
白石道人詩說一卷	姜夔撰	存	历代、学海、讀画、珠叢、螢雪、詩触、全集等	或作白石詩說，姜氏詩說。
后村詩話前集二卷后集二卷續集四卷新集六卷	刘克庄撰（一一八七——一二六九）前后集六十至七十岁所作，續集近八十岁所作，新集八十二岁所作。	存	适园叢书、全集等	
江西詩派小序一卷	刘克庄撰	存	續历、全集等	
草堂詩話二卷	蔡夢弼撰 草堂詩箋自跋于嘉泰三年（一二〇三）	存	續历、草堂詩箋等	四庫提要称始末未詳，按当与草堂詩箋相先后。
履齋詩話一卷	孙奕撰 履齋示儿編自序于开禧元年（一二	輯	螢雪	即履齋示儿編卷九卷十中之詩說。

书　名	作者及年代	存佚残辑	版本	备　注
	〇五） 日人近藤元粹辑			
娱书堂詩話二卷	赵与虤撰 宁宗（一一九五——一二二四）以后人	存	續历、讀触等	玉屑引作赵威伯詩余話，文瀾閣书目作赵威伯詩話。
玉林中兴詩話补遺一卷	黄升撰 作于詩人玉屑以前 罗根泽辑	輯	輯校	据玉屑、詩林二书輯。
休齋詩話一卷	佚名撰 疑魏庆之友 罗根泽輯	輯	輯校	据玉屑、詩林二书輯。
詩人玉屑二十卷	魏庆之撰 黄升序于淳祐甲辰（一二四四）	存	詩法統宗、四备、刊本	
滄浪詩話一卷	严羽撰 理宗时（一二二五——一二六四）人	存	百川、历代、津逮、宝顏、珠叢、螢雪、全集等	內分詩辯、詩体、詩法、詩評、考証五种，末附答吳景仙书。周樂園重訂宋严滄浪先生全集本最佳，中有序文数編，考訂頗詳。
严氏糾謬一卷	清馮班撰	存	鈍吟杂录本	

书名	作者及年代	存佚残辑	版本	备注
滄浪詩話注四卷	清胡鉴撰	存	光緒辛巳刊本	
滄浪詩話箋注一冊	今人胡才甫撰	存	中华书局印本	
荆溪林下偶談四卷	吳子良撰 宝庆二年（一二二六）进士	存	古今、宝顏等	各本皆题宋吳氏撰，四庫提要考知为吳子良。
吳氏詩話二卷	佚名輯	輯	学海	就荆溪林下偶談摘其論詩語。
对床夜話	范晞文撰 景定三年（一二六二），晞文以此书投馮去非。	存	学海、武林、知不、續历、螢雪等	
竹庄詩話二十四卷	何溪汶撰 四庫置浩然齋杂談前	存	四庫珍本初集	宋志二十七卷，今本二十四卷，散佚抑合并不可考。
詩話抄	陈本齋撰	佚		周密志雅堂杂鈔卷下书史类，称姚子敬有陈本齋詩話抄。
詩家糾謬	雪林撰	佚		同前称姚子敬有雪林詩家糾謬
詩話□家乘	韋居撰	佚		同上称姚子敬有韋居詩話□家乘

书　名	作者及年代	存佚残辑	版本	备　注
浩然齋雅談三卷	周密撰（一二三二——一三〇八）清四庫舘輯	存	聚珍、忏花庵本等	据永乐大典輯，上卷考証經史，評論文章，中卷詩話，下卷詞話。按周氏志雅堂杂鈔卷下称乙丑八月，作五詩話，不知是否即此书。
弁阳詩話一卷	日人梁川星岩菅老山原輯 日人近藤元粹重輯	輯	螢雪	即浩然齋杂談卷中之詩話，原輯名浩然齋詩話，近藤改此名。
竹窗詩文辨正叢說四卷	囂囂子撰 南宋人	未詳		四庫詩文評类存目
深雪偶談一卷	方岳撰 南宋末年人	存	学海、錦囊小史、宋人百家小說等	
詩林广記前集十卷后集十卷	蔡正孙撰 自序于己丑，距宋亡十年	存	元刊本、明汪亮刊本、明仿宋本、明四卷本	
詩論一卷	釋普聞撰	殘	說郛	
王明之詩話		佚		見遂初

书　名	作者及年代	存佚残辑	版本	备　注
南宫詩話一卷	叶凱撰	佚		見宋志
古今詩源	周錫撰	佚		見四川通志
玄散詩話一卷	闕名撰	殘	說郛	
蘭庄詩話一卷	闕名撰	殘	說郛	
玉齋詩話一卷	闕名撰	佚		見說郛，原注"闕"，知已佚。
續詩話一卷	无名氏撰	佚		見陈录及通考
詩三話一卷	无名氏撰	佚		見陈录及通考
唐宋名賢詩話二十卷	不知作者	佚		見宋志。遂初載名賢詩話，不知是否即此书。
新集詩話十五卷	不知作者	佚		見宋志
元祐詩話一卷	不知作者	佚		見宋志
大隐居士詩話一卷	不知作者	佚		見宋志
詩談十五卷	不知作者	佚		見宋志及遂初，遂初无卷数。說郛有題宋闕名詩談一卷，但述及李东

书名	作者及年代	存佚残辑	版本	备注
				阳何景明，当作于明人，与此恐非一书。
詩話二十卷	未題作者	佚		見通志
詩話集类	未題作者	佚		見遂初
靜熙詩話	未題作者	佚		見遂初
叙事詩話	未題作者	佚		見遂初

此外，总龟后集卷五再引胡氏诗评，玉屑卷三和卷七再引藜藿野人诗话，竹庄卷一引蔡百衲诗评，卷十一三引师氏诗说，卷二十引抒情诗话，诗林前集卷四再引臞翁诗评，后集卷三再引诗引，卷四引艺苑谈丛，野客丛书卷七和卷二十三再引松江诗话，西溪丛话卷上引李君翁诗话，能改斋漫录卷五引芥室诗话，零珪断璧，不知已否成为专书，从省不载。

三 許彥周詩話

上列近百种的诗话，记事闲谈占着极大多数，名家所作，如欧阳修诗话，陈师道后山诗话，杨万里诚斋诗话，刘克庄后村诗话，虽是闲谈，可也颇有珍贵意见，已分别系本人论次；小家随声附合，诚然如黄永思所说，“徒资谈笑之乐，鲜有益于后学。”黄彻提出辅名教，论当否，但所作䂬溪诗话仍偏于记事闲谈。至辨句法，备古今，正讹误，辅名教而有见解之作，止有范温诗眼，许彦周诗话，张戒岁寒堂诗话，姜夔白石道人诗说，严羽沧浪诗话，吴子良林下偶谈六种；范姜属于江西派，吴隶于浙东派，已分别系

派论次；现在只述许、张、严三家。

许彦周虽提出辨句法，备古今，正讹误的诗话路向，但他所提示的实在有限，较重要的不过描写与用事两种。说描写的如云：

> 詩人写人物态度，并不可移易。元微之李娃行云："髻鬟峩峩高一尺，門前立地看春风。"此是娼妇。退之华山女詩云："洗粧拭面著冠帔，白咽紅頰長眉青。"此定是女道士。东坡作芙蓉城詩亦用長眉青三字云："中有一人長眉青，炯如微云淡疏星。"便有神仙风度。（津逮秘书本）

这就是说描写人物重在恰如其分，但如全幅的精神都放置在刻画人物，又易流于迂弱；最好能恰如其分，而又造语壮丽。所以又云：

> 写生之句，取其形似，故辞多迂弱，赵昌画黄蜀葵，东坡作詩云："檀心紫成暈，翠叶森有芒。"揣摸刻骨，造語壯丽，后世莫及。

至用事，许彦周认为最忌直塡：

> 凡作詩若正尔塡实，謂之点鬼簿，亦謂之堆垛死尸，能如猩猩毛笔詩曰："平生几緉屐，身后五車书。"又如"管城子无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书。"精妙明密，不可加矣，当以此語反三隅也。

又云：

> 淮阴胜而不驕，乃能师李左車，最奇特事，荆公詩云："將軍北面师降虜，此事人間久寂寥。"李广誅霸陵尉，薄于德矣，东坡詩云："今年定起故將軍，未肯說誅霸陵尉。"用事当如此向背。

"点鬼簿"的掌故出于唐代张鷟的朝野佥载，说杨炯为文，"好以古人姓名连用，号为点鬼簿"。许彦周当然受彼影响，不过据此提出向背以及其他"精妙明密"的方法，就算他的贡献了。此外如谈鍜鍊，谈熟读，都无新义。

四　張戒岁寒堂詩話

张戒岁寒堂诗话，标举言志咏物，责斥用事押韵：

建安陶阮以前詩專以言志，潘陆以后詩專以咏物，兼而有之者李杜也。言志乃詩人之本意，咏物特詩人之余事。古詩、苏、李、曹、刘、陶、阮，本不期于咏物，而咏物之工卓然天成，不可复及，其情眞，其味長，其气胜，視三百篇几于无愧，凡以得詩人之本意也。潘陆以后，專意咏物，雕鐫刻鏤之工日以增，而詩人之本旨扫地尽矣。（武英殿聚珍版叢书本卷上）

诗人的本意是言志，诗人的余事是咏物，张戒认为二者当兼而有之。兼而有之的方法是以言志为主，万不可专意咏物。以言志为主的诗可以兼有"咏物之工"，专意咏物则诗人之本旨——就是言志的本意——扫地尽矣。至用事押韵，那就更下一等：

詩以用事为博，始于顏光祿，而极于杜子美；以押韵为工，始于韓退之，而极于苏黄。然詩者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岂專意于咏物哉？子建"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本以言妇人淸夜独居愁思之切，非以咏月也，而后人咏月之句，虽极其工巧，終莫能及，淵明"狗吠深巷中，鷄鳴桑树巓"，本以言郊居閑适之趣，非以咏田园，而后人咏田园之句，虽极其工巧，終莫能及。故曰"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咏歎之，咏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后人所謂"含不尽之意"者，此也；用事押韵何足道哉？苏黄用事押韵之工，至矣尽矣，然究其实乃詩人中一害，使后生只知用事押韵之为詩，而不知咏物之为工，言志之为本也，风雅自此扫地矣！（卷上）

陶阮以前专以言志，潘陆以后专以咏物，颜杜用事，韩愈至苏黄押韵，并古代风骚，可以分为五等：

国朝諸人詩为一等，唐人詩为一等，六朝詩为一等，陶阮建安七子兩汉为一等，风騷为一等，学者須以次参究，盈科而后进可也。黄魯

直自言学杜子美，子瞻自言学陶渊明，二人好恶已自不同，鲁直学子美，但得其格律耳，子瞻则又专称渊明，且曰"曹、刘、鲍、谢、李、杜诸子皆不及也。"夫鲍谢不及则有之，若子建、李、杜之诗，亦何愧于渊明？即渊明之诗妙在有味耳，而子建诗微婉之情，洒落之韵，抑扬顿挫之气，固不可以优劣论也。古今诗人推陈王及古诗第一，此乃不易之论。至于李杜，尤不可轻议。

国风离骚固不论，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余之此论，固未易为俗人言也。子瞻以议论作诗，鲁直又专以补缀奇字，学者未得其所长，而先得其所短，诗人之意扫地矣。段师教康昆仑琵琶，且遣不近乐器十余年，忘其故态。学诗亦然：苏黄习气净尽，始可以论唐人诗，唐人声律习气净尽，始可以论六朝诗，镌刻之习气净尽，始可以论曹、刘、李、杜诗。(并卷上)

风骚一等就是"国风离骚固不必论"的一等，其余当然以陶、阮、建安、两汉一等为最高，国朝一等为最低。因为陶阮以前专以言志，可是兼有咏物之工；国朝诸诗人以苏黄为宗，苏以议论作诗，黄又专以补缀奇字，失掉言志咏物的诗意，堕入用事押韵的深渊。所以必须"苏黄习气净尽，始可以论唐人诗；唐人声律习气净尽，始可以论六朝诗，镌刻之习气净尽，始可以论曹、刘、李、杜诗"。这种论调与朱熹颇相近，不知曾否互相影响。

国风的所以推为"固不必论"，因为不但"专以意志"，而且经孔子削删，存传的都"思无邪"：

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世儒解释终不了，余尝观古今诗人，然后知斯言良有以也。诗序有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其正少，其邪多，孔子删诗，取其思无邪者而已。自建安七子六朝有唐及近世诗人，思无邪者惟陶渊明杜子美耳，馀皆不免落邪思也。六朝颜、鲍、徐、庾，唐李义山，国朝黄鲁直，乃邪思之尤者，鲁直诗虽不多说妇人，然其韵度矜持，

冶容太甚，足以蕩人心魄，此正所以为邪思也。魯直專学子美，然子美詩讀之使人凛然兴起，肃然生敬，詩序所謂"經夫妇，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风俗"者也，豈可与魯直詩同年而語耶？

"言志"是旧话，但张戒说言志可以兼咏物之工，专意咏物则流于雕鎸刻镂，寖假而至于用事押韵，补缀奇字，沦为诗人中一害，遂成为新说。"思无邪"也是旧话，但张戒說韵度矜持，冶容太甚也是邪思，进而据以分别杜黄，遂成为新解。

往在桐廬見呂舍人居仁，余問魯直得子美之髓乎？居仁曰"然。""其佳处焉在？"居仁曰："禪家所謂死蛇弄得活。"余曰："活則活矣。如子美'不在晏公三十年，封书寄与淚潺湲，旧来好事今能否，老去新詩誰与傳'，此等句，魯直少日能之。'方丈涉海费时节，元圃寻河知有无，桃源人家易制度，橘州田土仍膏腴'，此等句，魯直晚年能之。至于子美'客从南溟来，朝行青泥上'，壯游，北征，魯直能之乎？如'莫自使眼枯，收汝泪从横，眼枯却見骨，天地終无情'，此等句，魯直能到乎？"居仁沈吟久之曰："子美詩有可学者，有不可学者。"余曰："然則未可謂之得髓矣。"

这种指摘很正确，本来黄的学杜止在格律法度，杜的悲天悯人，黄并未措意。（参七章一至三节）

五　严羽滄浪詩話

无疑的，从诗学的观点衡量宋代诗话，当以严羽沧浪诗话为巨擘。后人的承用及批评，恐怕沒有人能一一缕述，单说写成专书的就有清人冯班纠谬一卷，胡鉴注四卷，今人胡才甫笺注一册，可见影响之大。全书分诗辯、诗体、诗法、诗评、诗证五门，提供的新义有下列四说：

（一）禅悟说——诗辯云：

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韓退之远

羽的重要诗说，也是重要贡献，可惜后人往往忽略。

（四）兴趣说——严羽虽"从顶𩕳上做来"，但据诗辩，实在是"推原汉魏以来，而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自注云："后舍汉魏而独言盛唐者，谓古律之体备也。"关于盛唐诗的妙处，诗辩云：

> 詩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徹玲瓏，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

这一望而知其源出司空图，不过司空图归于韵味，严羽归于兴趣；韵味是风格问题，（参五篇五章五节）兴趣则属于情性。情性是先天的，可也与后天陶冶有关。诗辩云：

> 夫詩有别材，非关书也；詩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讀书，多穷理，則不能极其致。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

是陶冶的方法在读书穷理。要读书明理而又力戒直接入诗，也是在鍼贬江西及其他当时诗人而发。所以诗辩云：

> 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詩，以才学为詩，以議論为詩；夫岂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蓋于一唱三歎之音，有所歉焉。

六 詞 論

词话兴起以前已有词论，就我们所知，苏轼曾力倡"词为诗裔"。（详六章四节）可是不要说旁人，他的弟子，就止有张耒与之同调，余则秦观不肯遵守，（详六章四节）晁无咎陈师道更持论相反。张耒的贺方回乐府序云：

> 文章之于人，有滿心而发，肆口而成，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性情之道也。……賀方回博学业文，而乐府之詞，高絕一世，攜一編示予，大抵倚声而为之詞，皆可歌也。或者譏方回好学能文，而惟是为工何哉？余应之曰：是所謂滿心而发，肆口而

汉魏晋与盛唐之詩，則第一义也；大曆以还之詩，則小乘禪也，已落第二义矣；晚唐之詩，則声聞辟支果也。学汉魏盛唐詩，临济下也；学大曆以还之詩者，曹洞下也。

诗评也再四标评盛唐大曆以及晚唐诗的优劣，虽沒有提出初唐中唐二名，但盛唐之前应有初唐（诗体也正于“盛唐体”前列“唐初体”），盛晚中间的大曆以还即为中唐。

悟有深浅是在反江西，唐分盛晚是在反四灵。诗辯云：

近世赵紫芝翁灵舒輩，独喜賈島姚合之詩，稍稍复就清苦之风，江湖詩人多效其体，一时自謂之唐宗，不知止声聞辟支之果，岂盛唐諸公大乘法眼者哉？

（三）上学说——始创江西派的黄庭坚本来学杜，可是年事稍晚的陈师道就以学黄为学杜楷梯，宋末的江西余裔更以稍前的江西诸子为学黃陈楷梯，四灵矫正江西，也止能溯至晚唐，都是下学法。严羽鄙江西四灵，由是改创上学说。诗辯云：

夫学詩当以識为主，入門須正，立志須高，以汉魏晉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若退屈即有下劣詩魔入其肝腑之間，由立志之不高也。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头一差，愈騖愈远，由入門之不正也。故曰：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又曰：見过于师，仅堪傳授；見与师齐，減师半德也。工夫須从上做下，不可从下做上。先須熟讀楚辞，朝夕风咏以为之本；及讀古詩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汉魏五言，皆須熟讀；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經；然后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虽学之不至，亦不失正路。此乃是从頂顪上做来，謂之向上一路，謂之直截根源，謂之頓門，謂之單刀直入也。

稍前的朱熹张戒虽也有学上之意，但沒有象严羽这样的彰明較著的提出。宋代的诗学本来是模仿，江西派从脚下做，虽目标在头，往往做不到头，严羽从头上做来，确是“直截本源”。这是严

甚，而其詩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妙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

严羽以前的韩驹吕本中已倡言妙悟，严羽当然受其影响；（参七章五、六两节）不过虽受其影响，而旨趣则相反不同。严羽答吳景仙书云：

仆之詩辯，乃断千百年公案，誠惊世絕俗之談，至当归一之論。其間說江西詩病，眞取心肝劊子手，以禪喻詩，莫此亲切。是自家实証实悟者，是自家閉門鑿破此片田地，却非傍人籬壁，拾人涕唾得来者。李杜复生，不易吾言矣。（詩話附录）

可见他最自矜重的是诗辯，诗辯中最自矜重的是禅悟，禅悟就在"说江西诗病"。诗辯云：

然則近代之詩无可取乎？曰：有之，吾取其合于古人者而已。国初之詩，尙沿襲唐人。……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詩，唐人之风变矣。山谷用工尤为深刻，其后法席盛行，海內称江西宗派。

虽不见得眞能刽取心肝，但确是在尽力讥贬。依我们所知，他的妙悟说出于韩吕，可是他却说"是自家闭门凿破此片田地"，虽然狂妄夸大，但也眞是较韩吕有进步。诗辯云：

悟有深淺，有分限；有透徹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汉魏尙矣，不假悟也；謝灵运至盛唐諸公，透徹之悟也；他虽有妙者，皆非第一义也。

非第一义之悟，即但得一知半解之悟，大概就是指韩吕及其他江西诗人而言。

（二）四唐说——自元人杨士宏撰唐音，明人高棅撰唐诗品汇，论唐诗的每分为初、盛、中、晚四期，穷源索本，实始严羽。诗辯云：

禪家者流，乘有小大，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学者須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若小乘禪，声聞辟支果，皆非正也。論詩如論禪，

成，虽欲已焉而不得者。若其粉泽之工，则其才之所至，亦不自知也。夫其盛丽如游金张之堂，而妖冶如揽嫱施之袪，幽洁如屈宋，悲壮如苏李，览者自知之，盖有不可胜言者矣。（柯山集，聚珍版丛书本卷四十）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引晁无咎评宋朝乐章云：

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声甘州云："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唐人语，不减高处矣。欧阳永叔浣溪沙云："堤上游人逐画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绿杨楼外出秋千"，要皆妙绝，然只一出字，自是后人道不到处。苏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居士辞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黄鲁直闲作小词，固高妙，然不是当行家语，自是著腔子唱好诗，晏元献不蹈袭人语，而风调闲雅，如"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知此人不住三家村也。张子野与柳耆卿齐名，而时以子野不及耆卿，然子野韵高，是耆卿所乏处。近世以来，作者皆不及秦少游，如"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虽不识字，亦知是天生好言语。（又见诗人玉屑卷二十一）

陈师道后山诗话卷二云：

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尔，唐诸人不迨也。（后山集廿九）

词是文学，也是音乐，从文学的观点看来，词不殊于诗，所以苏轼说"词为诗裔"。张耒虽称赞贺方回的词"皆可歌"，但先泛言文章，最后又以屈、宋、苏、李比况，那末也是以文学的观点评词，也是说诗词相同。陈师道说苏轼"以诗为词"，"要非本色"，大概就是指其"不谐音律"。"不谐音律"的苏词，晁无咎解云，"曲子中缚不住者"，那末曲子中缚住者自然是应谐音律。所以晁陈的见解相近，都是占在音乐的观点，说诗词应当异路。后来论词的虽各有所见，但大体仍是这两种观点，如苏辙的孙子苏籀，书三学

士长短句新集后云:

黄太史(庭坚)纖穠精稳,体趣天出,簡切流美,能中之能,投弃斧斤,有佩玉之雍容。秦校理(观)落尽畦畛,天心月胁,逸格超絶,妙中之妙,議者謂前无倫,而后无繼。晁南宫(无咎)平处言近文緩,高处新規胜致,朱絃三歎,斐丽音旨,自成一种姿致。(双溪集,粤雅堂叢书本卷十一)

南宋初年的郑刚中,作乌有编序云:

長短句亦詩也。詩有节奏,昔人或長短其句而歌之,被酒不平,謳吟慷慨,亦足以发胸中之微隐。(北山集,金华叢书本卷十三)

南宋末年的林景熙,作胡汲古乐府序云:

唐人花間集,不过香奩組織之辞,詞家爭慕傚之,粉泽相高,不知其靡,謂乐府体固然也。一見鉄心石肠之士,譁然非笑,以为是不足涉吾地。其习而为者,亦必毁剛毁直,然后宛轉合宫商,嫵媚中繩尺,乐府反为性情害矣。乐府、詩之变也,詩发乎情,止乎礼,美化厚俗,胥此焉寄,岂一变为乐府,乃遽与詩异哉?(霽山集,知不足齋叢书本卷五)

都偏于以文学的观点立论。李之仪跋吳思道小词云:

長短句于遺詞中最为难工,自有一种风格,稍不如格,便覺齟齬。唐人但以詩句而用和声抑揚以就之,若今之歌阳关曲是也。至唐末遂因其声之長短句而以意填之,始一变以成音律。大抵以花間集中所載为宗,然多小闋。至柳耆卿始鋪叙展衍,备足无余,形容盛明,千載如逢当日,較之花間所集,韵終不胜:由是知其为难能也。張子野独矯拂而振起之,虽刻意追逐,要是才不足而情有余,良可佳者。晏元宪、欧阳文忠、宋景文,則以其余力游戏,而风流閑雅,超出意表,又非其类也。諦味研究,字字皆有据,而其妙見于卒章,語尽而意不尽,岂平平可得髣髴哉?(姑溪居士集,粤雅堂叢书本卷四十)

女词人李易安云:

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开元天宝间。……自后郑卫之声日炽，流靡之变日烦，已有菩萨蛮、春光好、莎鸡子、更漏子、浣溪沙、梦江南、渔父等词，不可偏举。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楼吹彻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之词，语虽奇甚，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又有张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绛、晁次膺辈继出，虽时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者，何邪？盖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且如近世所谓声声慢、雨中花、喜迁莺，既押平声韵，又押入声韵，玉楼春本押平声韵，又押上去声，又押入声，本押仄声韵，如押上声则协，如押入声则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乃知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后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无铺叙，贺苦少典重，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黄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半矣。（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卅三）

都是偏于以音乐的观点立论，虽然也不忽略文学。

七　词　　话

唐圭璋先生的词话丛编收宋人词话七种：

碧鸡漫志五卷，王灼撰。

能改斋漫录二卷，吴曾撰。

苕溪渔隐词话二卷，胡仔撰。

魏庆之词话一卷，魏庆之撰。

浩然斋雅谈一卷，周密撰。

詞源二卷，張炎撰。

乐府指迷一卷，沈义父撰。

赵万里先生据辑宋金元人词辑宋人词话三种：

时賢本事曲子集一卷，楊繪撰。

古今詞話一卷，楊偍撰。

复雅歌詞一卷，鲖阳居士撰。

但能改斋漫录原为笔记，此摘录十六十七论乐府二卷。苕溪渔隐丛话原为诗话，此摘录前集五十九、后集三十九论乐府二卷。魏庆之词话亦原为诗话，此摘录卷二十的附论诗余。浩然斋雅谈亦原为笔记，此摘录清四库馆臣所辑下卷的论乐府，都不是词话专著。梁任公先生记时贤本事曲子集，谓是"最古之宋词总集""亦可称为最古词话"。（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十六册）今案张侃拙轩集卷五有跋拣词，共十六则，除最后一则论李商隐锦瑟诗外，都是论词的。自志云：

予监金台之次年，榷酒之暇，取向所录前人詞，别写一通，及数年来議論之涉于詞者附焉。傳不云乎，"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賢乎已。"若未泥紙上之空言，极舞裙之逸乐，非惟違道，适以伐性，予則不敢。（四庫珍本本）

还不也是词话？杨绘卒于元祐（宋史三二二本传），张侃自志署绍圣四年（一〇九四），相去不远。杨偏于隶事，体同于本事诗；张偏于议论，批评的意味较浓，不过也沒有提出新的意见。宋代词话有新意见的止有王灼、张炎、沈义父三家：

（一）王灼碧鸡漫志——如四库提要所言："是编详述曲调源流"，但卷二却批评五代北宋词，特别崇尊苏轼，睥睨柳永，说苏轼指出向上一路，柳永是野狐涎：

东坡先生以文章余事作詩，溢而作詞曲，高处出神入天，平处尙

贻鏡笑春，不顧儕輩。或曰"長短句中詩也"，为此論者乃是遭柳永野狐涎之毒。詩与乐府同出，岂当分异？若从柳氏家法，正自不分异耳。

柳誉卿（永）乐章集，世多爱賞該洽，序事閑暇，有首有尾，亦間出佳語，又能擇声律諧美者用之。惟是淺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予尝以比都下富儿，虽脫村野，而声态可憎。

長短句虽至本朝盛，而前人自立与眞情衰矣。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然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今少年妄謂东坡移詩律作長短句，十有八九不学柳誉卿，則学曹元寵，虽可笑亦毋用笑也。

尊苏卑柳，基于偏重文学观点。"诗乐同出"，较"词为诗裔"更进一步。从历史言，"词为诗裔"，则词的起源止能溯于晚唐五代；"诗乐同出"，则可溯于远古唐虞。碧鸡漫志发端设或问歌曲所起，王灼答云："天地始分而人生焉，人莫不有此心，此歌曲所以起也。"从性质言，"词为诗裔"则词已不限于"倚红偎翠"，而应当接受诗的言志抒情；"诗乐同出"，则词更不惟应当接受诗的言志抒情，还应当接受古乐的崇雅正，黜俗艳。反柳就是恶其俗，反曹就是恶其艳。漫志卷二云：

元祐間王齐叟彦龄，政和間曹組元寵，皆能文，每出長短句，膾炙人口。彦龄以滑稽語譟河朔，組潦倒无成，作紅窗迥及杂曲数百解，聞者絕对，滑稽无賴之魁也。

今之士大夫学曹組諸人鄙穢歌詞，則为艳丽如陈之女学士狎客，为"纖艳不逞淫言媟語"如元白，为側艳曲如溫飞卿，皆不敢也。

他攻击侧艳的地方还很多，最甚者如说李易安"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搢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籍者也。"

（二）张炎词源——阮元四库未收书目提要云："上卷详论五音十二律，律吕相生，以及宫调管色诸事。……下卷历论音谱、拍

眼、制曲、句法、字面、虚字、清空、意趣、用事、咏物、节序、赋情、离情、令曲、杂论、五要十六篇。"自制曲以下，是在说作词的方法与意态。作词五要原作于杨守斋：

第一要择腔，腔不韵则勿作。

第二要择律，律不应腔则不美。

第三要填詞按譜。

第四要随律押韵。

第五要立新意。

杂论云："(杨)守斋持律甚严，一字不苟作，遂有作词五要，观此知词欲协音，未易言也。"张炎作词源，正是在言"词欲协音"，故首论五音十二律。但杂论又云：

詞之作必須合律，然律非易学，得之指授方可。若詞人方始作詞，必欲合律，恐无是理，所謂千里之程，起于足下，当漸而进可也。……音律所当参究，詞章先宜精思，俟語句妥溜，然后正之音譜，二者得兼，則可造极元之域。

所以他也从词章方面说提示作法，如制曲云：

作慢詞看是甚題目，先擇曲名，然后命意，命意旣了，思量头如何起，尾如何結，方始选韵，而后述曲，最是过片，不要断了曲意，須要承上接下。……詞旣成，試思前后之意不相应，或有重迭句意，又恐字面粗疏，即为修改，改毕，淨写一本，展之几案間，或貼之壁，少頃再观，必有未稳处，又須修改，至来日再观，恐又有未尽善者，如此改之又改，方成无瑕之玉。倘急于脫稿，倦事修擇，岂能无病，不惟不能全美，抑且未协音律。作诗者且犹句锻月炼，况于词乎？

此外句法、字面、虚字、用事、咏物、节序，也都是就修辞说作法。清空一条云："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昧。"杂论云："词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为情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耆卿伯可不必论，虽美成亦有所不免。……所谓淳厚

日变成浇风也。”是张炎也是推崇雅正的。

(三)沈义父乐府指迷——沈是主张诗词不同的，绪言曾有征引，(参一篇一章八节)又全书发端首云：

余自幼好吟詩，壬寅秋，始識靜翁于泽濱，癸卯識夢窗，暇日相与倡酬，率多塡詞，因講論作詞之法，然后知詞之作难于詩。盖音律欲其协，不协則成長短之詩；下字欲其雅，不雅則近乎纏令之体，用字不可太露，露則直突而无深長之味；发意不可太高，高則狂怪而失柔宛之意：思此則知所以为难。

事实上，词到了南宋，已逐渐由教坊俗唱变为文人雅歌，所以尽管沈义父力唱诗词不同，也要一方面强调词不能成为长短之诗，一方面又强调不近乎缠令之体，指迷又云：

前輩好詞甚多，往往不协律腔，所以无人唱，如秦樓楚館所歌之詞，多是教坊乐工及市井做賺人所作，只緣音律不差，故多唱之，求其下語用字，全不可讀。甚至咏月却說雨，咏春却說秋，如花心动一詞，人目之为一年景。又一詞之中，顚倒重复，如曲游春云“臉薄难藏泪”，过云“哭得渾无气力”，結又云“滿袖啼紅”。如此甚多，乃大病也。

赚人所作是赚词，与缠令相仿。正当的路途，沈义父说“当以清眞(周邦彦)为主，盖清眞最知音，且无一点市井气。”知音便可以协律，无市井气便不致近于缠令。至谓鍊句下语，不可说破，如咏桃不说桃，只用红雨刘郎等字，四库提要已指出，欲避鄙俗，“转成涂饰”。

八 文　　話

诗话中偶亦谈文，以“文”名书的，始强行父所记唐子西文录，但仍以诗为主。东坡文谈录(载学海类编，一卷)，是专门谈文的，但辑者乃元人陈秀明。直斋书录解题文史类著文说一卷，

注“南城包显道录朱侍讲论文之语”。久已亡佚。宋志及宋阙目著王瑜卿文旨一卷，亦亡。明人胡文焕格致丛书论文类有张镃文学规范一书，但那是录自张氏仕学规范，一则不是专书，二则都是采辑的他人言论。今存宋人谈文专书，当以陈骙文则为最早，次之就是李耆卿文章精义。

（一）陈骙文则——书分上下两卷，自序于乾道庚申（一一七〇），所论大都属于文法修辞。卷上云：

> 事以簡为上，言以簡为当。言以載事，文以著言，則文貴其簡也。文簡而理周，斯得其簡也；讀之疑若有闕焉，非簡也，疎也。（台州叢书本）

这是他的繁简论。此外最重要的为论助辞：

> 文有助辞，犹礼之有儐，乐之有相也；礼无儐则不行，乐无相则不諧，文无助則不順。

论倒言：

> 倒言而不失其言者，言之妙也；倒文而不失其文者，文之妙也。

论辞有病疑缓急轻重：

> 病辞者，讀其辞則病，究其意則安。……疑辞者，讀其辞則疑，究其意則断。
>
> 辞有緩有急，有輕有重，皆生乎意也。

论十喻：

> 一曰直喻，或言犹，或言若，或言如，或言似，灼然可見。
>
> 二曰隐喻，其文虽晦，义則可尋。
>
> 三曰类喻，取其一类以次喻之。
>
> 四曰詰喻，虽为喻文，似成詰难。
>
> 五曰对喻，先比后証，上下相符。
>
> 六曰博喻，取以为喻，不一而足。
>
> 七曰簡喻，其文虽略，其文甚明。

八曰詳喻，須假多辞，然后义显。

九曰引喻，援取前言，以証其事。

十曰虛喻，旣不指物，亦不指事。

论二援：

援引詩书，莫不有法，推而論之，盖有二端，一以断行事，二以証立言。

论接踵体：

文有上下相接，若繼踵然。其体有三，其一曰叙积小至大，……其二曰叙由精及粗，……其三曰叙自流极源。

论交错体：

文有交錯之体，若纏糾然，主在析理，理尽无已。（幷卷上）

此外分论经传以及韩文的文法，不一一征引。

（二）李耆卿文章精义——四库提要云，"不著时代"。又据焦竑经籍志有李淦文章精义二卷，谓"耆卿或淦之字"。今案彼为二卷，此为一卷，不知是否亡佚或合幷。书中引及文章正宗，当在眞德秀之后。眞德秀出朱熹，此亦时引朱熹说，赞谓"三百篇之后，一人而已"。又云：

晦庵詩意卽从韋柳中来，而理趣过之，所以不可及。苏門文字到底脫不得縱橫习气，程門文字到底脫不得訓詁家风。（文学津梁本）

四库提要誉为"持平之论，破除洛蜀之门户，尤南宋人所不肯言"。实则朱熹已有揉合洛蜀的倾向，不过沒有象李耆卿这样的彰明论列而已。（详九章二节）书中最新颖的见解是反对立意：

做文字人須放胸襟如太虛始得。太虛何心哉？清輕之气，旋轉乎外，而山川之流峙，草木之荣华，禽兽昆虫之飞跃，游乎重濁渣滓之中，而莫覺其所以然之故。人放得此心，廓然与太虛相似，則一旦把笔为文，凡世之治乱，人之善惡，事之是非，某字当如何书，某句当如何下，某段当先，某段当后，殆如妍媸之在鉴，如低昂之在衡，决不知

(疑当作至)颠倒錯乱，虽进而至圣經之文可也。今人时文，动輒先立意，如詩賦策論，不知私意偏见，不足以包尽天下之道，以及主意有所不通，則又勉强迁就，求以自伸。其若是者，时文之陋态也，可不戒哉？

所见甚为精闢，的确先立意，便不免勉强迁就，不能包尽天下之道。晋代的陆机(三篇一章二节)和唐代的杜牧(五篇一章三节)都曾說到"意"，但"立意"应当說是倡于苏軾，故此可能是针对苏軾的流弊而发。可是另一条說"行乎其所不得行，止乎其所不得止，眞作文之大法也"，则又采用了苏軾的見解。

九 四 六 話

最早的四六話是王銍所作上下两卷。据宣和四年(一一二二)自序，其父"从滕元发郑毅夫论作赋与四六，其学皆极先民之渊蘊。銍每侍教誨，常语以为文为诗赋之法"。由是类次而益以"所聞于交游间四六話事实，私自记焉"。序又云："世所謂箋題表启，号为四六者，皆诗赋之苗裔也。"此所謂诗赋指场屋所试而言。大概唐宋的古文运动，并没有打进科场和官场，科场所试的始终是律赋，官场所用的始终是四六文，律赋四六文都是骈体，所以王銍說四六是诗赋的苗裔。论赋格的书，唐朝以迄五代前后很有几家，可惜都已亡佚。(详五篇三章十节)范仲淹赋林衡鉴序云："少游文场，尝禀詞律，惜其未获，窃以成名。近因余闲，载加研玩，颇见规格，敢告友朋。其于句读声病，有今礼部之式焉；别析二十门以分其体势。"大概是讲体势的赋总集，今也亡佚。宋志及宋閲目载吳处厚赋评一卷，今也亡佚。李廌师友谈记载秦观论科场律赋十余则，中有一则云："国朝前輩多循唐格，文冗事迂，独宋、范、滕、郑数公得名于世。"滕郑当即王銍父从论

赋与四六的滕元发郑毅夫，益可证明四六文的与赋相通。王应麟著词学指南四卷，首言编题、作文法、诵书、编文，末言试卷式、题名，中列制诰以迄颂序范文，专为便利词科，也与四六有关。

各家文集笔记以至诗话中常论及四六，洪迈容斋随笔所谈，且有人辑为一卷，命名容斋四六丛谈，刻入学海类编。但零零碎碎，很少明晰的见解，专书除四六话外，还有四六谈麈和云庄四六余话两书。费衮梁溪漫志卷五云："古今人作诗话多矣，近世谢景思（伋）作四六谈麈，王性之（铚）作四六话，甚新而奇，前未尝有此。"四库提要责王铚"但较胜负于一联一字之间"，称谢伋"以命意遣词分工拙，视王铚四六话所见较深"。实则彼胜于此则有之，大不了的差别是没有的。本来四六止是官场应用文，评论者除了就字句较胜负，也不会有再好的方法，因也不易有再好的见解。四六话卷上云：

> 四六有伐山语，有伐材语。伐材语者，如已成之柱桷，略加绳削而已；伐山语者，则搜山开荒，自我取之。伐材谓熟事也，伐山谓生事也。生事必对熟事，熟事必对生事。若两联皆生事，则伤于奥涩；若两联皆熟事，则无工，盖生事必用熟事对出也。（学津讨原本）

四六谈麈云：

> 四六施于制诰表奏文檄，本以便于宣读，多以四字六字为句，宣和间多用全文长句为对，习尚之久，至今未能全变，前辈无此体也。
>
> 四六之工在于裁剪，若全句对全句，亦何以见工？（学津讨原本）

前书提出伐山取材，后书提出工在裁剪，就算很难得了。前书必以生熟相对，未免太拘，确是不及后书。

云庄四六余话载说郛，旁注"二卷"，但不足十则，知删落甚多。题宋相国道，注云"字深中"。考宋志小说类著杨囦道四六余话二卷，直斋书录解题文史类著一卷，解云，"杨渊撰，未详何

人，视前二家为泛杂”。囦古渊字，作者或名杨渊道，字深中，说郛脱“渊”字，直斋脱“道”字，“相”字为“杨”字残毁，后人以“相”非姓，遂增“国”字，而作者遂似姓宋名道，实则宋乃朝代名，说郛例先举朝代也。直斋谓“视前二家为泛杂”，当指王谢二书，就今存数则观之，也诚然是泛杂而缺乏明确的意见。

十 詩文評点

評是很早的，点起何时，可从字训索答。尔雅“灭谓之点”。郭璞注，“以笔灭字为点”。唐写本切韵，五代王仁昫切韵，以及宋代重修的广韵，都云“点、点画”。洪武正韵则云，“点、注也”。是汉晋所谓点指以笔灭字，唐宋所谓点指以笔点画，元明以后所谓点指以笔点注。点画是长抹，点注是圆滴。

后汉书文苑下弥衡传，“文不加点”。晋纪“刘琨作劝晋表，无所点窜”。（引见文选卅八劝晋表注）世说新语文学篇，阮籍为文，“无所点定”。都指以笔灭字。韩愈秋怀诗云：“不如覷文字，丹铅事点勘。”（昌黎集一）魏了翁跋修全赵公所作蒙箴云：“予生虽后，尚及见大父行，于经子百氏书，皆复纸细字，丹铅点勘。”（鶴山集六五）宋人所谓标注笺校，大抵以己见评骘，故点疑指以笔抹画。自然唐代也还有用指点灭的。如刘知几史通点烦篇云：“钞自古史传文，有烦者皆以笔点其烦，凡字经点者，尽宜去之。”又李商隐韩碑云：“点窜尧典舜典字，涂改清庙生民诗。”（义山诗集，四部丛刊卷二）但唐写本切韵既释为点画，不释为点灭，知用指点灭是徇古，知用点画才是从今；宋以后所谓点勘率指点画，则韩愈所谓点勘也大概指点画。至元明以后的点注，至今用之，尽人皆知，无庸举例了。

韩愈的点勘今不可见，可见的有宋人苏洵的苏评孟子二卷。

四库提要云：

> 宋人读书，于切要处率以笔抹，故朱子语类论读书法云："先以某笔抹出，再以某笔抹出。"吕祖谦古文关键，楼昉迂斋评注古文，亦皆用抹，其明例也。谢枋得文章规范，方回瀛奎律髓，罗椅放翁诗选，始稍稍具圈点，是盛于南宋矣。此本有大圈，有小圈，有连圈，有重圈，有三角圈，已断非北宋人笔。其评语全以时文之法行之，词意庸浅，不但非洵之语，亦断非宋人之语也。

然则此是伪书。不过抹乃抹画，疑即点画，朱子所谓"先以某色笔抹出，再以某色笔抹出"，正是韩愈所谓"丹铅事点勘"。大概最早的抹画止施于文章的关键之处，后来也施于警策之句，施于关键之处的是长画，施于警策之句的是短画，短画逐渐变为点，由点又扩充为圈。元刊本东坡诗及明刊本杜工部诗的点都是长画，其形为——，元刊本李长吉歌诗，王荆文公诗，则或为长画，其形与杜苏诗同；或为撇画，其形为ノ；或为捺画，其形为㇏；或为逗画，其形为、。(四书皆原中央图书馆藏)元刊本王右丞集没有撇画，余三种杂用，捺画下垂，其形为亅。(据四部丛刊影印本)他书亦往往如此。这些书都点于刘辰翁，而形样纷然不同，究竟原出刘辰翁或改于后人不可知，但撇画捺画显然是长画的蜕变，而逗画则当是缩抹。明刊本罗椅和刘辰翁两家放翁诗选的点大半为长画，而一句之旁，便有时为撇画、捺画或逗画(据四部丛刊影印本)，益可证撇捺点是抹的无意或有意的蜕化，意义与作用完全相同。明刊本方逢辰点的止斋奥论用圆点，其形为·(原中央图书馆藏本)，想又是缩抹的圆描。后来的点止用缩抹圆描两种，所以洪武正韵释为"注也"，由是点的义意与"画"不同，而点抹遂歧为两种。

四库谓吕楼两家皆止用抹，今案金华丛书本古文关键前附

凡例云:"此编家藏两宋刻,刻有先后。""前本不施圈点,偶点其一二用字着力处,圈则竟无之;后本稍用圈点,或一二字,或一二段之下,间有着圈者,点则连行连句有之。"明嘉靖本迂斋先生标注崇古文诀,则有抹也有圈点。(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本)宋刊古文关键前本有点无圈,知圈出于点,点在圈前。

抹点一律在字的右旁,圈则变化较多,除了四库所举伪苏评孟子曾使用的各种以外,崇古文诀还有领圈围圈两种。如卷二陈政事书"假使陛下居齐桓之处","假使陛下如曩时","假使"二字右旁有圈,大概意在指出领起下文,后来多移于右上角,或改用三角圈。这也可见苏评孟子确是晚出书。崇古文诀卷二十八法原,"法者何也","未尝无法而久者也","法"字皆以圈围之,其式为㊈;围圈之意,大概在标举题眼。

韩魏所谓点勘之勘,并不同于今人所谓校勘,而是指以己意"批评"。清末的吴汝纶有群书点勘,实在就是群书评点。黄庭坚尝欲就杜诗的"欣然会意处,笺以数语"。(详七章二节)楼昉的崇古文诀冠有"标注"二字,吕祖谦有标注三国志详节(中央图书馆藏有南宋建安刊本),谢枋得有唐诗绝句注(有卢前补注本,会文堂出版),所谓"笺"或"注"实在都是"批评"。这种批评,大抵偏重诗文关键,如崇古文诀卷一答燕惠王书,"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所以事先王之心"。旁注云"书中多说此二句"。所以评的起源虽很早,而这种指陈关键利病的随文批评,实出于点勘标注,是唐宋人的新法。

不过韩愈的点勘既亡,苏评孟子又是伪书,则现在可见到的,当以吕祖谦古文关键为最早,次之为楼昉崇古文诀、谢枋得文章规范、真德秀文章正宗等书。失姓氏古文关键旧跋云:

古文关键一册,乃前贤所集古今文字之可为人法者,东莱先生批

注詳明。

又张云章序云：

> 有宋一代文章之事盛矣，而集录古今之作，傳于今者仅三四家，夫亦得其当者鮮哉。眞西山（德秀）宗謝迭山（枋得）規范，其傳最显，格制法律，或詳其体，或举其要，可为学者准則。而迂齋樓氏之标注，其源流亦軌于正。……以余考之，是三书皆东萊先生开其宗者。

此等批评有两种方式，一是循行摘罂，一是眉批总评。如古文关鍵卷一获麟解首云："麟之为灵昭昭也。"旁批云"起得好"。是寻行摘罂。如文章规范卷一上张仆射云："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眉批云"一句说破"。又篇后云："先叙情之不堪，中间发一段大道理，后出所宜处者，一正一反，须看他运旋得排蕩噴薄演漾处。"是眉批总评。四库责苏评孟子评语"全以时文之法行之"，吕谢诸家的评语，也是"以时文之法行之"。评点的作用，当时本来是"取便科举"，（详一篇一章二节）古文关鍵附总论看文学法，论作文法，论文字病。文章规范分为放胆文，小心文两种，说："凡学文，初要胆大，終要小心。"周弼三体唐诗分七言绝句为实接、虚接、用事、前对、后对、拗体、側体七格，分七言律诗为四实、四虚、前虚后实、结句、咏物六格，分五言律诗为四实、四虚、前虚后实、前实后虚、一意、起句、结句七格，也都是"取便科举"。直到宋末元初的方逢辰，批点止斋先生奥论，前六卷为论，实在多是四书文，后二卷为奏及序记书状，也是"取便科举"。但同是宋末元初的刘辰翁，以全副精神，从事评点，则逐漸摆脱科举，专以文学论工拙。明人汇刻所评各书为"刘须溪批评九种"，內包括班马异同評三十五卷，老子庄子列子上下卷，世説新语三卷，李长吉歌诗四卷，王摩诘诗四卷，杜工部诗集二十卷，苏东坡诗二十五卷。另外今可见者，还有放翁诗选集八卷，别集一卷（四部

从刊影明初本),王荆文公诗五十卷(原中央图书馆藏元大德五年刊本)。放翁诗选的所以名为后集,因为以前的罗椅已有评选放翁诗集十卷(四部丛刊影明初本),可见摆脱科举,专以文学观点评诗文者,刘辰翁以前已有人在。

四库提要说刘辰翁的批点,“大率破碎纤仄”。(须溪集下)评班马,对“笔削微意,罕所发明”。(班马异同下)“论诗以幽隽为宗,逗后来竟陵弊体”。“评杜诗,每舍其大而求其细”。“惟评(李)贺诗,其宗派见解,乃颇相近,故所得较多”。(笺注评点李长吉歌诗下)实则也不尽然。如批史记樊郦滕灌列传赞云:

> 有樊酈滕灌,并涉蕭曹二家之业。“鼓吹屠狗”樊也,“卖繒”灌也,概言“兴也如此”,所謂疏蕩頗存奇气,不足律以后世人笔法,亦且不堪为言。“高祖功臣之兴时若此”。語别有恨。(班馬异同卷十一)

就文章言,确有所见,司马迁的赞文确是愤愤不平。评杜率多崇褒,评李则有褒有贬,如于雁门太守行后批云:

> 起語奇,賦雁門著“紫土”本嫩,后三語无甚生气,設为死敌之意,偏欲如此,頗似敗后之作。(李長吉歌詩卷一)

是刘辰翁的见解,不一定近于李贺,远于杜甫。又对于苏王诗也有褒有贬。如批苏诗赠王子直秀才云:“笙歌、鼓吹、奴婢各异,数目复多。”批松风亭下梅花盛开的再用前韵云:“非再用韵,得意前诗,草创而已。”批花落复前韵云:“此篇亦牵强。”(王状元集诸家分类东坡诗,中央图书馆藏,元卢陵坊刻本卷十四)批王诗白鹤吟示觉海元公云:“无味。”(王荆文公诗卷三)都颇有见地。

附录　兩宋詩話輯校敍录

诗话起于宋，亦盛于宋，惜存者虽多，而佚者亦伙。暇与曼漪撮录苕溪渔隐丛话、诗话总龟、诗人玉屑、诗林广记、草堂诗话、以及元板修辞鉴衡等书所胪举，益以笔记野史所援引，参伍校覈，删汰复重，辑出已佚诗话二十一种，题曰两宋诗话辑校。各书之采辑依据，作者略历，诗学见解，分为叙录详之。造端于二十四年秋，写讫于二十五年夏。祁寒盛暑，不辍把笔，如能予读者津逮，则我辈为不徒劳矣。廿五年七月廿五日，根泽记。

叙录初稿，刊布于文哲月刊一期十卷，末注云："竹庄诗话中，对各家诗话亦有征引，容后补录。"今补录，并益以累年读书偶得，据以仇校旧辑，润改旧叙。四库有曾慥类说六十卷，提要谓"取自汉以来百家小说"，恐亦取及诗话，存目著方深道集诸家老杜诗评五卷，北平图书馆藏有钞本，今皆无从稽览，惟有俟异日之再事补录云尔。卅二年十二月廿七日，又记。

一　东坡詩話

宋志子部小说类载苏轼东坡诗话一卷，郡斋读书志小说类作二卷，言："皇朝苏轼，号东坡居士，杂书有及诗者，好事者因集之成二卷。"今说郛本共三十二条，日人近藤元粹据刻入萤雪轩丛书，谓："案其体例，非东坡自著，盖后人编辑其关系于诗者也。"考诗话总龟前集引八条，与说郛重者一条，实余七条。诗林

广记引三条，草堂诗话引一条，苕旧续闻引一条，皆说郛所无。并据补入，得四十四条。又爱日楼丛钞卷三陆务观诗条云："功名在子，何异我躬，东坡诗话亦有此语。"遍检四十四条无此语，则原本不止此可知。诗话总龟所引"吾诗曰日日出东门"，"仆尝梦有客携诗文过者"二条，皆见东坡志林，知的为好事者所集，非东坡自著也。

二 紀　詩

诗话总龟前集引纪诗九条，据辑为一卷。诗话总目不著作者。中有云："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此退之听颖琴诗。欧阳文忠尝问仆琴诗何者最佳，余以此答之。公言此诗最奇丽，然自是听琵琶诗，非琴诗。余退而作听杭僧惟贤琴诗云："大絃春温和且平，小絃廉折亮以清。平生不识宫与角，但听牛鸣盎中雉登木。门前剥啄谁叩门，山僧未闲君勿嗔。归家且觅千斛水，净洗从前筝笛耳。"诗成欲寄公而薨，至今以为恨。"听惟贤琴诗乃苏轼所作（分类东坡诗卷十二作听贤师琴），知此亦为苏轼所作，否亦后人辑苏轼诗语也。书中多记述苏轼自己之诗，斯所以名纪诗之故歟？

三 蔡寬夫詩話

蔡宽夫诗话不见著录，惟清朱绪曾开有益斋读书志卷六云："余于吴山书肆得宋蔡宽夫诗话三卷，旧钞本，前无序。宋诗纪事云：'蔡居厚，字宽夫，熙宁御史延熙子。第进士。大观初，拜右正言，累官徽猷阁待制。有诗话。'余考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九引王直方诗话，载蔡宽夫启，为太学博士，和人治字韵诗，有'先王万古有何用，博士三年冗不治。'诗话自言崇宁初为检点试

卷官。景定建康志引南窗纪谈，蔡宽夫侍郎治第于金陵青谿之南，今贡院基是。据此似宽夫名启，官太学博士侍郎，与樊榭所言俱未合。”今案梅磵诗话卷上引直方诗话止作蔡宽夫，盖字而不名。诗人玉屑卷七引直方诗话作蔡宽夫天启，天字盖涉夫字而衍。宋有蔡天启，名肇，乃字而非名，知非此人，而此人当如朱氏所考，名启字宽夫，与作诗史之蔡居厚字宽夫者非一人。至吴东岩所辑渊明诗话以蔡宽夫诗话为蔡絛所作，则又涉蔡絛有西清诗话而误也。

朱氏所得钞本尚在人间否不可知，朱氏引劳季言称：“宽夫诗话俱在渔隐丛话，似当日全部收入。”谓“此本勘验悉合”。则钞本不出渔隐丛话所引。兹从丛话前集辑出六十六条，后集辑出十九条，总八十五条。诗话总龟后集引十一条，诗人玉屑引十五条，诗林广记引廿一条，竹庄诗话引十五条，野客丛书引二条，云谷杂记引一条，除玉屑所引“老杜之仁心优于乐天”一条，余皆在八十五条之内，益征劳氏所言不甚误，所以各书所引，概见丛话之内也。能改斋漫录卷八云：“蔡宽夫记天圣中，孙冕载詹光茂妻寄远诗云：‘锦江江上探春回，消尽寒冰落尽梅，争得儿夫似春色，一年一度一归来。’”不见八十六条，盖出于名居厚之蔡宽夫诗史，非此蔡宽夫诗话也。兹分八十六条为二卷。

宽夫反对诗格，谓览之使人拊掌不已（唐末五代俗流以诗自名条）；慎于用事，谓诗家使事难，称子美不为事使（安禄山之乱条）。又言：“诗语大忌用功太过，盖何腾则意必不足，语工而意不足，则格力必弱。”又言“天下事有意为之辄不能尽妙，而文章尤然，文章间诗尤然。”盖惩于晚唐五代以来之究心诗格诗法而力主自然者也。所以又谓：“前史称王筠善押强韵，固是诗家要处，然人贪于捉对用事者，往往多有趁韵之失。”所言极是，而其

诗不传，除王直方诗话所引二句外，竟无所闻，岂亦所谓“诗有别材，非关书理”邪？

四　西清詩話

宋志、直斋书录解题、通考经籍考，俱载西清诗话三卷。宋志谓蔡絛作，直斋曰：“题无为子撰。或曰蔡絛使其客为之也。”案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二云：“蔡絛约之，好学知趋向。为徽猷阁待制时，作西清诗话一编，多载元祐诸公诗词。未几，臣僚论列，以为絛所撰私文，专以苏轼黄庭坚为本，有误天下学术，遂落职勒停。”今说郛本才十一条，去原书远甚。季沧苇书目有抄本，无卷数。述古堂书目亦有抄本，三卷。艺风堂藏书记亦有旧钞本，二卷。藏书记云：“孙氏手跋曰：‘陈直斋书目解题曰，西清诗话题无为子。或曰蔡絛使其客为之也。遂假且且斋本写于华亭集贤泗北村居且喫茶处。时洪武五年，岁在壬子四月七日甲申，映雪老人谨志。年七十有六。’”三种抄本皆未见，观其卷数参差，疑非据原本传抄，或系各依渔隐丛话辑录。兹亦据渔隐丛话前集辑出八十一条，又从诗话总龟后集辑出二十二条，诗人玉屑二十三条，诗林广记二十七条(一条误作西村诗话)，优古堂诗话一条，庚溪诗话一条，草堂诗话一条，余师录一条，能改斋漫录十一条，野客丛书六条，墨庄漫录一条，湘素杂记一条，爱日楼丛钞一条，修辞鉴衡一条，履斋示儿编一条，竹庄诗话十八条。以校除重复，余一百零七条。虽不能复原书之旧，然相差想已无几。谨依宋志陈录，仍编为三卷。

编中固以苏轼黄庭坚为本，然对王安石亦未厚非。如举王文公见东坡醉白堂记云：“此乃是韩白优劣论。”东坡闻之曰：“不若介甫虔州学校记，乃学校策耳。”据谓“二公相诮或如此，然胜

处未尝不相倾慕。”至对于诗之主张，似与苏相似，主变化自得。言变化者，如云：“薛许昌答书生赠诗云：‘百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终’，讥其不能变态也。大抵屑屑较量，属句平匀，不免气骨寒局。殊不知诗家要当有情致，抑扬高下，使气宏拔，快字凌纸。又用事皆破觚为圜，剉刚成柔，始为有功者，昔人所谓缚虎手也。”言自得者，如云：“作诗者陶冶物情，体会光景，必贵乎自得。盖格有高下，才有分限，不可强力至也。”至引杜少陵云：“作诗用事要如禅家语，水中着盐，饮水乃知盐味。”谓“此说诗家祕密藏也。”以余所知，倡此说者，五代有桂林淳大师诗评，宋有严羽沧浪诗话，此谓语出少陵，不知何所本也。

五　陈辅之詩話

说郛本陈辅之诗话十一条。考渔隐丛话前集引有六条，皆说郛本所无。又诗话总龟后集引一条，已见说郛本。诗林广记、诗人玉屑、竹庄诗话、能改斋漫录，皆引王建宫词一条，已见渔隐丛话。诗学规范引论杜一条，亦见渔隐丛话。故校除复重，实得十七条。梁谿漫志卷七曰：“陈辅之云：‘林和靖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殆似野蔷薇。’是未为知诗者，予尝踏月水边，见梅影在地，疏瘦清绝，熟味此诗，真能与梅传神也。野蔷薇丛生，初无疏影，花阴散漫，乌得横斜也哉？”

辅之盖好与人立异。王直方诗话谓名辅，丹阳人。东坡志林卷一云：“九江陈辅之，有於陵仲子之操，不娶无子。今为丹阳南郭人。”（稗海本）竹庄诗话卷十八引诗事云：“自号南郭子，以诗名世，能尽其妙。少为荆公所知。”五总志云：“自号南郭先生，少从介甫游，介甫授以经旨，辅之曰：‘天生相公，辅亦读书，天不生相公，辅亦读书，愿自见也。’一日，谒公于定林，不值。留诗壁

问曰：'北山松粉未飘花，白下风高麦脚斜，正是旧时王谢燕，一年一度到君家。'介甫见之，笑谓龚深之曰：'此郎复以我为寻常百姓矣。'后与丹阳郡守作诗争衡，为守捃摭揵之，废弃终身，悲夫！"（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四，能改斋漫录卷十引王直方诗话略同，又略见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四）林和靖咏梅诗，宋人自司马光（见续诗话）以下皆称之，而辅之独谓其殆似野蔷薇，亦基于好立异耳。

六 王直方詩話

郡斋读书志小说类、通考经籍考文史类，俱载归叟诗话六卷。遂初堂书目文史类亦载之，然无卷数。郡斋读书志云："皇朝王直方立之撰。直方自号归叟。元祐中，苏子瞻及其门下士，以盛名居北门东观。直方世居浚仪，有别墅在城南，殊好事，以故诸公亟会其家，由是得闻绪言余论，因辑成此书。然其间多以己意有所抑扬，颇失是非之实。宣和末，京师书肆刻印鬻之。群从中以其多记从父詹事公话言，得之以呈。公览之不怿曰：'皆非我语也。'"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一亦引其赞（梅）圣俞在礼部考校时和欧公春雪诗，"韵恶而能用事"。驳云："余阅宛陵集，圣俞此雪诗，即非和欧公韵，乃是唱首。此诗圣俞自注云：'闻永叔谓子华曰：明日圣俞若无诗，修输一盃酒。'欧公集中亦有和圣俞春雪诗，皆在礼部时唱和，以此可见矣。王直方不切细审，遂有韵恶而能用事之语。盖其诗话中似此者甚众，吾故辨证之。"然则所述多失实可知。

原书久佚，渔隐丛话等书征引颇多，然率称王直方诗话，间亦称王立之诗话，不以归叟名也。兹汇而辑之，计渔隐丛话前集百零九条，诗话总龟前集百九十条，后集十三条，诗人玉屑四十

六条，竹庄诗话二十四条，考古质疑一条，诗林广记三十一条，优古堂诗话一条，滹南诗话二条，野客丛书二条，能改斋漫录七条，爱日斋丛钞一条，猗觉寮杂记一条，墨庄漫录一条，云谷杂记一条，清波杂志一条，侍儿小名录拾遗一条，共四百三十二条。又修辞鉴衡引诗文发源十七条，与渔隐、总龟所引直方诗话重者四条，知亦即直方诗话。并四百三十二条，共四百四十五条。以校除重复，余二百八十二条，编为六卷。

诗话有两种作用，一为记事，一为评诗。记事贵实事求是，评诗贵阐发诗理；前者为客观之记述，后者乃主观之意见。二者固有相互关系，然记事之疏，无妨于意见之是也。宋人诗话偏于记事，然就文学批评而言，则评诗尤为重要。此书记述既多失实，则尚论古人者，当然不可轻信。至评诗者，如云："谢朓尝语沈约曰，'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故东坡答王巩云：'新诗如弹丸。'又送欧阳季默云：'中有清圆句，铜丸飞柘弹。'盖诗贵于圆熟也。余以谓圆熟多失之平易，老硬多失之枯乾；能不失于二者之间，则可与古之作者并驱耳。"又云："陈君节字明信，言：'鍊句不如鍊韵。'余以为若只觅好韵，则失于首尾不能贯穿。"皆不无识见。故与其过而弃之，无宁过而存之。

七 洪駒父詩話

洪驹父诗话，遂初堂书目文史类有著录，无卷数，久无传本，兹从渔隐丛话前集辑出十九条，后集一条，诗人玉屑八条，诗林广记三条，诗话总龟后集一条，冷斋夜话一条，优古堂诗话一条，履斋示儿编一条，竹庄诗话三条，能改斋漫录四条，野客丛书一条，猗觉寮杂记二条，共四十五条。以校除重复，实二十六条，编为一卷。

宋诗纪事卷三十三云："洪刍字驹父。绍圣元年进士，崇宁中入党籍，靖康中为谏议大夫。汴京失守，为金人括财，流沙门岛卒。有老圃集。"考书录解题于洪炎西渡集下云："洪氏兄弟四人，其母黄鲁直之姊。驹父与伯兄明龟父，叔弟炎玉父，皆图入江西宗派，称三洪，又并季弟羽鸿父称四洪。"诗话二十六条，关于杜甫者七条，关于黄庭坚者四条，诚以庭坚不惟为驹父舅氏，而且为江西诗派盟主，而杜甫则江西诗派所奉为不祧之祖，故乐为揄扬也。

八 潘子真诗话

潘子真诗话，艺苑雌黄称为诗话补阙(引见渔隐丛话后集卷六)。今惟有说郛本，仅四条。兹从渔隐丛话前集辑出二十八条，后集一条，诗人玉屑九条，竹庄诗话三条，诗林广记二条，能改斋漫录六条，野客丛书二条，余师录二条，颍川语小一条，履斋示儿编一条，并说郛四条，共为五十九条。以校除重复二十四条，余三十五条，编为一卷。

子真，名惇，大父清逸老人，名兴嗣，颇能诗，著有诗话一卷，故子真所作，亦称诗话补阙。子真虽未列入江西诗宗派图，然与江西宗派颇接近。诗话中称潘邠老"与洪驹父徐师川洎予友善。山谷尝称邠老，天下奇才也。"又称"山谷尝谓余言，杜老虽在流落颠沛，未尝一日不在本朝，故喜陈时事，句律精深，超古作者，忠义之气，感发而然。"潘氏重视句律，如谓"古人造语，俯仰纡余各有态"，及讲明双声迭韵诗，皆是也。

九 李希声诗话

宋志载李錞诗话一卷，直斋书录解题及通考经籍考作李希

声诗话。陈振孙云:"秘书丞李錞希声撰。与徐师川潘邠老同时。"东坡志林卷六云:"吾故人黎錞字希声,治春秋,有家法,欧阳文忠公喜之。"称"亦能文守道不苟随者也。"与此恐非一人。李錞列江西宗派图,其诗话一卷久佚。诗学规范引二条,渔隐丛话前集引一条,诗人玉屑引一条,诗林广记引二条,修辞鉴衡引一条,校除重复,余四条,编为一卷。王直方诗话及艺苑雌黄时引李希声言,盖皆诗话中语也。四库提要诗文评类存目,著南宋人嚚嚚子编竹窗诗文辨正丛说四卷,称其"摘钞前人诗话语录而成,词皆习见,惟李希声诗话,蒲氏漫斋录,世韵语三书为稍僻尔。"不知已否亡佚,想征引甚多也。

十 潛溪詩眼

郡斋读书志小说类著诗眼一卷,称:"皇朝范温元实撰。温,范祖禹之子,学于黄庭坚。"直斋书录解题文史类、通考经籍考文史类,俱作潜溪诗眼。传世有说郛本,仅三条。兹从渔隐丛话前集辑出二十三条,诗话总龟后集三条,诗人玉屑九条,竹庄诗话十四条,诗林广记九条,草堂诗话四条,野客丛书二条,余师录二条,修辞鉴衡四条(中有三条系转引古今诗话,三条之中,一条并转引诗宪),共七十三条,校除复重,余二十七条,仍编为一卷。

元实论诗重识而矜视句法,第七章有专节诠次,故兹删略。

十一 古今詩話

古今诗话不见著录,宋志文史类载李颀古今诗话录七十卷,不知是否一书。苏轼有答李颀秀才以画山见寄诗(东坡集五),不知是否一人。兹从渔隐丛话前集辑出六条,后集二条,诗话总龟前集三百六十一条,后集五条,诗人玉屑二十一条,竹庄诗话

五条，诗林广记十一条，竹坡诗话一条，优古堂诗话一条，韵语阳秋一条，能改斋漫录二条，侍儿小名录拾遗一条，修辞鉴衡十五条，共四百三十二条。以校除重复，实三百九十四条。编为六卷。修辞鉴衡尚有引古今总类诗话八条，诗学规范亦引十四条，是否一书，不可知，姑为附录一卷。

优古堂诗话既引及此书，则其成书当先于优古堂诗话。优古堂诗话作者吴幵，绍圣丁丑中宏词科，靖康中官翰林承旨，建炎后安置永州。则此书最晚应作于建炎之前。书中言元丰初，王仲效王建作宫词，则最早应在元丰之后。所以成书盖在哲徽二宗时也。作者如即李頎，亦必为哲徽二宗时人也。

宋人诗话率一二卷，十数卷者已稀，若韻语阳秋之二十卷，实为仅见，而古今诗话录至有七十卷之多，颇疑为诗话总集，如渔隐丛话、诗话总龟之类，所以不名古今诗话，而名古今诗话录也。惜原书已佚，末由复案。篇中亦以记事为主，言及诗学者极少；有之若曰："凡诗以意义为主，文词次之。"又曰："自古工诗未尝无兴也，覩物有感焉则有兴。今之作诗者，以兴近乎讪也，故不敢作，而诗之一义废矣。"又述优人挪揄西崑诸人之窃取义山诗句，称李白之复古道，菲薄声律。盖亦附和元祐诗人，轻视西崑诗体者也。

十二　高斋詩話

高斋诗话不见著录，惟福建通志艺文志卷七十五集部诗文评类一载一卷，称："晋江曾慥著。亦园脞牍云，'未见全书，曾采渔隐丛话及他书所引者，哀为一卷。'"兹亦据渔隐丛话前集辑出二十二条，后集一条，共二十三条。诗话总龟后集引三条，诗人玉屑引九条，诗林广记引六条，竹庄诗话引二条，野客丛书、韵语

阳秋、云谷杂记、侍儿小名录拾遗各引一条，无出丛话外者，知丛话所引，几尽全书矣。

丛话、总龟、玉屑、广记皆未标作者，云谷杂记卷四及阳秋卷十六皆称曾端伯高斋诗话，知福建艺文志称曾慥著，不误也。伯端字慥，自号至游居士。孝宗乾道初右丞相怀从弟。然此书之作，则必前于孝宗，因丛话前集序于高宗绍兴戊辰，而此书不能晚于丛话也。书中率偏于考订名物故实，对诗人诗句，虽亦时加品题，而诗学见解，则苦于无可紬绎也。

十三　蔡宽夫詩史

宋志文史类著蔡宽夫诗史二卷，其书久佚。兹据诗话总龟前集辑出百一十二条，仍分为二卷。诗人玉屑引有六条，竹庄诗话引有五条，与总龟全重，知总龟所引虽未尽原书，亦所余无几。所以知未尽原书者，总龟前集卷二十八引古今诗话述刘子仪事，称"蔡居厚诗史不言刘子仪，而谓刘贡父"云云，知有删略也。

宋代盖有两蔡宽夫，一名启，作有诗话，一名居厚，作有诗史。居厚，宋史卷三百五十六有传。略言第进士，累官吏部员外郎。大观初，拜正言。宋诗纪事卷三十七称居厚有诗话，盖误以启为居厚也。至所以知诗史为居厚所作者，以总龟明称蔡居厚诗史也。

书中称："聂夷中河南人，有诗曰：'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孙光宪谓有三百篇之旨，此亦为诗史。"所以以"诗史"名者，意或在此。然覈读全书，与诗话固无异也。菲薄晚唐，谓"晚唐人诗多小巧，无风骚气味。"又谓："晚唐诗句尚切对，然气韵甚卑。"顾称赞西崑，引杨文公云："錢惟演刘筠首变诗格，学者慕之，得其格者蔚为佳咏。"然则盖尚切对，

且重气韵者耶?

十四 艺苑雌黄

宋志文史类著严有翼艺苑雌黄二十卷，直斋书录解题及通考经籍考入子部杂家类，称其书大抵辨正譌谬，其目子史、传经、诗词、时序、名数、声画、器用、地理、动植、神怪、杂事，卷为二十，条凡四百。砚冈居士唐稷序之。是涉及者颇多，并不限于诗文。然宋志既著于文史类，则盖以诗文为主。原书久佚，今可考见者，皆叙述诗文之语，故不妨以诗话目之。

流传有说郛节录本，止八条。四库全书存目有江苏巡抚采进十卷本，提要云："今考此本止有十卷，而无序及标目，与宋人所言俱不合。又宋时说部诸家，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蔡夢弼草堂诗话，魏庆之诗人玉屑之类，多有征引艺苑雌黄之文。今以此本参互检勘，前三卷内虽大概符合，而如渔隐丛话所录卢橘、朝云、鞦韆、琼花等十余条，草堂诗话所录古人用韵重复一条，此本皆不载。又如中兴条末东坡诗云云，牵牛织女条末文选注云云，俱胡仔驳辨之语，而亦概行阑入，舛错特甚。至其第四卷以后，则全录葛立方韵语阳秋，而颠倒其次序。其中如东坡在儋耳一条，立方原文有三从兄讳延之云云，此本改作葛延之以隐其迹，而其所称先文康公者，乃立方父胜仲之谥，则又沿用其文，不知刊削。盖有翼原书已亡，好事者抚拾渔隐丛话所引，以伪托旧本，而不能取足卷数，则别据韵语阳秋以附益之，又故变乱篇第以欺一时之耳目，颇足疑误后学。今特为纠正，以祛后来之惑焉。"则此十卷本者，实依伪不足据者也。

兹从渔隐丛话后集辑出七十三条，诗话总龟后集九条，诗人玉屑十条，草堂诗话一条，竹庄诗话一条，诗林广记十六条，修辞

鉴衡一条，并说郛八条，都百一十九条。校除复重，余七十八条，视原书约五分之一，诗词一目，当略尽矣。然容斋续笔卷十四，玉川子月蚀诗条，首载东坡谓董秦“非无功食禄者”，次言“近世有严有翼者，著艺苑雌黄，谓坡之言非也。”又四笔卷十六有严有翼诋东坡一条，称所著艺苑雌黄，“颇务讥诋东坡公。予尝因论玉川子月蚀诗，诮其轻发矣。又有八端，皆近于蚍蜉撼大树，招后人攻击。”所言八端，出正误、卢橘两篇者，已见七十八条；出四凶、昌阳、苦荼、如皋、荔枝等篇者，以及辩董秦功罪，则七十八条皆不见，知尚有散佚。但或出于名数、杂事等目，亦未可知。履斋示儿编引十二条，不载于诗说类，而载于字说类，盖亦出名数、杂事等目。惟榿字一条亦见渔隐丛话，始字条论杜诗“皂鹏寒始急”，白诗“千呼万唤始出来”，亦有关诗词，故一并附入。再除重复，得八十一条，析为四卷。

陈振孙称建安严有翼，四库提要称尝为泉荆二郡教官。书中僧惠洪冷斋夜话条云：“予作荆南教官，与江朝宗汇同官。”宋玉九辩条云：“予顷校士于上饶。”其可考者仅此而已。宋诗纪事小传补正卷四有江朝宗，名汉，此名汇，想非一人。所引及于张文潜明道杂志，僧惠洪冷斋夜话，陈无己诗话，蔡絛西清诗话。惠洪与东坡鲁直友善，张文潜陈无己皆苏门弟子，蔡絛为宣和时人，然则严有翼盖南渡前后人也。

十五　漫叟詩話

说郛本漫叟诗话十二条，题阙名撰。渔隐丛话引四十九条，与说郛重者一条；诗林广记引七条，与说郛丛话重者六条，故实六十一条。此外诗话总龟后集引六条，诗人玉屑引十八条，竹庄诗话引二条，草堂诗话引二条，皆在六十一条之内。书中云：“元

符中在临川作法掾。"又云:"予崇宁间,仕兴国军。" 又云:"建中靖国中,与谢民师同寓兴国寺。"知为哲徽时人。既言及崇宁,则著作更在其后。郡斋读书志小说类著漫叟见闻录一卷,称"不知何人者,建炎中所撰也。" 建炎去崇宁才二十年,或即一书,亦未可知。洛阳旧闻亦称洛阳诗话,玉堂闲话亦称玉堂诗话,宋代不乏此例。如元祐中为法掾时年三十岁,则至建炎时约六十岁,正可以称叟时也。

书中似特重用事,如称:"东坡最善用事,既显而易读, 又切当。"此外对于用事之考订尚多,虽于诗不无小补,然亦碎矣。

十六 詩說雋永

遂初堂书目文史类著诗话雋永一书,久佚。说郛中有一卷,乃元人俞正己所撰, 非此之谓也。渔隐丛话后集引诗说雋永二十条,诗话总龟后集亦引有七条,诗林广记引有一条。以校除重复,实二十二条,编为一卷, 疑即诗话雋永也。篇中称"政和末,先公为御史。"又记李易安建炎初从祕阁守建康作诗,而首言"今代妇人能诗者"云云,似作者亦建炎时人。

十七 瑤溪集

宋志文史类及通志诗话类俱载瑶溪集十卷, 知亦诗话书。通志不著作者,宋志题郭思撰。书久佚。渔隐丛话前集引二条,中一条亦引见诗林广记。又能改斋漫录卷二引郭思诗话云云,盖亦瑶溪集语, 知宋时亦有以"诗话"称者。竹庄诗话卷一引瑶溪集一条,又卷十四,丽人行下, 亦引瑶溪集云:"诗之景不一而足,今随诗出之,观作者之梗概云。"并加案语曰:"瑶溪集多立体式,品题诸诗, 强为分别,初无确论, 今并不取。独所论诗之景

者，为说虽泛，然其间类编，多前辈所称美，而后人所脍炙，故颇加删录，得五十九篇；若他有评论，已见别卷者，兹不复载。”自丽人行至卷十五雨过苏端，适五十九篇，每篇皆标举诗景，如丽人行云“一首说帝都游春之盛”，雨过苏端云“一首见朋友相聚之乐”。卷十五第一篇为陇头吟，标云“一首状边情”，注云“以下并瑶溪集云”。然则五十九篇皆原载瑶溪集，标语亦原出瑶溪集。今并丛话二条，能改斋一条，录为一卷。

郭思不知何时人，既引于能改斋漫录，当在吴曾之前。其书“多立体式，品题诸诗”，似受五代诗格影响，年代亦不当甚晚。胪引全诗，加以品题，与竹庄诗话、诗林广记体例略同，非如他家诗话之但拈一句一联，或止称某人某篇，此所以以“集”名书欤？

十八　汉皋詩話

说郛本汉皋诗话十一条，撰者阙名。兹据渔隐丛话后集、诗林广记、野客丛书补一条，又据能改斋漫录补一条，共十三条。虽所补无几，然能改斋一条称汉皋张君诗话，知作者姓张，周煇清波杂志卷五云：“顷得诗话一编，目曰汉皋。王季羔端朝尝偕去亲为是正，亦言不知人作。”又言：“一小说云，汉皋姓张，不得其名。”亦作者张姓之一证也。书中所话，率偏于字句之校勘或评正。渔隐等书所引一条云：“字有颠倒可用者，如罗绮绮罗，图画画图，毛羽羽毛，白黑黑白之类，方可纵横。”知其颇沾沾于字句间也。

十九　桐江詩話

说郛中有桐江诗话，止五条，作者缺载。渔隐丛话前集引十九条，后集引一条，诗人玉屑引五条，竹庄诗话引一条，诗林广记

引四条，诗话总龟后集引一条。以校除重复，余二十二条，编为一卷。书中言“少汲，宣和间在河朔作漕。”又言“程进道，绍兴初帅闽中，殄灭诸寇”。知成书不能前于绍兴。从话前集序于绍兴戊辰，此书当稍在前。比而推之，其绍兴十年前后之作乎？书中品题，颇重字句，如谓：“许浑集中佳句甚多，然多用水字，故国初士人云，‘许浑千首湿’，是也。”又云：“逢原句中，佳句颇多。”此外摘句品藻者，尤不胜枚举也。

二十 休斋詩話

休斋诗话不见著录，诗人玉屑引八条，诗林广记亦引二条，但皆同于玉屑，兹录下辑为一卷。休斋不详。书中颇称述自己诗句，他日或可考知其人也。除零碎品题外，有诗要有野意一条，颇新颖。其言曰：“人之为诗，要有野意，盖诗非文不腴，非质不枯，能始腴而终枯，无中边之殊，意味自长。风人以来，得野意者惟渊明耳。如太白之豪放，乐天之浅陋，至于郊寒岛瘦，去之益远。予尝欲作野意亭以居，一日题山石云，‘山花有空相，江月多清晖，野意写不尽，微吟浩忘归。’人多与之，吾终恐其不似也。”颇有隐逸诗人之风，倘菊庄之友乎？

二十一 玉林中兴詩話补遺

是书不见著录，诗人玉屑引有三十三条，曾茶山条标玉林中兴诗话补遗，余止标玉林，盖从省也。诗林广记引黄玉林五条，盖亦是书语，据辑为一卷。

黄玉林，名昇，字叔暘，玉林其号也，与诗人玉屑作者魏庆之交甚善，玉屑有黄氏淳熙甲辰序。宋诗纪事卷六十九引胡季直云：“玉林早弃科举，雅意读书，间从吟咏自适。游受斋，尝称其

诗为晴空冰柱。楼秋房闻其与魏菊庄友善，并以泉石清士目之。”宋诗纪事小传补正卷四云：“黄昇，闽人，著有散花庵词一卷，又辑花庵词选十卷行世。”独不及此书，知亡佚久矣。至其著作年代，盖稍前于诗人玉屑也。

就玉屑及诗林广记所引，除即人品述外，颇讨论蹈袭。赵天乐条云：“天乐送眞玉堂诗云：‘每于言事际，便作去朝心。’用唐人林宽语也。（林宽送惠补阙云：“长因抗疏日，便作去朝心。”）寄赵昌父诗云：‘忆就江楼别，雪晴江月圆。’用无可语也。（无可同刘升宿云：“忆就西池宿，月圆松竹深。”）赠孔道士诗云：‘生来还姓孔，何不戴儒冠？’用姚合语也。（姚合赠傅山人云：“悲君还姓傅，独不夢高宗。”）宝寇寺诗云：‘流来桥下水，半是洞中云。’用于武陵语也。（武陵赠王隐人云：“飞来南埔水，半是华山云。”）瓜庐诗云：‘野水多于地，春山半是云。’亦用姚合语也。（姚合送宋愼言云：“驿路多连水，州城半在云。”）此类甚多，姑举一二。盖读唐诗既多，下笔自然相似，非蹈袭也。其间又有青于蓝者，识者自能辨之。”王荆公勘会贺蘭山主诗条亦云：“前輩作诗有蹈袭而不以为嫌者。”此言极是。蹈袭前人，陈陈相因，固然不可；取法前人，推陈出新，则不为病。若读诗既多，下笔偶与前人相似，就词句而言，似是蹈袭，实质纯出创作，不过巧合古人而已。

二十二　餘　記

此外零珠断璧不成卷帙者，与非诗话而偶为人引作诗话者，尙甚多，分别叙述，以为余记。

名贤诗话一条，引见艺苑雌黄及诗学规范。考宋志载不知作者之唐宋名贤诗话二十卷，或其仅存者歟？

松江诗话一条，引见野客丛书卷二十三。

李君翁诗话一条，引见西溪诗话卷上。

松江诗话二条，一引见野客丛书卷七，一引见同书卷二十三。

抒情诗话一条，引见竹庄诗话卷二十。

胡氏评诗二条，引见诗话总龟后集卷五。

臞翁诗评二条，引见诗林广记前集卷四。

蔡百衲诗评一条，引见竹庄诗话卷一。

师氏诗说三条，引见竹庄诗话卷十一。

徐柏山诗庄二条，一引见诗林广记前集卷四，一引见同书前集卷六。

诗休二条，引见诗林广记前集卷八。

诗引二条，引见诗林广记后集卷三。

艺苑丛谈一条，引见诗林广记后集卷四。

芥室诗话一条，引见能改斋漫录卷五。

吕氏诗事录一条，引见能改斋漫录卷八。

藜藿野人诗话二条，引见诗人玉屑卷三与卷七。

诗宪三条，引见修辞鉴衡。

上述十七种，七种以诗话名，余十种虽不名诗话，而审其性质，亦诗话者类耳。

洛阳诗话一条，引见诗话总龟前集卷五。但卷四、卷三十六俱引作洛阳旧闻。洛阳旧闻，司马光撰。

朱定国诗话一条，引见诗话总龟前集卷三十九。但卷一、卷二、卷十七俱引作续归田录，卷三十六引作朱定国续归田录（原作录曰续归，误），卷四十二引作朱定国归田录。又前列集百家诗话总目，有朱定国续归田录，无诗话，知原名续归田录。

玉堂诗话七条，引见诗话总龟前集卷十二。但卷十八引作

玉堂闲话，总目有玉堂闲话，无诗话，知原名闲话。

桂堂诗话一条，引见诗话总龟前集卷三。但总目有桂堂闲话，知原名闲话。

漫斋诗话一条，引见竹庄诗话卷十一。但他卷皆引作漫斋语录，知原名语录。

西溪诗话一条，引见竹庄卷十八。但他卷皆引作西溪丛话，知原名丛话。

西斋诗话一条，引见野客丛书卷九。考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引西斋话纪一条，疑出一书。或原名话纪，野客丛书引作诗话欤？

又诗话总龟前集引闲居诗话十一条，与司马光续诗话重者五条，与中山诗话重者二条。与中山诗话重者二条中，一条亦见于续诗话。考诗话总龟前集未引续诗话，后集引一条，作迂叟诗话，然则闲居诗话或亦续诗话之别名欤？

中国文学批评史

三

罗 根 泽 著

(原中华上编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青浦环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9.25　字数 194,000
1984年3月新1版　1984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2,700

统一书号：10186·431　　定价(七)：0.95元

統一書號:10186·4
定　　價: 0.95 元